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出版

● 第 21 期 ●





本所所長陳三井及助研究員許文堂於 1995 年 10 月，參觀訪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杭州大學舉行「中法關係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全體出席人員合影。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二十一期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抗戰建國暨台灣光復：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	卓遵宏 3
	「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王奇生 13
	「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爭之再檢討：	
	新資料與新解釋」國際研討會	張力 25
	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 ...	黃克武 36
	滬杭史學之旅	陳三井 46
會議消息	美國東南區亞洲研究協會第卅五屆年會	54
<hr/>		
學人簡介	從「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者	
	——王家儉先生	葉高樹 57
	隨意寫新詩 白首下書帷——	
	周策縱先生治學的三大領域	周昌龍 68
	橫山英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曾田三郎 79
<hr/>		
研究心得	撰寫《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	
	的若干心得	蘇雲峰 87
<hr/>		
研究概況	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國研究	李國祁 100
	對兩岸研究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史現狀的省思	青石 115
	關於中東鐵路研究評述	譚桂戀 137
	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 Literature	Christian Henriot 151
<hr/>		
史料介紹	關於中日戰爭日方史料的收藏與介紹	
 加藤陽子撰，川島眞、傅奕銘譯	176
	越飛與孫中山——蘇俄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的一頁 ...	林軍 185

新書評介 黃自進著：《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
（1906~1932）》..... 川島真 208
耿雲志、崔志海著：《梁啟超》..... 黃克武 216
陶文釗等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 吳翎君 224

學位論文 台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
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5.3~1996.1）..... 公小穎輯 229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4.12~1996.3）... 公小穎輯 231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1~20期總目..... 237

封面設計：黃憲鐘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

主任委員 陳三井
編輯委員 陳三井 林明德 李恩涵 魏秀梅
張瑞德 張啓雄 黃自進
執行編輯 張啓雄
助理編輯 張秋雯 吳翎君 公小穎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半年刊 第 21 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公司 7054251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台幣 250 元

學術會議

抗戰建國暨台灣光復：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

卓遵宏*

一、前言

國民政府領導的對日抗戰，是國史上動員人力、物力最多，戰事堅持最久，戰區範圍最廣；亦為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反侵略殊死戰。其對我國政治、社會、經濟、文教等層面的衝擊也特別大，影響尤為深遠。另一方面，被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同胞，戰時以不同的形式支援祖國抗日；及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與其他淪陷區的同胞一樣，以最興奮歡欣的心情，迎接慶祝勝利與重歸祖國。勝利與光復迄今恰五十周年，國史館職司修史，為探索這場聖戰的真實史蹟與戰後的影響，特將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第三屆的主題定為「抗戰建國與台灣光復」，以彰顯先烈先賢暨全國同胞為國家民族的存亡所作的奮鬥與犧牲。

國史館為辦好此次討論會，事前作了兩項規劃：第一、秉持純學術原則，不預設立場，廣泛邀請相關學者專家自行選題，撰寫學術論文。第二、擴大籌備委員會組織與工作人員編組，籌備委員除增加館內同仁達九名外，另敦聘館外史政機構首長與近代史學者王曾才、王壽南、宋晞、李國祚、李雲漢、張玉法、陳三井、傅應川、劉鳳翰、蔣永敬等十位望重士林，學識淵博之學人參與籌劃。同時將工作人員擴編至三十六人，均遠超出前二屆，亦較國內一般研討會工作人員為多。主辦單位有意辦好這次討論會的決心，明顯可見。

* 國史館纂修

二、議程

這次會議於 1995 年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假台北市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召開，分「抗戰建國史」與「台灣光復史」兩組十四個場次進行，全部論文如下：

（一）抗戰建國史組

- 蔣永敬：從團結禦侮到共赴國難
徐光明：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對日政策之分析
朱文原：何應欽與西安事變
傅寶真：抗戰期間外國駐華軍事顧問組織之比較研究
陳慈蓉：抗戰初期蘇聯對華外交與軍援
胡健國：抗戰時期鄂北五戰區軍糧供需略論（民國 30 年 10 月至 32 年 9 月）
莊焜明：林繼庸與戰時中國工業
陳慈玉：戰時日本煤業統制下的華北礦工
王綱領：美國戰後對華投資交涉——中美關係的轉捩點之一
傅應川：抗戰時期國軍「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之戰略涵義
陳在俊：中日全面戰爭「持久戰」的研析
劉維開：戰時黨政軍統一指揮機構的設置與發展
華中興：抗戰前中央航校的飛行教育（1932~1937）
劉祥鋒：抗戰初期空軍戰列部隊兵力問題（民國 26 年）
卓文義：抗戰初期武漢制空保衛戰之研究
王繩果：太平洋抗日戰爭期間美軍攻台計畫分析
李恩涵：抗戰期間日軍在華北的「三光作戰」暴行
塗叢柏：日本戰後軍國主義復甦之分析
沈上明：抗戰勝利後軍事接收決策問題的探討
高純淑：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部署
林桶法：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人員的探討——以平津區為例
陳存恭：毛澤東抗日統戰策略初探
許秀容：「抗大」與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運用
林富水：抗戰時期的國共談判——不對稱權力結構下的分析
陳亦榮：抗戰時期劉文輝治康初探

- 吳淑鳳：行憲前後的黨政關係（1946~1948）
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之初創與在抗戰期間的文化貢獻
張力：抗戰前期國聯在華防疫事業
賴淑卿：抗戰時期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經過
陳立文：抗戰期間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努力
劉鳳翰：抗戰期間台籍日本兵問題之研究

（二）台灣光復史組

- 李雲漢：蔣中正先生與台灣
洪喜美：光復前後中國國民黨台灣黨務的發展（1940~1947）
侯坤宏：二二八事件研究——以國史館藏相關檔案史料為中心之探討
張淑雅：杜勒斯與對日媾和中的台灣問題（1950~1952）
何鳳嬌：日據時期日本收奪台人土地之初探——以工業用鹽土地之收買為例
薛月順：資源委員會與戰後台灣公營事業的建立
查時傑：台灣光復初期的基督教會（1945~1949）
簡笙簧：光復後政府接運旅日台胞返籍之探討
林蘭芳：日據末期台灣「皇民奉公」運動（1941~1945）
遲景德：台灣光復後的土地改革——一次研討會的論文綜述
卓遵宏：台灣光復與經濟發展——記台灣光復後經濟發展研討會
李南海：制憲時期台灣地區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

三、論文述要

討論原擬按論文內容安排場次，但受限於少數主講人的時間，無法盡如理想。茲依性質歸類次第討論如下：

（一）戰前策略：包含三篇探討抗戰前國家政策，及其與中日爆發全面大戰之關係的論文。政大教授蔣永敬〈從團結禦侮到共赴國難〉，討論戰前中國經歷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戰役、長城抗日、勦共有成，加上和平解決兩廣事件與西安事變，使國內分歧意見，在團結禦侮前提下，步調漸趨一致，及盧溝橋事變爆發，才有全國共赴國難之壯舉。空軍官校政治系主任徐光明〈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國對日政策之分析〉，首先討論事變時的國內與國際環境，說明國民政府在既不易得到外援，又與日本軍力懸殊

下，對日政策殊多限制，以致採取不抵抗政策，避免與日武裝衝突，此政策雖正確，但與國人抗日狂潮相左，不易得到國人諒解，反被中共利用作為攻擊誣蔑的利器。國史館協修朱文原〈何應欽與西安事變〉，認為西安事變關係抗戰極鉅，何應欽於事變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其策略原是勦撫兼施，揮軍討逆，旨在營救蔣中正，故能促使事變早日結束，避免內戰；醜詆何氏有殺蔣禍心實屬歪曲史實。此三篇文章均能把握戰前的大局趨向，對抗戰之爆發有撥雲見日之效。

（二）軍事戰鬥：計七篇文章，可見戰爭本身仍不失為討論抗戰的主要內容。其中兩篇談戰略，國防部史政局長傅應川〈抗戰時期國軍「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之戰略涵義〉，係批駁中共宣傳「正面戰場是國軍打的，敵後戰場是中共軍打的」而作的研究。由於上海八一三戰役，國軍傷亡過重，乃有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之戰略，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之潛力，故可運用以敵後方之游擊戰為抗戰的重要手段，惜此戰略受到中共之襲擾，影響後期之功效。中日關係研究發展委員會研究委員陳在俊〈中日全面戰爭「持久戰」的研析〉，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野心勃發，已註定無可避免中日大戰與美日決戰。蔣介石歷經憂患，體認出反制日本應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日人毫無警覺，在舉國狂歡攻占武漢、廣州之時，其百萬大軍已深陷大陸泥淖中。

有三篇討論空軍的訓練與戰鬥。空軍官校副教授華中興發表〈抗戰前中央航校的飛行教育〉，探討國民政府創建中央航空學校的宗旨、構想、沿革、師資、設備、訓練與學生背景及教育成果。史政局史政員劉祥鋒以〈抗戰初期空軍戰列部隊兵力問題〉為題，討論抗戰爆發雙方空軍之質量，認為開戰之初，中國空軍飛機性能與數量不亞於日軍，空戰差距不大，然中國工業無法支援戰時之飛機耗損，維修之機師亦缺乏，飛行員之補充均不及日本，故初期過後即難發揮戰力。空軍官校文史系主任卓文義宣讀〈抗戰初期武漢制空保衛戰之研究〉，本文指出保衛武漢為國民政府的重要課題，因而動員了龐大兵力，包括空軍。其時日軍動員之各種飛機計達四百架，中國空軍經一年之損耗，元氣大傷，幸蘇俄及時接濟，武漢戰前方有二百三十一架，約占日空軍之二分之一強，然在制空保衛戰中仍有輝煌戰果。綜觀三篇論文，可知戰前中國已醒悟現代戰爭中空軍的重要性有意急起直追，戰事爆發初期雖勉能應付，但在整個科技工業無以為繼下，空軍難以持續支援戰局。

另外兩篇，一為戰術督察委員會主任王繩果之〈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軍攻台計畫分析〉，討論自 1943 年美軍開始反攻，採用跳島作戰，戰略目標逐步推進至選擇反攻呂宋或台灣時，對其所擬攻台的計畫，經比較分析美軍攻台勝算與探究戰術目標之爭議。另一篇則探討〈抗戰期間日軍在華北的「三光作戰」暴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恩涵指出：三光作戰是日軍於戰時在中國實施燒光、殺光、搶光的暴行。此為有系統、大規模地殺戮戰鬥與非戰鬥人員，破壞公私房舍，搶走糧秣、物資與各項設備之總稱，表現極其野蠻殘暴。國人應向日本索取賠償。

（三）戰時政治：國民政府新統一不久，內部仍多齟齬，攘外還需內部的一致，加上國共問題與準備光復台灣等重大事件，使戰時政治成為史家重視的焦點。關於政治的有八篇，中央黨史會總幹事劉維開〈戰時黨政軍統一指揮機構的設置與發展〉指出：戰爭初起，黨政軍領導繫於蔣中正一身，上下和諧緊密；但為適應戰時需要，復有設置統一指揮機構之議，歷經國防委員會與國防會議、大本營之擬議與軍事委員會的改組、國防最高會議與國防最高委員會的設置，結果均不盡理想，惟仍有一定作用。國史館助修吳淑鳳〈行憲前後的黨政關係〉指出：勝利後，中國應走向政黨政治的常軌，國民政府乃召開制憲國大，招致中共與民主同盟之抵制，民青兩黨也因落選者眾而有怨懟，暴露國人對政黨政治的認知幼稚，民主憲政之實施尚有遙遠之路程。國史館助修陳亦榮〈抗戰時期劉文輝治康初探〉認為：戰時劉文輝擔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勵精圖治安定後方，支援抗戰有一定貢獻；但其視西康為個人地盤，對中央以應付為主，中央對該省控制仍屬有限。

戰時國共關係仍時鬆時緊。政戰學校碩士現服務於海軍的林富水發表〈抗戰時期的國共談判〉，以新的談判理論，從權力結構、戰術與談判結果等項分析國共談判。發現中共不斷修正權力結構，對戰術倚賴甚多且靈活。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存恭〈毛澤東抗日統戰策略初探〉，探討毛抗日統戰思想的醞釀與實踐，認為毛走上革命，是共產國際對華的統戰。戰時中共聲稱共赴國難，卻暗中保全自己，其理論漏洞百出，但時空環境成全毛之生存發展條件。國史館科長許秀容〈抗大與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運用〉說明：中共「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於戰時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吸引熱血青年前往，給予政治、軍事教育，培訓為中共奪權的幹部。中央黨史會主任委員李雲漢宣讀〈蔣中正先生與台灣〉，

指出蔣公後半生勳業在台灣，其對台灣之最主要貢獻有光復台灣、保衛台灣與建設台灣三項。往昔中共與中外異議分子之責難，實欠公允。國史館纂修洪喜美發表〈光復前後中國國民黨台灣黨務的發展〉一文，探討中國國民黨於民國 29 年設立台灣黨務籌備處，台灣光復後正名為台灣省黨部之經過，並對抗日期間及光復初期變動政局中台灣黨部扮演的角色，重新評估。

（四）中外關係：抗戰前後的中外關係也是學者有興趣的論題，計有七篇論文。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力〈抗戰前期國聯在華防疫事業〉指出：抗戰爆發，中國隨即向國聯請求援助，國聯同意撥給兩百萬瑞士法郎，派遣三個流動防疫工作隊來華，其他會員國也提供醫療器材與大量藥品，協助中國防疫。至民國 29 年歐戰爆發，國聯無以為繼，縮小工作範圍，30 年初終告結束。史政局史政員陳慈蓉〈抗戰初期蘇聯對華外交與軍援〉，指出抗戰初期中國極力爭取外援，但只有蘇聯願意伸出援手，因此中國自然積極與蘇改善關係。彰化師範大學教授傅寶真〈抗戰期間外國駐華軍事顧問組織之比較研究〉，比較戰時德國、蘇俄與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對我反侵略戰爭的積極貢獻與不良負面影響，指出各國顧問團成效之良窳與其所屬政府對華援助，與兩國利害關係有直接關連。文化大學副教授陳立文〈抗戰期間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努力〉，係採用中、美、英三方面檔案，探討廢除不平等條約到簽訂平等新約所經歷之艱困過程。國史館協修賴淑卿〈抗戰時期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經過〉，敘述戰時中美特種合作所之成立，初為中國與美國海軍以口頭約定，雙方作情報與裝備之相互支援，後因美戰略局介入，美方內部不和造成對中國不良影響。

另外二篇論文為與抗戰直接相關的戰後中外關係，一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淑雅〈杜勒斯與對日媾和中的台灣問題〉，本文利用美方與中國公佈之檔案，從美國對台政策的角切入，探討對日媾和的過程中有關台灣問題的協商，美國全權代表杜勒斯扮演的角色，及華府欲藉對日和約達成對台政策目標。一為文化大學教授王綱領〈美國戰後對華投資交涉〉，本文指出 1943 年中國與列強簽訂平等新約，隨後日本投降，國人又陶醉於四強虛名，對於美國在華投資案，堅持民族立場，不予優惠；既忽視美國資金與技術對中國之重要，復忽略尊重盟邦之傳統，終使美人對我失望怨懟，而棄國民政府於不顧。

（五）戰時社會經濟與文教：國史館纂修胡健國〈抗戰時期鄂北五

戰區軍糧供需略論〉，鄂北自民國 29 年起，即糧食不繼，窘迫情況持續至抗戰結束。由此而引發軍方與地方政府覓糧之歧見、徵糧與搶購之雜亂，甚至鬧成民眾抗拒納糧等情事，本文一一深入探討。工技學院副教授莊焜明〈林繼庸與戰時工業〉指出：為使中國工業不被日本毀滅及保存國家工業命脈，林繼庸一身負起倡議沿海工廠內遷，推動內遷工廠復工與開發西北工業等重任，影響中國戰時工業發展頗大。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慈玉〈戰時日本煤業統制下的華北礦工〉指出：日本為掌握中國煤礦，使其產銷配合日本工業發展所需，意欲建立「東亞煤業帝國」，乃陸續接收華北煤礦，並以包工制剝削勞工強制增加生產。國史館助修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之初創與在抗戰期間的文化貢獻〉，敘述中央圖書館籌備於民國 32 年，至抗戰爆發，籌備處西遷重慶，新建新館，收集戰火中瀕臨散佚之古籍珍藏，使中華典籍免於淪亡，被譽為「戰時文化之宮」。

（六）日據台灣問題：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劉鳳翰〈抗戰期間台灣日本兵問題之研究〉指出：日本在發動戰爭期間急需人力支援，乃徵召台籍人員擔任軍屬、軍夫、通譯等工作，隨軍前往大陸與亞太戰區，1942 年起更實施志願兵制度，1944 年並強制徵兵，總數在二十萬人以上。國史館助修何鳳嬌〈日據時期日本收奪台人土地之初探〉，係透過日人強制收買工業用鹽土地為個案，探討日本台灣總督府對台灣土地收奪手段及台人反應。立法院協編林蘭芳〈日據末期台灣皇民奉公運動〉，指出 1941 年日本總督府在台灣推動皇民奉公運動，進行對台人訓練，要求增產以確立戰時體制，為達成此目標方視台人為皇民。透過此三篇論文，略可窺知日本帝國對殖民地人民之蹂躪與濫用。

（七）戰後問題：有四篇，其中三篇為接收問題。史政局史政員沈上明〈抗戰勝利及軍事接收決策問題的探討〉，指出抗戰勝利時，國軍兵員戰力的不足，無法進行軍事總接收，乃思藉外力掩護，在華北華東採妥協與和談，而傾全力接收東北，卻遭受中共抗擊，未能如願。中央黨史會專門委員高純淑〈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部署〉，本文討論自抗戰末期準備接收東北至日本投降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等自重慶起飛赴長春期間，國民政府對接收東北的各項部署，包括組織東北調查委員會、成立東北行營、調整東北省區、派定接收人員、進行外交交涉等項，佈置雖謹慎卻已失去先機，給予中共坐大機會。輔仁大學副教授林桶法〈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人員的探討〉，指出國民政府雖極重視接收人員之能力操守，

但接收人員之貪污卻弊端重重，留下不良影響。另一篇探討戰後日本問題，為空軍官校教官塗叢柏〈日本戰後軍國主義復甦之分析〉，本文討論戰後日本迅速復興，自衛隊已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尤其八十年代開始擴增國防經費與軍備，既違憲又有步上軍國主義復甦之危機。

（八）台灣光復後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國史館處長簡筌簧〈光復後政府接運旅日台胞返籍之探討〉，指出戰時旅日台胞約五萬人，光復之初如何籌措返台經過，及政府對返鄉台胞之接待與安置。部分返鄉及就業未蒙妥善照料，以致對政府心懷不滿，而加入反政府行列。台北技術學院講師李南海〈制憲時期台灣地區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敘述民國35年10月底台灣地區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之過程，分析候選人之學經歷，並指出其時代意義。國史館協修侯坤宏〈二二八事件研究〉，係以國史館典藏之檔案卷牘配合其他史料，從政治、社會、經濟等三方面探討二二八事件之真實內涵。台大歷史系教授查時傑〈台灣光復前後的基督教會〉，旨在探討台灣光復前後的兩個截然不同時代裏，基督教會如何受到不同統治形態的影響，而呈現過渡、轉變與大不相同的面貌。

有關台灣光復後經濟的論文有三篇，均由國史館同仁撰寫。助修薛月順〈資源委員會與戰後台灣公營事業的建立〉，敘述台灣光復初期，資委會派員抵台，透過接管方式，將日本在台的工礦企業轉變為公營事業，並訓練一批技術人才，奠定台灣強有力的經濟基礎。此外纂修遲景德與筆者分別就國史館前舉辦的兩次台灣經濟史研討會：「台灣光復後土地改革研討會」與「台灣光復後經濟發展研討會」宣讀之論文與會議內容作簡介。前篇尚對該次九篇論文作綜合性檢討；後篇於摘述論文要旨之餘，提出著者對台灣光復與經濟發展兩者間緊密關係之看法。

四、會議記略

本次討論會正值秋高氣爽，中央圖書館適於台北市之中心，交通頗為便利，加上抗戰建國與台灣光復又是今年（1995）眾所矚目的焦點，占天時地利與人和，故此次會議之盛況超越前兩屆。應邀出席學者有來自四十餘個學術機構與民間社團，出席人數達二百餘人；而且前來觀禮之貴賓與採訪之新聞記者亦甚多，有幾位尚於禮成後繼續旁觀，全程參與，精神可感。行政院連戰院長於開幕典禮中致詞，重申抗戰勝利與光復台灣之意

義，並報告其祖、父兩代抗日經過及對台灣重回祖國之熱望。連院長的致詞為大會添增幾分新聞性。抗戰與軍事有極其密切關係，因此大會特約請軍方學者提供十篇有關軍事的論文，由不同角度來探討抗戰史。十位受過高深軍事教育之學者對國防決策、軍事技術、戰略戰術等方面均頗能掌握，以其所長與史學家交流對話，截長補短，互有助益，一改往昔文武殊途之偏見。此次四十三篇論文中有關抗戰的三十一篇，台灣的十二篇，其中尚有二篇以抗戰為主題，內容涵蓋及台灣光復部分，作者中一半屬年輕學者，顯示戰後出生的一代對抗戰與光復史事仍投以相當的矚目。其中林富水為布農族人，使撰稿群更具廣闊包容性。

這次論文涵蓋內容相當平整，雖軍事作戰略多一些，但戰時政治、外交、經濟、社會各方面亦為數不少；在時限上，抗戰前、中、後期與台灣光復部分不分軒輊。本來此次論文原定完全由受邀學者自訂題目撰寫，唯於（1995年）7月14日第二次籌備會議時，籌備委員李國祁教授發現已邀學者提報之論文多以小範圍專題為主，雖符合學術論文之旨意，惟以舉辦慶祝抗戰與台灣光復言，難免不無見樹不見林之憾，如能斟酌中心主題中必不可少之議題，特約專家撰文，方能光大抗戰史之完整光芒。於是特邀蔣永敬教授執筆撰寫抗戰決策，敬邀李雲漢教授撰述領導階層。有關光復後台灣經濟建設方面，因短期內難找到合適人選，故委請遲景德教授與筆者就國史館已舉辦之兩次研討會成果提出報導。此外，陳存恭教授又適時改題寫毛澤東抗日統戰策略，劉鳳翰教授提交台籍日本兵研究。而黨史會國史館之資深研究人員陳在俊、簡笙簧、洪喜美等亦傾囊取出各人絕學，頓使會議內容巨細靡遺，蔚然可觀。

二天十四場的討論會都在平和理性與求真求實的氣氛下，熱烈進行，會議雖具有濃厚的慶祝性質，然不失其學術性之嚴謹。對戰時全國上下犧牲奮鬥與銜哀奮勵之舉，固受讚揚，而對決策措施失當與接收私心貪婪史實，則嚴加批判，未予寬貸，對於論文中之創見予以肯定，對似曾相識之論文，亦有指點。最後的壓軸是綜合討論，其中有幾個共同議題：一為呼籲國史館、黨史會、中央研究院、史政局，甚至台灣省文獻會等史政機構，應共同合作，購置史料與互通有無（陳存恭、呂實強、陳在俊、李雲漢）。二為呼籲儘速開放大溪檔案，提供研究使用（蔣永敬、陳存恭、張力）。三為呼籲出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蔣永敬、劉鳳翰、陳存恭）。

建言方面，黃大受教授指出台灣同胞被日人屠殺的，絕不只目前所知

的少數事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之《台灣現代史》記載有六十五萬人，我們應確實調查，且該於殉難處立碑紀念，以誌不忘。蔣永敬教授認為目前中華民國正面臨危機，大陸否定民國存在，台灣也有人對國號動搖信心。中華民國史關係民國存亡，應積極鼓勵研究，因此亦肯定本次討論會之召開，具有正面意義。張力教授說今年海內外有許多關於抗戰史的研討會，我們應充分掌握資訊，將有助於瞭解抗戰史的研究現況與成果，可為開拓未來研究之方針。陳在俊教授呼籲廣搜國外史料，編譯出版以利研究，如史政局編譯日本防衛廳出版之一百零二冊戰史，頗值借鏡；不過外人著作多有立場，最好加註，以便初學者辨識。莊焜明教授建議國史館蒐集近年來國內外研究抗戰建國之史料與論著，聘請專家予以評介，以供學界與教育界參考使用。同時亦肯定將新近小型研討會之會議成果，介紹給未能參與之學者，不失為好辦法。呂實強教授認為中華民國在大陸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卻有五十年，因此不可忽視台灣史的研究。張玉法教授主張學術討論會要儘量回歸到學術，不要討論政治。研究本地史有其方便與必要，不可認為研究台灣史就與台獨運動有關。同時研究國家歷史與地方歷史都應齊頭並進，歷史學者不可用政治觀點曲解歷史。

綜合討論結束，潘館長簡要致閉幕詞後，兩天愉快而豐收的會議就此閉幕。本次所有宣讀之論文，將請作者修正，而後輯為《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出版，供各界參考使用。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依本刊格式用有格稿紙謄寫，電腦打字稿並附磁片尤受歡迎。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三份。
- (7)來稿請寄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王奇生*

一、會議緣起及概況

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是時下中國學術界探討的一個熱門課題，因與當前中國現實進程緊密關聯，近年來頗引起國內學術界的深切關注。美國比較現代化學者布萊克（C. E. Black）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有三次偉大的革命性轉變。第一次革命性轉變是原始生命經過億萬年的進化以後，出現了人類；第二次革命性轉變是人類從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而第三次革命性轉變則是近幾個世紀以來正在經歷中的發展與變遷，全球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域從農業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¹ 近代以來，古老的中國經歷了其開天闢地以來最為劇烈的衝撞與變遷，千年不變的傳統社會發展模式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簡直可以以「十年一變」的頻率來考量。² 就當下而言，中國又同時面臨著三種轉型：其一，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其二，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其三，從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轉型——本來，中國時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但西方國家進入後工業時代所面臨的問題，今日中國也不能脫其干係，這種犬牙交錯的時代使命橫陳在中國人面前。中國社會現代轉型任重而道遠。

1995年10月28日至31日，「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由著名歷史學家、華中師範大學前校長章開沅教授策劃，由華中師大歷史研究所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會議籌備者邀約時希望學者們從歷史與現實的契合點上，探討

*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1 參見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浙江，1989年中譯本），頁1-4。

2 參見唐德剛，〈論「轉型期」與「啓蒙後」〉，見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詮釋》（上海，1993年），序言。

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以及主流文化的重建。應邀出席本次研討會的海內外學者共計一百二十餘人，分別來自美國、日本、香港、臺灣和大陸各地。

大會於10月28日上午舉行開幕典禮。開幕後，隨即由日本駿河臺大學法學部野澤豐教授、武漢大學哲學系蕭蕙父教授、美國賓州愛丁堡大學心理學系李紹崑教授和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李金強博士發表專題演講。野澤豐教授的講題是〈日本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蕭蕙父教授的講題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回顧與前瞻〉；李紹崑教授的講題是〈愛國愛教的馬相伯先生〉，李金強博士的講題是〈清季福州新教育的建立及其影響〉。

根據會議主辦者的安排，除開幕式和閉幕式分別以半天時間採取全體會議的形式外，其餘均以小組會議的形式進行論文報告與討論。鑒於論文篇數太多，主辦單位乃分成三個小組：A組主要探討社會轉型問題；B組主要討論文化變遷問題；C組則集中報告教會大學史。每位提交論文的學者均安排了十五分鐘的論文報告時間，並事先指定了一位論文評論人。會議開得緊張而活躍，加之赴會代表以中青年學者為主，大家暢所欲言，均感大會開得圓滿成功。

二、討論述要

鑒於本次會議提交的論文篇數多，且涉及的主題十分寬泛，本文限於篇幅，勢難一一詳加介紹，僅就幾個論題相對集中的方面擇要簡述如下：

（一）社會轉型綜論

如何界定社會轉型與文化轉型？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具有什麼特徵？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有何影響？不少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馮天瑜教授（武漢大學歷史系）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芻議〉一文中認為，所謂「文化轉型」，是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整體性變革。今天我們所討論的「現代轉型」，是指從自然經濟為主導的農業社會向商品經濟為主導的工業社會演化的過程。馮教授著眼全球，探討了「內發自生型」和「外發次生型」兩種不同型態的現代轉型，並指出中華文化現代轉型的激變性和複雜性，認為中國的現代轉型，不僅要完成文化的時代性躍進，還要處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與變異這一對矛盾。中國學界自十九世紀末葉開始，直至二十世紀八九〇年代仍然眾說紛紜的「體用

之辯」，正是中華民族現代轉型過程中，時代性轉換與民族性維繫之間複雜關係的形而上反映。對此，謝放教授（四川大學歷史系）在〈中體西用：轉型社會的文化模式〉一文中認為，「中體西用」的內涵有學術文化與政治文化之分。在學術文化層面，「中體西用」強調的是弘揚儒學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在政治文化層面，則強調以「三綱」為核心的傳統禮教。因學術與政治的不可分，人們在反對傳統禮教的同時，連儒學的學術傳統也一併拋棄；同樣，人們在維護儒學的學術傳統之時，又不自覺地維護了傳統禮教。於是，自「中體西用」提出來以後的中西文化論戰，始終擺脫不了這一「怪圈」。謝教授認為，這正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期文化變遷所具有的特點。

在中國傳統文化對近代社會轉型的影響問題上，周積明教授（湖北大學歷史系）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的三種動態〉和蕭功秦副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未赴會）的〈從中國傳統文化看早期現代化的兩難矛盾〉分別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蕭功秦副教授認為，雖然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中存在著若干有利於現代化的整合因素，然而自近代以來，中國又恰恰是一個在走向現代化進程中遭遇巨大挫折與創痛的國家，因此，他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應對現代化的挑戰的能力著手，分析近代以來現代化過程所陷入的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矛盾衝突。周積明教授則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入手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於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啟動，具有極其複雜的意義。由於傳統文化是一種自然經濟和宗法制同質的觀念形態，是一種反映和維繫傳統經濟和政治局面的思想體系，因此，它在系統意義上與現代化進程是相衝突的，更無法構成現代化的原生形態。然而，一旦變遷開始發生，傳統文化便發生功能上的解析：一部分貫通變易與改造，直接或間接轉化成為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動力因素；另一部分價值密度高的內容則形成抵禦現代化進程的強韌防線。郭齊勇教授（武漢大學哲學系）則認為，無論中國社會如何轉型，中國文化如何變遷，作為根源性的智慧，中國傳統精英文化和哲學永遠不會過時。中國文化與哲學的資源，不僅在「用」的層面，而且在「體」的層面，都是現代化的源頭活水。這是郭教授在其〈中國哲學資源與當代社會人生〉一文中所闡述的中心論點。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一直在尋找一種理想的社會發展模式。何一民副教授（四川大學歷史系）的論文〈對小生

產平均理想的超越——論康有為的大同學說〉認為，十九世紀末，當中國開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之際，人們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具體考察了康有為的大同學說，認為康有為的大同學說乃集中外理想社會之大成，超越了中國傳統的小生產平均理想，使中國人對未來社會的探索有了一定的科學根據。繼康有為之後，梁啟超對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理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等作了全面研究。董方奎教授的〈略論梁啟超對社會轉型理論的研究〉著重闡釋了梁啟超的政體轉型理論，認為梁啟超以開明專制為過渡的社會轉型論，在理論上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

（二）思想演化與文化變遷

社會結構的變遷，既是思想演變的造因，也受思想演變的影響。因此，思想演化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便成為這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之一。羅志田教授（四川大學歷史系）提交的〈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思想權勢與社會權勢的轉移及其互動關係〉一文，引發了與會代表的興趣。羅教授認為，以士農工商四民為基本要素的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在自身演變出現危機時，恰遇西潮的衝擊而解體，拉開了近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序幕。在西潮衝擊下的中國士人由於對文化競爭的認識不足，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點。文化立足點的失落造成中國人心態的劇變，從自認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認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近代中國從此失去重心。羅教授論文重點考察了傳統士人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化、知識分子在社會學意義上的邊緣化、以及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這一連續、相關而又充滿變化的社會進程。

一種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理念或具有廣泛動員力的社會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民族主義在中國近現代即是一種底蘊深厚的思想資源和社會動員力量。羅福惠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的〈民族主義思想研究導論〉一文對近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蹤跡作了系統的爬梳，並對民族主義的評價和民族主義研究方法作了很好的歸納。馬勇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三民主義：中國現代化的選擇與誤區〉則取了別一角度。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三民主義是孫中山關於中國現代化理論的一個偉大創造，反映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趨勢和選擇，另一方面也指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難免囿於後發國家的歷史條件和

焦灼情緒，導致某些理論的混亂矛盾或不清晰，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又將中國現代化的走向導入某些本來可以避免的理論與實踐的誤區。宋儉副教授（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的〈毛澤東與「三民主義共和國」建國方案〉一文，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提出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新方案的歷史背景和內容詳加闡述，並分析了這一構想最終未被執政的國民黨所接受的內外因素。

如何面對傳統，實際上成了轉型期中國人的一個兩難選擇：尊從傳統，在社會變革上便失去理由；拋棄傳統，在道德規範上又無所憑藉。本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中有兩篇專門探論了這一問題：一篇是蘇中立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的〈論世紀之交的孔教問題大辯論〉，該文以世紀之交在維新派與洋務派、革命派與保皇派之間圍繞著孔教問題展開的大辯論為例，揭示了傳統文化走出中世紀，向近代邁步的軌跡；另一篇是黃嶺峻博士（華中理工大學政法系）的〈反傳統與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失敗〉，該文以清末民初孔教會的流產為線索，具體分析了近代中國人在對待傳統道德時的兩難處境，這種兩難處境最終導致了反傳統，反傳統導致了道德失範，在人治向法治的過渡時期，道德失範又導致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延誤。

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名目的舶來「主義」和本土觀念相互激盪，紛然雜陳。梁景和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撰寫的〈論近代的「廢婚主義」〉一文對五四前後由少數知識分子倡行的「廢婚主義」的內涵及論據首次作了詳盡的分析，並指出廢婚理論缺少魅力和實踐意義的原因所在。王玉德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文獻研究所）的〈試論神秘觀念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中的作用〉一文則對近代神秘觀念的時代特徵和發展脈絡作了歸納和梳理，並對神秘觀念在近代社會轉型中的積極作用作了充分肯定。

（三）轉型期的政治與人物

政治形態的轉變是社會轉型的重要表徵之一。政治形態的轉變具體落實和折射在各社群的經驗與行為裡，卻又有因時、地不同而產生特殊的組合和變遷。王先明副教授（山西大學歷史系，未與會）的〈晚清士紳基層社會地位的歷史變動〉一文，透過皇權與紳權在基層社會的控制與超控制的歷史過程，來認識和理解晚清鄉村社會的變遷。王文認為，清王朝企圖

利用保甲制度，平衡和制約高度分散聚居的鄉土社會中任何一種社會力量的獨立性發展，削減士紳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保障皇權對鄉土社會的滲透。可是，在基層社會中真正發生作用的控制組織，並不僅僅依賴於單一的保甲制，根植於鄉土社會的民間控制組織始終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由官方控制的保甲組織，事實上根本達不到控制地方士紳的目的。因保甲長是平民，它永遠無法企及士紳對鄉土社會所具有的內在權威力。至咸同之際，伴隨著地方團練的興起與發展，士紳階層借助於這一組織形式，獲得了對地方社會控制的主動權，並開始從根本上擺脫了保甲制度的制約。桑兵教授（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臺灣民主國內渡官紳與庚子勤王運動〉從另一視角論述了皇權與紳權的衝突。該文以臺灣民主國內渡官紳介入庚子勤王運動的過程，揭示民本觀與聖王觀主導下的傳統中國綱常政治，皇權如果超越既定規範，便會遭到紳權的抵制和反抗，迫使士紳對朝廷與社稷作兩難選擇。此類衝突在王朝末世往往頻繁發生。到了近代，這一常規通則依然有效。該文在研究視角上未落入將傳統與現代對立的窠臼。

對於清政府在二十世紀初年推行的「新政」，同盟會的革命派曾尖銳地揭露過其欺騙性，並從原則性的角度展開過批判。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久保田文次教授（日本女子大學）在〈清末「新政」與革命派〉一文中則指出，革命派對「新政」既有批判的一面，又有利用的一面。如對「新政」中所實施的軍隊與學校的近代化、振興實業、地方自治、完善法制等措施，革命派認為是實現中國近代化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並斷定為了推動革命運動發展，也不妨加以利用。該文以圍繞著粵漢鐵路公司經營問題而引起的糾紛為個案，具體分析了革命派的立場。

川島真先生（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研究生）提交的論文〈清末外交官的培養論議〉則以晚清出使大臣、駐外使領館館員、國內外外交機關人員等人材培養為例，旨在探討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變容與基層轉型。文章認為，清廷設立總理衙門，外觀對應歐美的「外交一元化」的原則，但實際上地方督撫和南、北洋大臣參與外交，不易改變傳統的多元外交的特性；外務部設立後，欲行外交權的實際統一，但各省既有交涉司擔任外交事務，外務部只有設法掌握交涉司的人事權。由於專門外交官制度和科舉制度不相容，地方督撫不希望外交人材的中央一元化，希望繼續保有自己的外交人事權等原因，清政府未能建立起職業外交官的養成體制，從此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及官僚們想維護其既得權益的角度來看，反映了政治變容和基層

轉型具有相當的艱難性。

在本次研討會提交的論文中，還有多篇探討了歷史人物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中的活動。劉望齡研究員（廣東省社科院孫中山研究所）的論文〈張之洞與湖北報刊的興衰〉和沈繼成副編審（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的論文〈張之洞與武漢城市的近代化〉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了張之洞在區域社會轉型中的作用。李吉奎教授（中山大學歷史系）進一步拓寬視野，將福澤諭吉與張之洞的文化觀進行比較研究，認為福澤大力批儒，否定仁政說；張之洞則尊孔衛道，宣揚仁政；福澤鼓吹自由、平等，張則堅守綱常名教；福澤重在國民性改造，張則重在正人心；福澤提出「脫亞入歐」，張仍強調中西大防；福澤屬於民族自卑的虛無主義者，張則體現了文化保守主義傾向。這是李教授在〈福澤諭吉與張之洞文化觀之比較——以兩部「勸學篇」為中心〉一文中所闡述的中心論點。除張之洞外，郭國燦副研究員（深圳市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論文〈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詳述了嚴復在推動傳統學術與傳統人文精神向現代社會科學和現代人文精神的轉軌，以及嚴氏話語系統在近代文化載體轉型過程中的貢獻。

（四）轉型期的工商經濟

社會轉型是社會整體的變遷。其中經濟結構由以自然經濟為主導的農業社會向以商品經濟為主導的工業社會演化，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基礎。本次研討會有多篇文章涉論重商理論、商事習慣、商辦企業、商會報刊、工商經濟團體以及紳商的公民意識等問題，討論的視角與層面具有一定新意，形成本次研討會相對集中的又一中心議題。陳鋒教授（武漢大學歷史系）的〈明清時期的重商理論與實踐〉一文，探討了明清以來重商理論的形成和演化過程，認為由重農抑商→反對抑商→農商并重→重商，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這一歷史轉變過程，大致以明代中期具有重商色彩的理論闡發為起始，以晚清蔚為壯觀的重商思潮及某種程度的重商政策的頒布與實施為歸趨。隨著重商思潮的激盪和新式商業的崛起，商事習慣亦逐生漸變。嚴昌洪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與商事習慣變遷〉一文中，專門探討了這一問題。

虞和平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自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對清末民初的商人團體開展研究，本次研討會他提交的論文是〈清末民初工商經濟團體的發展與經濟倫理的資本主義化〉。文章認為，清末民初，經

濟倫理的資本主義化主要體現為國策層次上的農商顛倒，經濟體制上的官商易位，社會地位上的四民平等與社會組織中的四民一體，目的追求上的義利交替與團體的利益自維行為。經濟倫理的資本主義化促進了社團意識的加強和社團政策的開放。另一位專門研究晚清商會的學者朱英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則通過具體考察清末民初商會創辦的報刊，從一個側面論述了這一時期商會所具有的市民社會特徵。朱教授在〈論清末民初的商會報刊〉一文中指出，擁有獨立的輿論機關，是衡量市民社會獨立自治的一個重要指標。清末民初的商會創辦自己的報刊作為獨立輿論工具，既維護了自身的特殊利益，也一定程度地發揮了制衡國家的作用。由此可以說明，近代中國以新興工商業者為主體而組成的市民社會，在清末民初即已具備雛形。

如果說，創立自己獨立的輿論機關，是市民社會拓展其生存活動空間所必需的一項重要措施的話，那麼，清朝末年的地方自治運動，也可視為表現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公民意識和政治參與水平的一項政治成就。馬小泉副教授（河南大學歷史系）以〈地方自治：晚清新紳商的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為題，從社會轉型的角度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文章認為，清末地方自治帶有濃厚的官辦色彩，並未完全按照資產階級的意願發展，未能實現資產階級革新地方政治的初始目標，但是，它畢竟產生了選舉和議會制，並使傳統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其思想上和制度上的成就，構成了中國早期地方政治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階梯。

（五）城市文化與市政發展

自八〇年代開始，城市史研究異軍突起。在本次研討會上直接討論城市史的論文共有七篇：涂文學：〈城市轉型與中國城市文化的近代化〉；司昆侖（Kristin Stapleton）：〈民國時期的市政發展：歷史傳承與異域影響〉；張富強：〈略論近代廣州城市文化的鑄成及其初步發展〉；忻平：〈商業化、多元化、大眾化：二〇——三〇年代上海文化發展的三大特點〉；習五一：〈近代北京廟會文化演變的軌跡〉；樂正：〈近代廣州大眾傳播業的發展（1938～1949）〉；莫世祥：〈簡論香港早期城市化與華人社會的調適〉。

涂文學副研究員（武漢市社會科學院）從宏觀的角度對中國近代城市轉型的歷程作了大致勾勒，並對近代城市及城市社會的特點作了以下概

括：1.近代城市網的形成與沿海城市帶的崛起；由傳統的行政質屬的垂直體系向經濟聯繫紐帶橫向網絡體系的轉軌；由偏重內陸的封閉的城市體系格局向沿海的開放的城市體系格局轉型。2.城市功能由以政治軍事為主的單一功能結構轉變為由以工商業為主要功能結構要素的多元複合城市，並在城市平面布局上呈開放、實用特色。3.城市社會結構體系出現一系列新的變化：永久性都市居民的出現，商人成為近代城市的力量中堅，社會階層的多極化等。

司昆侖（Kristin Stapleton）助理教授（美國肯塔基大學）曾以〈晚清警政改革：成都（1902~1911）〉為題撰寫其博士論文，在此基礎上，她進一步探討二三〇年代的中國市政運動。她指出，二三〇年代的中國市政運動與同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相比，其聲勢相形見绌。這主要是由於鄉村建設派的成功實踐，使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們確信：最需迫切解決的問題是貧窮、愚昧和動盪，而這一切似乎並不存在於城市之中；同時，三〇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在農村的發展壯大，又使國民政府中的許多人把注意力從城市轉向農村。

與司昆侖女士關注內陸城市不同，國內學者更傾向於研究沿海城市。張富強副研究員（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忻平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和習五一副研究員（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分別對近代廣州、上海和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徵進行了分析。張文認為，近代意義上的廣州城市文化於民國初年初步鑄成；忻文指出，二三〇年代上海的現代化進程最快，新的社會階級已占據新的社會結構中的主導地位，新的生產力推出了全新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這一切在上海都市文化生活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商業化、多元化、通俗化與大眾化三大特點；習文具體探尋了近代北京廟會文化演變的軌跡，指出在京都廟會文化的多元功能結構中，宗教的主導作用發生根本動搖，商貿與文娛功能日益增強。

（六）教會大學與中西文化交流

所謂教會大學，是指從十九世紀末起西方基督教會在中國創辦的高等教育機構。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有由新教創設的大學十三所，由羅馬天主教創設的大學三所。這些在華教會大學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驅和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教會大學曾經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自五〇年代開始，中國大陸簡單地將教會大學視為「帝

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學術界甚少有人敢涉足這一「禁區」。直至八〇年代以後，隨著對外開放和學術環境的逐漸寬鬆，史學界才重新開始審視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並對之作出新的評價。1989年6月，首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召開。自此以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1994年初，華中師範大學以章開沅教授為首的一批學者創建了國內第一所「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本次學術研討會即為該中心與華中師大歷史研究所聯合主辦。正因為此，教會大學史也是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中心議題之一。會議共收到有關教會大學與基督教教育方面的論文二十八篇，幾占全部會議論文的三分之一。這些論文涉及教會大學的法學教育、醫學教育、女子教育、國學研究、師資群體、經費問題、辦學特色、建築樣式等。

章開沅教授的論文〈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命運〉主要利用收藏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貝德士文獻〉，對中國教會大學的發展過程作了一宏觀的概略回顧。章教授指出，中國教會大學的長足進步，是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以後，其主要特徵是日益本土化、專業化和世俗化，並逐漸融入中國社會，成為中國私立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教會大學對中國現代化自有其貢獻，但真正輝煌的時間不過二十年，其悲劇的結局乃是內外多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因素所造成。

與會學者還從各個不同側面探討了教會大學的辦學特色及其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張夢白教授和許周鶻女士（蘇州大學歷史系）在〈東吳大學對中國文化變遷的影響〉一文中指出，東吳大學的畢業生在生物、化學、法學諸學科領域產生的影響最為顯著。馬長林副研究館員（上海市檔案館）的論文〈東吳法學院與近代中國法學教育〉具體描述了東吳法學院前後三十七年的發展過程，總結了東吳法學院的教學特點及其對近代中國法學教育和法制建設的影響。饒懷民教授（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在〈從湘雅醫學院的創辦看教會大學的作用〉一文中寫道：傳教士創辦的醫科大學，把西藥以及近代醫院制度、醫學教育、護理教育等引入中國，促進了中國醫學事業的發展。

教會大學的特徵突出表現在辦學國際化、教學正規化、信仰宗教化、教育社會化諸端。馬敏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的論文〈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通過對華中大學的個案分析，揭示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不僅體現在其創辦者的國際性背景及辦學目標上，而且具體表現在其財產、

經費、師資等組合構成上。同時，教會大學的國際化特色還昇華，表現為一種開放性的文化氛圍。正是這種比較開放的文化氛圍，使教會大學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助推器」。

在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教會女子大學成為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驅。在本次研討會上，有多篇論文討論了這一問題。史瑪達（Martha Smally）女士（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論文〈中國女子高等教育：教會大學檔案個案研究〉利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館藏的檔案，以華南女子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為例，對教會女子大學在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上的地位，進行了翔實的探討。王奇生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的〈教會大學與中國知識女性的成長〉則利用國內所藏的教會女子大學檔案，通過量化分析得出結論說，教會學校不僅開創了中國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當中國人自辦女學興起和發展使得教會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變得無足輕重之後，教會女子大學教育始終保持著領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為中國第一代知識女性的成長提供了一塊重要的人才培養基地。

一般認為，教會大學重西學，輕國學。這次會議有兩篇論文專門探討了這一問題。何建明講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在〈天主教輔仁大學之國學與陳垣〉一文中指出，輔仁大學自創辦時起就以國學教育與國學研究為重心，以考證的專門學問為特色，以趕超國際漢學為志業，在國學人才的培養和國學問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成為中國近代國學重鎮之一。陶飛亞副教授（山東大學歷史系）的論文〈齊大國學研究所與哈佛燕京學社〉通過檢閱齊魯大學檔案，勾勒出齊魯國學所與哈佛燕京學社在研究中國文化歷史方面長達二十二年的合作歷程，並指出近代中國的國學教育與研究也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刺激和推動，至少對教會大學來說是如此。

以往從未有學者專門探討教會大學的建築特色。本次研討會上，董黎副教授（武漢工業大學建築學院）和吳小新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中西文化研究所）合作完成的論文〈形態構成與意義轉換——北京輔仁大學建築的歷史背景和藝術特色〉，首次從建築學的視角分析了天主教輔仁大學建築的藝術特色。文章認為，輔仁大學的主樓設計在中國教會大學建築中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實例，它既顯示了中國皇宮那種戒備森嚴的氣勢，又體現出西方修道院那種遁世忌俗的超脫。論文報告時配以幻燈片放映，更給人以直接的感受。

經費問題和教師群體是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比較薄弱的環節。秦和平副教授（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論文〈華西協和大學經費問題之初探（1910～1950）〉，通過對華西協和大學經費來源的演變過程，勾畫出華西協和大學的內部變化及其與社會、教會的關係。張麗萍小姐（華西醫科大學檔案館）的論文〈華西協和大學的中籍教職員〉，詳細考查了該校各個時期中籍教職員的人數和比例，以此折射出教會大學的本土化和世俗化過程。

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知識分子群體——基督徒知識分子。這群基督徒知識分子大多出身於教會大學。他們身處東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及思想系統中，不可避免地面對著激烈的文化衝突。吳梓明博士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融和——謝扶雅對中西文化溝通的貢獻〉一文中，選取原嶺南大學哲學系主任謝扶雅作個案研究，揭示了謝扶雅平等對話的中西文化觀，並進而探討了謝氏在中西文化溝通上所作的貢獻。

在這次會議上，尚有數篇論文探討了基督教在不同地區的傳播和影響。容應莢女士（日本亞細亞大學教養部）的〈從廣東關元昌一族的發展考察基督教之傳播與社會變遷〉，旨在通過分析一個宗族的發展，以探討基督教傳播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關係。文章指出，基督教在清季廣東一帶傳播，其信徒在傳統社會中形成一個新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不僅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近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更在血緣、地緣和姻緣方面有連帶關係。劉碧蓉女士（臺北國父紀念館）的〈基督教對近代臺灣社會的影響〉，描述了基督教傳入臺灣後與臺灣本土宗教信仰和社會文化交融互動的歷程，並考察了基督教對近代臺灣在移風易俗、新式教育、醫療過程等方面所擔任的角色與貢獻。

綜觀本次會議有關教會大學與基督教傳播的論文，實證分析與個案研究是其顯著特色。學者們大量運用現藏教會大學的原始檔案及其他第一手資料進行深入研究；在研究所切入的角度上，亦不再囿限於以往的帝國主義模式和民族主義框架。這標誌著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正日趨深化。

「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爭之再 檢討：新資料與新解釋」國際研討會

張 力*

一、會議緣起

1994年3月23日，來自世界各地的亞洲研究學者陸續抵達美國東岸的波士頓市，準備參加次日起召開一連四天的「亞洲研究學會第四十六屆年會」。如同往年一樣，隸屬「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The 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China in North America)的成員，也趁此一時機齊聚一堂，討論會務；即將接任會長一職的加拿大 New Brunswick 大學歷史系教授徐乃力(Larry N. Shyu)在下榻的旅館中，與任教於美國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朱永德(Richard Chu)教授，共同規劃未來工作方向。由於1995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年，可以預見世界各地將會舉行不同型式的紀念活動。「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為一學術團體，應能以舉辦學術研討會的方式，凸顯第二次中日戰爭在近代史上的意義；況且該學會自1982年成立以來，曾舉辦多次國際性研討會，頗獲學界好評。此一構想得到學會成員贊同，籌備工作隨即展開。

事實上「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在1995年間共籌辦了兩項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是與美國紐約的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海外華人作家筆會合辦的「對日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於8月18、19日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舉行。本文所介紹的是12月17、18日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主題為「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爭之再檢討：新資料與新解釋」(Reasses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5]: New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的研討會。該次會議得到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 的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New Brunswick 大學軍事與戰略研究所的資助，得以順利召開。共有來自亞洲與歐美七個國家與地區四十多位學者與會，宣讀論文三十三篇。

二、議程

研討會由徐乃力教授的致歡迎詞揭開序幕。徐教授首先指出今年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年，許多國家舉辦了紀念儀式或學術研討會，然大多數活動有其政治訴求。其中也有一些研討會與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有關，但參與本次會議的學者來自多個國家地區，論文品質整齊，顯然較類似主題的研討會更勝一籌。接著他指出中日戰爭不僅直接或間接造成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無法估計的損失，也帶給侵略者日本巨大禍害。徐教授再以幼年時期目睹日機轟炸貴陽後的慘狀，與戰火中的成都依然絃歌不斷，見證中國的犧牲與奮鬥。戰爭固然造就了甚多英雄與榮耀事蹟，但他更相信「一將功成萬骨枯」才是戰爭的真實寫照。徐教授期勉歷史學者能擺脫國家、宗教、族群之限制，拋開種種偏見，秉持學術良知，探求歷史真相。他並對包括副會長 Marilyn Levine 在內的所有會議工作人員，以及與會的學者表示感謝。

兩天的會議共分六個場次進行，以下為各場次主題及各篇論文摘要：

第一場：戰時外交與國際關係

1. Ke-wen Wang (王克文, Saint Michael's College), "Wang Jingwei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31-1937: The Policy Origins of the 'Peace Movement'" : 汪精衛在 1932 至 1935 年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時，以「一面談判，一面抵抗」的政策應付日本侵略；然而中國武力甚弱，地方軍系又各行其是，汪之政策遂無法貫徹，以致越來越依賴非軍事手段解決中日爭端。汪之對日妥協常遭人批評，但評價汪，須考慮：（1）汪無軍事實權，（2）汪之政策與蔣中正的「先安內後攘外」息息相關，（3）其政策避免了與日本全面開戰，（4）其政策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支持。戰前汪之處理中日關係經驗，對他 1938 年舍抵抗而就談判的決定有其影響。

2. Huang Meizhen (黃美真, 復旦大學), 〈中日戰爭期間兩國和談之經緯, 1937.7~1945.8〉: 本文將戰時中日雙方進行的多渠道、多層次的和平談判，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中考察。認為雙方試圖進行談判，均有其各

自目的與條件。蔣中正未向日本屈服，在於他特有之個性與立場，以及世界局勢之變化；其進行談判是爲了謀求和平，絕非投降。日本之謀和未能實現各階段目標，實爲失敗的政治謀略。

3. Eto Shinkichi (衛藤瀋吉，東京大學退休教授)，*“Japanese Maneuvers for Peace With China, 1937-40”*：中日戰爭前期，日本軍方高層人士與一般軍官雖對和戰問題意見不同，但均擔心北方之蘇聯勢力增強以及中日之戰曠日費時，遂透過私人管道謀和。包括船津辰一郎與高宗武之接觸、德人調停、第二次「近衛宣言」、宇垣一成與孔祥熙之會談、汪精衛系統之試探，以及田尻愛義與錢永銘之談判，俾使日本得以維持軍方威望與在華利益，達到和平。本文主要利用口述訪問所得，及軍方、外務省檔案，探討各次謀合努力爲何失敗。

4. Guido Samarani (University of Venice)，*“Italy’s Policy Towards the Wang Regime During the War”*：1941年7月義大利法西斯政府決定承認汪精衛政權，其實就是戰前與戰時在面臨國際政治的抉擇，接受了納粹德國和侵略者日本的立場後，所導致的必然結果。此一決定嚴重損害義大利之國際聲望與傳統中義友誼。1945年法西斯政府垮台，義大利重返歐洲與西方的民主傳統中，方能展開與中國外交關係的重建。

5. Chen Jian (陳兼，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 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早期中共對美態度因受共產國際主導，視其爲阻撓中國革命者。抗戰期間，中共力量日見茁壯，特別在1941年德蘇戰爭爆發後，莫斯科對中共的控制減低，中共遂能以獨立成熟手腕，制定對美政策。在中共中央與南方局運作下，美國記者或軍事訪問團時有利於中共不利國民黨之報導。1944年底與1945年初對美政策更是中共與蔣競奪未來中國的重點；然而政策原則仍是其革命之國內與國際計畫之重點。

6. Chen Qianping (陳謙平，南京大學)，〈中英1943年關於西藏問題交涉述評〉：作者指出，造成1943年西藏危機之原因，在於英國試圖分離西藏之政策，以及少數西藏上層親英分子所挑動。雖然由於對日作戰與戰時國際關係影響，中國屈從了英國的要求，未對西藏分離分子採取軍事行動，但仍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英人雖然希望將漢人之影響逐出西藏，但由於同樣原因，也無法對西藏地方政府的分離舉動在軍事或外交上予以公開的聲援與幫助。

第二場：抵抗與合作

1. Timothy Brook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 Government": 本文考察 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4 月間梁鴻志之維新政府成立之過程。作者認為二十世紀國家主權觀念甚強，日本爲了取得佔領區資源與繼續作戰，勢必要得到中國人合作，建立民治政府。但除了給予自治外，同一時期出現由日人建立的政權爲如何分配權力與資源，彼此互不相讓，日本也無法解決此一不能團結一致的問題。1940 年成立之汪政權雖然統一各地方政權，然實際問題仍未解決。

2. Peter J. Seybolt (University of Vermont), "War Within a War: Internal Struggle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 Case Study of a County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作者經由考察戰時河南北部的內黃縣，發現當地發生之戰鬥多是中國人之間的相爭，即使與敵人作戰，對手也以僞軍居多。奪取權力與經濟利益導致中國內部之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土匪與商人地主、秘密會社與土匪、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相爭。其主要原因在於清末以來內黃縣權力真空，國民黨未及建立有效控制即爆發戰爭。戰時地方人士試圖與日人合作，亦在設法藉外力掌握地方。內黃之情況絕非僅見，而其所產生的現象削弱了國民黨的權威，摧毀了城鄉既有的地方士紳力量，初時有助於日人統治，最後則產生反效果，更對中共最後取得政權助益甚大。

3. Parks M. Cobl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Japan's New Order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1937-1945": 作者認為日本在 1940 年 8 月提出「大東亞共榮圈」，雖然軍方意圖藉此發展中國經濟供日本軍事之用，並由日本完全控制，但因缺乏資金與相關知識，不得不尋求中國資本家的支持。本文指出戰爭初期日本純係掠奪中國資源，中期則承認需要作有系統的開發，於是設立華北與華中開發公司，後期則越來越依賴中國的資金與技術。此外日本也希望藉拉攏中國企業家來支撐汪政權。

4. Lo Jiu-jung (羅久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Survival and Rationalization for Collaboration, 1937-45": 本文以抗戰時期淪陷區爲歷史背景，探討通敵與救亡圖存——國家的與個人的——之間的關係。作者分別從通敵領袖如汪精衛者流與一般市井小民兩個角度，分析外敵入侵、時局動盪不安的狀況下，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因應之道，包括如何作選擇以及

替自己的行為尋找合理化解釋。在理論層次，作者檢視了戰後漢奸審判中所謂通敵是爲了保全國家與人民的說法，以及這些說法在中國歷史政治環境下的意義；在實際行動方面，作者從政治派系、軍事組合、個人生存與家庭責任等方面，呈現通敵的複雜性面相。

5. David P. Barrett (McMaster University), “The Wang Jingwei Regime, 1940-45: 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作者指出汪精衛之政權和戰前與戰時的國民政府有類似之處，汪和蔣之領袖地位不可動搖，但屬下派系林立；其力量主要在掌握軍權，但又無法確定軍隊是否效忠。汪也想建立一支效忠於己的軍隊，卻爲日人所阻。汪也重視精神教育，其倡導之新民運動與蔣之新生活運動相似。汪之反共態度也十分清楚。不過汪曲解孫文的大亞洲主義以迎合日本，且汪認爲自己承續中國傳統，對敵人寬容，這點不爲國共兩黨所接受。

6. Roger B. Jean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Third-Party Traitors in Wartime China: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China”：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在華建立傀儡組織，不僅設法拉攏知名人士，也試圖遊說較小黨派領導人加入。國家社會黨之諸青來、陸鼎揆、湯薌銘投靠了傀儡組織，其他人士並未動搖意志。雖然如此，國社黨卻屢遭國共兩黨抨擊，指其勾結外敵。國社黨雖試圖澄清，卻因諸青來等三人之舉動，而難獲國人諒解。此一事件削弱了戰時中國之黨派合作，但類似之事件在戰時歐洲國家也發生過。

第三場：戰爭的起源與初期的發展

1. Marjorie Dryburgh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Regional Office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Song Zheyuan and the Road to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5-1937”：宋哲元歷經早年軍旅生涯，逐漸成爲地方領袖人物。而在1930年代前半，日本在華北的擴張，使得宋哲元的角色益發重要。透過宋哲元與日本的來往，作者試圖了解地方上的互動如何影響中日官方關係，以及在此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如何看待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2. Young-tsu Wong (汪榮祖,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The Xi’an Inciden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過去學者一向認爲盧溝橋事變開啓了第二次中日戰爭，作者則指出自1928年起蔣中正對日力求妥協，以爭取時間安定後方。但民眾之愛國訴求導致

了西安事變的爆發，迫使蔣改變其不抵抗政策；既然決定抵抗，則戰爭必不可免。因此作者強調西安事變與對日抗戰之關係至為密切。

3. Stephen R. MacKinn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he Promise of Wuhan, 1938”：1938年國民政府曾以武漢為臨時首都達十個月，當時各界人士匯集此地，更因台兒莊捷訊激起的「漢口精神」，帶來了新聞、藝術與政治空前的開放氣氛。武漢會戰時也看出各種不同的國際參與。因此1938年漢口的一切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另一個充滿希望的方向。作者認為過去從國共鬥爭來探討中日戰爭的研究，應放在一邊。人民固然飽受戰火煎熬，但戰爭也造就了一代人的解放意識，並影響了社會關係與文化。

4. Joshua Fog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Japanese Travelers in Wartime China”：本文為作者針對近代以來日人遊歷中國，所撰寫遊記之一系列研究的一部份。分析了作家、記者、教育學家所作之記載，包括後藤朝太郎、長與善郎、小林秀雄、淺野晃、豐田正子等人之作品。

第四場：戰爭、戰時罪行與戰爭責任

1. Qi Fulin (齊福霖，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時期日軍在華暴行之再檢討——河北及平津地區の日軍暴行〉：本文首先介紹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日軍在華暴行的研究新進展，再以北京市檔案館收藏之大量檔案，詳述日軍在河北平津地區之燒殺行動。作者認為日軍在華製造暴行的基本原因有四：（1）戰前日本是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軍事帝國主義國家，（2）日本侵華戰爭的侵略性及其目的所決定的，（3）宣揚武士道精神與灌輸軍國主義教育，（4）戰前日本是一個歧視婦女的國家。

2. Mitsuyoshi Himeta (姬田光義，日本中央大學)， “A Research on the Japanese Army’s Policy of the ‘Three-All Campaign’ and ‘Uninhabited Districts’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作者首先介紹過去所從事之日軍「三光」作戰研究，認為若能閱讀到日本官方檔案，將更能深入考察。繼而說明目前進行之戰時日軍遷移居民、建立無人區之研究，此一地區在河北境內的長城沿線，為了防止八路軍與游擊隊的活動，日軍強迫該地居民遷移並集中居住在幾個區域，約有一百四十萬人遷徙，至少十五萬人在遷移過程中死亡。此一研究不只要了解中國人民的損失，

也要探究與日本軍國主義有關的問題。

3. Yu Shen (沈于, Indiana University), “Nationalists (*Juntong*), Americans (SACO), and Guerrilla Warfare”: 過去學界認為同盟國開始與中國併肩作戰後, 中國即不以主力對付日本, 而集中力量從事反共, 且國民黨之游擊隊僅用於對付中共。作者研究戰時戴笠主持之中美合作所, 考察其訓練之游擊隊組成、茁壯, 以至解散, 認為軍統訓練之游擊隊, 確曾予日軍不同程度的打擊。

4. Hui-yu Caroline Ts'ai (蔡慧玉,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Japan’s War Responsibilities Reconsidered: The War Compensation Movement”: 作者指出, 台灣的對日索賠運動絕非孤立事件, 應將之放在亞洲索賠運動, 甚至世界的人權賠償運動中來看。自1938年起, 即有台灣人接受日本徵召, 參加戰爭。戰後中國政府恢復對台行使主權, 但因內戰失利, 導致遷台後為了維持與日本之邦交, 遂擱置了索賠問題。1972年中共與日本建交, 兩年後索賠呼聲初現, 此後數年主要活動於日本展開。1980年代更因日人修改教科書問題, 引發東亞國家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與賠償。此一運動方興未艾, 不僅具有現實意義, 也是極重要的歷史議題。

5. Robert J. Perrins, “‘Strikes and Strike-outs’: Labour and the CCP in the Guandong Leasehold, 1920-1945”: 本文利用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東北地方史研究成果, 對1920年至1945年日本之關東租借地內, 中共如何發展黨組織及進行工人運動, 作一詳盡的考察。作者認為過去西方學界太過依賴日文資料從事相關研究, 以致斷定中共在關東租借地的活動無足輕重。實則中共之角色不容忽視, 且有效地領導工運。他呼籲西方學者應重視大陸披露的地方史料與研究成果, 才能更深入了解當時中共的策略。

第五場：戰時的經濟與社會

1. Jin Pushen (金普森, 杭州大學),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糧食問題之研究〉: 日本侵華戰爭嚴重破壞了中國糧食的供求關係, 抗戰前期國民政府未能有效處理, 糧價上揚所帶來的危機, 搖撼了經濟與社會基礎; 後期方採取糧食控制政策, 調整糧食管理機構, 管制全國糧價。此一亡羊補牢措施大致保證了軍隊與政府機關的糧食供應, 並穩定了社會秩序, 打擊了日本以戰養戰的政策。然國民政府之徵糧方式並不公平, 且官員之貪污

腐敗、擾民情況十分嚴重。

2. Takafusa Nakamura (中村隆英, 東洋英和女子大學), “The Establish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North 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佔領華北城市及鐵路沿線, 並成立華北開發公司, 俾取得資源供日本工業(尤其是軍火工業)所需。本文主要利用日文原始資料, 考察此一公司。作者首先綜述 1933 年至 1937 年日本在華北的經濟侵略; 繼而詳細分析盧溝橋事變後各日本機構的開發計畫及利益和衝突; 接著考察華北開發公司建立過程與初期活動; 最後則討論該公司的性質與活動。

3. Douglas R. Reynold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1938-1945: Old Questions, New Perspectives”: 1975 年作者完成博士論文〈中國工合運動與戰時政治的對立, 1938~1945〉後, 即轉向近代中日文化關係之研究。近年來有關「工合」的史料與研究陸續出版, 作者遂藉此機會修訂其論文。作者認為近年來大陸學者從事此一問題之研究時, 已能逐漸擺脫意識形態之束縛, 其成果對作者重新思考論文內容時, 幫助甚大。

4. Ka-che Yip (葉嘉熾,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Baltimore), “Health, National Resistance,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A Research Agenda”: 此為作者繼完成戰前中國醫學史之後, 所要展開的下一階段研究計劃。過去學者曾從政治、經濟等不同角度探討戰時中國, 但此一時期的醫學發展, 卻少有人注意。作者認為戰前國民政府已開始積極主導醫療體系的建立, 使之成為國家追求現代化的一個部分。中日戰爭爆發後, 中央與地方草創的醫療設施臨危受命, 投入抗戰。除了政府主持之醫療體系外, 作者另將討論軍醫系統、醫護人員訓練、外國醫療援助等幾個主題。本文並介紹了作者已知藏於台灣、美國等地的檔案與相關史料。

5. Chang Li (張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Grain Supply vs. State Revenue: Wartime China’s Liquor Production in a Dilemma”: 中國歷史上常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 禁止釀酒即為節約糧食的措施之一。抗戰期間有十七個省的地方軍政首長採行了禁釀措施, 本文利用藏於中研院近史所之經濟檔案, 深入探討此一問題。禁釀政策之執行, 中央之經濟與財政兩個部門認知觀點不同, 前者全力支持, 俾保證糧食供應; 後者則認為有妨國家稅收。但在 1942 年以前審慎考慮禁釀措施的採

行與解除，確有助於國民政府同時維持穩定的糧食供應與國家稅收。

6. Chen Hongmin (陳紅民，南京大學)，〈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動員能力之比較：以驛運和大生產運動為例〉：本文分別依戰時國共兩黨對驛運和大生產運動的組織發動，從最高領導階層之倡導、民意機關之態度、執行機構之監督管理，以及民眾之參與等四個層級，比較其動員能力。作者認為中共在發動大生產運動的過程中，其四個層級從上而下，基本做到了統一意志、齊心協力；而國民黨在領導驛運時，則是意見分歧，上下阻隔，甚至對立。

第六場：文化、藝術及意識形態

1. Min-sun Chen (陳明生)，"Fung Yu-lan and His Concep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45 as the Fourth Southern Crossing of Yangtze River (*Nan-tu*) in Chinese History": 本文主要介紹1946年5月4日立於昆明西南聯大，由馮友蘭所撰之紀念碑。該碑將抗戰時期流亡至後方情景，比作歷史上的第四次「南渡」。東晉、南宋、南明之南渡均不免最後滅亡，然而第四次南渡卻能勝利返鄉。其實九一八事變後馮友蘭就曾把中國情況比諸南宋南明，但同一時期也有其他的知識分子並不完全同意馮之南渡說法。

2. Poshek Fu (傅葆石，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To Defend China: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Hong Kong Cinem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戰前香港電影業的發展，僅次於上海、廣州兩地。對日抗戰開始後，大批內地電影界人士逃難來港，人才與資金的匯聚，促成香港影業的勃興。本文即在分析香港在淪陷前，電影事業的規模、資金、演員工作情形，及發行市場等問題。作者更指出，國民政府自1931年起開始限制方言影片的發行，粵語片時遭批判，這種中原文化與地方文化的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抗戰時期。作者另在會場中放映片段「游擊進行曲」，為戰時自內地來港影人所拍攝的國語愛國影片。

3. Kan Liang (梁侃，Seattle University)，"Expectation and Disillusion: Writers' Life in Wartime Chongqing, 1937-1945": 戰時重慶的作家因生活日益艱困，導致其對政府不滿，進而重新思考知識分子與國家的關係。由於作家對一般民眾有其影響力，其結果自然不利於國民政府。作者認為知識分子早在戰時即無意支持國民政府，而非如《劍橋中國史》所言是在內戰

中國政府軍事失利後，才對之絕望。

4. Donald F. McCallu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Japanese Visualiza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Ideology”：本文簡述研究方法後，先介紹日本畫家川端龍子和西洋畫家鹿子木孟郎所代表的官方版本的在華軍事行動描繪。主要部分則在討論上村松園（日本畫）和梅原龍三郎（西洋畫）兩位戰時重要畫家的作品。前者於 1941 年秋遊歷中國，其畫作為中國建構一個美好景象；後者之畫作則為 1939 年至 1943 年間之北平，亦是美麗動人的景致。作者認為這些畫家的活動亦是配合了日本政府與軍方的政策，雖然他們自己並未特別察覺到。

5. De-min Tao (陶德民, Bridgewater State College), “Japan’s War in China: Perspectives of the Leading Japanese Sinologists in Wartime”：作者認為過去學者討論日本帝國主義，著重在西方帝國主義對其影響；實則近代以前的東亞國際關係的經驗，特別是蒙古、滿洲兩個外族入主中原，對日本的擴張心理影響亦大。故而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可就東亞地區當時與歷史範疇再作探討。本文即在分析幾位主要的日本漢學家戰時所表達的意見、政策的提議，以及對日本之歷史角色的看法。

6. Odoric Wou (吳應銑, Rutgers University), “Communist Sources and Localizing the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抗日戰爭的史學研究，從過去的「誰丟失中國」、「中共革命成功的因素」，到最近分析戰前及戰時國民政府的建國努力與正面戰場問題。此項轉變受到西方與中國大陸史學界的重視。然而史學家往往只從國共或日本的其中一個方面做分析，作者呼籲此後應進行合作研究。而戰爭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更需要深入地方作仔細探討。因此最近中國大陸出版的省與縣市文史資料、史志資料、黨史資料、根據地之經濟史資料，以及個人回憶錄，均有值得發掘的史料。

另有三篇論文因作者未能與會，僅由會議主辦人略加介紹其主要論點。這三篇論文是：張瑞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General Staff System within the Nationalist Arm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5”；李國祜（台灣師範大學），“German Archival Materials on German-China Relations During the 1930s”；水野明（日本愛知學院大學），“The Prison of Japanese Military Gendarmerie in Wuh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來自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的 Steven I. Levine 教授，擔任這次會議的綜合評論人。他首先表示，1976年4月他應邀參加在紐約聖若望大學舉辦的「戰時中國（1937~1945）研討會」；1986年5月又參加在伊利諾大學舉辦的「西安事變五十周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近十年後，第三度參加有關中日戰爭的學術研討會；他認為本次會議比前兩次更成熟，不僅發掘引用更多的史料，所作之分析也更深入，同時也觸及了戰爭中的多種社會問題，反應了整個世界廣泛的道德議題。他強調歷史學者並不能解答所有戰爭中的問題，未來仍會出現不同的觀點與論辯，值得繼續加以探討。

三、餘記

溫哥華之會可能是1995年間，以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為主題的各種研討會的壓軸。由於本次會議期許能從「新資料與新解釋」出發，來重新檢視這段歷史，因此會中宣讀的論文，頗能吸引與會學者的注意，也不可避免帶動若干議題熱烈的討論。其中關於汪精衛政權及其他通敵的個人或團體，是多篇論文關注的焦點，但其行為應以 *collaboration* 或 *cooperation* 來界定，引發學者不同的看法。此外，衛藤瀋吉教授一度認為學術會議中討論「日本戰爭責任」，並不適宜；經其他學者反駁與解釋，衛藤教授未堅持本身看法，並就其心路歷程另做一番公開的剖白。因此 Steven I. Levine 教授總結時，也特別以「日本戰爭責任」這個具有爭議性，同時又十分關鍵的主題，作為呼籲未來和平的祈願結語。

紀念中日戰爭結束五十周年的熱潮已過，大多數的學術會議仍是在中國大陸或台灣召開，其中亦不乏值得重視的論文。實則這場戰爭需要檢討的主題仍多，而海峽兩岸仍有大量檔案並未開放給學者充分運用。溫哥華會議之強調「新資料與新解釋」，就此段歷史研究而言，可視為一個起步，相信也替未來類似主題的研討會，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 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

黃克武**

1995年9月12日至16日在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iere）的主持下於法國 Garchy 召開「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Conference on European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這一個會議的醞釀是受到兩件事情的影響，一是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狹間直樹教授所領導的「梁啟超研究會」對任公思想與行為的深入研討，一是1993年在廣東新會、南海所舉行「康有為、梁啟超與戊戌後的維新派研討會」會中所引起的討論。巴斯蒂教授覺得如果能夠針對二十世紀初期，康梁之外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歐洲文化的互動關係，召開一次包括大陸、台灣、日本、法國、德國、瑞典、美國等地學者之研討會，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因此她幾乎在會議召開之前兩年就開始籌備，包括從日本京都大學、法國國科會與我國蔣經國基金會等機構爭取經費，以及邀請學者赴會、安排行程等。此次會議的主旨是探討大約在1900年至1920年之間，歐洲思想如何進入中國人的心靈世界，因而促成了一個「新」文化的內容。其焦點包括：歐洲思想或某些源於歐洲的觀念，經由何種途徑被引介到中國？中國人對這些想法有何了解、有何誤解，又有何新的引伸？而造成中國人「選擇性了解」與「詮釋」的原因何在？再者當時中國人對歐洲思想的認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透過日文的翻譯，因此形成了「歐洲思想——日本人對歐洲思想的譯介——中國人透過日譯本了解歐洲思想」的複雜過程，目前這個環環相扣的翻譯與詮釋過程，還沒有受到學界足夠的注意，而且也有許多日文的資料也沒有人深入分析。此次會議即是希望對於這些

* 本文完成後承蒙朱法源先生指正，並撰寫他在會中宣讀論文之摘要，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課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這次會議的議程與論文題目如下：

一、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接受歐洲思想的背景

張 灝（美）：轉型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評論：
Don Price、佐藤慎一）

1. 型態、階段與文化轉移的條件

島田虔次（日）：西洋對章太炎的作用（評論：楊天石、T. Loden）

李華興（大陸）：從傳播歐洲思想到回歸傳統文化——《甲寅》時期章士釗
思想研究（評論：島田虔次、狹間直樹）

彭 鵬（大陸）：杜里舒（Hans Driesch）來華——一個被忽略的德國哲學
家的個案（評論：石川禎浩、M. Bastid-Bruguiere）

2. 幾個主要作品的翻譯過程

黃克武（台）：Yan Fu's Translation of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評論：
高柳信夫、王曉苓）

王曉苓（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原文與最早漢譯文的異同初探（評論：
狹間直樹、Marina Svensson）

二、普遍知識與思想系統的接納

佐藤慎一（日）：Chinese Acceptance of Social Evolution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Case（評論：張灝、
黃克武）

高柳信夫（日）：1900年代中國關於「科學」的言論的幾個側面（評論：
李華興、M. Bastid-Bruguiere）

三、關鍵性政治觀念的採介

狹間直樹（日）：梁啟超來日後對西方近代思想認識的深化——尤其在「國
家」與「國民」方面（評論：黃克武、王曉苓）

Don Price（美）：European Models of State, Citizen and Constitu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評論：山室信一、Jerome Bourgon）

山室信一（日）：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tion of Japanese Meiji Thought

on Law and Government in Chinese Reception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m (評論：張芝聯、Jerome Bourgon)

朱泐源(台)：Imitation of Mutation? Chinese Perception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評論：森時彥、張芝聯)

四、社會法規與組織的再思考

森時彥(日)：清末知識界對西歐經濟學說的接納：梁啓超的經濟思想(評
論：朱泐源、李華興)

Jerome Bourgon(法)：Shen Jiaben's Idea of Legality and European Law(評
論：山室信一、彭鵬)

Marina Svensson(史雯，瑞典)：The Chines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評論：佐藤慎一、M. Bastid-Bruguere)

楊天石(大陸)：蘇、陳譯本《慘世界》與近代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潮
(評論：Catherine Yeh、齋藤希史)

五、感官與美學的變化

齋藤希史(日)：關於近代中國文學進化觀念：白話文學誕生的前夜(評
論：T. Loden、Catherine Yeh)

Catherine Yeh(德)：A Taste of Exotic West: Fashion and Furniture in Shanghai
Courtesan Hous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評論：齋藤希史、Don
Price)

六、整合的論題

M. Bastid-Bruguere(法)：Popularization of New Concept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Vocabulary of *Dongfang zazhi* Editorialist, 1904-1911(評論：
石川禎浩、高柳信夫)

石川禎浩(日)：近代中國的「文明」與「文化」(評論：張灝、楊天石)

以下簡要敘述各文的大要。

張灝先生將轉型時期定義為 1895 至 1920 年初，他認為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關鍵時期，其中有兩方面特別重要，一是新傳播媒介的出現，一是思想內容的變化。就傳播媒介來說，當時制度性的傳播

媒體如報刊雜誌、新式學校與學會等大量湧現；此外又有新的「現代知識階層」形成，提倡新學。傳播媒介的改變直接促成思想內容的變化，在這方面作者指出兩點：第一是中國文化出現了嚴重的「取向危機」，即文化的核心，或所謂「體」的層次發生動搖。第二是新的思想論域的出現，此一論域不但使用新的語言，而且從一「共同的主體意識」出發，討論大家所關心的論題，例如中西文化之關係、未來國家與社會之型式、革命與改革的途徑與新時代的人格典型等。此一文章是大的背景性的說明，為大會所討論的其它題目設下歷史的舞台。

下一階段的論文環繞著三位歷史人物，具體地探討當時中西文化的交流與國人對此一衝擊所產生的選擇性的反應。

島田虔次先生〈西洋對章太炎的作用〉指出西洋對太炎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視西洋為「蹂躪人道的帝國主義國家」，所以中印兩民族應協力共進，拯救悲慘的亞細亞諸民族。再者太炎一心提倡「國粹」或「國學」，此一概念的產生與流行也與西洋有關。

李華興先生的文章描寫《甲寅》時期（1914~1920年代）章士釗從傳播歐洲思想、主張新舊調和到回歸傳統文化、高唱農村立國、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變遷，並分析此一演變的原因，李氏一反從前對章士釗轉向保守的否定態度，他從「文化守成主義」的觀點認為此一思想轉向對反傳統的激進主義有「補偏救弊」之效，是很有價值的。

彭鵬的論文是關於德國「生機主義」哲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來華講學的過程與國人的反應，他通過杜氏訪華被當時人們所忽略的事實指出：杜氏以一個哲學家的身份作學理式的演講，他所關懷的純粹精神層次的哲學知識命題，並不受當時知識界的歡迎，他的來華比不上羅素、杜威與泰戈爾來華所造成的影響。

接下來所討論的主題是反省兩個歐洲的主要著作被譯為中文的過程。

拙著分析嚴譯約翰彌爾的 *On Liberty*（《群己權界論》），我嘗試修正 Benjamin Schwartz 的觀點，認為嚴復的翻譯之中了解與誤解是交織在一起的，而他所誤解的部分雖然受到「富強」之追尋的影響，但主要還是源於認識論與群己觀方面的差距，而這兩方面都與傳統思惟模式有關。彌爾的想法環繞著 fallibility 的觀念，認為人在本質上有很強的犯錯的傾向，這種對真理的徬徨使他強調進步須要知識、而知識的獲得須要自由的思想

的競賽，這樣的認識論可以稱為「悲觀主義的認識論」，以此為起點他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性，認為個人自由的範圍應儘可能地廣。嚴復的譯文卻透露另一訊息，他的認識論是比較傾向樂觀主義的，他不了解彌爾悲觀主義認識論的推理，也無法像彌爾那樣肯定個人自由的範圍，他所強調的是群與己之間以「界」為基礎的平衡關係。嚴復將 *On Liberty* 譯為《群己權界論》清楚地顯示他將彌爾所關懷的個人自由轉移為社會性群己關係的界定。

拙作也指出清末民初之際西方有兩個主要的民主傳統被介紹到中國來，一是約翰彌爾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傳統，一是盧梭、黑格爾、馬克斯所代表的民主傳統，但前者的影響力遠不及後者。如果說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不深入了解彌爾，那麼他們了不了解他們所熱情擁抱的盧梭呢？王曉苓所處理的就是這一課題，她探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被引介到漢文世界的過程。她將盧梭的原文與早期的兩個漢譯本——中江兆民的《民約通義》與楊廷棟的《路索民約論》作一比對。她發現中文譯本與原文之間也有很大的差距，例如中江兆民將盧梭「我將努力把權利所許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結合在一起」譯為儒家意味濃厚的「政果不可得正邪？義與利果不可得合邪？」；盧梭上文所針對的是「個人利益」，楊廷棟的翻譯卻變成「端在保全眾人各自之利益，及眾人一體之利益而已」，同時重視個人與群體。作者指出「中江兆民的譯文沒有將儒家的重民思想與盧梭的民主思想加以區別」；楊譯則沒有把握盧梭思想中自由權利與社會契約等核心觀念。

第二個主題是討論西方的社會演化論與科學在中國的情況，也涉及中日的比較。

佐藤慎一的文章探討清末民初環繞著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等「公例」的社會演化論。他首先說明日本接受社會演化論的情況，其中包括東京大學的有賀長雄，以及在 1890 年代日本思想界從提倡民權轉到強調國權的變化。接著他談到中國接受社會演化論的情況以及社會演化論從日本傳入中國的另一歷史線索，例如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即介紹了有賀長雄有關斯賓塞主義（Spencerism）的著作。作者認為社會演化論對中日兩國思想界的社會觀與歷史觀都有影響，而由於國情不同，同一理念在兩地的影響並不一樣。其中加藤弘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早年肯定盧梭的天賦人權，1880 年接受社會演化論之後立刻改變立場，著《人權新說》鼓吹國權、反對盧梭思想。在中國梁啟超也有類似的變化，但方式卻很不相同，

梁氏並不將盧梭與社會演化論完全對立，他不關心兩者在抽象層次何者正確的問題，他從歷史的角度化解此一衝突，認為盧梭（平權派）適合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演化論（強權派）則適合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高柳信夫指出維新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關於科學的議論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區別，前者將科學視為「西學」之一，是有用的、具體的知識，可以補充中學的不足；後者則以為科學不是個別的知識，而是貫穿所有先進學術的一種原理與態度，此一知識體系是與中學相對的。為了了解此一變遷，他觀察 1900 年左右的過渡時代對科學的看法。藉著梁啟超與嚴復的例子作者認為 1900 年左右已有「貫穿近代科學的整個領域的共通因素的認識」，但他們都不贊成把科學絕對化。然而另一些日本、法國的留學生則有不同的態度，由於「迫切的亡國危機意識和焦躁感」推動了他們對科學的絕對化與教條化，使他們將科學與宗教、迷信對立起來。通過上述的考察，作者的結論是五四時代的科學觀有一個發展的過程，「並不是突然而出現的一種現象」。

其次的四篇文章注意到幾個關鍵性政治觀念的採介。

狹間直樹先生處理梁啟超到日本之後對西方「國家」、「國民」兩觀念認識的深化。他以梁氏在日本的活動與《清議報》上的言論，如〈愛國論〉與〈自由書〉等文分析梁氏思想轉變的理路，他認為梁氏「國權」、「民權」兩概念類似橢圓形的兩個重心，相互制約又相互獨立，前者的重要性並不一定完全超過後者。接著他又指出後來梁氏又感覺到「在日本體會到的只是一種日本化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要探究西方近代『真精神、真思想』只有親自到西方去」。

Don Price 教授的文章是處理民國初年中國人對歐洲模式的憲法、國家與國民觀念的採介。他從清末立憲派的言論談到民初關於總統制與責任內閣制的爭論，文中所討論到最重要的人物是宋教仁、章士釗與梁啟超等。再者民初對此課題的討論也受兩本譯著的影響：一本是英人 James Bryce 的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譯為《平民政治》），一本是法人 Rene Foignet 為法學院一年級學生所寫的憲法課本，譯名為《法國民主政治》。作者認為當時討論的主軸是放棄日本（君主立憲）與美國（總統制）的模式而採取 Bryce 與 Foignet 所代表的英、法的政治模式。

山室信一的文章分析中日甲午戰爭至民初臨時約法訂定的過程，中國人對歐洲憲法的理解，他強調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經由日本人轉手的

介紹，而康有為、梁啟超討論憲法的文章都表現出這樣的特色。

朱法源嘗試分析二十世紀初年中國人對 nationalism 的認識。他先整理西方近代的 nationalism，分成以領土、國家、民族以及民主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 nationalism。以領土為基礎的，又分成希望自治與企圖獨立兩種；以國家為基礎的，又分成堅持要國內各種不同民族融為一族與不堅持必須融合，但需有共同意志兩種。這個複雜的主義傳到中國以後，原本紛亂的局面，加上中國自己的情況，就變得四不像。因此，他的文章以 imitation（模仿）或 matation（突變）為題。他指出這一個觀念在中文中至少有六種譯法，它們分別是民族主義、族國主義、國族主義、國家主義、國民主義與反帝國主義，這些詞彙不但使中國當代的政治論述變得非常豐富，也帶來各種各樣的群眾運動。在這複雜的概念之下，國人的想法也種類繁多。有純屬主義之介紹；有發揮新國民觀念；也有強調種性，並藉種性情緒達成建立共和；更有為求生存救亡，不分滿漢，祇要排外的反帝國主義等。這許多意識形態之中，主要是循著兩條思路，一是改革派的 pragmatic nationalism，強調以滿漢融合為手段，在民族合作的前提下逐漸的改革來實現憲政的理想，比較上像國家主義；一是革命派的 romantic nationalism，主張以漢族為中心的暴力革命，目標是以驅除韃虜為手段，來達成建立共和的目的，有族國主義傾向。文末結論指出：在 1912 年之前，以革命派的說法為主流，所以有民國的肇建，而 1912 年之後的歷史，則顯示前者才是一個正確的判斷。

森時彥教授也是「梁啟超研究會」的重要成員，他的論文是以梁啟超為例來看清末知識界如何透過日文譯本來認識西歐的經濟學說。作者指出在赴日初期任公所肯定的主要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學派經濟學說，他所撰寫的〈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即是為了讚揚此一學派而作。然而在撰寫過程中他所接觸的三本日譯西方的經濟學說史與當時日人撰寫的相關著作「都是從歷史主義立場出發重新編著的西歐經濟學說史」，因此任公不自覺地「通過歷史學派的框架結構來通觀西歐經濟學說史」，強調干涉與保護。森氏更指出任公經濟思想的變化與他的思想中其它方面的轉變有相類似的發展脈絡，歷史觀方面從直線進步史觀變為螺旋發展的進步史觀，政治思想方面則是否定盧梭思想、肯定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說，再導向「開明專制論」。

Jerome Bourgon 文章是探討中國在接受西方法律觀念時，法治觀念與

中國本身法律傳統重視道德之間的複雜關係。他以沈家本對杜氏命案的個案討論為例說明西方思想在中國土壤中產生的影響與變化。

史雯則注意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的「人權」(human rights)觀。她所問的問題是清末西方人權觀念如何被引介到中國，他們運用那些資料，而中國人當時對人權的看法與西方觀念有何異同。她認為人權觀念無法在中國生根，與其說是因為它與中國政治文化格格不入，還不如說是由於當時中國政治上所面臨的諸多困境所致，當時人們所關懷的主要是國家存亡，而不是免除國家迫害、保障個人自由。但是如果說他們完全不顧個人自由也是不對的，自由與人權的觀念對當時人們有很強的吸引力，也鼓舞他們推翻滿族的專制。

楊天石的論文是處理蘇曼殊、陳獨秀合譯雨果的《悲慘世界》(譯名為《慘世界》)，他認為這是以翻譯小說面貌出現的一個革命宣傳品，在翻譯之中兩人在原有情節的基礎上敷演、生發出新的情節，藉此表達「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反對孔學，反宗教迷信，主張土地公有，均分富人財產」等觀念。作者以為此書獨特之處在於它從根本改變勞動人民悲慘命運的角度提出了革命的主題，可視為革命黨人第一個社會革命方案，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個公開的社會主義綱領。

第五場討論是從文學與物質生活層面看歐洲對中國的影響。

齋藤希史的焦點是清末梁啟超等人所推動的「小說界革命」，他首先敘述西方小說的傳入所帶來小說觀念的變化，小說因為被認為是開啓民智的重要工具，因此評價日高。但早期的翻譯小說主要是用文言文(如林紓的譯文與任公所譯《佳人奇遇》)，1902年以後梁啟超開始引介「文學進化論」概念，認為進化的方向是從「古語之文學」到「俗語之文學」。因此伴隨著啓蒙的要求與進化的文學觀，白話文學到了五四時代終成一個不可抗拒的潮流。

葉凱蒂(Catherine Yeh)的文章是談清末民初上海的青樓文化，尤其注意到在西方物質文明的影響下，妓院的傢俱、妓女的服飾、用品與生活方式(包括乘馬車遊街的路線)的變化，而物質基礎的改變也影響到人們心態的變遷。作者使用大量的圖片作為史料，探討一個有趣而重要的題目，為大會帶來一個別開生面的論文報告與討論。

最後一場的討論是嘗試做一種總結與整合的工作。

巴斯蒂教授的文章以1904~1911年《東方雜誌》「社說」為基本史料，

探討新觀念普及化或大眾化的情形。作者並不採用量化的方式看各種新詞彙出現的頻率，她的方法是著重在性質方面的特點。作者首先列舉各種新的語彙，例如遠東、種族、社會、國家、國民、政體、主權、公僕等。她發現雖然社說中有許多新語彙，但作者們似乎並不在意這些新觀念的起源，也不特別注意到底是那一個西方人提出這樣觀念，這和日本接受外國思想的態度是很不一樣。換言之新觀念是以無根的方式整合入複雜的中國的思想世界，因此這些新觀念雖然普遍，但就思想變遷而言，其影響的深度是有限的。

最後一篇文章是石川禎浩分析「文明」與「文化」兩概念在近代中國的演變，他以梁啟超為例指出在《清議報》與《新民叢報》初期「文明」一語使用非常頻繁，而此處文明的用法是與野蠻相對的，是指「一元化地貫穿著人類的公理所在，又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的普遍價值」，就來源來說，任公的用法受到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之影響。至1920年代任公不再高舉文明的大旗，尤其在遊歐之後，轉而強調「以歐洲為中心的一元性、普遍性的『文明』已宣告破產」，這時取而代之的觀念是「文化」，在任公心目中文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民族固有的東西」。作者認為從文明到文化的轉變使中國從「文明」的基軸桎梏中解放出來，以一種新的觀點認識「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由和意義」。

以上是各文的大要，針對這些題目會中產生了許多的討論。

我對這次會議有以下的感想，首先，此次與會者，就地理來說，包括大陸、台灣、日本、歐洲與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就年齡層來說，不但有老前輩、中壯年的學者，也包括好幾位學界新秀，可以說是老中青三代的結合。再者此次所邀請的人數只有二十幾人，大家圍坐一圈，暢所欲言。總之不同史學傳統有相互對話的機會，了解到別人的長處，這是很可貴的。對我來說，我對中國與西洋的漢學界雖有了解，但對日本的「中國學」還是相當陌生的，這次會議讓我知道狹間直樹先生主持的「梁啟超研究會」竟有三、四十位學者參加，定期討論任公的生平與思想；他們不但開始收集任公在日本所讀的當時日文有關西方的書籍、譯作，而且已經將任公的〈變法通議〉、《自由書》、《新民說》與李俊國編《梁啟超著述繫年》等輸入電腦。這些工作對梁啟超研究是很有意義的。

此次會議的核心議題是歐洲思想傳入中國的過程與影響，尤其注意到日本所扮演的中間轉遞者的角色，這個課題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例如在

梁啟超的思想之中有多少成分是來自日本，又有多少成分是他自己的創造，還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課題。佐藤慎一的文章談到任公對歐洲思想史的認識主要是來自中江兆民的《理學沿革史》，任公有關歐洲思想家的文章是《理學沿革史》中各章的翻譯（他依靠宮村治雄的研究）。我在評論中指出任公雖然是依靠中江，但是有他的創造性，例如在有關霍布士的文章，他比較了霍布士與荀子和墨子；在談康德的文章他不斷地提到康德與朱熹、王陽明、佛教思想的異同，這與他深厚的國學背景有關。巴斯蒂教授針對我的說法表示這些中西的比較很可能也是抄襲日文著作。我將中江《理學沿革史》中康德的部分找出來做過比對，並沒有發現其中有談到朱熹、王陽明或佛教的部分，這本書是翻譯法國哲學家 Alfred Fouillee 的 *L'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一書，而中江並沒有加上譯註；當然任公也可能抄別本日文書，無論如何這個課題仍待更多的研究。

此次會議的論文當然無法含括「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的所有的層面，但顯然開啓了許多新的研究角度。大會的兩位主要工作人員巴斯蒂教授與狹間直樹教授為此次會議的籌備花費了相當多的心力。多數的論文都在會前一個月寄到與會者手中，開會的地點又在法國葡萄酒與 Cheese 的產地，大家在法國的佳餚美酒之中，討論百年前中西文化的交會與激盪，這個會議無疑地算得上學界的一次盛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7)

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

張啓雄著

366 頁 平裝 350 元，精裝 400 元

清末民初的中蒙關係，歷經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的過程。外蒙，在俄國的策動下，既脫離中國獨立，卻又回歸中國的道理何在？本書將就國家認同、統獨紛爭與主權歸屬交涉三個層面加以分析探討。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是作者自創的理論，也是本文的研究架構，用以考察傳統政治文化在中蒙統獨紛爭的分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就成為解釋外蒙所以改廢國號、帝號、年號及政府名義，奉中華民國之正朔暨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受中國冊封等政治外交行為的最佳理論基礎。

滬杭史學之旅

陳三井*

一、初會杭州

古人常說：「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多讀書以吸取新知，拓寬視野；常旅行以增廣見聞，結交同行，兩者相輔相成，各有不同的收穫，這應也是現代人和周邊的世界保持資訊接觸的必修課，更是治史者所不可不講求的工夫。這一趟滬杭之行，主要便是抱著這層意思去的。

1995年10月6日（星期五）一個清爽的早晨，與同事許文堂、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孫若怡相約在桃園中正機場會合，先搭國泰 CX465 班機到香港，再轉港龍 KA620 班機，於下午四點半（遲到）抵達嚮往已久，以西湖勝景聞名的杭州，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金普森暨「中法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籌備會副主任樓均信、秘書長鄭德弟派兩部小轎車到機場候接，當晚安排住宿於該校老專家樓，我住三樓 303 一室，除臥房外，並附一間會客室，相當寬敞而氣派，顯見大會的特別禮遇。

晚飯後，偕文堂、若怡隨興到附近的商場及位在天目山路旁的杭大校園內略作散步，主要想弄清楚明天會場逸夫科教館的方位。

晚，杭大歷史系主任楊樹標來訪，熱烈表示歡迎之意。我們曾在前年南京舉行的「第三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碰過面，他不久前來過台灣，又是浙江省台灣研究會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所以對台灣的情況並不陌生。楊主任全身充滿幹勁，人很健談，他以前寫過《蔣介石傳》，最近則剛出版《宋美齡傳》，所以自己戲稱「這是靠蔣家吃飯！」其後，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學的鮮于浩先生來談，他出版過《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稿》一書，目前進行中國鐵路的研究，雖是第一次見面，但因相互贈書關係已屬文字之交，倒有不少的共同話題可聊。

今晚也認識住在對門，來自巴黎第八大學的阿蘭·魯（Alain Roux）。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他研究三十年代的上海工人，最近曾把他的法文著作 *Grève et Politique à Shanghai: les désillusions* 寄一冊給我，我趁此機會向他補說一聲謝意。可惜，他正在為洗澡水冷熱失調而哇哇大叫，並勞師動眾在處理，故未便多打擾。

二、記「中法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此次去杭州，主要是參加「中法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這類性質的會，不但台灣辦不起來，就是法國人也不敢輕易嘗試主辦。所以不禁對杭大歷史系的魄力和勇氣，表示最大的敬意！

7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討論會假逸夫科教館舉行開幕典禮，共有三、四十人出席，是個精緻型的專家之會，杭大校長沈善洪親臨講話，指出中國人民敢於起來反對封建主義，主要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中國人特別喜歡拿破崙，也尊敬像戴高樂般的民族英雄。

上午第一場討論會，由楊樹標主任主持，共宣讀四篇論文，他們是：
耿昇（社科院歷史所）：十六~十八世紀的中學西漸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

Alain Roux（巴黎第八大學）：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國老板與中國工人——三〇年代上海的情況

樓均信（杭州大學）：沈鍊之與中法文化交流

沈堅（杭州大學）：中國文化和法國洛可可藝術

大會未設評論，時間卻拖得相當長，待分別報告完畢，我建議稍做討論，並笨鳥先飛第一個發言。首先，對沈鍊之（里昂中法大學海外部學生）回國後在杭大歷史系創設法國史研究會，倡導法國史研究的貢獻，予以充分肯定。繼表示幾點：(1)無論大陸或台灣，要開展法國史研究，恐難免不無資料上的限制（指原始材料）和語言上的困難；(2)避免畫地自限，自我孤立，要多結合中法關係史、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共同切磋努力，否則恐將永遠落在外國人之後；(3)研究工運、婦運，甚至青運，切忌過分政治化、教條化，以免模糊歷史的多樣性和真實性；(4)吳開先與上海工運的關係，值得注意。

下午第一場，由 Alain Roux 用標準的法語主持，宣讀下列幾篇論文：
Nora Wang(王楓初,巴黎八大): "Immigration Chinoise en France et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dans les années 1920” (1920年代在法國的中國移民與中法關係)

鮮于浩(四川西南交通大學):法國朝野與留法勤工儉學

許文堂(中研院近史所):中法實業銀行歇業風潮——政治層面的考察

鄭德弟(杭州大學):巴金筆下的法國大革命

呂一民(杭州大學):二戰時期中國主要報刊對戴高樂及其「自由法國」的報導與評價

其中前兩篇與歐戰華工及留法勤工儉學有關,正是我所熟悉的課題,所以也當仁不讓的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和補充意見。

晚飯後分二組,分別由 Nora Wang 與復旦的金重遠教授主持一場「學術沙龍」,大家匯報相關的教學及研究概況,我也就台灣的法國史教學出版及最近成立的「中外關係史研究會」的活動情形提出報告。

8日上午,從八點半到十一點半,由我主持一場馬拉松式的討論會,共報告七篇論文,分別是:

黃時鑿(杭州大學):《譜姓:拿破辰翁》序說

許明龍(社科院世界所):再論黃嘉略

戴成鈞(杭州大學):趙保祿(Paul Marie Reynaud, 1854 ~ 1926)在浙江傳教活動述評

嚴建強(杭州大學):法人在華辦博物館:概述與評析

計翔翔(杭州大學):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金尼閣

汪林茂(杭州大學):中國人是如何認識和瞭解法國的

董海櫻(廣州中山大學):略論中法早期的交往

雖然老少配輪番上台,但我嚴格控制時間,多擠出半小時供大家討論之用。

下午最後一場,由杭大資深教授兼大會籌備會副主任樓均信主持,完成下列幾篇報告:

金重遠(復旦大學):拉萼尼使團和黃埔條約——中法關係上的一頁

陳三井(中研院近史所):從北圻到中國——十九世紀一個里昂商人的殖民觀

謝俊美(華東師大):翁同龢與中法戰爭

郭世佑(杭州大學):施阿蘭與李鴻章

寶成關(吉林大學):論孟德斯鳩學說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許明龍（社科院世界所）：中法關係史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報告討論完畢，旋即舉行閉幕典禮，對研討會的得失有所檢討，我應邀談話，盛讚大會的幾項特色，並比較兩岸的開會文化，最後誠懇的提出幾點建言，包括漏發名牌給與會學者等。大會從善如流，立刻補做五個名牌給來自海外的學者當紀念！

晚飯後，無事一身輕，與謝俊美、鮮于浩、寶成關、許文堂、孫若怡外出逛逛，信步走到美麗的西湖旁，在一家歐式的戶外冰淇淋店品嚐特大號的彩虹三式（每份十五元），迎著仲秋夜微風，縱談古今，月旦人物一番，頗有「人生幾何，對酒當歌」的豪情。

9日上午，大會特包下一艘古色古香的大船，讓與會學者遊賞西湖，以滌除幾天來的辛勞。船在薄霧中緩緩沿著楊柳青青的蘇堤前行，斷橋殘雪、曲院風荷、三潭印月、花港觀魚等勝景盡收眼底，飽覽無遺！西子果然出落得清新脫俗，繁花垂柳，比起揚州的瘦西湖，無論格局或景色，果然更勝一籌！

下午參觀中國茶葉博物館，該館於1991年4月開放，坐落在龍井路雙峰村，佔地5,060公頃，建築總面積3,500平方米，內分茶史、茶萃、茶具、茶事、茶俗五個展覽廳，頗能展現中國茶葉文明及茶文化的概況。前人形容喝茶好處的極致是「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四碗發輕汗，生平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僊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輕風生。」走出茶香滿園的「茶博」，每個人也都喝得肚子發脹，不但有「破孤悶」、「發輕汗」的感覺，而且頗有「肌骨清」的快意。

三、紹興古蹟一日遊

10月10日（星期二），今天專程前往紹興做一日遊。紹興古稱會稽，位於浙江杭州灣南岸，會稽山北麓，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距杭州79公里，相等於台北至新竹之遙，鐵路皆可抵達。全市運渠縱橫，山明水秀，地靈人傑，素有魚米之鄉和水鄉澤國的美稱。春秋時代為越國都城，西施曾在此浣紗。紹興的特產有三缸——酒缸、醬缸、染缸，皆與水質有關，紹興老酒聞名中外。紹興除出師爺外，也出了不少名人，包括大書法家王羲之、南宋詩人陸游（放翁）、革命先烈秋瑾、近代教育家蔡元

培、文學家魯迅、中共總理周恩來等。

一大早杭大派車到老專家樓來接，與許文堂結伴，並由金普森教授作陪導覽，興致沖沖的往紹興出發，車經錢塘江第二橋，走一段杭甬高速公路，過蕭山，一路欣賞江南風光到紹興，車行約一個半小時。

紹興的風景名勝眾多，上午第一站先參觀雄偉的大禹陵。相傳夏朝的創始人大禹因奉命治水，曾兩次到紹興，後埋葬於此，後人因而豎碑建廟，以為紀念。大禹陵由禹陵、禹祠、禹廟三大建築組成。禹陵背靠會稽山，陵前立石碑，上刻明代紹興知府南大吉所書「大禹陵」三字，筆力遒勁、氣勢不凡。左右兩側立有「咸若亭」和「禹穴辨碑亭」。禹陵左側是禹祠，始建於夏少康之時，祠前一泓碧水，名曰「放生池」。禹陵右側為禹廟，是一組宮殿式建築，自南而北依次是照壁、岫巖碑亭、午門、拜廳、大殿。廟宇依山勢逐漸升高，左右對稱，布局精當，相映在群峰之中。殿內中立六米高的大禹塑像，頭戴冕旒，手捧玉圭，身披朱雀雙龍華袞，雍容大度，令人肅然起敬。殿旁有一窆石亭，長石下相傳這才是夏禹真正的埋葬所在。

參觀畢，回到市區，與紹興市社科院副院長朱順佐（曾任杭大教授，著有《邵力子傳》、《胡愈之傳》，並主編《紹興名人辭典》等書）會合，瀏覽魯迅故居、百草園、三味書屋（魯迅上私塾處）暨魯迅紀念館。中午，紹興市政府民政局長嚴華作東，假市府直營的福樂飯店，以海鮮席宴客。

下午繼續參觀百歲堂（周恩來祖居）、秋瑾烈士紀念碑、蔡元培故居及王羲之的蘭亭。蘭亭位於紹興西南十公里之處，相傳原為越王勾踐種蘭之處，漢代設驛亭，故名蘭亭。蘭亭主要建築有御碑亭、曲水流觴亭、晉右將軍祠、鵝池、小蘭亭等，竹林成蔭，遠離塵囂，頗有世外桃源之感。聞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三月初三日（以後成為各地詩人騷客吟詩詠唱之日），王羲之邀約謝安等四十一位名士好友相聚於此，舉行盛大的風雅野宴。小溪彎彎曲曲順著山勢而下，四十一人分坐溪邊兩旁，酒觴順水而流，停在何人處，此人就需賦詩一首，即「曲水流觴」。不能賦詩者十五人各罰酒三觥，十一人各賦詩二篇，十五人各賦詩一篇，得詩三十七篇。王羲之大樂，提筆寫序，此時王羲之已有幾分醉意，下筆如有神助，故寫出書法的經典名著〈蘭亭集序〉，王羲之因此被尊為「書聖」、蘭亭也成為書法聖地。王羲之喜歡賞鵝，從鵝頸部以上的活動中，體會出書法提筆運動的妙處，故蘭亭有「鵝池」。亭北有一石碑，正面刻有康熙帝所書的

〈蘭亭集序〉全文，背面則刻有乾隆帝遊蘭亭感賦的幾首詩。祖孫二人的書詩同刻一碑，為全中國獨一無二所僅有，亦屬藝文佳話一樁。

回程轎車因離合器故障而拋錨，一行三人不得不改搭野雞中型巴士，繼續上路。不料這輛老爺車不但速度奇慢，而且接連爆胎兩次，最後停靠在錢塘二橋上，動也不動，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因為晚上還趕應酬，真令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最後，在半求半重賞之下，總算攔到一輛小發財車載我們過橋進入杭州市區，再轉雇出租計程，趕回住處。這一意外折騰，不但害得作陪的金教授大破鈔，也讓今晚的東道主楊樹標主任等得心急如焚！這雖是「大陸經驗」的一種新奇嘗試，仍不免令人有在大陸出門旅遊迢迢難的刻骨銘心感覺。

四、滬上取經行

11日（星期三）晨搭八點十四分旅遊車由杭州到上海，在此又增加了一項「大陸經驗」。即雖然買車票對號入座，但在人潮中為了爭取提前入站上車，杭大的沈堅先生又為我們每人購買了名實不符的「茶座費」六元，這個數額高達火車票的五分之一，真是「創收」有道！偏偏火車因故延遲了一小時又一刻鐘才啟動。車行約三小時抵上海，復旦大學黃美真教授派車來接，並招待火鍋午餐後，安排住進校內的正大管理學院專家樓。略事休息，下午與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楊立強、陳絳、姜義華、黃美真、金重遠、石源華等見面，交換研究課題訊息。晚，系主任楊立強在專家樓設宴招待。

12日（星期四）上午由黃美真教授作陪，參觀上海市檔案館，第一印象是門禁森嚴，見到副館長董永昌、館長助理兼二處處長馬長林。馬先生帶我們參觀檔庫，該館以所藏公共租界、法租界檔案暨上海商界數百行業資料最為豐富。據兼《租界志》辦公室主任的馬先生透露，該館修纂《租界志》有年，已近殺青階段。馬先生並送我們各類不同的目錄，我也趁機購買到該館出版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上海工會聯合會》暨《抗日戰爭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工人運動史》等書，收穫頗豐。

下午到淮海中路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拜會張仲禮院長，並與歷史所所長熊月之、所長助理羅蘇文、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天綱暨黃美真教授等人座

談。據報，“八五”國家、上海市、院三級重點研究課題（1991～1995），在史學類方面正在進行的有：(1)上海通史（熊月之）；(2)上海移民史（熊月之）；(3)近代上海市民研究（羅蘇文）；(4)舊上海工部局研究（袁燮銘）；(5)當代上海大事記（許敏）。聞《上海通史》共十五卷暨《當代上海大事記》今年八月可以出版。又該院為慶祝最老的二個研究所——經濟研究所與歷史研究所成立四十週年，訂於1996年8月舉辦「中國城市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已展開籌備。晚，張仲禮院長假淮海中路一家頗具歐洲風味的餐館設宴招待，作陪的尚有副院長俞新天等人。

13日（星期五）上午華東師大謝俊美教授來接，特往位於上海中山北路的華東師範大學參觀拜會。該校佔地近百公頃，花木扶疏，素有「花園學校」的美稱。主要參觀歷史系，與系主任王斯德、副主任李學昌暨教授忻平、虞寶棠、劉學照、謝俊美、易惠莉等座談，瞭解彼此的研究概況，並交換出版刊物。

華東師大歷史系成立於1953年，目前有正副教授二十餘名，分設以下三個研究室：

1. 中國近代史研究室——成立於1978年，以研究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為主，教授有陳旭麓（已故）、夏東元、黃逸平、劉學照、謝俊美等人，已出版有《盛宣懷傳》、《洋務運動史》（夏東元），《近代中國經濟變遷》（黃逸平）、《王韜評傳》（忻平），《翁同龢傳》、《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謝俊美）、《洋務運動與近代中國》（劉學照）等著作。
2. 世界近現代史研究室——重要成員有李巨廉、王斯德、潘人杰、鄭寅達等，已出版有《世界現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事件人物》（王斯德），《第二次世界大戰——專題述評》、《第二次世界大戰百科辭典》（李巨廉）等專著。
3. 法國史研究室——重要成員有王養沖、陳崇武、尤天然、王寅等，編有《法國史研究通訊》，已出版有《羅伯斯比爾評傳》（陳崇武）等書。

該系另設有「中國企業史研究中心」，以研究和撰寫中國著名廠礦企業史為主，研究人員以退休教授、在職部分研究員和研究生為主，目前出版有《雲南煙廠史》、《江南造船廠史》、《上海鋼鐵第三廠史》、《正泰橡膠廠史》等數十種。

歷史系並附設有：

1. 文物陳列室——以收藏古錢幣、古代兵器、部分出土文物為主，主要配合中國古代史的教學。
2. 歷史資料室——以收藏海內外期刊、雜誌和報紙及出版著作為主，供教師、研究生教學、研究參考之用。

中午，王斯德主任在國際學生活動中心設宴招待，並表達與台灣學術界進行出版品與人員交流的意願。

下午趕回復旦大學，在歷史系主任楊立強主持下，向歷史系三、四十位師生報告「四十年來台灣的上海研究」，發問者熱烈踴躍，這是此行比較正式的一次演講。

晚，在專家樓設宴回請復旦的幾位教授，到者有楊立強、陳絳、黃美真、金重遠、姜義華、石源華以及華東師大的謝俊美教授，賓主把酒盡歡。

翌日（14日）上午啓程搭機，右手拎的左手提的都是以書為主的厚重行李，幸承黃美真教授派車送至機場，一路順利返回台北。法國名雕刻家羅丹（Auguste Rodin, 1840~1917）曾謂：「我到處都在學，就是不在學校裡。」就個人來說，滬杭之行，真是滿載而歸；就史學接觸而言，更是一次令人難忘，大有收穫的史學之旅。

（1996年1月30日完稿）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叢書(57)

陳湄泉先生訪問紀錄

許雪姬、沈懷玉訪問 曾金蘭紀錄 191頁 平裝 250元，精裝 300元

陳湄泉女士(1914~)，遼寧北鎮縣人。內政部警官高等學校畢業，曾在首都警察廳、桂林警察局、鹽務總局服務，卅四年任女青年軍訓導組副組長兼代組長。抗戰勝利後，以接收專員身分返鄉，受聘於中央警官學校東北分校及遼寧警察學校。卅六年當選國大代表。來台後，獻身台灣女警的創建與推行警察公共關係等開創性工作。六十年自警界退休，八十年自國大代表任內退職。本書述其八十餘年之經歷見聞，尤以女警為主題，亦包括夫婿趙炳坤先生在抗戰期間對我國防空及恢復長江航運之貢獻。書中並附錄陳女士之學生口述女警受訓經驗，以為補充。

會議消息

美國東南區亞洲研究協會第卅五屆年會*

美國東南區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三十五屆年會於1996年1月12日至14日在美國田納西大學克諾納斯威爾(UT-Knoxville)校區召開為期三天的議程，會中共針對二十四個主題發表論文計七十三篇，內容涵蓋東亞、南亞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過去與現在，包括文學、藝術、歷史文化、宗教、哲學、政治，國際關係、經濟及婦女等問題。其中與中國近現代史有關的討論主題及論文如下：

中國——十九、二十世紀歷史(China-19th-20th c. History)

1. Grant Alg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Regional Repertoires of Conflict: Boatmen and Xie-Dou in northwest Fujian, 1889”

2. Roger Jeans,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ome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ews of the Soviet-Russian ‘Experiment’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3. Derek Waller, Vanderbilt University

“‘Mud’ and ‘Slug’: the First American Mission to Tibet, 1942-43”

對亞洲現代化及其發展困境的政策回應(Policy Responses to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Dilemmas in Asia)

4. Loren Fauchier, Queens College

“Predators or Providers: District-Level Leadership Responses to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the Case of Baixia District, Nanjing, China”

性別角色和種族在現代中國(Gender Roles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輯

5. Andrew Kipnis, 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
“Banqueting, Christianity, and Gender in North China”
6. Ma Hongnan,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Learning Womanhood in China”
7. Dorothea A. L. Martin, 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Reforms”

亞洲和變遷模式(Asia and Models of Transition)

8. Qiang Yan and Guoyun Zhu, Nanj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Jiangsu Model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9. Xiaobo Hu, Morehead State University
“Informalization and Formaliz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

中國——歷史和政治學(China-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10. Li Li,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
“Who was She?--Sophie Lanneau's Negoti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1907-1950”
11. Zhaohui Hong, Savannah State College
“The Subordinate Men and Changing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 1900-1980's”

中西關係中的上海(Shanghai in Sino-Western Relations)

12. Beth Vandlingham, Carson-Newman College
“‘I Don't Believe I'll Go to Hell for Shooting a Chinaman,’(Anglo-Chinese Conflict in 19th c. Shanghai)”
13. Mark Wilkinson,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A Death in Shanghai: Zhang Da Erzi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5-6”

東亞和西方：比較文化的分野(East Asia and the West: the Cross - Cultural Divide)

14. Lung-Lee Sun, University of Memphis
“Images of Orientals as the ‘Third Sex’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東亞和東南亞：變遷中的革命(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evolutions in Transition)

15. William Head, U.S. Air Force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Revolution: Secret Societies to Maoism”

16. James Gillam, Spelman College

“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Entrepreneurs in Modern China”

亞洲的宗教/哲學(Asian Religions/Philosophy)

17. Chungmin Maria Tu, University of Georgia

“From Tao to Chaosmos: A Deleuzean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aoist Paradox”

後鄧時期中國的發展途徑(Paths of Development in Post-Deng China)

18. Weixing Chen,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The Shandong Way of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19. Zhong Yang, University of Tennessee-Knoxville

“Where is China Going? A View from Below”

20. Katherine Palm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anaging Ethnico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ntrasting Paths of Development.”

21. Guangzhi Zhao,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Regional Economies and Regionalism in China in the 1990s: the Case of Yunnan”

舞台幕後：社會和政治議題在中國文學、戲劇、電影及通俗文化中的角色(Behind the Scene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pera, Film and Popular Culture)

22. Winston W. Lo,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The Battle Scen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Fiction: Realism or Fantasy?”

23. Ann L. Lo, Tallahassee Community College

“Canton Opera Actors in Ch’ing China: Social Outcasts, Folk Heroes, Triads, and Rebels”

24. Edward S. Krebs, Independent Scholar

“Photo Exhibit: ‘The Mannequin Series’”

學人簡介

從「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者——王家儉先生

葉高樹*

史學界有關魏源的研究，用力最深、成果最豐的學者，當推王家儉先生。對王先生而言，研究魏源及其相關問題，是學術生涯的起點，研究工作的重心；更重要的是，開啓了他對海權思想、近代海軍史，以及明清思想史的興趣，並進而從海防思想的形成與新式海軍的創建，以及傳統學術思想的發展脈絡，探討近代中國的變局。

一、求學與任教

王家儉先生，1925年8月17日生，安徽省渦陽縣殷廟集人。幼年時期，就讀於當地渦陽縣立第三十一小學；畢業前後，抗戰軍興，無法繼續升學，只得改入舊式私塾。延滯數年，始再入學，先後就讀於宿縣縣立初中、私立徐州高級中學、安徽省立第五臨中。抗戰勝利，執教於渦陽縣立城中鎮小學、渦陽縣中孫店分校等校；1947年改任宿縣符離小學教導主任。是年8月，隨友人來台旅遊，旋因內地局勢動盪，交通受阻，乃決意在台求學。

1948年，先生考取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前身）理化系，一年後轉入史地系。1949年4月6日，「四六事件」發生，時軍隊進入師範院校園逮捕學生，先生亦受到牽連，與其他住宿同學二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

百餘人同時被捕，兩周後始獲釋放。同年 8 月，復為同學李氏構陷，再度被捕，當局以「錯抓不能錯放」為由，送往內湖新生總隊感訓，這次更遭囚禁年餘，直到 1951 年 6 月方得釋回，並准予復學。關於這段往事，先生絕少提起，數年前在先生家的聚會時，偶然間談及「四六事件」，經不起學生再三追問，才勉強道出原委。

1953 年 7 月，先生自師大史地系畢業，即被聘至桃園縣楊梅中學執教；1957 年 8 月，轉往新竹省立新竹中學。雖然在中學任教，先生不曾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加上大學同班同學呂實強先生（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時時給予鼓勵，復於 1960 年 6 月考取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隨指導教授李宗侗（玄伯）先生繼續深造。1963 年 7 月，以《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一文獲碩士學位，旋應聘回師大母系服務，展開學術研究工作。

先生任教於師大歷史系長達三十年，自講師、副教授而教授，主要在大學部講授「史學導論」、「明清史」，研究所碩士班擔任「明史研究」、「清史研究」，博士班則指導「明史專題研究」、「清史專題研究」等課程，並負責博士班導師工作；其間先後發表學術論文、專著近六十種，領域甚為廣泛，成果相當豐碩。惟先生總是謙稱：「研究的動力，常是來自教學的壓力」；「因為課堂上的討論，而引發研究的興趣」。又先生常說自己是個「老學生」，是因其投身學術時的年歲稍長，尤其在負擔沉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同時，仍不忘尋求吸取新知的機會，而分別於 1970 年赴英國倫敦大學，1979 年至美國哈佛大學各進修一年。此外，先生亦曾擔任行政工作，1976 至 79 年出任歷史系系主任，1989 至 90 年又兼僑生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1994 年 8 月，先生自師大退休，現旅居於加拿大，著述工作始終未嘗中輟。

二、魏源及其相關研究

十九世紀的中國，是國勢由盛轉衰的關鍵時代，也是學術思想由「為學問而學問」導向於「為經世而學問」的轉變時代。在外患的日迫與嚴重，以及國民雪恥圖強運動的兩大發展趨向之下，魏源率先提出以國富兵強，充實海防為標的；以認識外情，師夷長技，講求外交，改良內政為手段的雪恥圖強方案，不啻為中國指出一條朝往近代化的道路。

魏源為清代中葉的今文學者，也是講求經世之學的思想家，其有關今文學的著述，扭轉了清代中葉的學術方向，引導了清末的變法圖強運動；對於海防思想的見解，不僅為論洋務與海防者所宗，甚而影響了日本幕末志士的維新思想，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魏源的學問既深且博，舉凡經學、子學、史學、地理、兵學、文學各方面，皆有創見；然在眾多研究魏源的學者之中，能無所偏廢，且持續發表研究成果者，至今似僅王家儉先生一人。

提起王家儉先生對魏源研究的興趣，約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先生在大學時代，受業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辦人郭廷以先生門下，在師大特重中國近代史研究學風的薰陶下，奠定深厚的學術基礎。一則是在新竹中學任教期間，呂實強先生為鼓勵先生繼續進修，特地自南港寄來一部兩大包的魏源《海國圖志》，因而引起研究的動機，更擇定魏源為日後學術生涯的中心。

先生的學位論文《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完成後，郭廷以先生即曾示意交付近代史研究所刊行，惟時任台大歷史研究所所長余又蓀先生有約在先，遂於1964年由台大文史叢刊出版。是書於二十年後再版，時海內外有關魏源研究的論著，非僅數量方面斐然可觀，學術水準亦日益超前，然專論魏源海防思想者，卻寥寥可數；先生常因同好無多而深感遺憾，實則顯示先生之作歷久彌新，非一時之間所能超越。綜觀全書，以海防為中心，非但留意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情勢的演變，又關注魏源思想形成的淵源與轉折，更兼及魏源的影響，以及中外學者的評論，可謂鉅細靡遺。近十年以來，從「外緣因素」與「內在理路」兩方面研究清代思想史，幾成通則，然先生在三十年前已有此認識，其學術價值與成就無庸贅言。

自1966年起，先生陸續發表包括《魏源年譜》在內的一系列與魏源相關的論著，且更及於經學、史學、經世等各方面。此外，又從魏源的海防思想為出發點，拓展到近代海軍史的研究；復就魏源的學術思想為基礎，延伸為明清學術思想史的探討，因而構成以「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術體系。

三、近代海軍史的研究

魏源為清末海防論者的先驅，有關海防三書，即《海國圖志》、《聖武記》、《夷艦入寇記》，揭示海國時代已經來臨，也意識到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正處於變化複雜的新形勢，其見解在晚清流傳廣泛，深受學界、政界推重。在魏源的海權思想中，首要之務為創設新式海軍，這樣的觀點，自然吸引了長期投入魏源研究的王家儉先生的注意，從而有計畫地展開近代海軍史的探討，並集結成《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

據先生總結魏源的歷史地位，認為魏源的海防思想，對中國的近代化負有啓蒙功能，惟其思想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以致近代化為之遲滯約二十年（1842~1860）之久。因此，先生自理論著手，先檢討清季「海防論」，論證是說的產生，係中國在西方挑戰（challenge）之下所起的反應（response），並藉以觀察海防問題的內涵及其演變。繼之，由實務來說明近代海軍的肇建與發展，自人物而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具體地呈現出海軍在近代史上的意義。其中，有關清季海軍衙門的討論，彌補了近代政制史與軍事史的不足；而為研究中日關係史學者所忽略的「長崎事件」，其交涉過程亦有詳盡的論述，皆極具參考價值。又先生藉〈近代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一文，做為近代海軍史研究的階段性結論。先生以中國的歷史觀，檢視中國民族海洋活動的興衰，以及從陸權（land power）到海權（sea power）轉變，並由思想史的觀點與理論化的分析，說明中國近代海權不振的原因。更進一步地指出，中國如欲向海洋發展，必會遭遇種種困難，但為國防的安全，海權的確保，國際貿易的維護，乃至民族生活空間的擴大，將來均非向海洋進軍不可。所論正是將魏源的海權思想加以拓展，並賦予現代化的意義，充分顯露出知識份子的時代關懷，亦即「經世致用」的具體表現。

與近代海軍關係密切的李鴻章，則是先生關注的另一焦點，在收入《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各文中，已見其端。之後，又陸續撰就〈李鴻章對於中國海軍近代化的貢獻〉、〈李鴻章的海軍知識與海權思想〉、〈李鴻章與北洋海軍〉（英文稿）諸篇；經過長期的構思與蒐集資料，復於旅加期間完成《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中國近代創建新海軍的失敗與教訓》一書。新作係先生多年心力的累積，將由國立編譯館出版，相信對北洋海軍以及晚清時期中國新式海軍建立的經過與成敗得失，必多有

創見發明，值得吾人期待。

四、明清思想史的探討

在研究魏源的過程中，學術思想亦是問題的核心，故而王家儉先生多年來對思想史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常說：「人類的行為往往受其思想所指導，是以何種思想即產生何種行為。於此可知，思想史實為整個歷史的靈魂」。學術思想有其傳承，亦有其流變，先生歸結明清以來學術思想的發展，特為指出：明代的學術思想可分為明初的程朱之學、中葉的王學，以及晚明的實學三個階段；清代的學術思想也可分為清初的經世之學、乾嘉時期的考證之學，以及晚清的公羊之學三個時期，各有不同的特色。而西方學術亦於明清之際傳入中國，前者伴隨天主教來華，造成中西文化的衝突與交流；後者則自鴉片戰爭之役，形成一股銳不可當的西潮，皆帶給中國以極大的影響，決不容忽視。

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先生兼顧時代環境對思想家的衝擊，以及學術思想的內在轉折，而尤長於流派的界定；既是延續早期研究魏源海防思想的治學態度，又另闢蹊徑，不以一家一派為限。欲瞭解思想家的學術淵源與轉變，必先釐清其思想的流派，故而先生對於晚明的實學、清中葉的漢學與宋學，以及晚清的公羊學的討論，率皆自流派的歸類切入主題，此即先生治思想史的一貫主張。藉由「學案體」的研究方式，可清楚地呈現出明清學者博學兼修的特質，始能掌握學術論戰中的折衷點，否則無法準確分析明清學術思想由爭論而調和的演變過程。

先生有關明清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收錄於《清史研究論叢》的「學術思想」之部。是編以晚明實學思潮的特質，以及天主教對中國的衝擊為開端；繼而自漢宋之爭，探討由經世到考據的轉變，「中體西用」之爭，進而檢討晚清儒家思想的演變；再就晚清公羊學的復興與演化，論述其對政治改革的影響；乃至以魏源的思想為核心，說明晚清經世之學的再現，並兼論西方史地、科技的輸入，及其時代意義，而貫穿其間的中心思想，則為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簡而言之，先生對近代思想史考察的心得，是始自「經世」與「西學」，亦歸結於「經世」與「西學」，此論點非但掌握了明清思想發展歷程的源、流、變的特質，且亦自成完整的解釋系統。

五、其他有關的著述

王家儉先生的學術，奠基於魏源研究的專精；而「海權」與「思想」，則是其建構近代中國史學術體系的兩大支柱。然先生除專注於既定的研究課題之外，其他如近代政治、軍事、經濟、人物各方面，亦有著述問世。1970年代後期，台灣的近代史學界著重現代化與區域研究的討論，先生特就地方行政、警察制度、婦女參政等問題，發表系列論文。其次，是對滿文的興趣。先生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學位時，曾從廣祿先生學習滿文達三年之久；197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即趁便蒐集滿文相關資料，計畫撰寫有關英國所見的滿文資料，惟返國後以教學與研究兩忙之故，不得不暫時擱置，然至今仍未曾放棄此一計畫。再次，則是對台灣史的關心。先生因研究海權，特別注意台灣問題；1979年至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期間，曾蒐集約二十餘萬字的清季台灣海關史料，擬名之為《清季台灣海關志（1858~1895）》一書，以供台灣對外貿易史研究之參考，惟以台北某出版社將原稿遺失，殊為可惜。

留意於科際整合與理論架構的建立，是先生史學研究的另一個興趣所在，同時也鼓勵、指導學生朝此方向努力。以先生對清代前期滿漢關係的解釋為例，雖採用「征服王朝」（*dynasty of conquest*）理論，但深知此係以邊疆民族入主中國的角度為中心，過於偏向滿人，而無法涵括全面；至於社會學家費孝通等人所主張的「敵對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觀點，則過於強調漢人的立場，仍有偏差，遂於〈崑山三徐與清初政治〉一文中提出「利益交換」的概念，以彌補諸說不足之處。「利益交換」之說，看似簡單，卻能直指問題核心，遍閱清初政治史論著，尚無人提出相近的見解，足見先生為學出入於理論之中，而不為理論所囿。

先生自認「興趣廣泛，用力不專」，實則學問淵博，成績斐然。先生少年時期適值時局動亂，青年時期復遭無謂橫逆，求學過程可說是坎坷多舛。迨投身學術，幾屆壯年，然多年來始終堅守教學與研究的崗位，未嘗鬆懈，即退休之後，亦仍勤於著述。綜觀先生三十年的研究業績，階段分明，自成體系：第一個十年，以魏源研究為起點，擴展為近代海軍史研究；第二個十年，既掌握現代化與區域研究的學術動態，又將重心置於明清思想史的探討；第三個十年，則分就魏源、思想史、海

軍史三大領域，進行總結式的研究，從而完成以「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變局的體系。或許在往後的十年、二十年，先生另有研究計畫，讓我們拭目以待。

附錄：王家儉先生主要著作目錄

專書

- 《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民 53 年 1 月。
- 《魏源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 21 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56 年 11 月。
- 《魏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第 42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67 年 6 月。
- 《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代化的歷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73 年 10 月。
- 《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73 年 12 月。
- 《清史研究論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83 年 7 月。
- 《李鴻章與北洋艦隊——中國近代創建新海軍的失敗與教訓》，排印中。

論文

- 〈《海國圖志》對於日本的影響〉，《大陸雜誌》，32 卷 8 期，民 55 年 4 月。
- 〈清季的海防論〉，《師大學報》，第 12 期，民 56 年 6 月。
- 〈十九世紀西方史地知識的介紹及其影響〉，《大陸雜誌》，38 卷 6 期，民 58 年 3 月。
- 〈明治初期日本漢學家岡千仞的訪華觀感〉，《新時代》，12 卷 5 期，民 61 年 5 月。
- 〈文祥對於時局的認識及其自強思想〉，《師大歷史學報》，第 1 期，民 62 年 1 月。
- 〈清季的海軍衙門〉，《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5 期，民 62 年 3 月。
- 〈論醇親王「用人行政敬陳管見」一摺所展示的晚清政局〉，《師大學報》，第 18 期，民 62 年 6 月。

- 〈清末海軍留英學生的派遣及其影響（1876~1885）〉，《師大歷史學報》，第2期，民63年2月。
- 〈北洋武備學堂的創設及其影響〉，《師大歷史學報》，第4期，民65年4月。
- 〈旅順建港始末（1880~189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民65年6月。
- 〈中日長崎事件之交涉（1886~1887）〉，《師大歷史學報》，第5期，民66年4月。
- 〈晁錯〈籌邊策〉形成之背景及其歷史意義〉，《簡牘學報》，第5期，民67年3月。
- 〈琅威理之借聘來華及其辭職風波〉，《師大歷史學報》，第6期，民67年5月。
- 〈近代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中央研究院五十週年院慶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中國維新思想研討會》論文，民67年6月。
- 〈吳淞鐵路補遺〉，台北市文獻會編印，《台北市耆老會談專集》，民68年9月。
- 〈晚清地方行政現代化的探討（1839~1911）〉，《師大歷史學報》，第8期，民69年5月。
- 〈民初地方行政現代化的探討（1912~1916）〉，《師大歷史學報》，第9期，民70年5月。
- 〈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上冊，民70年10月。
- 〈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代化的歷程（1901~1915）〉，《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民71年5月。
- 〈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1912）〉，《師大歷史學報》，第11期，民72年5月。
- 〈洪北江的憂患意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史研討會論文集》，民73年4月。
- 〈民初改造參議院風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民73年4月。
- 〈由漢宋調合到中體西用——試論晚清儒家思想的演變〉，《師大歷史學

- 報》，第 12 期，民 73 年 6 月。
- 〈民國元年廣東省的府會之爭〉，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會·政治外交組》，上冊，民 73 年 7 月。
- 〈呂坤的憂患意識與經世思想〉，《師大歷史學報》，第 13 期，民 74 年 6 月。
- 〈晚清時期我國科技發展的鳥瞰〉，《師大學報》，第 30 期，民 74 年 6 月。
- 〈廣東的機器繅絲工業與近代中國第一次反機器風潮〉，《食貨月刊·復刊》，15 卷 3 期，民 74 年 9 月。
- 〈晚明的實學思想〉，《港大國際明清史研討會論文》，民 74 年 12 月。
- 〈創造新時代的新史學〉，《文史哲的時代使命》，民 75 年 4 月。
- 〈清末民初安徽的警政建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民 75 年 12 月。
- 〈海軍對於抗戰的貢獻〉，《海軍學術月刊·抗戰五十週年紀念特刊》，21 卷 7 期，民 76 年 7 月。
- 〈李鴻章對於中國海軍近代化的貢獻〉，《師大歷史學報》，第 16 期，民 77 年 6 月。
- 〈清史研究的回顧——開國與建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民 77 年 6 月。
- 〈從天主教的衝擊看明末清初時期中西文化論戰的背景與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民 78 年 4 月。
- 〈晚清公羊學的演變與政治改革運動〉，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 78 年 6 月。
- 〈晚明的實學思潮〉，《漢學研究》，7 卷 2 期，民 78 年 12 月。
- 〈魏源的水利議——兼論晚清經世學家修法務實的精神〉，《師大歷史學報》，第 18 期，民 79 年 6 月。
- 〈清季南洋海軍的創建與演變〉，《師大歷史學報》，第 19 期，民 80 年 6 月。
- 〈崑山三徐與清初政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民 81 年 2 月。
- 〈魏默深的海權思想〉，淡江大學編，《第二屆廿一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

- 集》，民 81 年 7 月。
- 〈是清朝的忠臣還是民國的罪人？對於末任甘肅巡撫袁大化的歷史評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民 82 年 2 月。
- 〈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師大歷史學報》，第 21 期，民 82 年 6 月。
- 〈孫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思想的特質與影響〉，《國史館刊·復刊號》，第 15 期，民 82 年 12 月。
- 〈試論《春秋》一書對於中國史學的影響〉，《師大歷史學報》，第 22 期，民 83 年 6 月。
- 〈甲午海戰檢討的幾點反思〉，山東社會科學院主辦，《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4 年 9 月。
- 〈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以大亞洲主義為中心〉，廣東省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4 年。
- 〈李鴻章的海軍知識與海權思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編，《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民 84 年 3 月。
- 〈是調和而不是衝突——中國人的中西文化觀〉，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flicts of Civilization & Cultural China. (文明衝突與文化中國國際研討會)，C.R.R.S.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主辦)，Vancouver, Canada, Jan. 6-7, 1995.
- "Li Hung-chang and the Peiyang Navy." Samuel Chu & Kwang-ching Liu ed. *Li Hung-chang and Chinese Early Modern*. New York, 1995.

書評

- 〈評介詹遜 (Janson) 著《日本人與孫逸仙》(*Japanese and Dr. Sun Yetsen*)〉，《思與言》，5 卷 3 期，民 56 年 9 月。
- 〈評介 Rawlinson 著《中國海軍發展史》(*China Struggle for the Naval Development, 1861-18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 期，民 58 年 8 月。
-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冊漢譯評介〉，《中央日報·副刊》，民 61 年 6 月 5~6 日。
- 〈魏秀梅《陶澍在江南》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 期，民 75 年 9 月。

〈從歷史看《河殤》〉，《國文天地》，民 78 年 7 月。

編輯

《馬新貽生平事略》，台北，華岡書局，民 70 年。

《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1825~1861)》，第 1 輯（上）、（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61 年。

《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冊（〈民初的軍事與警政〉；〈民初的地方自治〉），台北，民 71 年。

雜著

〈清代的院畫〉，《中央日報·副刊》，民 61 年 8 月 27~28 日。

〈論嚴復與伊藤博文之間的一段軼聞〉，《中央日報·文史專刊》，民 67 年 7 月 25 日；另見《趙鐵寒先生紀念論文集》，永和，文海出版社，民 67 年 4 月。

〈近百年來中國海權觀念的萌芽〉，《中央日報·副刊》，民 67 年 8 月 22 日。

〈魏默深對於台海地位的卓越見解〉，《中央日報·文史專刊》，民 68 年 2 月 20 日。

〈蕭一山先生對於清史研究的貢獻〉，《中央日報·副刊》，民 68 年 7 月 4 日。

〈對於當前高中歷史教學的幾點管見〉，《中等教育雙月刊·歷史專號》，29 卷 3 期，民 67 年 6 月。

〈也談提高大學師資素質之道〉，《中央日報·副刊》，民 69 年 11 月 22 日。

〈歷史教學與改進〉，師大學術研究會編，《明日的高中教育》，民 71 年 6 月。

〈有關師範院校學生前途問題的再檢討〉，《中國時報·二版專論》，民 72 年 10 月 31 日。

〈「紀念魏源誕辰 20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9 期，民 84 年 3 月。

隨意寫新詩 白首下書帷—— 周策縱先生治學的三大領域

周昌龍*

周策縱教授去年甫自服務垂三十年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榮休，到明年一月，便是他的八秩華誕。周先生以《五四運動史》一書馳譽中外，被史學界推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研究的權威之一，每逢五四紀念，就見他僕僕於美亞二洲，儼然是五四運動的首席發言人。事實上，周先生是章實齋所說的「博雅」型的學者，除了近代史之外，他的研究專長還包括了中國文學批評、詩論、紅樓夢研究、和經史考據等，每一方面都有相當分量的著作。所涉獵的學術領域，更廣及古文字學、金石學、社會史、政治學、現代文學等。從才藝與風格上著眼，周先生會被順理成章地歸入傳統文人一型，他率真不器，詩、詞、畫、篆刻無一不精，書法則幼承家學，父鵬翥、弟策橫均為湘中有名書家，先生亦綜兼各體，卓然自成一家。但先生又不是遺老型的人，甚至還不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他秉持五四以來獨立批判的精神，鼓吹以科學方法治學。他翻譯拜倫、泰戈爾等人的詩，自己也創作可與任何一位現代詩人比「新」比「現代」的新詩。從創作的前衛性而言，他又是一個標準的現代詩人。

周先生是湖南祁陽人，1942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參加過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的工作。在學術上，他早年是顧頡剛先生的忘年交和私淑弟子，服膺胡適學派以科學精神治學的學風。1948年先生赴美求學，主要即得力於顧先生的鼓勵。和蕭公權先生一樣，周先生在美國所修習的專業是政治學，1950年獲密西根大學公共行政系碩士，1955年在同校獲博士。在美國的華裔漢學家中，對建設域外漢學有「光復」之功的幾位元老大師，如洪業（煨蓮）、陳榮捷、楊聯陞等均以博學精審著稱，他們的治學特色，和國內的漢學大師王國維、陳寅恪等一脈相承，都是在乾嘉學者實事求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副教授

是之治學精神和功力之外，再吸收西方近代的治學視域（approach）和方法，淹賅博綜，不尚空論，中西共治，不為主奴。周先生治學正是秉承這種新考據學的精神，司馬遷說：「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先生將這兩句話擴充成爲：「通古今中外物我之變，成多方互訟一家之言」，前一句顯示學者所需掌握學術領域之廣袤，後一句說明學者應有的治學精神與態度。多方互訟不是各憑意見自言自語，與訟的每一方都得依據古今中外物我通變之客觀事實，辨證析理，然後能成就客觀的、科學的一家之言。乾嘉以來中國學術上最大的發展特色即在建立這樣一種科學的精神，胡適準確地看到了這個事實，所以他說乾嘉學者的治學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有人據此批評胡適不懂科學，這固然不無道理，但也不無過分苛評之處。胡適有多「懂」科學是一回事，他當然不可能像專業的科學哲學家那樣全面地「懂」得科學的本質與理論（科學哲學家何嘗人人都能真懂？），但他強調乾嘉學者的治學方法和科學實驗室的方法有相同之處，指出乾嘉學者的精神就是實驗室的精神，這個看法本身並沒有錯。顧頡剛師承胡適，周先生私淑顧頡剛，胡適學派學風對周先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作爲民國新學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胡適在學術上有不少貢獻，其中必須要包括梁啟超所說的「漢學殿軍」之成就在內。所謂「殿軍」，不當作「絕後」解，而當視爲承先啓後之意。以胡適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爲例，他以西方哲學史的方法論爲基本架構，全面吸收清儒考證學和歷史學的各種優點，從而超越了清儒考證學的成績，爲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實例。周先生的《五四運動史》飲譽三十餘年而不衰，主要是因爲這本書奠基在充實、全面之史料上，是用客觀、科學的態度寫作的，這也可說是胡適學派學風正面影響的實例。但無可諱言，胡適的學術視域確有其限制。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胡適對其入室弟子羅爾綱的指導態度。羅爾綱在從事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時，只要稍微越出「史料學」軌道，想進一步對史實作理論發揮或闡釋時，就會受到胡適「沒有證據就說話」的斥責。胡適在考證、辨僞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他的方法和識力發揮到極致時，可以成就像《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這種平實而又具有革命性影響的作品。但是，同樣的方法和態度，卻也讓胡適花了幾十萬字作有關神會和尚的考證，而還未進入研究禪宗史的門檻。

胡適自稱有「歷史癖」，但他從來不會對中國任何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具體變化和互動歷程，作過系統、深入的研

究，當然也就無法對中國思想、歷史和文學問題，建立理論架構。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綱》等著作中所展現的對晚清社會、經濟問題的深入瞭解，以及對諸如清季軍制變化（湘軍以前，兵爲國有；湘軍以後，兵爲將有）等理論分析的興趣，使他不得不受到胡適三番四次的嚴厲批評，但隨著《湘軍新志》、《綠營兵志》等作品的完成，羅氏卻一再證實了自己所建立的理論的可信性，間接也說明了胡適學術視域的局限性。周先生在史料辨偽、考證和重建歷史原型等治學風格上都深受胡適、顧頡剛等人的影響，《五四運動史》的長處，就在它能夠全面地蒐集、辨識和組織史料，在相當程度上可信地重建了此一歷史的真實原型。想想這些史料的數量、爭議性、龐雜性和蒐集的困難度，此書之盛譽其來有自。但在眾多推崇讚美聲中，也有人批評這本書只是史料而非史學，如周先生的威大同事林毓生教授即作如是觀。剛好林教授又是胡適的嚴厲批評者，不同學風的磨擦，固然暴露了每位學者都必然會有的學術偏向，但只要不存門戶之見，換個角度來看，這又何嘗不是突出了周先生重史實而不輕作推斷的學術風格？

周先生是威大東亞系的奠基人，以其博學彊記，在威大素有「活字典」之稱。他的學術淹通文史，綜貫中外古今。據其學生王潤華博士的初步統計，先生著有中英文專書多種，論文、講演、訪談一百七十多篇，翻譯西詩四種，自著新舊體詩三百多首。以下即分五四運動，古史研究與經史考據，及紅樓夢與文學研究等三大領域，試加論述。

一、五四運動

據周先生自述，他對五四運動的研究興趣早萌芽於青年時代。五〇年代中期在密西根大學撰寫博士論文時，便即以此爲題，寫成的論文原名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 Dissertation, 1955)，中文譯名應爲〈五四運動和它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文長八百多頁，由密西根微縮中心印爲兩大冊。1956到1962年，周先生在哈佛大學研究，便開始本書的改寫工作，改寫的方向，大致是縮減原來「政治學」的成分，而增加思想史的分量。1960年，周先生將原書易名爲今日通行本的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中譯《五四運動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

出版。自面世迄今，三十五年來，此書一直在相關研究領域中高踞權威地位，是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學者不可或缺的首要參考書。哈佛一再將此書重版，史丹福大學出版社也出版普及本。在新陳代謝速度飛快的美國漢學界，一本書能夠「壟斷」一個重要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達如是之久者，在華人用英文寫作的著作中，大概只有陳榮捷先生的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享有同樣榮譽。諷刺的是，此書在中文世界，並不像在英文世界一樣幸運。在獲准用中文公開發行之前，此書曾有坊間盜譯本（如龍田本）在台港等地流傳，資料疏脫，譯筆慘不忍睹，錯譯連仍。後來獲周先生正式授權翻譯的中文本《五四運動史》，由周先生弟子王潤華、洪銘水、鍾玲、陳永明等人執筆，交香港明報（1981）出版，後由台灣桂冠圖書公司（1989）出版所謂「全譯本」，都只有上冊，即英文原著的上編部分，下編迄今未見正式譯本（盜印本不計）。

《五四運動史》分上下兩編，每編各七章。上編集中描述五四運動的成因和發展經過，是五四的「本史」，下編探討五四運動在政治、社會、文學、思想方面的影響，可視為對五四本質的闡釋和定位。周先生對五四運動下過一個至今尚為學界廣泛沿用的「雙定義」：即五四運動應包含寬狹兩義。狹義的五四，係指 1919 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學生示威運動；廣義的五四，則包括五四的本身和前因後果，從 1917 年開始的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到後來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都涵蓋在內。此書上編，即為對五四運動從狹義發展到廣義之過程的翔實交代，下編則擴展為對整個新文化或新思潮運動的全面論述。因此，此書雖然是以五四運動為主題，實際上，它的討論面涵攝了中國近代政治、社會和學術思想等多個層面上的許多重大問題，幾乎每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學者，在從事本身的專業研究時，都可以從這本書中獲得相當的靈感和參考資料。

資料詳盡至巨細靡遺的地步，是周先生在五四研究上一項令人歎為觀止的成就。與五四運動直接有關的民初雜誌書籍等出版物，洋洋八、九百種，已見於周先生編的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中文書名為《五四運動研究資料》)，這些第一手資料再加上其他難以數計的參考書和材料，構成了《五四運動史》的基層建設。但這些資料還只是周先生所用過的參考文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涉及每一個與五四稍有關係的專門論題時，周先生又

會循線追索，使用更多專門性的資料。例如在論及歐戰結束使中國工業界發生恐慌時，周先生除了引用多位中外專家的著作和統計數字外，還參考了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中國年鑑》、及美國出版的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等原始材料。而這個問題，不過是周先生書中略為帶過的幾句話罷了。周先生常說，重建史實是歷史研究中首要的事，也是最困難的事。從周先生自己艱苦卓絕的示範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他這些話語中的深意。

周先生對五四運動有一種宗教般的熱烈感情，如他自己在《五四運動史·自序》中所說的：「我少年時代在長沙，對五四運動就已感到興趣……在當時的學生運動中，我頗為活躍，也是學潮和罷課活動的核心人物。當我們回顧五四運動時，自然感到驕傲和欽佩。」他的第一首白話詩，登在長沙《抗戰日報》上，題目就是〈五四，我們對得住你了〉。他在密西根大學堅持要寫五四運動的博士論文，不理會指導教授要取消獎學金的威脅。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他對五四運動不止是一種專業的研究態度，還是一種生命的研究態度。唯其如此，他才能夠這樣「不計成本」地埋首寫出一本傳世之作。而更難得的是，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生命情調」而改變首重證據的客觀學術態度。他把自己對五四的內在生命感情，轉化為追求所慕對象之真相的研究動力，用最平實的態度，重建五四之歷史真實。

對知識分子而言，平實的態度往往更能感人。1978年12月，羅素的第二任夫人朵拉（Dora Black Russell）從英國寫信給素未謀面的周先生，說自己「不知道這封信能否寄到你處，或者甚至你是否還活著，但當我讀你的《五四運動史》時，我馬上覺得必須寫這封信，因為我要為這本書而感謝你。」朵拉接著說，當1920年她和羅素一起訪問中國時，她並不知道五四運動的詳情，卻對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膚」，現在讀了全部詳情，使她感覺「非常痛快」。這封信由周先生珍藏，曾在1979年5月13日的《時報周刊》上發表。

除了《五四運動史》和《五四運動研究資料》之外，周先生還有多篇討論五四運動的中英文論文，最重要的首推“The 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一文，收入 Arthur Wright 所編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1960年版《大英百科全書》的「五四運動」一條，也出先生手筆。三十多年來，先生對五四

運動始終抱著一個平實的看法，他認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並非全盤否定，而是全面批判；不是反傳統，而是反《傳統主義》。五四之前，傳統主義的勢力很大，將一切正統文化都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五四知識分子提倡獨立思考，打破天經地義的觀念，所以說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是很自然的民族自我批評與反省，他們的弊病是過度貶抑了中國的古文化，好處則是加強了中國思想界理智主義的力量。這個看法幾乎沒有什麼「理論性」，很難討好現代學界，卻是先生一貫的態度。

二、古史研究與經史考據

周先生在大學時代，就有《子產評傳》之作，其中兩章發表於重慶《新認識》月刊，全稿約二十萬字，燬於大陸五〇年代土改時。1969年，新加坡新社出版先生的《破斧新話：詩經研究之一》。1986年，台北聯經出版社出版的《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則是先生在古史研究和經史考據方面的代表作。

《古巫醫與六詩考》初稿寫於1969年，最早以論文形式分兩期發表於台灣《清華學報》（新12卷1、2期合刊，新13卷1、2期合刊），原題分別為：〈中國古代的巫醫與祭祀、歷史、樂舞及詩的關係〉及〈古巫對樂舞及詩歌發展的貢獻〉。後來又將部分內容用英文改寫，收入錢存訓和芮效衛（David T. Roy）合編的 *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古代中國論文集）。全書最後在1984年定稿。

如果說，《五四運動史》所關心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挑戰時所激發的對傳統的危機感，則《古巫醫與六詩考》所積極探索的，便是這個傳統的真正源頭，或者說，是形成中國文化傳統的原始性質和本相。唯有瞭解本相之後，我們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文化傳統，也才有可能適當地融合外力來轉化傳統。五四知識分子很多都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們在引入新思潮的同時，對禮俗民謠等民間文化，都特別注意研究。胡適、劉復、顧頡剛等發起蒐集歌謠和民間傳說，周作人、江紹原等提倡研究禮俗和原始宗教，均為顯例。周先生研究古代巫醫，其目的與探徑，竟都和他所研究的五四知識分子不謀而合，洵非佳話？

《古巫醫》一書大量運用古代文獻和甲骨文、金文、出土文物等資料，論述巫醫文化的長遠、豐富傳統及其與詩經「六義」等文學傳統之間的

關係。巫可能是中國知識階層存在之最早形態，在文化傳統之早期形成過程中，佔有極重要地位。但從西周人文主義興起之後，「天道遠，人道邇」的觀念在知識階層中取代了「尚鬼」的殷商文化，巫的歷史亦從此湮沉。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下，周先生爬梳比附，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如中篇第五章論述商湯與巫醫傳統時，指湯、攘、禳、禡等字音近義通，商湯之名與巫陽之名，取義可能相類。又引皇甫謐〈甲乙經序〉「湯液始於伊尹」，湯液為醫酒，見於《皇帝內經》第十四篇〈湯液醪醴論〉，聯想湯的大臣伊尹可能與巫醫有關。類似的論證，固然尚不足成為信史，這點周先生自己亦早有所警覺，他在書前〈自序〉中說：「由於古史資料稀少又零星，我的結論有些固然自信已能補前史的缺失，但也有不少還只能算是一種假設。」但由於周先生的論證繁贍詳明，常有訓詁依據，與唯憑想像鑿空附會者不同，他的許多假設，除了能刺激靈感之外，也有相當程度的可信性。另一位以博雅著稱的漢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比周先生少一歲，最近也有長文討論古巫問題（見《慶祝中華書局八十周年論文集》）。與周先生不同，饒先生反對以巫術觀點推論巫的性質，他認為，在有史可稽的古代中國，屬於菁英階層的巫，早已超越了巫術時代，而成為賢士大夫中的一員。饒先生博引經典，持之有故，與周先生「同」途（論證方法）而「殊」歸（結論）。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古巫傳統所知仍極有限。如果兩位先生能夠共同主持一個 Workshop，從不同學術視域系統地探討此一問題，成績必有可觀。

周先生曾發表〈如何從古文字與經典探索古代社會與思想史〉一文（見《明報月刊》216期，1983:12），認為傳統經典在記載古代社會風習、日常生活、或非正統觀念與思想時，常疏於詳紀，而後人訓釋則尤多昧誤。故在推求古史真相時，不妨從經典恆訓常釋以外之異說，或正文隸變傳受之脫誤處入手；古文字則因象形、指事、會意者尚多，間有視若形聲，細審則可能兼含會意，對古人原始觀念、心態、情志之探索，往往有意外收穫。由於這種方法很容易流入牽妄，所證者往往只得其可能，而不能冀其可必，故求證時必須慎思明辨，察微顯幽，在文字和訓釋的本證外，尚必須求得旁證，然後博會貫通，自成一說。《古巫醫與六詩考》一書，可說是先生對自己所主張之方法論的實踐。

三、《紅樓夢》與文學研究

是非聚訟苦悠悠，識曲端推顧曲周。

能使一書天下重，白頭海外說紅樓。

這是新加坡詩人潘受先生寫贈周先生的詩，顧曲周既用周瑜知音顧曲的典故，又指周先生為妙解紅樓十二曲之人，用「端推」兩字，可見周先生在紅學研究上之受推重。事實上，在《紅樓夢》研究的領域內，周先生被公認是可與大陸首席紅學家周汝昌分庭抗禮的兩大權威之一，所謂：「中美東西，大江南北有兩周」，兩周即先生與周汝昌是也。

《紅樓夢》一書在民初大受推重，研究者主要分兩派，一為傳統的小說評點派，另一為蔡元培等領導的索隱派，受方法與資料所限，頗多捕風捉影之談。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以「科學方法」解決了《紅樓夢》的版本和作者等問題，奠定「紅學」研究的基礎。五〇年代中共清算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原為1923年出版之《紅樓夢辨》），反使「紅學」聲名大譟，蔚成海外顯學。周先生在哈佛研究時，便與楊聯陞、海陶瑋（James R. Hightower）等教授經常討論《紅樓夢》，海陶瑋更曾英譯過《紅》書的前五回。到威大執教後，先生更利用教學之便，大力鼓吹其多角度多科系合作的「紅樓夢研究計畫大綱」，使威大成為海外「紅學」研究的重鎮之一。1980年，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在威大舉行，周汝昌、馮其庸、潘重規、余英時、趙岡、王靖宇、葉嘉瑩、白先勇等教授均發表論文，周先生除擔任大會主席外，並一口氣提出論文三篇，分別探討版本、主題和比較研究等問題，「勇」冠三軍。

周先生五〇年代初期與唐德剛先生等發起紐約白馬詩社，邀胡適先生為顧問。當時先生與胡先生談起《紅樓夢》時，曾指出「紅學」研究應該從兩個方面同時下手，一方面要像胡先生已經做過的那樣，用乾嘉考證方法加上西方科學和漢學研究方法，去探索有關的事實真相；另一方面，則要用中外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的方法，去分析、詮釋小說本身。從胡先生到周先生，紅學家所走的主要仍集中在第一條路，文學評論的本身在王國維之後反成絕響。據說，周先生曾游說兼通中外文學理論的羅根澤先生從事紅學的文學評論工作，羅先生自謝不敏，反過來又要周先生自己去努力嘗試。紅學的文學評論，仍有待開創。

《紅樓夢》之外，周先生對中國詩論、小說和文學批評等都曾下過功

夫。1962年在《海外論壇》(World Forum)發表論王國維人間詞之短評六十則，頗得洪業先生稱許。十年後由香港萬有圖書公司集結出版，書名即為《論王國維人間詞》。此書仿王國維《人間詞話》之體裁，以文言寫作，抒論先生自己對王國維詞之心得，間及對整體文學之意見，高思雋語，輕靈曼出。其中第二十八則對清末詩壇的批評，先生後來覺得過於簡率偏激，實則最能代表其靈光一現的機趣式評論風格，深得傳統詩話之神髓。現錄該則部分文字如下：

自清末西學東漸以後至五四前，能鎔近代感情與想像入舊體詩詞而足以驚心動魄，移情沁人心者，寥寥無幾，在詩，當推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蘇曼殊；在詞，則王國維一人而已。康、譚之詩，不純以政治改革家眼光出之，而發於無比之救世狂熱，有佛孔墨耶棒喝悲憫之懷，親入地獄以拔眾生於苦之志，益以今文家如龔定盦輩恢詭筆墨之影響，故能發非常可怪之言，造悲壯瑰璋之境，震撼靈魂，深予烙印。……康、譚曾讀譯書，蘇氏則受西洋十九世紀初期浪漫派詩人如拜倫、雪萊之浸潤尤深，皆不欲為當時流行之宋詩風格所拘。……靜安於詩，除五言外，不脫宋詩韻味。然於詞之風格，則得五代北宋婉麗之旨，以之紓寫叔本華及佛陀之悲憫情緒，與麗情合一，是又能兼康譚蘇之意境，而其往往臻於無我之境，則又非三人所能及。凡此四家，皆曾受西洋哲學文學之影響，而又深契於佛諦者。正長素所謂：「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此殆五四以前詩壇之空谷足音，而結束數千年來舊體詩詞之絕響也。

葉嘉瑩教授已有系統探討王國維詞之專著，以成巨著而言，周先生這本區區小冊子自難與抗衡。然詩詞中自有靈境，以捕捉靈境而言，則拈花一笑勝於曼妙小語，曼妙小語又往往勝於博學鴻詞。以此觀之，則先生此不足六十頁之《論王國維人間詞》，亦尚有傳世之道耶？

附錄：周策縱先生主要著作目錄

英文

Election, Initiative, Referendum and Recall: Charter Provisions in Michigan Home Rule C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58.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ed., vol. 1. Madis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8.

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ed., vol. 2. Madis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Hong Kong: N.T.T.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A New Index to 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according to a new method of arranging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various methods), Madiso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2.

“Report 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16~20, June 198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0.

中文

《子產評傳》（大學時代作，全稿二十萬字，燬於大陸五〇年代土改時，其中兩章發表於《新認識》月刊）。

《梁山伯與祝英台》（改編地方劇）（1956年稿）。

《林紓年譜》（1958年稿）。

《拜倫〈哀希臘〉詩漢譯彙集》（兼新譯與注）（1956~1959年稿）

《海燕》新詩集，香港：求自出版社出版，1961年。

《論對聯與集句》，香港：友聯出版社，1964年。

《釋「無以」與「來」——兼說「必也」與「歸去來兮」》，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學中文系，1965年。

《破斧新詁（《詩經》研究之一）》，新加坡：新社，1969年。

《論王國維人間詞》，香港及台北，1971年。

《海外新詩鈔》（選編，手稿），1973年。

《〈說文〉祭祀詞彙考釋》，1978年。

《五四與中國》（合著），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

- 《五四運動史》（偷譯本），台北：龍田出版社，1980年。
- 《五四運動史》（中譯本），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1981年。
- 《五四運動史》（全譯本），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9年。
- 《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
- 《〈紅樓夢〉大觀》（合著），香港：百姓出版社，1987年。
- 《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台北：聯經出版社，1986年。
- 《胡適與近代中國》（合著），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 《梅花詩》（自藏版中學時代作）（1991年）。
- 《白玉詞》（自藏版）（1991年）。

翻譯

- 《西詩譯萃》（中譯英、美、德、法、俄、希臘、羅馬等國詩一百五十首，部分發表於紐約《海外論壇》、新加坡《南洋商報》、台北《聯合報》、《中國時報》、香港《文藝》等報刊）（1948~1950年稿）。
- 《螢》（中譯泰戈爾詩集），台北及香港，1971年。
- 《失群的鳥》（中譯泰戈爾詩集），台北及香港，1971年。
- 《奧德賽》（中譯荷馬詩集，譯完前三卷，部分發表於香港《大學生活》及新加坡《南洋商報》）（1972年稿）。

單篇論文、講演及訪談

- 1948年5月出國以前，論文及紀錄稿八十多篇，分別刊載於國內報紙及書刊。
- 1948年出國以後，論文、講演及訪談一百六十多篇（內英文三十多篇），分別刊載於美國、香港、台北、新加坡、馬來西亞、德國、法國、中國大陸等國家和地區報紙及書刊。

新詩及舊體詩詞

自三〇年代至現在國內外發表新詩及舊體詩詞共三百多首。

小傳載在：

- Who's Who in America*, 1975 to present.
- Directory of American Scholars*, 1975.
- Wisconsin Men of Achievement* (Bicentennial Edition 1776~1976), 1975.
- International Authors and Writers Who's Who*, 1977.
- Who's Who in U.S. Writers, Editors and Poets*, 1986 to present.

橫山英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曾田三郎*

橫山英先生 1924 年出生於日本兵庫縣。他在 1988 年退休之前，長期任職於廣島大學，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學，曾任廣島大學文學院院長，為廣島大學的發展作出過貢獻。橫山先生也曾膺任廣島史學研究會（日本著名的歷史學會之一）的理事長，活躍於日本學術界。退休之際，先生學術聲望甚隆，校方乃授予廣島大學名譽教授之學術榮譽，到廣島修道大學進行教學和研究，至今仍然對學術熱心以求，廣島中國近代史研究會亦幸賴先生指導，才能不斷湧現出年輕而優秀的研究者。又，先生在年輕時，曾遠赴美國，擔任哈佛燕京研究所的研究員，此乃先生能常以國際視角來研討中國近代史之故。先生的研究因有諸多業績，在此僅就如下幾個部分加以介紹。

一、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貢獻

橫山英先生最初發表的論文，是有關元代寺院的研究。而自 1952 年在《歷史學研究》上發表有關明代工商業勞動者的論文後，正式開始了對明清時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1960 年代，他又在與《歷史學研究》同樣著名的日本歷史學學術刊物《東洋史研究》、《史學雜誌》上發表了有關清代運輸業、踹布業、城市絲織業等的研究論文，並且進而研究農業問題，從而執筆寫成《中國近代化の經濟構造》（亞紀書房，1972 年版）一書。

橫山英先生在這部書中明確指出：「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不但出現於本來的工廠手工業，而且起源於商業資本將小生產者組織起來，作為事實上的工資勞動者而加以控制的這樣一種形態。此書是對於戰後日本有關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史研究有過很大貢獻的學術著作，現今美國出版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論著中仍經常引用。為釐清此書的學術意義，本有進一步

* 廣島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助教授

詳述的必要，但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慈玉先生已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中予以介紹，故我在此從略。橫山英先生在明清社會經濟史領域之外，也有可觀的研究成果，謹略加析述。

二、獨創性的辛亥革命研究

對於橫山英先生的辛亥革命研究，首先應予指出，他將中華民國時期的政治權力作為「半殖民地的絕對主義政權」來把握，而這種政權成立的標誌，就是清末民初的政治變革即一般所說的辛亥革命。同樣的觀點雖有他的老師今堀誠二先生提示過，但橫山英先生參考了明治維新史研究和法國絕對王政的研究，在邏輯上作了更周密的闡述。然而，橫山英先生的見解同日本國內外認為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大多數研究者相異，因此問世後引來了多方面的批評。

橫山英先生早在 1966 年發表的論文中就不同意視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通說；自此大約十年之後，他在公開出版的《辛亥革命研究序說》一書中獨創性地提出了「辛亥革命即半殖民地的絕對主義政權的成立」這一論點。恐怕橫山英先生自己也察覺到，這一論點還包含著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尤其是有關清末民初資產階級各派勢力特性的實證研究、還有關新政時期的清朝政權和中華民國時期政治權力結構的實證研究，都是留諸今後的重大課題。但是，橫山英先生所持見解的重要性在於，既然知道實證研究尚很缺乏，那就可從國家權力各階段的視角來規定中華民國時期政治權力的性質，因此，如果認為辛亥革命作為資產階級革命來說是失敗了，那麼革命中成立的中華民國的政治權力又是什麼性質呢？關於此點，本來批評者應該就此提出不同的闡釋，但其爭論至今仍未取得充分成果。

為了確立上述有關辛亥革命的本質，橫山英先生在清末民初中國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看法。首先，在政治上的一個重點，便是如何評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若要判明近代以來國家的性質，那麼分析該國擁有的憲法是很重要的。通過辛亥革命而建立的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就相當於暫定的憲法。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條款之中，橫山英先生特別重視的是第一章第二條有關國家主權的規定和第二章裡有關人民基本權利的規定。

橫山英先生認為，第一章第二條對國家主權的規定，同梁啟超的國家

思想一樣，是根據國家高於國民的觀點；而這種觀點也反映在第二章裡有關基本人權的規定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二章雖然規定了自由權等基本人權及人民的其他各項權利，但該章第十五條卻規定這些權利可由法律加以限制。橫山英先生注意到這點，認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具有絕對主義政權性質的日本明治時期的國家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是同一性質。橫山英先生在研究梁啟超的許多論文中，不是從君主制或共和制的國體論，而是從國家法人學說的角度分析了梁啟超國家思想的特徵。

關於政治方面的另一重點，是橫山英先生將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視為立憲派。眾所周知，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幾乎都認為孫中山和中國同盟會派勢力的領導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橫山英先生則認為無論立憲派還是中國同盟會派都是資產階級的勢力，而正是立憲派才領導了被稱為辛亥革命的政治變革。其理由是：第一，立憲派持有最具體的、體系性的、實踐性的政治變革構想；第二，從立憲派的社會基礎來看，代表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組織了商會、教育會等職能團體和地方自治團體，對社會發揮了巨大影響的是商紳階層（地主資產階級），而通過諮議局或立憲團體在政治上代表著他們的卻是立憲派。

在《辛亥革命研究序說》刊行之前，筆者也曾研究過湖南省的辛亥革命，認為湖南在擺脫清朝政權統治的過程中，立憲派確實起了領導作用。立憲派是「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的主張，雖還不為世界各國的研究者所認可，但對於橫山英先生所說立憲派在清末民初各政治勢力中有最強固的政治、社會性組織、有最明確的國家構想，這些都是我所贊同的。對於立憲派的歷史評價，不知是否受了橫山英先生對立憲派研究的影響，我不敢確定，但學術界在此之後，對立憲派的整體評價確實變得大為提高。

橫山英先生將一般所謂商紳階層或紳商階層這一當時帶有資產階級特點的社會階層的歷史性質規定為「地主資產階級」。而這一規定的基礎，則是出於橫山英先生對清朝末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所持的特有觀點。在他看來，「民族資本」同洋務派的資本主義企業相並行，從十九世紀七八〇年代發生，到中日甲午戰爭後的九〇年代末，其增長便超過了「官僚資本」；進入二十世紀後到「新政」時期，其增長進一步加速。橫山英先生由如下三點來分析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為「民族資本」所創設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經濟特徵。

其一，是關於當時生產力階段的問題。他基於原動力的整個使用狀況

和像火柴業這樣個別產業的分析，認為很多企業都處於工廠手工業的階段。其二，是關於當時中國產業的整體構成的問題。他注意到「民族資本」所投資的產業大部分是消費資料生產的範圍。其三，是關於「民族資本」的來源問題。橫山英先生整理了中國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剖析了投資於當時資本主義企業的「民族資本」大多來自「地主官僚」、「商人」、「買辦」的出資，而其中以「地主官僚」所占比率最高。根據這種「民族資本」來源的有關事實，橫山英先生提出：中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即不是因於農民等生產者內部的財富積累或近代性質的分化過程，而是地主、商人（包括買辦）等舊有統治階層所積蓄的一部分財富投向近代產業而進行的。

商紳階層作為資本家階級來說是尚未成熟的。他們一方面作為地主同傳統的經濟保持著密切的利害關係，故而不想根本變革現存的政治體制，但另一方面又要求親自參與政治和修改政策——在這一方面，立憲運動等便是具體表現。不過他們的政治要求同當時的清朝政權並不是根本對立的。這是由他們的階級性格所決定的，但當時清朝政權的性質也有過影響。而對於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清朝政權的性質，橫山英先生也有獨創性的見解。

橫山英先生指出，二十世紀初的清朝政權是由以袁世凱為首的「新洋務派官僚」掌握著主導權的。「新洋務派」雖然承接了十九世紀後期推行洋務政策而企求中國經濟近代化的洋務派官僚的派系，但義和團事件後，添加了採用立憲主義、追求政治近代化的新特點，同時也隨之掌握了清朝政權的主導權。因此，假如說清朝政權的倒台是名符其實的革命，那就勢必出現「新洋務派」從權力寶座上被拉下來的事態。但是，當時商紳階層和政治上代表著他們的立憲派勢力，圍繞著立憲政策的推進日程及各項政策的內容，即使同「新洋務派」有不同意見，卻並沒有根本的對立。

一般視為當時在政治上代表先進的資本家階級的中國同盟會派勢力，橫山英先生評價為「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勢力」。這派勢力與立憲派不同，並不是中國國內特定社會階層的政治代表，而是通過留學和國內新式學校的教育而學到新知識，對國內外危機狀態反應敏感的知識精英群體。被總稱為立憲派的勢力具體講是由若干團體所構成的，而其共同點是具有建設立憲君主國家的明確政治目標。相比之下，中國同盟會派勢力在組織上、思想上的凝聚力並不強。人所共知，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兩年就很

快發生了組織分化；而橫山英先生認為，同盟會派在思想上也包含從國粹主義者到無政府主義者等泛雜的知識分子。

由於缺乏立憲派那樣在組織上、思想上的凝聚力，因而中國同盟會派勢力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變革期要發揮主導作用是困難的。那麼，該勢力在此時期到底起了何等作用？關於這問題，橫山英先生還注意到中國同盟會派勢力的「反滿革命」論。持有各種思想的知識分子參加了構成該派勢力的各團體，其共通之處便是強烈的「反滿論」。爲了認清「反滿論」在清末民初政治變革時期的客觀意義，有必要再來談論清朝政權。

前已述及，橫山英先生認為在義和團事件後清朝政權內部掌握著主導權的是「新洋務派官僚」。如果以這種對政權結構的看法爲前提，那麼無論怎樣激烈的「反滿論」和據之進行的武裝起義，對清朝政權的主導勢力來說也不是多大的打擊；倒是打擊了政權內部轉而處於從屬地位的保守勢力，從而在客觀上爲「新洋務派」建立自己的政權提供了可能性。在中國同盟會派勢力領導的「反滿革命」運動和立憲派主導建立的新地方政權這樣一種政治環境下，其後掌握了中華民國政治權力的正是原來的「新洋務派」，即所謂軍閥。

中華民國時期的政權，是與工廠手工業的生產力階段相適應的。一方面維持著舊有的社會經濟體制，另方面根據新興資本家階層的要求而推行發展經濟的各項政策；由此，橫山英先生還考慮到當時中國所處特殊的國際環境，從國家權力各階段的角度將這個政權定位爲「半殖民地的絕對主義政權」的成立。

三、中華民國時期民眾運動的研究

對於中華民國時期的各個歷史問題，橫山英先生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五四運動的研究方式也很獨特，是以中國確立各項民主主義權利的角度來分析的，不過我在此要介紹的是他所研究的 1920 年代的農民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抗日運動。

在《辛亥革命研究序說》一書中，橫山英先生就曾論及中國農民所參加的民眾運動，但這個時期的農民還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潛在力量。這樣的農民運動開始具有明確的政治目標，是到 1920 年代以後的事，作爲近代意義上的農民運動而獲得了質的發展之所以可能，一個重要

原因是由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指導。把握此點並非獨創，關鍵是有關研究過於強調對於農民運動的政黨指導，存在著將政黨的農民運動對策與農民運動的實態相混同的強烈傾向；而橫山英先生則注意到運動發展中農民方面的內在原因和農民的自主性意識。

橫山英先生對於 1920 年代展開的湖南農民運動作了實證研究，明確指出政黨和民眾關係的要點：同清末相異，1920 年代的農民運動有著政黨指導，而這些政黨雖有解決中國農村各種問題的指導方針，但其指導方針與農民自身的要求並不一定一致，有時候倒是農民方面的要求反而對政黨的指導有制約作用。對於闡明農民運動在 1920 年代急速高漲而後又迅即停息的原因，先生的這種觀點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於中華民國時期政黨和民眾運動研究的這種認識方法，同樣見諸橫山英先生有關知識分子的抗日運動的研究中。就 1930 年代的抗日運動而言，研究者們大多從政黨間關係的角度而重視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的對立與合作，但橫山英先生卻很早就注意到政黨之外的抗日運動，特別是研究了城市知識分子運動的特有意義。其具體事例就是對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鄒韜奮等的研究，他闡明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圍繞著抗日運動和新國家的建設而結成的以他們為中心的團體所特有的意義及其局限。

以上在有限的範圍內介紹了我的恩師橫山英先生豐富的學術研究業績。我最後想要強調的是，先生的研究是根據長期性的洞察觀點而進行的。能夠最明顯地了解這一點的是先生的一篇論文，即為《中國の近代化と地方政治》一書所撰寫的緒論〈二十世紀初期の地方政治近代化についての覺書〉。戰後日本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政治史方面取得的進展超過了社會經濟史研究。但是，政治史研究的成果雖體現在對政治史上各個事件進行個別分析的深化這一點上，而在提出中國近代政治史的全體展望方面，尚不充分。對此，橫山英先生從國家權力各階段的視點將中國近代史一以貫之地作通盤思考。他這種研究特色不僅是在政治史方面，而且也反映在他對社會經濟史和民眾運動史的研究之上。

總而言之，橫山先生是一位重視宏觀研究，業績斐然可觀的中國近代史學者。

附錄：横山英先生著作目錄年表

- 1950 〈元代の寺院財産とその性格素描〉，《史學研究》2。
- 1951 〈宋代に於ける佃戸の存在形態〉，《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1。
- 1952 〈中國における商工業労働者の發展と役割-明末における蘇州を中心として-〉，《歴史學研究》160。
- 1955 〈中國に於ける農民運動の一形態-太平天國前の「抗糧」運動について-〉，《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7。
〈開港と近代化の始動〉、〈植民地化の進行と辛亥革命〉，《教養東洋史》，柳原書店。
- 1957 〈十九世紀末の中國における農村事情〉，《社會科教育・歴史・地理研究論集》。
- 1960 〈清朝中期における抗糧運動〉，《歴史教育》8-11。
〈清代江西省における運輸業の機構〉，《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18。
〈清代における踰布業の經營形態〉，《東洋史研究》19-3、4。
- 1961 〈インテリ革命家の生涯-彭湃と廣東農民運動-〉，《社會科研究》9。
〈中國民族工業資本と錢莊との關係について〉，《社會經濟史學》27-3。
- 1962 〈清代における包頭制の展開-踰布業の推轉過程について-〉，《史學雜誌》71-1、2。
- 1964 〈中國史における變革期のみかた（近代）〉，《講座社會科教育》世界史Ⅲ。
〈咸豐期、山東の抗糧風潮と民團〉，《歴史教育》12-9。
- 1965 〈抗日統一戦線の形成過程〉，《講座社會科教育》世界史Ⅳ。
〈中國におけるマッチ製造マニファクチュアの成立〉，《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25-1。
- 1966 〈清末の變革における指導と同盟-辛亥革命研究ノト-〉，《史學研究》97。
〈抗日運動と愛國的ジャーナリスト-鄒韜奮の活動と思想變革-〉，《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26-3。
- 1968 〈清代の都市絹織物業の生産形態〉，《史學研究》104、105。
〈五四文化運動前後の復古的イデオロギ〉，《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28-1

- 《孫文-人と思想-》，清水書院。
- 1969 〈ロシア十月革命と中國〉，《別府大學史學論叢》4。
- 1970 〈五四運動の思想とその繼承〉，《歴史學研究》362。
- 1971 〈辛亥ブルジョア革命説の系譜〉，《史學研究》111、112。
- 1972 〈脱出への苦惱-梁啓超とその時代-〉，《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1-2。
〈抗日大眾運動の展開〉，《中國研究》30、31、32。
《中國近代化の經濟構造》，亞紀書房。
- 1973 《ドキュメンタリ中國近代史》，亞紀書房。
- 1975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Modern China* 1-2。
〈梁啓超の立憲政策論〉，《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5。
〈鄭觀應の議院論〉，《史學研究》129。
- 1976 〈湖南農民運動の起因と土地問題〉，《アジア經濟》17-3。
〈辛亥革命研究覺書〉，《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6卷特輯號1。
- 1977 《辛亥革命研究序説》，新歴史研究會。
- 1978 〈清末立憲思想の研究〉，《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38。
- 1979 〈近代中國の村と革命〉，《歴史公論》5-4。
- 1981 〈1910年長沙暴動關係史料紹介〉，《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41。
- 1982 〈中華民國成立時の農村事情についての史料2編〉，《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42。
- 1985 《中國の近代化と地方政治》（編著），勁草書房。
〈20世紀初期の地方政治近代化についての覺書〉，《中國の近代化と地方政治》。
- 1986 〈清末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國家有機體説〉，《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45。
〈孫文の地方自治制度論〉，《孫中山研究日中國際學術討論會報告集》，法律文化社。
- 1988 《中國社會史の諸相》（共編），勁草書房。
- 1992 《中國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統合》（共編），溪水社。
〈國民革命期における中國共產黨の政治的統合構想〉，《中國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統合》。

研究心得

撰寫《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的若干心得

蘇雲峰*

清華學堂係由美國退還之超收庚款所創辦，為一留美預備學校，籌備於1909年，開辦於1911年，英文名稱為 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民國元年（1912）改為清華學校，英文名稱改為 Tsing Hua College。1925年開辦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新舊二制並行，1929年留美舊制和國學研究院結束，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二十年間，共培養約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其中真正由清華學校畢業的僅九百七十二人）。人數雖不多，但他們都是學術、科技、教育、工商社會和外交等方面的菁英，對中國大陸和台灣之現代化作出了貢獻。

本書目的在探究她所以成立的原因，重建她的這一段校史，並探討她何以成為一所優良大學的緣由。本書之要點和心得如下：

一、在退款交涉和創立清華學堂方面，清季駐美公使梁誠(1864～1917)是最大功臣。他是容闈帶赴美國留學的第四批幼生。他主動交涉退款成功，但袁世凱主張用於東三省之開發，他不顧個人政治前途，配合美方，極力主張用於廣設學堂，派遣遊學。袁乃調虎離山，催他任滿交卸回國，他堅持等接到美國國務卿來函同意退還超收庚款後，才啓程回國。回來後受到袁的冷落。民國元年袁為大總統，梁知不可為，隱退香港。梁誠的貢獻迄今尚未為海峽兩岸的清華大學所肯定。

二、清華的學制與民初的學制不同，和美國的學制亦不一樣。她採取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八年一貫制，分爲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前四年相當於初中一年級到高中一年級，後四年相當於高中二年級到大學二年級，八年畢業後可以直接插入美國大學的三年級，系別不拘。要想讓一個中國少年八年後能直接進入美國著名大學插班，必須重視英文和美國歷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和訓練。清華的課程雖然分爲「中文部」和「西文部」，但特別重視「西文部」。以優厚的薪資前後延攬數十位美國老師和若干位留學生。「西文部」以英語直接教學，重視體育和課外活動，尤其是中英文之演說和辯論。目的要培養他們能在國際上和他人競爭長短。

三、創辦和管轄清華學堂的是外務部（民元後爲外交部），學部（民元後爲教育部）僅是配角。時人多謂不當，但衡諸清末民初中國政局和各部人才，我倒認爲在這一時期，由外交部來管轄清華，應是不得已的較佳選擇。我的理由有四：（一）、外交部總次長人事比較穩定，且主要由顏惠慶、顧維鈞與王正廷三人輪流擔任。（二）、外交部人員多受過現代教育，富有世界知識和眼光。（三）、外交部和美國駐華使館之間的溝通比較容易取得共識。（四）、外交部實際僅管清華基金和經費預算和校長任免權，清華主管和教員對學校方針、課程、設系，並不受教育部規定的限制，在校內教職員任用，也有較大的自主權。

四、早期之清華人事有一個少爲人知的網絡，這個網絡就是聖約翰、外交部和清華的三角關係。外交部是這個三角關係的轉運點，原因是民初時期，聖約翰出身之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唐國安、周詒春、趙國材、曹雲祥、嚴鶴齡等人，都在外交部擔任要職。由於清華受外交部管轄，故其人事任免均操之於外交部。清華歷任校長唐國安、周詒春、曹雲祥，副校長趙國材，和董事會董事長嚴鶴齡，以及知名教員林語堂、馬約翰、戴超等，都是由於這種關係而進入清華的。清華歷任校長中任期較長的周詒春和曹雲祥兩人，都有賴於外交部聖約翰同學或老師如顏惠慶、顧維鈞和王正廷等人的支持。如果這種關係有助於清華的穩定發展，那麼聖約翰之於清華也有貢獻。

五、關於美國同意以退款派遣留學的動機和駐華使館角色問題，不僅受到當時愛國人士的質疑，更受到來自左派尤其是後來共產黨人的攻擊。譬如說美國想要在「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以追求其最大商業利益。說得不好聽就是美國「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或是企圖「和平演變中國」，使成美國附庸。美國以退款派遣留美，不容質疑，是要跟日

本競爭在中國的文化、政治外交和經濟上的利益。問題在美國的這種企圖是否也有利於中國，造成雙贏的結果。這一點在歷史研究上已得到證實。此外，駐華使館參與清華基金之保管，有助於基金之穩固。美國使館希望清華在國內政治鬥爭中保持中立，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也反對共產黨過激言論進入清華，和在內戰時要派使館衛兵保衛清華校園等等。這些動作難免有干涉中國內政和學術獨立之嫌，雖經學校當局婉拒，但也出於正當動機。所以 1924 年當清華發起改革運動時，主張徹底翻騰革命的學生領袖王造時（1925 級，後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也肯定美國駐華公使參與清華基金保管的貢獻。

六、清華之美式教育，不為時人所認同。試想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須學習先進國家經驗，二十世紀初美國已在國際舞台上展露頭角，教育上也有長足的進步。1919 年杜威（John Dewey）來華訪問，對中國教育界發生強大的影響力。1922 年的新學制，就是完全模仿美制。一直到今天，美國教育仍居世界領導地位。所以中國於二十世紀初將留日政策轉向留美，應是正確的抉擇。清華重視人文和通識教育，知德體群美五育並重，強調個性發展、辯論與領導能力、培養男子漢氣概和民主風範，多方發展學生潛能，學生大致平均分向人文社會、自然科學和應用科技等方面發展，有卓越的表現。至時人所懷疑的國家忠誠問題，係出於狹隘民族主義和一些人士的偏見，其實校園裡有許多愛國活動。清華學生皆知自己是用「中國人、民血汗錢」所培養出來的，留美時雖稱讚美國科學、教育和文化，但因曾受美國社會歧視而加強愛國觀念，留美畢業回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其明證。

七、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是當今大學所標榜的理想，清華自 1926 年起已實現這兩個理想，而且一直維持到大陸易手以前。這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異數。北京大學在學術自由上是一顆不時閃爍的明星，但在教授治校方面，則不及清華彰顯有效。原因是清華經費充裕而獨立，學生長期浸淫於美國自由主義文化之下，和許多留美同學返校任教的關係。此外美國使館的關懷而不干涉學術，使清華得以超然獨立，未陷入國內政治派系漩渦之中。

八、清華的校長，從 1911 至 1929 年共換過六位，其中任期較長者為周詒春和曹雲祥兩位。對清華之貢獻較大者，也是他們兩位。周詒春奠定清華的軟硬體設施，和運動、演說辯論等課外活動風氣。曹雲祥建立了清

華內部改革機制，如設調查和各種改革委員會，接受校園內外的批評和建議，改制升大，使清華不因退款終止而停頓，設立「評議會」和「教授會」，實行教授治校制度。

九、清華的教員依學科分爲「西文部教員」和「中文部教員」，美國教員和部分留過學之中國教員屬於西文部；傳統功名出身及畢業於國內大學者屬於中文部。二十年中，教員結構有三點變化：（一）美國教員的性別由多數女性轉變成多數男性，其學歷也逐年提高，（二）西文部之中國教員由最初之極少數而成多數，取代美籍教員地位和功能，（三）清華留美返校任教之校友逐漸成爲清華之中堅，他們掌控「評議會」和「教授會」兩個權力組織，採取民主議事規則，討論清華之發展方向，包括人事、預算、課程、和有關制度等等。中美教員之間在待遇和權益方面有衝突，但在教育學術和文化思想方面沒有衝突。燕京大學則有宗教方面的麻煩。

十、美國教員之角色，遭到《清華大學校史稿》（1981）的全面否定，今從《清華周刊》等資料中找到六十四位美國教員（其中女教員二十二人）的零星資料，並加以整理成本書之附錄。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到美國教員對清華是有貢獻的。他們除了擔任課程教學外，都積極參加學生的課外活動，或充當顧問，或指導演說辯論，擔任裁判員，或組音樂和戲劇社團，指導學生練習、排演和演出，甚至粉墨登場和全校師生同樂；或定期向學生演講，介紹西方和美國的教育、科學、文化、社會。有時也邀請學生到住所去喝茶聊天，建立友誼。他們也作各種問題的研究和參觀訪問，常在《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The Tsing Hua Annual*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或充當顧問和編輯。此外，他們還積極參與校務改革，參與曹雲祥校長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協作委員會」（Coordination Committee）、「課程委員會」、「教授會」和「評議會」等組織，提供意見。換言之，他們多能盡到作教師的本分，除了少數人外，多不干涉校政，或從事於與教學無關的政治性活動，對清華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十一、清華校園派系衝突呈現於物質和權力兩方面：

（一）、由居住條件差別待遇所引起的。大約在1921年以前，由於學校只顧興建教研大樓，而不建教員住宿，在粥少僧多情況下產生下列四種差異：1、美籍教員可以免費居住新式美觀、寬敞和現代衛生設備的洋房。2、有小部份人（校長和副校長）獲得新式住宅。3、數十位中國教職員中，僅少數人分配到中式住所，餘多租賃民房及茅屋。4、在配到宿舍者當中，

有的免付租金，有的得享用免費傢俱。校方的政策既偏重西文課程，優待美國教員和西文部華籍教員，是可以理解的，但美籍教員也貪多務得，經常埋怨住宅不夠舒適，要求另建新宅。

中國教職員在憤怒之餘，成立「清華教職員俱樂部」和「清華華員大學會」（另名華籍教員俱樂部）兩個組織。要求學校添建住宅，拉高水平，平衡中外。及學校興建四十戶中式住宅，滿足大家的基本住房要求後，教職員間的磨擦始漸告消除。

（二）、為由清華「少壯派」對抗外來勢力所引起的衝突。本書第二章「人事網絡和權力組織」及第三章「校長人選、貢獻和繼承風波」，已陳述了清華校園裡的複雜關係。茲從中美教員結構轉變中，觀察新的校園派系競爭和權力衝突。

第一點，清華少壯派於1925年時已成主流派，其他非清華校園出身的就屬於非主流派。少壯派不滿清華現狀，要求改革，同時有取代美國教員和主控清華校政的意念。

第二點，教務長張彭春（南開校長張伯苓之弟）與校長曹雲祥之間不和。張同胡適都是1910年清華公費留美學生，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專攻課程改革。曹請他來改革清華課程，對張寓予厚望，但張有代表南開大學開拓清華勢力的雄心，也有取曹而代之的意圖。也是南開畢業的梅貽琦對曹頗有微詞，也想成全張的心願，因此，張、梅二人和曹雲祥之間就難免有所磨擦。

第三點，張彭春和清華少壯派交惡而被排擠。張對清華師生的生活型態印象惡劣。他批評教職員學生都「貪錢」，是清華精神上的「污點」。他擔心「清華人回來的加多，……，漸漸清華歸入清華人之手」，所以與清華少壯派交惡。這時錢端升正好在外邊發表文章批評清華，其中之一為否定張彭春的大學部分科制（即設普通科和專門科各二年，前者為後者的初階，但亦可結業，發給畢業證書），終逼他辭職。

第四點，曹雲祥1925年底擬辭職隨顏惠慶赴歐所引起的人事風波，至翌年四五月間，因北京政變，張作霖以顏惠慶為內閣總理，曹雲祥赴歐不成為止，整整半年之久。因想要爭取清華校長一職的學術團體和人物很多。除了南開大學外，還有北京大學、東南大學、留英派之陶孟和、留法派之李石曾、教育改進社之黃炎培和陶行知等。被抬出來競爭校長之職者有胡適、梁啟超、范源濂、郭秉文、黃炎培、張彭春、馬寅初、王世杰、余日

章和清華西文系主任王文顯等人。抬轎和穿針引線者有梅貽琦、陶孟和、徐志摩，和清華少壯派之錢端升，在幕後運作的有顏惠慶和馮玉祥等人，可謂熱鬧非凡。之所以這麼熱鬧，基本關鍵是外邊勢力想打入清華園，清華少壯派吳宓、陳達、葉企孫、莊澤宣等自認為是當時接受最新和最好的教育者，和清華母校有深厚的感情，懷有提昇清華教育程度與學術獨立的使命，所以應團結起來保衛清華。簡言之，錢端升代表北大派，和留英派「現代評論」之陶孟和支持胡適或者梁啟超、范源濂。清華內部之南開系梅貽琦、朱君毅、楊光弼等人支持教務長張彭春。馮玉祥和教育改造社之黃炎培、陶行知等支持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顏惠慶反對胡適，支持余日章。曹雲祥反對梁啟超而支持一位名叫 T.L.的人，或范源濂和胡適，少壯派可能支持 T.L.或者西文系主任王文顯。馬寅初太忙，王世杰只一提，李石曾沒有抬轎人。結果，因曹氏辭職不成，大家空忙一陣，一無所獲。

第五點是曹雲祥與梁啟超的衝突。1927年夏南方的革命勢力進入華北，清華園內又出現校長問題。這一回是梁啟超和曹雲祥的對決。關於曹雲祥與梁啟超的矛盾，一部分可能出於曹的猜忌，一部分可能出於誤會。梁是曹於1922年春聘請到清華來授課，一直到1928年6月19日因病辭職為止。梁頗受學生喜愛，曹沒有理由不尊重他。梁任公到清華講課之前，就關心清華園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課以後，跟清華就發生了濃厚到難以捨割的感情。1925年底，徐志摩告訴張彭春說，任公也有意校長一職。但1927年8月初任公表示，「月來正思盡擺脫百事，獨於清華不能無拳拳」，「除了校長決不擔任外，董事一職，以歷史關係，總不能忽然也」。11月外交部正式改組董事會，規定校長由董事互選，而以任公為首席董事。任公再度表示，出任董事以不任校長為條件。曹不知任公真正意圖，竟發動教職員反對任公為董事，並上書外交部說「院中教員（暗指任公）曠職，請求易人」，又將此函油印寄給任公，諷其自動辭職，引起全體研究院學生之公憤。又因曹計劃在成立清華大學以後，停辦研究院，研究院學生乃上書控告於外交部，要求曹校長辭職。曹於1927年12月28日，向外交部提出辭呈。舊制與大學部的師生挽留無效，外交部派嚴鶴齡代理了事。

十二、清華學生之社會背景問題：

有人認為清華是「貴族學校」，有人說是「官僚子弟學校」，也有人說是「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較多的學校。而清華師生則不同意被貼上這些標籤，梁實秋、張忠絨、李先聞等人都說同學中多數出身於貧窮家庭。

貴族學校之說是根據早期清華直選留美的三批學生中有「特別學生」，和袁世凱要求國務院通過的「項城袁氏留美學額簡章」和「項城袁氏入學簡章」所帶來的問題。在直選留美的「特別學生」中，除少數貴胄子弟外，大都係由各事業機關所推薦的優秀人才。問題出於袁氏家族子弟每年分佔三名清華直接留美學額，和免試進入清華讀書的權利。黎元洪、馮國璋、章宗祥等權貴要求援袁氏例，享受同等權利，雖未遭到清華的斷然拒絕，終亦挨不過清華嚴格考驗。今查《清華同學錄》（1937），並無袁、黎、馮等家族之人，可見貴胄和大官僚子弟為數極少，不能說清華是「貴族學校」。

說清華是「官僚子弟學校」的是美國人。1923年12月在上海的美國大學同學會，根據許多中外名人、回國學生之研究，和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等人協助，到清華調查，將所得資料撰成「清華的大改革」一文，批評清華種種不是，其中之一就說「大多數清華學生皆為官僚子弟」。引起清華園內的一陣反彈。學生們議論紛紛，曹雲祥於是寫了一長文批駁。其中針對「官僚子弟」問題，曹氏特別將1924年在校學生家庭背景也作了一次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清華學生家長職業統計（1924）

家長職業別	學生人數	百分比
官 吏	99	25.45
學 界	120	30.85
實 業 界	78	20.05
鐵 路 界	17	4.37
農 業 界	15	3.86
法 律 界	14	3.60
軍 界	9	2.31
醫教及其他	37	9.51
合 計	389	100.00

資料來源：《清華周刊十週年紀念增刊》，1924年3月1日，頁67-72。

根據這一份統計資料，曹雲祥解釋說：在近四百位在校學生中，出身官吏家庭者99人，僅佔百分之二十五，不是「大多數」，且這些官吏家庭，

包括中央各部及各省地方辦事人員在內，大小不一，所以也不能說都是「大官僚」。此外，曹並沒有再進一步解釋。

1981年出版的《清華大學校史稿》則說這一時期的清華學生，「多數出身於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其中有些還是大官僚大買辦的子弟，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學生是少數」，等到1925年大學部公開考試後，才有一些成績優異的清寒子弟進入清華。我認為這種說法也不夠精確。

如果以官吏出身者為官僚階級，以實業界與鐵路界出身者為資產階級，以農業界出身者為地主階級，依照曹雲祥的上述統計，則官僚家庭出身者佔百分之二十五，資產階級佔百分之二十四，地主階級僅佔百分之四，軍界（可能是大軍閥）佔百分之二點三。四者合計為百分之五十六，超過半數。如果小資產階級包括學界、教育界、法律界與醫生，則小資產階級出身者在曹校長的統計中，佔近百分之四十四，也不是一個小數字。我認為清華學生大多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極少貧窮子弟能獲得讀大學的機會，更不用說清華了。

十三、校園生活：管理和衣食住行

清華的生活管理最初對幼年生嚴而對高年級生寬，1925年以後比較寬些，但淘汰率平均在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說相當嚴格的。

清華的伙食不惡，早餐四碟鹹菜如蘿蔔乾、八寶菜之類，每人三個饅頭，稀飯不受限制。中晚餐每桌四個大碗四盤菜，由於都在上課和運動之後用膳，所以大家都餓得發慌，開動不到十分鐘，就吃光了。衣著的形式，多為中式長袍、長衫、馬褂和長褲，質料有布和絲綢之屬，著西裝者極少。在顏色方面，則以黑白二色為最多，正如梁實秋所說是相當樸素的。故單從衣著上看，清華不似美式學校。

學生宿舍有第一至第三院。應屆畢業生住第一院，有住二人的小房間和住四人的大房間，都配有淋浴、抽水馬桶、鋼絲彈簧床和暖汽爐子，是最舒適的宿舍，凡住過的人都說「別具一番滋味」，同學們最為嚮往。第二、三院內的宿舍相同，每間住三四人，亦有住二人的，二院房間比三院小，光線稍暗。每間宿舍內有桌椅三份，五十燭光電燈二盞，書架三組，鐵床三張和一個痰桶。床上罩著白被單，基本上整齊清潔舒適。

交通方面，因距京城十餘里，交通不便，有騎驢的、坐洋車的，或坐火車，1919年後有客車，每日四班，電話很少用，可以說交通偏僻落後和不便。但學術資訊非常豐富。學生的生活費用每年平均約二百二十餘元，

其中伙食每月約六至七元。普通家庭不易支持。

十四、清華的醫療衛生和疾病死亡。

我用很多篇幅介紹清華校園課外活動，但這裡只談醫療衛生和疾病死亡問題，因為很少學校校史注意到這個問題。依照常理，清華環境優美，醫療衛生設備講究齊全，患病者應該很少才對，實則不然。門診方面，自1919年5月至翌年2月，平均每日十餘人次。轉診者不計，住入校醫院之學生，自1918年9月至1921年3月，共有八百六十四人，平均每月近二十八人（約佔在校生總數百分之七）。而死亡數字，更令人驚異。1914年至1921年的七年間共死亡學生四十人，平均每年五、六位，死亡率約為百分之一。1922年以後，由於作了種種改善，求診人數漸減。此年秋僅有一位高等科同學病故家中。但1927年7月至翌年7月的一年間，由於醫生的疏忽，導致六人死亡。物理系教授葉企孫在一位學生的追悼會上沉痛地指出清華學生死亡率太高，要求學校注意，他說：

自去年暑假至現在一年間，死去學生六人，而全校學生不過四百，按百分計算，清華學生死亡率竟至一至一點五。此種死亡率，未免奇高，學校尤應特別注意。（其中一人腦充血，一人因肺病死亡，均因用功過度）

由上所述，可見清華學生之疾病和死亡情形，的確出乎意料之外的嚴重，難免令人感到清華除了多采多姿的生活以外，亦有「悲情」的一面。

十五、總之，清華之所以能夠成功，基本原因有五：一是經費獨立充裕，二是得到聖約翰大學出身的人才支援，包括外交部高級官員如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和留學生唐國安、周詒春、曹雲祥等。三是獲得清華公費留美制度下所培養出來的眾多人才之回饋，如梅貽琦、楊光弼和許多返回母校任教的教授。四是五四運動後之清華改革，建立了「內部改革機制」，落實「教授治校」制度，促進清華不斷進步和發展。五是得到美國駐華使館方面的關懷（或者是干涉），使清華經費能夠獨立，且避免捲入國內政治派系鬥爭之漩渦，及其他外國勢力的干擾。

十六、留學與貢獻。

清華學生到美國後，分別進入美國三十二州一百二十八所學校，但大多集中於東部和中部各州之著名大學，統計有清華學生二十人以上者十七校：依次為哥倫比亞大學一百七十九人，哈佛大學一百一十三人，麻省理工學院一百一十二人，威斯康辛大學九十五人，芝加哥大學九十二人，康

乃耳大學七十一人，密支根大學六十二人，史坦福大學五十八人，普渡大學四十四人，俄亥俄大學四十一人，伊利諾大學三十五人，賓州大學三十四人，耶魯大學三十二人，卡羅拉多大學三十人，霍布金斯大學二十九人，華盛頓大學二十二人，賓州州立大學二十一人。¹

按照早期清華派遣游美章程，規定以百分之八十學理工農醫實科，百分之二十習人文社會。早期直接選派留美者，大多符合此一比例，但由學校畢業後出國者，多依自己在校時的志趣選讀科系，結果是學自然基礎科學及應用科學者僅佔百分之五十二，學人文社會科學者佔百分之四十八，大致平衡。在理工方面以工程為最多，理科次之。在人文社會方面，則以經濟為最多，人文次之。

清華學生在美國各大學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以學位之取得為例，在所查到的九百六十九人中，除了病故二十二外，取得博士學位者一百八十三人（19%），碩士四百三十六人（45%），學士二百四十八人（25%），未取得學位者僅八十人（8%）。在取得博士者中以1918級至1924級，和1927級至1928級者較多，而取得碩士以上學位者竟佔全部留美學生的百分之六十四以上。²由此可見清華留美學生的表現是可以肯定的。

清華學生在語言和學業上，的確有很強的適應能力，且有驚人的表現，如攻讀人文社會學科者多能直接插入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二、三年級，甚至四年級，覺得月考分數比清華「甚寬」，得到教授甚佳的印象，所以有的人在三年內就可以拿到博士學位。有的在留學期間被邀請到附近市鎮作專題演講，受到地方人士的歡迎。

他們回國後大部分集中於大都市，多數人獲得工作，如1923年時學成返國者四百七十八人，除一百人職業未明外，都有職業，其中以服務於教育界、商界和實業界者居多，政界及其他行業較少。1924年冬，曹雲祥到武漢和四川等地考察，發現：「大冶鐵礦及湖北水泥廠之重要職務，均由清華同學充當，表現不錯」。³

1926年清華學成歸國者八百人中，服務於教育界者三百人（38%），

1 沈希珍，〈清華留美學生之研究：以留美預備部學生為對象〉，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3年6月，頁95。

2 沈希珍，〈清華留美學生之研究〉，頁95-98。

3 《清華周刊》，期328，1924年11月28日，頁12-16。

其中任校長者十人，教務主任四十人，教師及職員二百五十人。服務於醫法及各社會事業者，約一百六十人（20%）。服務於工程界者一百人（13%），其中任總工程師者二十人。服務於商業界者六十人（8%），其中任公司經理者十五人。服務於銀行界者五十人（6%），其中任經理及行長者十人。服務於交通界者五十人，其中任鐵路局長者不少。服務於政治外交界者五十人。

再往後一點看，更能顯現清華畢業生在學術、科學和實業方面的成就。1948年中央研究院推選第一屆院士，這是舊制清華學生成熟的時期，在當選的八十一位院士中，由舊制清華出身（包括直派留美）者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數理組八人：周仁（1910）、竺可楨（1910）、姜立夫（1911）、侯德榜（1912）、茅以昇（1916）、葉企孫（1918）、曾昭掄（1920）、薩本棟（1922）。

生物組九人：秉志（1909）、錢崇樹（1910）、戴芳瀾（1913）、陳克恢（1918）、陳楨（1919）、李先聞（1923）、鄧叔群（1923）、湯佩松（1925）、馮德培（1929）。

人文組十二人：胡適（1910）、趙元任（1910）、馬寅初（特別生）、金兵霖（1914）、陳達（1916）、湯用彤（1917）、李濟（1918）、蕭公權（1919）、錢端升（1919）、梁思成（1923）、梁思永（1924）、李方桂（1924）。

後來第二三四屆之院士選舉，又有生物組之趙連芳（1923）、和數理組之梅貽琦（1909）、顧毓琇（1923）、任之恭（1926）四人。

院士之外，在教育文化和社會學術上有優異表現者眾多，耳熟能詳者如梅光迪（1911）、廖世承（1915）、傅葆琛（1916）、吳宓（1916）、朱君毅（1916）、查良釗（1917）、莊澤宣（1917）、程其保（1918）、潘光旦（1922）、陳可忠（1922）、雷海宗（1922）、梅貽寶（1922）、梁實秋（1923）、施嘉煬（1923），及社會學家吳文藻（1923）、吳景超（1923）等人，在藝術和音樂方面有聞一多（1922）、黃自（1924）等人。可以說在1950年代以前之學術界和教育界，舊制清華出身者已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清華早期直接派送留美者多數選讀理工和農醫等實用科學，由清華學校畢業留美者，也有百分之五十二學習理工農醫，所以在國內之實業界也有傑出的表現。在工業工程方面，擔任廠長、工程師、總工程師者為數眾

多。學農的雖僅六十餘人，但也有所表現，除三人當選院士外，多人當大學教授，或農業行政、農林棉牧試驗所、農場主管和廠長。他們對民國以來的中國農業之貢獻，主要在培養人才和改進生產技術兩方面，抗戰前平均分布在全國農學院約二十餘處，每處三人，培植農業現代化方面人才。其中以任大學校長及農學院院長之金邦正（安慶農專及北京農專）、竺可楨（浙江）、虞振鏞（北平農學院）、秉志（中央大學）、過探先（金陵大學），最受尊敬。抗戰時大後方之農業行政，幾全由清華人主持，如農林部次長為錢天鶴，甘肅建設廳長為張心一，四川農業改進所所長為趙連芳，副所長為楊允奎，貴州農業改進所所長為虞振鏞，甘肅為汪國輿，湖北為劉發宣。

台灣光復後來台從事台灣農業和糖業改良工作者亦有十二人，他們的名字和職位如下：李順卿任台灣省農林廳林務局局長，李川容為台糖公司種畜場總技師，陳同白為台灣水產公司總經理及農復會漁業組組長。劉和為中興大學教授，趙連芳院士為立法委員，兼台灣長官公署農林處處長，李先聞為台糖公司顧問，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劉淦芝為台灣茶葉公司總經理及台糖公司顧問，糖業試驗所所長，和台灣香蕉研究所所長，劉發宣為台灣水產公司總經理，台灣大學教授。他們對台灣之農業改良也作出了貢獻。⁴

在商業金融方面，清華人真的不少，僅舊制生在國家行局服務的就有八十八人，分別擔任副總裁、總經理、局處長、經理等職務，其中中央銀行有李幹等二十人，中國銀行有姚松齡等二十七人，中央信託局有周賢頌等二十五人，郵政儲金匯業局有蔡競平等十人，交通銀行四人，中央、中銀、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總處者有楊蔭溥等二人。至在商業銀行服務者舊制生有四十三人，分別在金城、華僑等九家商業銀行擔負要職。此外，擔任我國駐外銀行及經濟貿易機構之經理、局長和參事者至少有十五人之多。

由於清華重視語言和演說辯論，國際交涉知識比較豐富，所以在外交及涉外關係方面的表現相當突出，自1911年起之舊制生，曾任駐外公使及全權大使者十五人，外交部司長一人，顧問一人。他們是：楊永清、張欽海、蕭蓬、謝保樵、劉師舜、劉馭萬、甘介侯、段茂瀾、時昭瀛、陳欽仁、

4 劉淦芝，〈清華與中國現代農業〉補正，《清華校友通訊》，新期 75，頁 33。

朱世明、李迪俊、王化成、張忠絨、李惟果、陳之邁和孫碧奇。

在政治方面有吳國楨（1921，上海市長、台灣省主席）、羅隆基（1922，民盟宣傳部主任）等人。在軍事方面有吳欽烈（1914，兵工署司長、廠長）、何浩若（1922，河南財政廳廳長）、孫立人（1923，將軍）等人。

清華基金對中國留學教育的貢獻不止於此，它還實施清華津貼生制度，對已在美肄業二年以上之自費生，品學優良，因家貧未能繼續學業者，每年提供七十個名額，每人每年可得美金四百八十元（清華學生為美金七百二十元），可連發三年，讓一千八百七十六位自費生完成學業，⁵也是一項重大的貢獻。在清華津貼生中，不乏有成就的人士，諸如林語堂之於學術，蔣夢麟和郭秉文之於教育，蔣廷黻之於歷史和外交，陳雋人和沈宗翰之於農業，何廉和劉國鈞之於經濟，李景漢之於社會學，袁同禮、裘開明、戴超之於圖書館學，馬約翰之於清華體育教育，對國家社會都有顯著的貢獻。

此外，為糾正清華偏重西方文化之批評，於1925年設立國學研究院，請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名家講課，在短短四年間培養國學專家七十四人，在各大學任教，抗戰期間，出任各大學教務長、訓導長、院長、研究所主任及文、史系主任者十七八人。他們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和專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這是清華人文教育的另一項成就。

總之，清華學生的表現以在學術、實業、外交和教育文化方面者居多，而在政治方面者較少。這種表現與國外任何大學相較，亦無大遜色。這亦是以退款興學的美國政府，與清華歷任校長、教師感到欣慰之事，如果梁誠在天之靈有知，也必額手稱慶者也。

附註：本文所介紹的專書，已經本所專刊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即將出版。

5 《清華一覽》，1919年，轉引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1，頁229-231。津貼生名單見清華同學錄(1937)，附錄。

研究概況

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國研究

李國祁*

一、前言

去年因國科會推薦，蒙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於 8 月至 10 月間，赴歐洲德、匈、捷三國考察其中國研究。在三國之中，德國之中國研究機構近三十年來由於受所謂中國熱的刺激，以及工商界的需求，一時間如雨後春筍，迄今其中國研究機構在二十個以上，而且其研究風格改變，與匈牙利捷克頗不相同，故擬日後另文介紹。匈牙利及捷克兩國毗鄰，其中國研究在風格上甚為相像，故先草此專文以為介紹。唯個人既不通匈牙利文，亦不通捷克文，在兩地時間又短，其中或有舛錯疏漏之處，尚請專家多予指正，之所以仍草此文者，純以國內學術界對兩國中國研究情況陌生，故敢本野人獻曝之心，拋磚引玉也。

二、匈牙利

匈牙利是東歐各放棄共產主義國家中，當前經濟情況最好者。其中國研究發軔甚早，早在鴉片戰爭以後，1845 年即有植物學家 Stefan Ladislas Endlicher 用德文於維也納發表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中文文法入門）。此後在十九世紀後期，陸續有匈牙利學者將中文與匈牙利文作語言學上的比較研究，以為中文及匈牙利文有若干共同的源流。這種語言學上的比較研究之所以興起，當然亦是受匈牙利人是黃種人，其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祖先可能來自蒙古之說的影響。故於十九世紀後期不斷有匈牙利的貴族及學者組織探險隊，前赴中亞各地考察，收集資料，欲確切了解其民族是否為匈奴的後裔，亦因此帶動匈牙利人對中亞的研究。1876 ~ 1879 年間 Count Béla Szechenyi 所組織的探險隊曾進入中國。其成員之一地質及地理學家 Lajos Loczy 教授不僅發表了有關中國地理的專著，並因其報告，引起 Sir Aurel Stein 的興趣，前往敦煌佛窟考察，收集大批壁畫，使敦煌研究漸聞名於世。¹故在歐洲，匈牙利的中國研究產生的原因，是與其他國家不太相同。它不是為了侵略或好奇，而純粹是由於尋根。

匈牙利大學中的東亞研究講座是最先於 1924 年創設於布達佩斯大學，其第一位講座教授是 Vilmos Pröhle。氏是一語言學家，據說包括中日文在內，通四十種語言。在年輕時即曾著有關於土耳其語論文。氏於 1942 年自布達佩斯大學退休。是年該校復設中亞研究講座，以 Louis Ligeti 為講座教授，開授滿蒙及藏文研究。氏曾在巴黎隨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P. Pelliot）研究，深知中國研究之重要，願無薪給亦擔任東亞研究講座。故此後氏同時主持東亞中亞研究達二十年之久，桃李滿匈牙利。唯其個人蒙藏滿研究較中國研究著名，或者由於其個人之喜好尤在於滿蒙藏，故時布達佩斯大學蒙藏滿等收藏亦較中國資料為多，惜於二次大戰期間燬於戰火。1949 年氏出任匈牙利國家科學院副院長，亦在該院創立蒙藏滿研究。也許因受民族因素及 Ligeti 教授之影響，此時期匈牙利之中國研究特別注重中國與游牧民族間之關係。Ligeti 教授本人對敦煌學及吐蕃問題有其貢獻。²

1950 年以後，由於匈牙利與中共間建立文化交流關係，中共並大力支持匈牙利的中國研究，一時間的確培養出不少極傑出之中國研究專家。當時匈牙利在政策及方法上如同東德，選派不少在語言學上極具天才之年輕學生及學者，赴中國大陸留學，在中國大陸作較長期之停留。故使新一代中國研究專家，不僅能說甚流利之中文，而且中國學知識深厚。因而形成了新的匈牙利中國研究傳統：並不講求量的擴充，而注重品質的提升。此時期所培養出的著名中國研究專家，如 Ferenc Tökei（杜克義）現任匈牙利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中心（Oriental Research Center）主任，曾於 1992

1 Ming Wilson & John Caybey edited,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1995), pp.48-49.

2 同上書，頁 50。

年來台北參加歐洲中國研究史會議，氏之專長在中國上古史，特別是周代的社會。並在該中心建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風氣。³是歐洲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要學者，匈牙利漢學界的領袖人物。

又如 Endre Galla（高恩德）教授，氏原攻讀德文，因有語言天才，於 1950 年被派至北京學習中文，初在清華大學習中文兩年，後轉往北大從王瑤研究中國文學三年。由於長期留華，得娶原在清華大學負責接待並照顧外籍學生之女助教為妻。高恩德極注重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學史研究，特別喜好魯迅作品。此不僅因魯迅為文筆調諷刺，深刻動人，亦在於魯迅曾介紹匈牙利民族詩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作品入中國。高恩德亦因此與孫用合作，將裴多菲長詩《勇敢的約翰》一書譯成中文。高恩德於數年前曾來台北訪問，是除俄國學者外，第一位來台訪問的東歐學者。氏因夫人為河南人，故其中文，亦略帶有河南口音。

再如 Barnabás Csongor（陳國）、Sándor Józsa（尤山度）教授。Barnabás Csongor 教授專長在於語言學，用語音學音韻學的方法研究唐代關於中亞方面的記載，近年來則研究《水滸傳》，視之為中國社會史資料，氏現業已退休，曾於 1992 年來台參加歐洲中國研究史會議，提出匈牙利中國研究歷史之論文。Sándor Józsa 教授亦係 1950～1954 年留學中國者，其專長在中國近代史，現在是教授中國近現代史的副教授。

另外布達佩斯著名的東方收藏之 Ferenc Hopp Museum 前館長 Pác Miklós（白米爾）亦是 1950～1953 在北京攻讀漢學，其專長在中國藝術史，曾撰寫不少有關禪宗對中國藝術影響之論文。此外，Ildikó Ecsedy（艾之迪）博士，伊學中文時間略晚，專長則在突厥研究。⁴

綜括言之，匈牙利今日中國研究的成績實根植於五〇年代，並深受該國與中共的關係影響。而其研究重心有二，一是其科學院中的東方研究中心，另一則是布達佩斯大學。此兩機構個人均曾參觀訪問。就科學院的東方研究中心言，其機構在布達佩斯城的布達（Buda）城區山上著名之 Mathius 教堂附近，藏書有九千餘冊，其機構之功能除本身從事純學術研究外，主要在協調其他單位從事中國研究。個人前往拜訪時杜克義教授生病，氏請 Dr. Mária Ferenczy（范思陵）女士接待。Dr. Ferenczy 是現任

3 同上書，頁 51。

4 同上書，頁 51-52。

Ferenc Hopp Museum 館長，係六〇年代前期成長的漢學家，專長除東亞藝術外，亦在於唐古特西夏文化史，氏認為當代中國年畫頗反映出受唐古特的影響。伊對台灣亦深有興趣，頗盼其藝術館能與故宮博物院建立圖書刊物交換之關係。匈牙利科學研究院之東方研究中心規模並不宏大，在研究方向上似仍受有 Ligeti 教授的影響，注重中國四鄰民族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布達佩斯大學，過去稱之 Péter Pázmány 大學，自 1949 年以後改稱 Loránd Eötvös 大學。蓋均是以人名代替地名也。其東亞研究部門仍是採行歐洲的舊辦法，即分為中日文兩系，但均是以中文為主。現今負責人為 E. Galla 教授，而 Stókei 亦在此授課。根據 Galla 教授所言，該校在政策上重質而不重量，故欲讀中文之學生，必須先具有若干中文知識，否則不予錄取。其目的在收取真正對中國有興趣，而且已具有初步基礎者，故考生雖多，其取錄就讀者人數甚少。該中文系目前僅有學生十五、六人，圖書亦甚少，僅約數千冊，但教學及訓練甚嚴，要求學生不僅懂中文，能中文譯匈牙利文，亦要能匈牙利文譯中文。故該中文系學生畢業時中文程度甚好。參觀其東亞部門時，管中文圖書之 Major Kornélia（馬秋菊）小姐即能說極為流利之中文，顯是極好之證明。由於 Galla 教授本人注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故該系學生亦以偏重文學研究者多。

要而言之，匈牙利之中國研究與很多西歐國家不同：一、由於其本身是黃種人，可能是匈奴的後裔，故其中國研究含有濃厚的尋根意味，因之亦特別注重中國與游牧民族的關係，在方法上則注重語音及詞彙的比較。二、或由於匈牙利是農業國家，其與中國（無論是大陸或台灣）經濟貿易的關係並不發達，故社會上需要中文的人才不多，致其中國研究始終是採取重質而不重量的政策。三、其中國研究雖規模甚小，但亦確有獨到精美之處。雖因政治及上述經濟的原因，不注重近現代中國問題研究，但在中國古代社會史及中古一些問題上，成就仍是可觀的。

三、捷克

捷克居於歐洲心臟地帶，是另一個除匈牙利與俄國外，注重中國研究的東歐（實際上應是中歐）國家。如果說匈牙利的中國研究的興趣與尋根有關，則捷克當代的中國研究則與爭取自由有關。蓋 1968 年前後的布拉

格之春的民主運動，不少漢學家參與其事，致而俄國大軍進入布拉格（Prague）毀滅了其民主自由運動後，捷克的漢學家乃遭遇空前浩劫，包括 Augustin Palát 教授在內，不是被逮捕入獄，即是被驅逐離開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使很多研究中國問題者紛紛改行，有的成爲導遊，或計程車司機，有的不再從事學術研究僅從事翻譯工作。故目下的捷克的中國研究，可以稱之爲是摧毀後的再生學術研究，是在捷克經濟日益繁榮的情況下，重新生長。顯然自由與經濟繁榮是使其成長的必要條件。

由於基督教的 Odorico de Pordenone 修會中有不少捷克的傳教士，故捷克人早在十八世紀即有到過中國者。祇是這些傳教士他們由於傳教的關係，僅注意及語言，未曾真正的去研究中國。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研究逐漸在捷克生根成長。先是有 August Pfizmaier 曾編譯有關中國朝代史的書籍。而後創建於 1348 年的布拉格之查理大學雖經長時間的停辦，終於 1882 年復校，二年後在哲學院成立東方研究，請 Rudolf Dvořák 擔任教授。Dvořák 個人興趣甚廣，並不全在中國。在中國研究上，氏於 1889 年著孔子的生平與教學，1895 年著中國的宗教，1897 年翻譯詩經，1920 年又譯道德經。由其譯著中已可看出，氏在中國研究上的興趣，在哲學與倫理。而就哲學與倫理言，似又以儒家思想爲其主體。⁵一般學者均以 Dvořák 是捷克的中國研究真正創始者。惜氏退休後，後繼無人。直到一次世界大戰末期 1918 年捷克脫離奧匈帝國獨立，捷克的漢學研究乃有突破性的轉機。

捷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即以重工業——軍火工業著名，中國與捷克之間的貿易因而日漸展開。中國常購買捷克所產武器，特別是捷克所製之機關鎗、大炮及機械設備等。捷克獨立後，兩國之間一般的貿易往來亦因而帶動。當時捷克有 Batá 等八家公司經營對華貿易。⁶他們因實際的需要，共同成立東方研究所，研究東方經濟及對華貿易等問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捷克的中國研究，即是因彼等的資助而興起。蓋日後全力推動捷克中國研究的世界著名教授 Jaroslav Průšek，即是在此八家公司支持下，前來中國。

Jaroslav Průšek 最初在查理大學攻讀東羅馬時代的希臘史及其文化。因而接觸到亞洲，並進而及中國問題。此時期捷克的東方研究主要在印度

5 同上書，頁 27-28。

6 Batá 係捷克製鞋工廠，時大量製布鞋銷中國。

而不在中國，捷克境內有關中國的學術研究著作極少。氏乃於 1928 ~ 1930 年前往瑞典 Geteberg 大學從高本漢教授學習中文，後並到德國 Halle 大學追隨 G. Haloun 教授研究中國北方民族及世界歷史地理，亦曾就讀萊比錫大學追隨漢學大師 Prof. E. Hähnisch，旋返回查理大學修讀博士，於二十四歲時以〈狄的遷徙〉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Průšek 是以世界史的觀點討論先秦時期北狄的入侵中國，認為此是當時世界游牧民族運動的一環。在歐亞草原上，游牧民族在任何一方的運動，必然將刺激或影響另一方。⁷此一觀點確實對中國邊境游牧民族與中國的關係，提出了創新的看法。

1931 年 2 月 Průšek 因捷克八大貿易廠商需要中國通，提供其財力支援，前來中國。不久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氏曾撰文譴責日本。亦因此日後獲得日本政府的邀請，去日本研究。氏因此亦研究日本古文化及近代文學。⁸1937 年氏返回捷克布拉格。

Průšek 在中國共停留兩年餘，初研究中國古史，後因時當中國文藝界發生論戰，而氏個人因此亦轉變興趣，注意中國的章回小說及白話文藝研究，並結識了當時名作家魯迅、茅盾及鄭振鐸等。在諸人中 Průšek 最喜歡魯迅的作品，以為其文字潑辣深刻，最具對舊社會舊傳統的摧毀力。氏與魯迅亦交往最深。魯迅曾贈其親書之「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對聯。氏為表示對魯迅的欽佩，不僅將其小說《吶喊》等譯成捷文，日後並將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中文圖書館命名為魯迅圖書館以紀念之。

關於中國的章回小說，Průšek 認為此類民間俗文學是中國社會的寫實，人民生活的寫真，對於中國官方資料有修正及參考的功能。氏曾翻譯《老殘遊記》及《聊齋誌異》等書。其對中國白話文及俗文學的研究，不僅在於翻譯，亦注重中西文學的比較，個人與社會關係的分析，以及其理論架構。日後曾出版《中國的歷史與文學》及《現代中國研究》等專書。⁹除文學及古文外，氏在中國研究上，亦對佛教及敦煌學有若干興趣，祇是此方面著述不多。

要而言之，Průšek 熱愛中國文化，日後曾著《中國——我的姊妹》一

7 《民間史學》，頁 27。

8 同上書，頁 27-28。

9 氏所著《中國的歷史與文學》一書出版於布拉格 1970 年，為氏之論文集，其重要著作多輯於此書。

書，記載其在中國所見所聞。由於其個人對中國文化的深切認識，及其在中國研究上的成就，不僅德國國家科學院、巴伐利亞邦科學院等授予院士，而在捷克確實成為建立現代捷克中國研究的第一人。今日很多捷克甚至匈牙利漢學家喜愛研究中國的現代文學，顯然是受他的影響。

1937年元月 Průšek 回國後，不久即應美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邀請，前往教授中國文學。迨其再返捷克，則正當德軍進佔捷克，捷克大學多被關閉。氏因而仍祇能在八商家所辦東方研究所教授中文，因此編著捷克第一本中文課本。¹⁰二次大戰結束後方得至查理大學哲學院教書，直到 1953 年，使中文得在捷克大學有完整的教學體制，亦培養不少後繼之漢學家，大多在其東方研究所工作。1953 年氏被任命為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所長，經過其長約二十年的領導，該所不僅成為捷克研究中國學的重心，並且揚名於世界，使捷克的中國研究，在世界上得居一席之地。

繼 Průšek 而領導捷克中國研究者，則為 Augustin Palát。氏是 Průšek 得意高足，其成名年代，在本世紀五〇年代，亦正是捷克及東歐國家發生中國熱的時代。Palát 家境清寒，十一歲以後即輟學，初在工廠做工，晚間在東方研究所從 Průšek 修讀中文。迨 1943 年方得入大學，五年後畢業，畢業後不久正當捷克與中共關係友好，捷克產生中國熱，各地學校開設中文時。氏除在八大工廠所在地 Zlín 的中文班教授中文外，亦在 Olomoc 教授中文，此外並在查理大學授課。故對捷克的中文教學貢獻良多。¹¹1954 年被派為駐華文化參事，其在華長達四年之久，對捷克與中共的文化關係貢獻良多。時中捷關係密切，每年捷克得派不少學生赴中國大陸學習中國語文，1958 至 1959 年氏並於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中國中古史。氏對王安石的變法最感興趣。蓋欲從中吸取變法成敗的經驗，俾供捷克政治改革的參考。¹²顯然氏對現實政治的興趣，遠強於其師 Průšek。當然在意識形態上亦比較親華，以代替親蘇。為了研究中國的平民社會問題，氏曾將《水滸傳》翻譯成捷文，亦注意當時的中國農村生活。因此氏亦甚注重中國現代史研究，對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少數民族問題所下功夫尤深。¹³

1959 年 Palát 返回布拉格出任東方研究所副所長，協助其師 Průšek，

10 *Europe Studies China*, pp.36-37.

11 《民間史學》，頁 30。

12 同上書，頁 30-31。

13 同上書，頁 31。

時常往來於西歐各地。氏與法國漢學界關係尤深。由於其個人與政治的關係，此時期他已是捷克共黨中開明改革派及親華派的重要成員，而捷克的漢學界亦由於他的影響，不少人亦捲入政治的意識形態之爭中。1968年俄軍入捷政變後，氏被迫離開東方研究所，一度曾奔波於國外。日後他仍返捷從事譯書工作，亦或以英德法諸國文字，介紹中國文化。1992年台北召開歐洲中國研究史會議，氏曾參加，並報告捷克的漢學研究史。此次個人訪問捷克，據聞其已得中風半身不遂，臥病在床，未能得見，深以為憾。

Palát 治學與其師 Průšek 不同，不重文學研究，而潛沉於中國中古史研究之中，其巨著《宋元史》長達八百多頁，是當前捷克，甚至歐洲，研究中國中古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但對捷克社會而言，其影響則不在此，而在其所翻譯的《水滸傳》，此書深為捷人所喜愛。¹⁴

稍晚於 Palát 另一名治中國史而著名的捷克中國研究者，則是 Josef Fass。Fass 的攻讀漢學，是受 Průšek 所著《中國——我的姊妹》一書影響，因此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而入查理大學亞非學院攻讀中文，成為 Průšek 學生。初亦修讀中國現代文學課程，旋轉興趣於中國現代史，五〇年代後期，氏留學北京，先在清華攻讀一年，復至北大研究中國現代史三年，並將其重心置於中國革命史與對中山先生的研究方面。¹⁵日後並在德國的檔案中發現孫中山先生在護法之役時，曾獲得德國政府巨款支助，因而得運動海軍及國會議員南下，反對段祺瑞等北洋軍閥。氏研究中國革命史注重中國現代化的演進，及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入中國與成長發展，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利用了五四運動。

1968年俄軍入布拉格，氏被迫出走，初在布魯塞爾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1969～1970年亦曾在西柏林講授清史及五四運動史。返國後無法再在東方研究所工作，亦難入大學教書，乃於1972年冬入捷克通訊社充當譯員。共黨政權崩潰後，初返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工作，後為政府拔擢，派為駐北京大使，以迄於今。

五〇年代在華成長的捷克漢學家，除 Fass 外，尚有 Jaromir Vochalá, Oldřich Kral, Zdenka Hermanova 及 Josef Hejzlar 諸人。Jaromir Vochalá

14 同上書，頁 31。

15 同上書，頁 39-40。

(吳和)是語言學家，在大學時攻讀國際貿易，因此被派北京，學習對華貿易。初在清華攻讀一年中文，1954年轉入北大中國語文學系，時中共正熱烈討論文字改革，主採用羅馬拼音者甚囂塵上，致而引起吳和的興趣，改攻讀中國語言學，特別注重中國語法研究，並在王力、周祖謨及林燾諸教授指導下，撰寫畢業論文。¹⁶1956年6月6日並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熱烈歡迎中國的拼音字母〉一文。吳和認為中國文學的最大特色是表意，而不是表音。在漢語的演進中，有書面語(文)和口語(白話)的不同。漢學是有其獨特形式的書面語，而不是說話的口語。如改用拼音文字，即將喪失其固有的特色，何況中國文字結構本身即是一種藝術。¹⁷故其文雖說歡迎中國的拼音字母，實際上卻是提出他的顧慮與隱憂。

吳和在北大讀書時期，認識北大東語系系花王如珍小姐，兩人於1957年結婚，1958年吳和在北大畢業後，與中國夫人返回布拉格，初在郊區教授外國人捷文，1960年進入查理大學哲學院亞非系教授中文，直至1990年退休。吳和因專攻中國語法，對中國字的結構與正字書法頗有心得，對中國文字有極有系統的精確分析，使查理大學的中文教學有一套完整的學習程序。氏著作等身，專著多達八十餘種，更編有《漢語文言入門》、《現代漢語基礎》、《漢學指引》及《翻譯入門》等課本。¹⁸

Oldřich Kral也是Průšek的學生，祇是他的興趣不全在於現代中國文學，而置重心於明清小說及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老莊及佛學等。氏是捷克著名的紅學專家，其研究《紅樓夢》幾至廢食忘寢之地步，曾將《紅樓夢》翻譯成捷文。在現代小說方面，喜好巴金、茅盾的作品，曾將《家》及《李家舖子》譯成捷文。氏出身於查理大學，受Průšek影響甚深。1954至1957年在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當研究生，得至北京留學研究，時當中共百花齊放時期，使他認識中國在學術思想上的多樣性。1965年二次至北京，由於中共對外政策的改變，他與中國學者接觸不多，故僅停留三四個月。

Kral認為中國傳統藝術文學所表現的精神，與西方現代藝術文學頗有相近之處，因此他要從事中西文學的比較研究，曾比較中國與英國文學的異同。氏亦研究先秦諸子思想。1958年以後並在查理大學亞非系教授中

16 同上書，頁34。

17 同上書，頁34-35。

18 同上書，頁35。

國哲學及文言。但自 1968 年政變後，被迫離開查理大學，後得友人相助，在民族藝術館亞洲藝術部門工作。在此時期內，氏除專心研究及翻譯《紅樓夢》外，亦翻譯了《莊子》〈內篇〉，並因老莊思想的研究而注意佛經，並將《六祖壇經》譯成捷文。共黨政權崩潰後，氏得重返查理大學亞非系執教，並主持系務。曾於 1990 年來台參加比較文學會議，對台北之繁榮及故宮博物院典藏之豐之精留有深刻印象。¹⁹

Zdenka Hermanova 出身稍與上述諸捷克漢學家不同，少女時代曾在英劍橋大學附設中學讀過書，對語言深有興趣，曾學習過英法德俄各國語言。後並習古埃及文及印度梵文。因而入查理大學亞非系後從 Průšek 學習中文。於 1953 年被派來華，初在清華學習中文，與吳和同學，一年後兩人同時進入北大中國語文學系就讀，亦同時寫畢業論文畢業於北大。1958 年 Hermanova 與吳和夫婦返捷。氏於東方研究所工作，參與編纂《捷華辭典》。此項辭典之編纂係中共與捷克雙方合作所進行之學術文化交流工作。初由曾在中國任捷語系系主任之 Dana Heroldova 教授負責。迨中捷關係惡化，Dana Heroldova 離職，捷克政府不再考慮進行此項學術工作。幸語言學研究組負責人 Ladislav Augusta 大力支持，這項工作乃得持續進行。1969 年 Ladislav Augusta 被迫離開捷克，其工作遂 Zdenka Hermanova 單獨負責。此後由於經費困難，原創議人 Heroldova 的死亡，工作一度幾乎中輟，而 Zdenka Hermanova 堅毅不拔，多方尋求援助，後得科學院出版社相助，終於在 1984 年完成，計九巨冊，其成就之高，可媲美日本的《漢和大辭典》。

1988 年 Zdenka Hermanova 因與東方研究所黨工人員意見不合，被迫離開該所，及共黨政權崩潰後，方再返所，擔任語言學組主持人。氏之中國學研究成果除編纂《捷華辭典》外，即是以布拉格結構語言學派之理論方法，研究漢語，著有《漢語構辭法的問題》一書，甚獲歐洲漢學界好評。氏亦曾將《西遊記》翻譯成捷文。²⁰

Josef Hejzlar 是研究中國藝術史的捷克著名的美術設計、美術理論及藝術史專家。氏出身於布拉格版畫中學、高等工藝美術學院，1951 年前往北京留學。初在北大學習中文及中國歷史哲學文學等。1954 ~ 1956 年

19 同上書，頁 36-38。

20 同上書，頁 40-42。

入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從王遜學習中國美術史、美術理論。故就藝術理論及藝術史言，氏係科班出身，而且是具有良好之西方藝術理論作為基礎的研究中國藝術，特別是繪畫問題的學者。氏以色彩學及心理學等觀點，來探討中國民間純藝術及工藝的設計，以及比較研究中西美術的不同。氏係捷克工藝美術研究所研究員，並在各專門學校授課。由於氏出身於工藝美術學院，故氏亦是工業建築室內設計專家。其夫人李玳君是中國人，兩人相識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在中國結婚，李玳君北大東方語文系畢業，來捷後工作於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助 Zdenka Hermanova 編纂《捷華辭典》。

Josef Heizlar 對當代中國畫家齊白石甚有研究，其所著《齊白石》一書出版於 1970 年，曾獲文學及藝術界出版頭獎，全國圖書出版頭獎。氏在捷克因反對俄軍侵佔捷克，為親俄之捷克政府所不喜，夫婦兩人屢受迫害，一度流亡國外，曾於 1987 年應中國大陸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工業設計院及建築學院與山東濟南工藝美術學院邀請，在各地講學，講述工藝美術設計理論，工藝美術與生態環境以及中西美術設計比較等課程，頗受歡迎。也許由於其親華立場的關係，次年中國大陸北方相關高等工藝美術學校再度邀請訪問，則為捷克當時親俄政府所阻，未能成行。²¹

在捷克的研究中國學者之中，唯一被視為台灣通的，則是 Ivana Bakesova（白漪葛）女士。氏原讀圖書館系，亦是受 Průšek 影響而轉入亞非學系，改學中文。畢業後曾在捷克駐北京大使館中充任翻譯長達二年之久。1966 年調回捷外交部充任譯員，1970 年入東方研究所，半年後轉入捷蘇關係研究所。由於該所藏有極多的中捷關係檔案資料，伊遂得發展其所長，專注於研究中國現代史，特別是中捷關係史。國民政府時代中國與捷克關係友好，兩國貿易，特別是軍火貿易甚盛，故伊亦致力於民國史研究。1980 年以後，伊開始研究台灣情況，由廈門大學及美國方面獲得不少有關台灣資料。伊認為台灣的處境與捷克相似，均是處於強鄰環伺之中。深以為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應可作為捷克的參考。1990 年捷克總統夫人來華訪問，Bakesova 曾隨行充當翻譯，似應對中華民國與捷克的關係有若干促進維護的作用。²²

在當前捷克諸多研究中國學者之中，被視為第三代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21 同上書，頁 42-44。

22 同上書，頁 44-45。

掌門人，則是世界知名的研究西藏問題專家 Josef Kolmas（高馬世或高馬士）。²³氏也是 Průšek 的學生，1952 ~ 1957 年在查理大學亞非學系隨 Průšek 學習中文，奠定其穩固紮實的中國學知識，畢業後則於 1957 ~ 1959 年至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攻讀藏文。高馬士教授之所以要研究西藏，最初是因對中西交通史有興趣，特別是中國古代溝通中西交通與文化的重要人物，如張騫、法顯、玄奘等。曾著有《旅行家、航海家、及地理發現家 ABC》一書，介紹此類偉大的探險家，亦曾將法顯所著《佛國記》譯成捷文，現並翻譯玄奘所著《西域記》。²⁴故中西交通史始終是他的另一項喜好。

Kolmas 對西藏興趣並非是始於其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研究時，實際上在他在查理大學讀書時，該校即已有教授 Pavel Paucha（中亞及印度語教授）開授西藏課程，此後復有 Kamil Sedláček 研究漢藏語言關係。故氏之對西藏初步知識與興趣，實起於在查理大學讀書時。1958 年氏在查理大學尚未畢業，曾將白居易詩集譯成捷文，並在《白氏全集》中發現有為唐帝擬致西藏之詔書，遂亦譯成英文。氏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從于道泉先生學藏文，于氏並為彼取中國名字「紹良」。Kolmas 在民族學院學了兩年藏文，因通藏文，對藏文所著佛經了解亦深。²⁵曾在四川購得今日世界僅有兩部的用藏文所寫的大藏經，現藏於東方研究所圖書館（另一部據云藏於北京）。氏之西藏研究不僅祇注重其文化，亦甚重視今日之中藏關係。他認為時間是解決中藏的最好方法，達賴本人並不反對中國文化，而其目下所堅持的，是政治制度上共產制度與西藏喇嘛間的矛盾。高馬士曾三次訪問過印度，亦見過達賴與不少喇嘛，對西藏問題了解甚深。²⁶

Kolmas 在中西交通史上除了翻譯法顯《佛國記》及正在譯玄奘之《西域記》外，亦整理十八世紀來華之波希米亞籍的耶穌會士資料。當時屬日後捷克籍的來華耶穌會士共有八人，其中一位中文名嚴家羅者與 Kolmas 同鄉，均為摩拉維亞人。嚴家羅曾有不少致摩拉維亞、巴黎及俄京彼得堡之書信，信中言及中國當時社會情況。Kolmas 認為此是極為寶貴之報

23 高馬世是其名片上所蓋中文圖章之名字，但個人及翻譯者常用高馬士。

24 《民間史學》，頁 32。

25 同上書，頁 32。

26 同上書，頁 33。

告，可視為中國社會的寫真。現正將之譯成捷文出版。²⁷

Kolmas 身材高大，為人豪爽熱忱。此次個人至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訪問，事先未能完全約好，而且該所在布拉格新市區，與老市區（亦即觀光區）甚遠，個人與內子前往等於是突乎其來的拜訪，仍蒙彼熱烈招待，親自陪伴參觀魯迅及 John F. Fairbank 圖書館。並請飲酒，聽鄧麗君錄音帶。一再表示希望能有機會至台灣訪問，他對台灣所藏蒙藏資料及蒙藏委員會有濃厚興趣。

以上所述是捷克的個人研究中國學的情況。至於研究機構，則捷克與匈牙利情況相同，僅有兩個機構，一是科學院中的東方研究所，一是查理大學的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部門。就東方研究所言，該所於 1929 年即開始籌備，1934 年方正式成立，1952 年以後改屬科學院。1993 年自舊市區遷來新址，現全所分為三大部門，即（1）非洲及近東，（2）遠東，（3）南亞。其研究中國者計有研究員七人，係該所之主體。科學院藏書共約二十萬冊，而東方研究所魯迅圖書館即有中文書籍約六萬六千冊。魯迅圖書館不僅收藏中國現代文學，最為可貴者，仍為地方志及叢書，不少已是外間少見者。在魯迅圖書館內即懸有魯迅親書之「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對聯，令人印象深刻。

另一值得一提者，該所出版有有關蒙藏及中國研究之期刊多種，惜個人不通捷文，難知其內容。此外美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講座教授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去世後，其夫人決定將費氏生前所藏西文書籍，全部贈予該所。故該所現亦成立 Fairbank 圖書館。個人參觀時，書尚未全到，正在編目上架中。Kolmas 亦深盼台灣方面能多贈予書籍，以增加其圖書館中文書籍的收藏。蓋其圖書經費甚困絀也。

至於查理大學東亞研究所之情況，該所即過去之亞非學系，1989 年捷克脫離共黨統治後，改為東亞研究所。如同傳統的歐洲學制，該所包括中日兩部門，以中國研究部門為主體。現中國部門有教員六人，研究範圍包括歷史、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及中國文學等。由於 1968 年的政治事件影響，五〇年代成長的中國專家教授全部離去，故該所中國部門的師資幾乎全部為新生代，負責接待的 Olga Lomova（羅然）女士即是其中之一。氏研究中國文學，華語極其流利。中國研究部門每年報考者一百多人，但取

27 同上書，頁 33。

錄僅十二三人而已。錄取人數不多的原因，一在於人事及經費不足，另亦在於本於傳統重質不重量的影響。由於查理大學是歐陸極具歷史之大學，素以注重理論研究及訓練嚴格而著名，故中國研究部門對學生要求嚴格，以培養學術研究人才為主，但亦要求學生均能說流利之中文，注重翻譯。東亞研究所現今與外國大學合作計畫不多，查理大學雖與國內國立台灣大學有合作關係，但限於科學部門，東亞所不在其中，羅然女士曾表示該所深盼能與台灣學術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個人印象，該所所藏圖書似亦不夠豐富。羅然女士亦深盼國內學術機構能慷慨贈圖書，並交換學生。

綜括上述，可了解捷克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研究，主要在於 Průšek 的帶動，無論是栽培人才，或沉潛於學術研究，氏均有不可磨滅之功。由此可以看出個人對於學術文化的強大影響。當然捷克工商界對早期中國研究的扶持，也是造成其能萌芽成長的一項重要原因。

就捷克日後中國研究的中挫而言，則是因中國研究學者牽涉入政治紛爭之中，1968年的俄軍入侵，幾使 Průšek 所建之的中國研究全部覆滅，1989年政權轉變後，方能再度重新開始。政治對學術所造成的摧殘是極其可怕的，今日捷克中國研究學者言及當年的情況仍談虎色變，其創痛之深，絕非是寥寥數語所能形容。當前捷克中國研究在缺人缺錢的情況下，其成長似乎是很緩慢的，台灣目下既開始其東歐政策，與捷克的關係日漸友好，如能對捷克的中國研究早日伸出援手，不僅對此東歐中國研究重鎮有所助益，即使對中捷關係的發展言，亦必定產生護持之功。

四、結論

綜觀上述捷克及匈牙利兩國中國研究情況，約可得到下列之結論：
一、兩國的中國研究均極注重語文訓練，個人此次在兩國所會晤的專家學者，均會說流利中文，而且以說中文為榮。不似西歐中國研究者，或不會說流利中文，或不願說中文，似乎在彼等心目中仍有歐美甚至白人第一的觀念。而匈捷的中國研究者大多以平等或對等的觀念研究中國問題，致而造成彼等在觀念與西歐美國的漢學家有根本的不同。
二、匈捷兩國的中國研究者，不僅精通中文，而且常精通數種語言，如英、德、法、俄諸語文，也有不少原是學其他種語文，而後及於中文，從事中國研究。例如匈牙利布達佩斯羅蘭大學中文系主任 Galla 教授，氏是先學德文，而後再學中文，

捷克中國研究界領導人物 Palát 精通法文德文。此固與五〇年代兩國政府在政策上要選拔有語言天才者去學中文，研究中國有關，但另一方面他們在觀念上始終認為，多語文的訓練，是學習中文研究中國的一種必要條件，此與英美中國研究者至多祇學日文，情況亦不相同。三、捷匈兩國中國研究，在本世紀五〇年代，頗受中共深鉅影響，由於中共在文化政策上注重扶助諸國的中國研究，並允諸國多派留學生來華，亦資助其圖書，甚至設備。故捷匈兩國此時期內中國研究興盛，名家輩出。但及六〇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兩國與中共交惡，其文化交流逐漸中斷，中國研究遂一蹶不振。尤其是捷克，由於漢學家參預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運動，1968年蘇軍進入布拉格後，中國研究全面遭受摧殘，幾至連根拔除。四、也許由於上述因素的影響，今日兩國的中國研究大多注重文學，不注重歷史，蓋如此方能遠離政治，故呈現有一種避禍的心態。五、由於兩國目前與海峽兩岸的中國並無巨大的經貿關係，故兩國的中國研究與德國受經貿因素影響不同，是純粹學術性的。它與過去歐洲傳統漢學研究，具有相當個人嗜好性，亦不相同。蓋尚能注意其在學術上的價值與重要性。也許這種型態的中國研究，才是一種合乎常態的中國研究。

(3) 郭廷以先生書信選

陸寶千主編

平裝 250 元

郭廷以(量宇)先生(1904~1975)，河南舞陽人。早年執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來台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民國44年起出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及首任所長。本書收郭先生致親友、同仁、門生，及海外學者書函百餘封；不僅反映近史所草創時期的艱辛歷程，亦為建構中華民國學術發展史的重要素材。

(4) 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

陳三井主編

平裝 250 元

近代史研究所自1955年2月籌備成立，至1995年2月屆滿四十週年。經過多年的奮鬥，近史所終於逐漸邁開腳步，找到自己應走的方向，確立自家應有的品牌和特色。收在本書裡的十餘篇紀念性文章，大抵以近史所創辦人郭廷以(量宇)先生為回憶的主軸，同時也兼及近史所其他個人和細節，應能部份呈現近史所成長的故事，及中華民國學術發展的一環。

對兩岸研究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史 現狀的省思

青 石*

一、兩岸研究在不少問題上漸趨接近

有關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的研究，是兩岸學者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不僅在於它關係到中國抗戰中許多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與評價，而且關係到如何看待和總結抗戰期間國共力量消長和戰後政權迅速易手的深刻歷史原因。在經過十多年的學術交流之後，多年觀點對立的兩岸學者，相當多數的研究心態已漸趨平和起來。從 1995 年 9 月相繼召開於台北和香港的有關抗戰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上，雙方學者笑談過去互以「匪」論，老死不相往來，而今濟濟一堂，磋商學術的可喜變化，足以看出這種心態之漸趨轉移。

研究心態之變化，直接影響到雙方研究興趣、研究態度和研究目的相應地在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在 9 月會議上，幾乎所有參加者都可以感覺到，多數學者已不願過多地涉及敏感的歷史問題，即使雙方仍舊不可避免地要討論到一些敏感的直接與過去黨派對立和爭論有關的問題，但無論是會議的組織者，還是兩岸的研究者，多數都比較注意避免意識形態的爭論，盡量不使用情緒化的用語。大陸章開沅教授在台北會議開幕時提出的「尊重歷史，超越歷史」的觀點，頗能反映大陸多數學者的願望。同樣地，在台北和香港會議的具體討論中，張玉法院士表示接受大陸學者的建議，改「收編」一詞為「改編」，劉鳳翰教授表示可以接受大陸學者關於不宜使用諸如「游而不擊」之類情緒化詞語的意見，反映出台灣學者也願意以更冷靜和更客觀的態度來檢討自身的研究。

兩岸學者開始注重客觀地看待和研究抗戰的歷史，促使雙方許多學者

* 大陸科研人員

開始改變過去不重視對方史料，甚至視對方史料為虛假的傾向。在這方面，大陸起步較早，也較少顧忌，利用台灣發表的史料研究國民黨的歷史和國共關係歷史的成果比比皆是。台灣多數學者對此雖然還不十分習慣，但年輕一代學者已明顯地沒有太多禁忌，利用大陸發掘的史料進行研究的學者日漸增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資深學者蔣永敬教授近年來開台北風氣之先，廣泛利用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新資料，並綜合以台灣公開的新資料，進行自己的獨立研究，頗為引人注目。

雙方都採取客觀冷靜、尊重歷史和超越歷史的態度來研究歷史，不分彼此地利用雙方發現的重要檔案史料，不可避免地促使雙方近年在一些較為敏感的國共關係史問題上的研究，出現了觀點趨同的重要現象。以下的幾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情況。

第一，台灣學者的觀點逐步接近於大陸學者的某些說法

例一，對於 1937 年國共兩黨放棄內戰，走向共同抗日的問題，過去兩岸學者的說法完全相反。大陸學者強調中共統戰政策的勝利，說兩黨關係的改變是「國共合作」、「團結禦侮」；而台灣學者的看法則完全不同，他們通常否認「合作」、「團結」之說，稱兩黨關係的改變，根本上是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成功，說中共是被迫「輸誠」、「投降」，紅軍因走投無路而被國民政府「收編」。近年來台灣不少學者的講法已有不同。一些台北學者的文章均已或多或少地承認，1937 年的國共和解，在某種程度上實際是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被中共統一戰線政策擊破的結果。此次台北研討會上蔣永敬教授在其發言中更進一步肯定，當時兩黨和解的過程，無論結果如何，都可看做是走向「團結禦侮」的一種表現。

例二，對於中共抗戰期間對日作戰的問題，大陸學者現今通常是講兩個戰場，稱中共抗戰主要在敵後戰場。但台灣學者多年來否認存在敵後戰場，通常不承認中共抗日，談到中共對日作戰時，一般也以「游而不擊」一言以蔽之。而今，不少台北學者對兩個戰場的說法已表示可以接受，著名軍事史專家劉鳳翰教授並且在其提交給香港會議的論文中，具體地討論了中共在敵後戰場進行對日作戰的情況。根據他的統計，中共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較大的作戰有一九九次，其中攻擊國軍的只有四十五次，不足四分之一，另外一百五十四次都是對日作戰。

第二，大陸學者的觀點也在向台灣學者的某些說法靠攏

例一，過去大陸學者討論 1931 至 1937 年間國民黨對日態度時，通常

冠以「不抵抗」三字，只講蔣介石、汪精衛等如何「妥協投降」，「喪權辱國」。近年來，多數研究抗戰史的著作都已注意台灣方面陸續公布的有關這一時期國民政府秘密準備抗日的重要檔案史料和較新的研究成果，開始明確承認蔣介石當時確有抗日準備。甚至，對於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一些學者也開始承認其邏輯上具有合理性，因而既批評中共當時的「反蔣」政策，也批評蔣介石的「剿共」政策，強調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安內」。

例二，過去大陸的抗戰讀物通常都只講敵後戰場，或八路軍、新四軍抗日，不講國民黨軍隊的對日作戰，甚至把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特別是武漢失守後的表現，概括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八個字。近十年來，此種說法已不復存在。絕大多數研究著作都大量採用了台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已經公開的戰史資料，肯定國民黨軍隊在對日作戰中的作用，具體描述其歷次重大戰役，對兩個戰場問題也採取較為客觀的態度，肯定二者相互依存。甚至，大陸上一些研究者還對國民黨軍隊敵後作戰的問題加以具體的研究。

從上面所舉的這幾個簡單的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兩岸學者這些年來在國共兩黨抗戰問題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不同，上述這些看法和說法的改變，在過去雙方突出強調各自的意識形態，敵對情緒很強的情況下，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想像的。

二、台灣學者研究當中的問題與不足

比較過去，兩岸學者近些年來對許多問題的研究，都表現出開放、平和的心態，因而整體研究水平在穩步上升，資料利用幅度在迅速增大，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明顯地加強。但是，對於抗戰期間的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由於歷史上你死我活的較量，再加上現時政治環境的影響，畢竟仍是敏感區域，研究上的難度很大，情緒化和主觀色彩的痕跡，即使在9月台北和香港的兩次會議過程中，仍舊表現得相當明顯。在這方面，綜合台灣學者的會議發言和有關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存在以下一些問題與不足。

第一，對中共歷史的整體研究水平相對偏低

研究國共關係，不能只從國民黨一個方面來發掘資料和討論問題，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不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共的歷史，對兩黨關係史的說

明就只能是片面的與扭曲的，甚至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研究都很難真正深入全面。但是，從接觸到的研究成果來看，除了個別專門的研究者，如蔣永敬、陳永發教授確實較深入地以相對客觀的態度進行了關於中共歷史的專題研究以外，多數談論國共關係或中共問題的研究者，對中共問題的了解，都不十分深入。這主要表現在：

(一) 大多數著作論文仍靠轉述十幾、二十年台北學者的研究成果。在過去突出強調反共意識，強化反共宣傳的年代裡，台灣曾經有過不少關於中共歷史的大部頭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王健民、鄭學稼、郭華倫幾個人的著作。這些著作多年來一直是台灣學者了解中共歷史的主要參考資料，至今這種情況似乎仍沒有多少改變。在台灣許多涉及到中共問題的論文和專著當中，引用這些早些年著作的情況幾乎比比皆是。但是，這些著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存在許多問題。首先是作者的意識形態色彩過於突出，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作者在考察中共歷史時不能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選擇史料時自然有所偏頗，它得出的結論和對眾多問題的說法，都難免要服從於政治宣傳的需要。其次是作者當年利用的資料十分有限，其利用的資料多數來自於幾十年前調查局等情治機關從有關管道得到的，且原本就是利用來證明中共「陰謀」的東西。僅僅選擇這樣一些最極端的資料來說明歷史，從純學術的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不僅方法上是不可取的，其結論尤其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在這些一再被反覆引用的「權威」著作中，不少關鍵資料的來源或解釋就有問題。

如被台灣學者引用得最多的，是所謂毛澤東在 1937 年 8 月八路軍由陝北出發前，對八路軍高級幹部關於在抗戰中要採取「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策略的講話。這個資料據調查局說是 1940 年從叛逃的「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騎兵連共黨支部書記」李法卿口中得到的。但這則資料的可靠性頗成問題。第一，人所共知，八路軍始終只有三個師的編制，其雖擴軍甚多，但也只是使用縱隊、支隊或旅、團之類的名義，向未成立過「獨立第一師」。1940 年前後楊成武部的名義是晉察冀軍區第一支隊，不是什麼「獨立第一師」。第二，如果李某所述確為事實，必為僅有少數最高軍事指揮人員知曉的重大機密決策，以李某一連隊支部書記，輕易獲知此等機密之全部內容，實難想像。何況，楊成武部 1937 年至 1940 年間擴大甚快，1940 年之連支部書記，1937 年最多只能是一般文書或排級幹部，其能否獲知機密都成問題。其三，只要對毛在抗戰前半期有關軍事策

略的各項指示和講話稍加研究，便可發現毛之策略曾幾度變化，而無論如何變，其最初因自身力量弱小，雖處處懷有防人之心，卻並無害人之意。李某所述毛分三階段如何如何打擊國民黨的策略，與事實相距甚遠。

(二)不少論文和著作存在常識性錯誤。由於對台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公布的各種檔案資料較為重視，因此，大陸學者對國民黨史了解得較多，參考資料也較豐富，一般研究上比較嚴謹的大陸學者，他們關於國民黨問題的研究專著中，較少出現史實方面的重大錯誤。比較起來，多數台灣學者很少深入研究和考察中共歷史，通常也不利用大陸方面的研究資料，往往只是借重王健民、郭華倫等人的有關著作，所能參考的資料和著作自然十分有限，結果影響到他們的有關論文和著作，只要討論到中共問題時，多半都會出現一些以訛傳訛的史實方面的明顯錯誤，有些甚至純粹是常識性的錯誤。在此次台北會議期間看到的某些資深台灣學者的論文中，像這樣的常識性的錯誤就有多起。

比如，有的學者將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與 1938 年 9 至 10 月間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混為一談；有的學者搞不清 12 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與毛澤東的意見分歧誰勝誰負，斷言「全會批准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路線，肯定洛川會議的決議」，其實正好相反。

又比如，一些學者將 1937 年 9 月 22 日正式公布的中共「團結禦侮宣言」，說成是 7 月 15 日「公布」。許多學者不清楚八路軍改編時的編制類別，以訛傳訛地誤信八路軍改編之初，國民政府「命令」其「總兵額二萬人」。其實，有關 1937 年軍隊改編談判的情況兩岸均已公布許多文獻檔案可以參照。年初談判時，中共要求編四個整理師，蔣則堅持三個國防師。至 5 月上旬雙方已大致商得結果，據台灣公布之〈中共活動真相〉中所錄國民黨方面談判代表張沖 5 月 8 日電報亦可知，當時談判「軍隊數目，結果勉強商得削至十五個團之數，編成三個國防師，統率於一個指揮部，受行營節制。」既為國防師編制，自然應為兩旅四團制，一師規定人數應為一萬二千人，再加上一個總指揮部一般可編四千人，僅僅按照此一編制，八路軍三個師的總人數就應在四萬人左右，何來一個「總兵額二萬人」之說？實際上，根據中共反覆要求，見之於蔣介石與周恩來 6 月 8 日的廬山談話，蔣不僅同意八路軍三個師照國防師編制編十二個團，且同意總人數可容至四萬五千人。因此，儘管八路軍三個師最初編成時尚不滿員（因留置陝北一萬人，八路軍三師出發時總人數僅三萬四千人），但無論從國

防師編制的常識角度，從雙方商定人數，或是實際編成人數來看，都不存在一個「總兵額二萬人」的情況。

類似這種常識性的錯誤之所以經常會出現，並且往往得不到台灣學者相互之間的糾正，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多數台灣學者多年來習慣於各說各話的局面，還沒有把作為國民黨對手的中共歷史的研究真正納入到學術研究的領域當中來給予重視，因此遇到問題時，多半只好不加分辨地借助於十幾、二十年前的那些「權威」著作上面的說法。

第二，在研究國共關係問題時多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片面性

台灣學者在研究抗戰問題時，已經越來越多地開始注意保持平和的心態，注意客觀地，不帶主觀情感地去看待過去的歷史了。但是，在涉及到國共關係，或者中共問題時，除少數的研究者外，多數研究者還很難真正使自己站在超越過去兩黨歷史恩怨的高度，做到客觀、公正、不帶主觀色彩。談論中共問題時，研究者們所以會大量引用已經過時的台灣出版的中共歷史著作，除了對中共歷史的研究不夠重視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出於感情上的偏向。只要稍加考察，就不難發現，一些台灣學者在談論國共關係史或中共問題時，經常表現出下列幾種情況：

（一）很少利用大陸研究成果和有關資料，即使有所利用，多數利用的時效性也較差。一般看來，第一，不少利用者利用的大陸出版物，還是八〇年代，甚至更早的大陸出版品，對大陸九〇年代新的研究成果利用較少；第二，經常被利用到的大陸出版物，往往是帶有明顯宣傳色彩的讀物 and 大事記之類的一般工具書，對有新意的、具有較強學術價值的大陸學術研究成果，引用者甚少；第三，與歐美學者相比，台灣學者通常喜歡引用水份較多的大陸書籍，而對歐美學者較為重視的，學術價值也更高的大陸方面的專題研究論文，也只有很少人利用。

（二）容易先入為主，而且習慣於以論帶史的研究方法。最突出的表現，是不少學者對中共問題只相信早些年出版的強調階級鬥爭的大陸中共黨史著作和有關人士的回憶錄，對近些年來陸續出版的，不同於其觀點的各種相關資料和研究成果往往視而不見，不研究、不辯駁，堅持各說各話。尤其是對抗戰期間的國共關係，和中共對國民黨政策等問題，在大陸方面已經陸續出版了一些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研究論文和著作，比較客觀地和系統地討論了兩黨關係的變化，它們具體說明了中共，包括毛澤東本人，對國民黨的看法和政策其實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但是，這樣的研究成

果，至今在台灣學者的研究當中，尙未見到任何反映。恰恰相反，直至 9 月的台港兩次討論會期間，凡涉及到這方面的爭論，大多仍舊是由於台灣學者不了解大陸近年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所引起的。

(三) 對許多資料的可靠性不加考證。治史之人最基本的學問，就是要辨別史料的真偽。但是，圍繞著國共關係問題或中共問題的研究，台灣學者論文論著中對史料不辨真偽的情況相當普遍。而這種情況的造成，如同前面講到的種種常識性錯誤的出現，幾乎都是主觀認定的結果。所謂主觀認定，就是首先對其研究和議論對象，確定了一個基本的道德標準，對中共則首先確定了它是壞的、惡的、虛偽的、弱小的，等等，然後據此選擇材料，凡有助於說明此觀點的，則相信其為準確的；凡無助於說明此觀點的，則一概不信、不用。因此，像張沖 1937 年 5 月 8 日電報關於編紅軍為三個國防師的電報，很少有人利用，更無人討論其內容，相反，那些並無多少文獻史料根據的貶低紅軍人數的說法，則被人們引了又引。除了八路軍三個師「總兵額二萬人」的說法以外，還有一個說法也是常常被台灣學者引用的。這就是郭華倫著《中共史論》中所說的 1936 年底紅軍人數。郭書稱此時毛在陝北之紅一方面軍僅約萬人，張國燾之紅四方面軍也約萬人，賀龍之紅二方面軍則僅二千餘人。因此，紅軍這時「只有二萬二千人」。其實，只要稍微查對大陸有關史書公布之文獻檔案，即可了解此說完全失實。因為中共紅軍此前，即 1936 年 10 月剛剛會師於甘北，據會師前夕三個方面軍各自通報的部隊人數及裝備情況，和隨後報給蘇聯軍委的編制詳報可知，第一方面軍總人數二萬一千人（另有六千缺少裝備的地方武裝），第二、四方面軍總人數五萬六千人，總共應有紅軍七萬餘人。10 月底紅軍三個方面軍在黃河沿岸展開寧夏戰役失利，紅軍被分割成兩部分，四方面軍二萬一千人渡過黃河，另外約五萬餘人被迫留置甘北。根據以後各種戰報和報告亦可知，至 1937 年 3～4 月，渡過黃河的二萬餘紅軍（即所謂「西路軍」）在甘西被「馬家軍」消滅為止，從 1936 年 11 月到 1937 年 2 月，國共兩軍之間再無大的戰鬥（僅山城堡一役國民黨損失一旅，和西路軍與「馬家軍」有些不很大的作戰）。因此，說 1936 年底紅軍只有二萬二千人，顯然不實。

同樣，出於大致相同的主觀道德認定的原因，不少台灣學者喜歡利用從中共叛逃出來的人的各種揭發材料。張國燾的回憶就是被引用得最多的一份資料。但是，對於張國燾的回憶，大陸方面以及歐美國家的不少學者

都已指出其中有許多不實之詞，可是不少台灣學者仍舊不加辨別地使用他的說法。像關於 1937 年 8 月洛川會議的情況，就是引用得很多的一個例子。張在回憶中聲稱毛當時堅持要實行「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包括日本和蔣介石」的策略，而他則堅持認為：蔣不會妥協；與國民黨合作不能表裡不一；不贊成專打游擊戰。其實，查對洛川會議記錄，不僅看不到張回憶所說的他自己的那些發言，也找不到他指責的毛的類似發言，倒是有不少他關於如何擴大紅軍和爭奪領導權的意見。從記錄上看，這次會議上也並沒有討論蔣是否有抵抗決心的問題，會議討論的中心只是中共軍事策略的問題，包括作戰方式（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出兵快慢（主力早出動還是晚出動）、指揮原則（獨立自主還是一切聽從蔣之命令），基本的出發點純粹是因為力量弱小，擔心被蔣計算，害怕僅有的軍事力量被投入正面作戰消耗殆盡而得不到補充，故而強調「防人之心不可無」。會議沒有討論過任何針對國民黨的進攻性的計劃和方針。

第三，感情色彩較重，不易客觀冷靜地考察兩黨關係的歷史

在 9 月會議期間，讓大陸學者感觸良多的首推台灣學者不受政治左右的政治情結。在台北，幾乎所有學者都能夠告訴大陸來訪者，他們那裡已經不存在一黨政治，因此，他們的研究絕對客觀，包括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在內，任何研究與討論都沒有禁區，完全可以自由批評。但是，置身台灣，凡遇會議或閱讀論著論文，大陸學者都會發現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即幾乎每一個研究者在談到蔣介石的時候，大都言必稱「委員長」、「蔣總裁」、「蔣先生」、「蔣公」、「老總統」，甚至「總統 蔣公」之類。既然對自己的研究對象仍舊抱著如此畢恭畢敬的心態，視其為長者、尊者、親者，甚或長官，又如何能夠在研究中作到客觀公正？大陸和台灣有過大致相同的研究環境，因此，這種稱謂的變化在大陸學者看來意義頗大。記得八〇年代初，大陸學者也有過類似的情況。他們當時在研究中談到毛澤東、周恩來時，通常都只能尊稱其官銜，如「毛主席」、「周總理」之類。甚至一些出版社和雜誌社直到九〇年初，還不能在其出版物中稱中國共產黨為「中共」。為了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大陸多數研究者都很清楚與自己的研究對象在感情上保持一定距離的重要性。因此，為了衝破類似這樣一些禁區，人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現在，已經不再有人會因為自己在文章中直呼毛澤東的名字而感到壓力與不安了，於是，毛的神話形象自然也隨之而改變。殊難想像，看上去比大陸更開放的台灣，如今仍

未稍減此風。這也就難怪，當大陸學者在9月會議中談論蔣的某些誤算時，台灣學者會立即反駁，且並無史料根據地去猜測蔣並非誤算，而是高深的謀略與手腕云云。言外之意，蔣非尋常之人，不可以尋常人之心理度之。可見，繼續將蔣介石奉為長者、尊者、親者，或長官的結果，不免仍舊對研究者的心理產生負面影響。

比較9月台港會議中大陸和台灣兩方面學者在某些敏感問題上的態度，可以看出，大陸學者的研究心態相對要平和得多。一般說來，大陸學者即使遇到某些較為敏感的歷史乃至政治問題，也比較容易採取冷靜的和分析的態度對之，從未見大陸學者提出過於刺激的問題，或對情緒化的批評作出激烈的反應。反觀台灣學者，有相當一批老一代的研究者遇到有關國共關係方面的不同觀點和說法時，則往往容易反應激烈。本來，學術研究應給予研究者相當的自由度，對己對人均應如此。學術批評，亦應就對方研究的方法、論據的可靠性，和觀點的邏輯性，就事論事地進行具體討論，不宜以一己之觀點，以今推古或借古喻今地妄斷對方之正謬。

觀察某些老一代台灣學者對國共關係研究情緒化色彩較重的原因，除了受傳統觀念影響較深以外，心態上的不平衡似乎頗為明顯。在這方面，年輕一代學者與相當一批老年學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為通常年輕一代學者較容易站在客觀的角度從遠距離來觀察國民黨和共產黨當年的恩恩怨怨，即使他們未必能夠完全免除某些善惡觀念的傳統影響，但一般說來，他們比較容易用平和的心態來討論國共兩黨關係，也比較容易與大陸學者從純學術的角度來交流相互之間的看法，即使這些看法有時可能相差甚遠。顯然，對於不少老一代的研究者來說，最困難的就是如何把自己擺在當年兩黨的歷史恩怨之外，不去感情化地充當歷史正義的法官。姑妄言之，他們之所以容易在國共關係問題上作出相當情緒化的表現，某種程度上多半是受到思想上正統觀的影響，這種正統觀不可避免地使一些研究者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老大心態。受這種心態影響，自然也就習慣於視自己為正統之代表，把國共關係感情化地看作是「官」與「匪」的關係；把中共推翻國民黨政權的過程，簡單地看成中共以小欺大，以下犯上，玩弄陰謀詭計，欺騙和推翻合法政府的「篡權」過程。因此，他們中不少人對大陸的有關研究成果和史料自然也就很難以平和的心態與客觀的態度來看待，有的研究者甚至連大陸公布的所有關係到中共歷史的史料，都極其情緒化地一概否定，聲稱：「中共的材料大都是假的！」可以想像，得

出這種結論的學者絕非毫無歷史研究的訓練與常識，他在其他問題的研究上必定知道如何來辨別史料的真偽。他之所以一遇到有關中共問題的研究就迷失了自我，看來多半是太過受到這種「官」「匪」情結的影響了。

第四，兩點觀感

(一) 國共關係的研究在台灣目前還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所以敏感，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歷史恩怨和現實政治的影響直接或間接地在起作用。這種作用，在短時期還頗難克服。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台灣年輕一代學者已經比較能夠超脫於國共恩怨以外，一些資深的學術前輩，如蔣永敬教授等，也明顯地在努力走超越歷史的純學術的研究之路，整個趨勢應當說還是積極的。

(二) 圍繞著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的研究，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中共研究在台灣學者中還是一個薄弱環節。欠缺對中共歷史的深入了解，又不易超越歷史地把自己擺在局外的地位，感情上存在死結，並受到正統觀念的影響，直接妨礙了相當多數台灣學者以平和和客觀的心理來發掘和利用大陸方面的各種史料。不掌握甚至不屑於利用大陸史料與研究成果的結果，使不少台灣學者很難從具體史實出發，平心靜氣地研討國共關係，動輒即被引入善惡問題或現實政治問題的死胡同裡。這不僅影響到兩岸學者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並且也給有志於此項研究的台灣學者相當的壓力，使之不能切實獲得一個自由研究的空間。因此，從整個情況來看，兩岸學者之間要想在更多的問題上取得共識，還有不少的障礙，要走一段相當長的路程。

三、大陸學者研究上的某些弱勢

比較而言，台灣老一代學者中許多人所以就容易就一些國共關係問題進行爭論，還有兩個原因要考慮。一個原因是長期以來自由爭論的學術風氣所使然，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當中出身於老兵的較多，長期從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宣傳教育者也佔一定比例。而大陸近現代史研究的主流研究人員，一來很少經歷自由爭論的場合，二來也鮮有那樣的背景經歷。因此，大陸多數研究者不僅相對比較超然，而且即使是在大陸舉行的有兩岸學者參加的學術會議上，雖有各說各話的情況，一般觀點上也很少去進行尖銳爭論。

但是，學術上缺少針鋒相對的爭論和交鋒，對大陸研究者互相促進，

切磋磨礪，強化學術規範，推進學術進步，也是一種重要的不足。實際上，大陸學者對於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問題的研究雖然心結較少，心得多多，具體史實研究較台灣學者也稍深入，然而在不少方面也同樣存在問題。比較台灣學者的研究，大陸學者研究上的弱勢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研究上起步晚，規範差

由於目前比較成熟的學術規範大都是參照歐美的研究方式建立起來的，因此，與台灣學者比較起來，大陸學者從事現代史研究的時間要晚得多。這是因為，自五〇年代起，就有大批台灣學生留學歐美，到七〇年代初，不僅台灣學者中熟悉歐美史學研究規範的留學生日益增多，而且與歐美學界之間展開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也日漸形成風氣，推動台灣史學研究逐步走向國際化。而大陸系統開展包括抗戰史研究在內的現代史研究的時間，實際上已經到了文革以後的八〇年代。也就是說，大陸史學界開始注意在學術上同國際規範接軌，相比台灣學者晚了至少十幾年。不僅如此，大陸史學界注重與國際史學界接軌的範圍和交流較多的領域，一般也僅限於歐美學者關心的少數外交問題，而涉及到國共關係以及抗戰期間中共作用等中國內政問題的研究，通常交流有限。結果形成大陸學者中交流較多者熟悉國際研究規範，交流較少，外文程度有限者，研究上各行其是的局面。再加上有關抗戰期間國共問題的研究領域長期以來受政治影響不甚開放，如今仍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不成文的禁忌，更影響大陸有關抗戰問題研究的論文論著，存在頗多問題。

比如，不少著作對發掘和利用第一手史料不夠重視。以抗戰期間的平型關戰鬥為例，長期以來幾乎沒有研究，所用史料多來自當年的宣傳材料。改革開放以後，雖有個別研究，將殲敵四千人的數字逐漸由四千降至三千，又降至一千多，但鮮有依據第一手資料進行研究者。多數文章著作遇到平型關戰鬥，通常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因此，直至9月台港會議，大陸學者的文章中又出現了殲敵三千的說法，與台灣學者所稱此次作戰只殲敵兩百餘人的說法，相距之遠可想而知。在1995年由大陸最權威的軍事科學院戰史部編寫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一書中卷，在詳細介紹此次作戰經過的行文中，堅持了殲敵一千餘人的說法，但仍舊沒有依據任何一件檔案文獻資料。是不是關於這次戰役沒有第一手的資料可尋呢？其實不盡然。有關的資料相當之多，筆者稍做努力，就找到了已經公開的參戰八路軍部隊的戰鬥詳報，參戰指揮官與八路軍總部之間的來往電報，朱德總

指揮事後發表的殲敵數字，國民政府收到的各種戰報，和當時被伏日軍及救援日軍的戰鬥詳報等許多第一手文獻資料。幾方資料考證核對，基本證實殲敵人數應在四五百左右。平型關是中共軍隊在抗戰中對日本打的第一仗，也是配合國民黨軍隊打的唯一一仗，具有很高的宣傳價值。對於這樣一次意義重大的作戰，大陸有關研究單位和研究者都沒有盡心盡力去查找第一手資料加以考證研究，又遑論其他？

又比如，不少研究者對資料的使用缺少嚴格的考證與鑒別。同台灣的研究者一樣，大陸不少研究者對資料的利用也不十分嚴謹。只不過，台灣學者通常多是在有關中共或國共關係問題上犯這種錯誤，而大陸的不少學者往往在更多的方面犯這樣的錯誤。在9月會議上，一位頗受人尊敬的大陸學者對回憶資料的說法引起了不少同行的異議就是一例。當時他在回答關於對他引述的某人回憶的可靠性的質疑時，答覆說：「這是他本人說的，要是他回憶錯了，這不怪我。」這位學者的本意也許並非如此，但其說法卻有一定的典型性。這是因為，不加鑒別地利用二手的、口述的或其他間接資料的情況，在大陸卻並不少見。9月會議上一位大陸研究者關於桂系治皖的論文之所以引起台灣學者的批評，也是存在著相同的問題。這位研究者對抗戰期間桂系治皖做了相當高的評價，而他所依據的材料絕大部分卻只是治皖的桂系將領當時發表的公開數字與報告。事實上，在有訓練的史學研究者的眼裡，任何一級政府或當權者公開發表的數字、報告等等，都不能簡單地拿來做自己的論據，必須配合大量其他史料，逐一加以核實，排除其水分。同樣的道理，像抗戰期間中共軍隊抗擊日軍比例的說法，也是經常出現在大陸有關抗戰史著作中的一個不十分嚴謹的說法。一般所說中共軍隊1944年抗擊日軍64%的說法，本來只是抗戰結束前夕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受命宣傳中共抗戰功績的一種宣傳數字，只要稍加考證，就可以發現它不是經過嚴密的規範的統計，有著嚴格科學依據的數字。

又比如，相當多的研究者不大懂得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同不少研究者在資料的使用上缺少嚴格的考證與鑒別有關的，是相當多的研究者在利用他人著作中揭示的資料時也很少有所猶豫，他們往往並不想進一步去核對這些被他人引用的資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而這個問題同時也反映出不少大陸研究者在歷史學研究上的素養。記得一位同行曾經要求某位作者提供關於某本書中某段資料的具體出處，說是他好直接引注其出處。作者反問他說：你為什麼不寫明轉引自某書？他回答說：那怎麼行？我沒看到的

資料都要寫轉引，那我的書上豈不到處都要寫「轉引」兩個字了？把使用「轉引」兩個字看成不光彩的事，這是妨礙許多大陸研究者對自己利用的史料採取負責態度的一個關鍵性障礙。其實，只要多讀幾篇歐美學者的歷史學論文和著作就可以了解，在歐美學者看來，轉引並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且，凡是重要資料或說法，依照當今通行的學術規範，是必須要註明資料來源和出處的。在他們的論文論著當中，相當一部分資料來源和出處都是轉引自他人著作的，這絲毫不會減損他們研究的水平。事實上，像李澤厚先生寫《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那樣，有時滿篇轉引他人引用的資料的情況畢竟是極少的。但註明轉引至少有兩個功用，其一，尊重他人的精神產品與勞動，這同文人不應剽竊他人成果頗有些近似的意義；其二，對自己引述的資料採取負責任的態度，說明自己並沒有看到原文，但是相信原引述是準確的。

再比如，大陸許多論文著作的引文注釋仍不規範。一篇好的歷史學論文，最基本的條件就在於「持之有據，言之成理」。沒有「持之有據」，「言之成理」也就談不上。因此，要做到「論從史出」，「持之有據」是最要緊的。而要讓讀者了解你確實是「持之有據」，那就必須對文中一切可以對自己的論點或對史實的敘述發生影響的資料和說法，加以必要的注釋，說明其可靠來源與出處。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大陸的許多論文論著還不能嚴格地做到這一點。特別是涉及到國共關係和中共問題的論文論著，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差。結果是，在大陸出版的不少論文論著裡面，無論是那些頗為引人注目的重要資料，還是那些十分令人懷疑的重要引文，經常都找不到它們的出處，讓人根本無法判斷它們的真偽。不僅如此，除了極少數專業雜誌以外，絕大多數學術刊物和出版學術著作的出版社，都還沒有一套統一的引文注釋標準。以致大陸學術出版物上引文注釋的規格五花八門，不少時候同一篇論文或同一本書上，就有完全不同的注釋方法。這種情況實際上反映出大陸相當多的歷史學工作者還缺少系統的歷史學研究方法的訓練。

第二，研究上存在片面性

由於差不多具有過相同的政治環境，批評台灣學者的某些話，其實也可以用來批評大陸學者。像片面性的問題，兩岸學者在某些方面的表現，其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而已。不過，由於大陸政治運動較多，波折也大，影響到許多大陸學者在研究上還突出地表現出易於反覆的特點。像

文革期間把朱德當年帶部隊上井崗山與毛澤東會師，改寫成林彪帶部隊上井崗山與毛會師的情況，固然不致再現，但近似的反覆未必沒有。像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正面戰場的地位及作用問題，忽左忽右，頗讓人有些莫衷一是。

大陸學者研究中的片面性主要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一) 一些著作存在著「看人下菜」的傾向。首先，在一些抗戰史的著作中，還存在著用《毛澤東選集》中的話來替代自己的分析和結論的情況。這種情況的存在，和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頗不合拍。因為，這種引用，通常並不是為了研究當時毛的思想和政策（因為要研究當時毛的思想和政策是不能從 1949 年以後修訂過的《毛澤東選集》上去找論據的，需要去找當年的，沒有修訂過的原文），只是為了替自己的說法找到更權威的依據。由此筆者不禁想起一件事。當初筆者剛開始從事歷史研究，一位資深的「權威」當著筆者的面批評某位教授講授抗戰史的講稿。他所以批評這位教授，是因為這位教授沒有用毛的話來支持自己的說法。據他說，他最看不慣這種自以為是的人，「你還能超過毛澤東？」在他看來，研究抗戰，首要的功夫就是背《毛澤東選集》，最好做到某一頁某一段某一行上的話，都能記得滾瓜爛熟。因為，有關抗戰問題，都可以從《毛選》中找到答案。不難想像，這種凡論皆找《毛選》的作法，也是出自同一衣鉢。這多半是不稱「毛主席」的毛主席崇拜。其實，毛就沒有錯？不要說後來的文革，就是當年毛最「正確」的時期，不也有犯錯誤的時候嗎？像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變後公開宣布蔣在西安時的諾言，1937 年 1 月不就曾自承作法不妥，政治上幼稚嗎？只不過，後來事過境遷，那篇文章又收入了《毛選》而已。當然，這樣的情況大多只是出現在那些集體編著的抗戰史著作中。但對共產黨方面的資料、數據信而不疑，對國民黨方面和日本方面的戰報及有關檔案，因為與自己的說法不同，疑而不信的情況，卻較為普遍。像抗擊日軍百分之六十的比例的問題，之所以很少被人提出質疑和進行周密考證，還不是因為存在著這樣一種心態？

(二) 看不到或不願看到歷史本身的複雜與變化。由於在許多人心目中，仍舊或多或少地把 1949 年前的毛視同於不犯錯誤的神，因此，仍有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抗戰時期的中共政策時，相信毛始終是運籌帷幄的諸葛孔明。即使沒有人這樣說，事實上也有不少人這樣看。除了毛的持久戰略和三階段劃分以外，最讓一些人稱道的，就是說毛從洛川會議開始就看出

應當如何向國民黨爭領導權。記得筆者當年剛出道，偶然翻得毛 1938 年 10 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論新階段》的報告時，對其中大量稱讚國民黨和擁護蔣委員長的詞句大為不解。於是曾問某位長者，長者曰：這是政治上的需要，是策略。筆者不禁詫異地問：這不是等於陰謀嗎？長者坦然答稱：「對階級敵人就是要搞陰謀。」然而，十幾年過去，細細檢閱當年歷史，發覺事實並非如此。八年抗戰，敵我力量懸殊，世界政治局勢雲詭波譎，毛對蔣的看法與策略，很大程度上是隨著他對整個複雜形勢的認識變化而變化的，並非自洛川會議就一如既往，一成不變。六中全會上的種種表示，也並非盡是虛言與陰謀。要知道，直到 1940 年，毛才提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問題呢！在此之前，毛的設想，多半還只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或由資產階級（國民黨）領導，有無產階級（共產黨）參加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他那時對蔣當然不會是後來那種態度。然而，很多研究者沒有看到，甚至不願看到這一點。他們往往更願意把毛神化起來。結果不僅違反了歷史的真實，而且在今天把自己擺在一個非常被動的地位。因為，台灣有不少研究者恰恰也是不願意看到一個比較接近於常人的毛，他們更願意從大陸那些大談毛如何設計奪權道路的著作中找到更多的炮彈，以支持他們所謂毛不想抗日，一心設計搞垮國民黨的說法。同時也可以通過這一點來證明共產黨是如何「卑鄙」和不可理喻。

（三）存在著思維模式過於概念化的傾向。思維模式概念化的問題，是台灣學者與大陸學者都存在的問題，儘管側重不同，觀念各異。就大陸學者而言，在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研究上，一個比較突出流於概念化的表現，就是濫用所謂「投降派」、「親日派」、「妥協派」、「頑固派」、「反共派」之類的政治詞彙。這些政治詞彙，嚴格說來，其實都是當年中共和政治鬥爭的術語，並不具有科學的範疇和內涵。但是，如今在不少研究抗戰的大陸著作中，仍不難找到這樣的詞彙。歷史研究，要講求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即使肯定當時存在著這個「派」、那個「分子」，也要給出具體的定義，說明其界限與範疇。不宜統而籠之、不加限定地沿用歷史上黨派鬥爭中攻擊性的詞彙。

除了概念的使用以外，思維邏輯的僵化也是概念化的表現。如對蔣介石抗戰前夕對日政策問題上的種種討論，通常已經演化為一種思維定式，即愛國即不能妥協，妥協即是賣國。其實，妥協＝投降＝賣國，這個邏輯未必能夠成立。僅就一般政府間外交關係的運作來看，妥協通常是必須的

一種手段。即使今天的大陸，外交上的妥協又何其多？其實，外交本身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泛泛地否定任何妥協，是不正確的。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蔣對日妥協的問題，重要的是要分析：蔣當時為什麼妥協，其妥協主要又是爲了什麼。如果這種妥協主要是一種策略手段，是爲了迅速實現國內和平，積聚力量，推進國防，以便最終對日強硬，直至實行抗日，那麼，這種妥協自然不能說完全錯誤，問題在於事實究竟如何，而不取決妥協形式的本身。熟悉近代歷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道光與咸豐兩位皇帝。當時外國列強一再挑釁，並武裝進犯中國。這兩位皇帝曾經毫不含糊地反對妥協，積極主戰，結果是一敗塗地，落得個喪權辱國、割土賠銀的慘痛下場。即使當時是毛澤東，是不是在那樣的情況下就一定不會不顧一切地採取對抗立場，甚至立即發動對日作戰呢？恐怕也頗值得懷疑。蘇維埃政府當時確有宣戰舉動，也強烈譴責國民政府對日妥協，但是，當1936年春毛指揮紅軍攻入山西，以「打通抗日路線」爲旗號實行東征戰役時，毛也並不主張紅軍真的開到河北去與日本人拼命。當時有人曾經因爲不了解毛的這種想法，對紅軍開到河北去抗日表示疑問，毛對此回答得很清楚，即他「沒有那樣傻，就去尋日本。」同樣，當「七七」事變發生，全國抗戰開始之後，毛照理應當迅速派出全部主力上前線對日作戰，但毛當時並不同意迅速出動全部主力上前線，而是強調要看到抗日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明確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的戰法，要求部隊把保存和發展自己放在首位，在真正做到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力量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地進行對日作戰。由此可知，歷史上的許多問題，不是單憑黑是黑、白是白的道德標準，或「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之類的政治邏輯，就能夠判明的。過於概念化的研究，很難取得科學的結果。

第三，兩點觀感

（一）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水平一般仍嫌偏低。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的研究，是與中共黨史研究相聯繫的。沒有對中共黨史的較爲深入的研究，國共關係的研究也沒有辦法真正深入下去。但是，以上談到的許多問題，相當部分恰恰都是中共黨史研究論文論著中存在的問題。實在地說，中共黨史著作幾十年來給人印象不佳，除了隨著政治氣候翻來翻去以外，很重要的也是因爲其缺少學術性，其中許多著作只是爲了宣傳和教育的目的而編寫的，並不特別注重史實的準確性。當然，影響到中共黨史研究深入的原因還有很多，未必都是學者本身的基礎訓練和學術素養問題，比如像檔

案資料不夠開放、中共黨史長期被視同理論而非歷史，對中共黨史走上科學研究的軌道，都有極大的妨礙。

(二)同中共黨史研究相比，國民黨史的研究空氣通常要比較寬鬆許多，研究的學術性和科學性一般也好得多。因此，不少從中共黨史研究和教學中解脫出來的教師和研究者都有跳出「苦海」的說法。由此不難看出，兩相比較，差距確實很大。但是，研究國共關係，必須是兩者的有機結合。從目前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研究的狀況看，國民黨史研究者不論其自由度有多大，其實並不佔據有利的位置。事實上，大陸目前較好的國共關係史的研究專著，大都是從事中共黨史研究較多的學者的成果，而非研究國民黨史的學者的成果。這是因為，一般國民黨史研究的學者往往不具有系統利用中共黨史資料的條件，而那些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確能比較深入的學者，則完全可以借助台灣大量公開的國民黨史檔案資料來彌補自己國民黨史研究上的不足。當然，對於他們來說，一個很大的困擾是必須受制於台灣公開檔案的速度。但無論如何，從兩岸近幾年公開檔案的趨勢看，等待台灣大批公開 1949 年以前檔案資料，還是比等待大陸要便捷許多。

四、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研究的幾個難點問題

9 月台港兩會的交流中，兩岸學者圍繞著抗戰問題的討論，存在著三個最容易形成爭論，也是最容易表現出感情上隔閡的問題。一個是關於中共在八年抗戰中的作用問題；一個是關於八年抗戰與大陸政權易手的關係問題；另一個則是抗戰期間的國共鬥爭對戰後中國前途的影響問題。這三方面問題，不僅是兩岸學者關於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問題研究上難以取得共識的三個死結，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礙著兩岸學者在更廣泛的範圍裡進行學術上的交流與合作。因此，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客觀公正的基礎上，通過學術研究，相互討論，設法解除這些死結，是兩岸學者都應當努力的。

(一) 關於中共在八年抗戰中的作用問題

講抗戰首先要講對日作戰。但是，從台灣學者的角度來看，同國民黨軍隊數十次動輒數萬、數十萬人，損失萬人以上，僅高級將領就戰死上百名的重大戰役相比，中共軍隊在八年抗戰中僅僅有過一次取得突出戰果的對日戰鬥行動（平型關戰鬥），和一次不成功的戰役行動（百團大戰），

犧牲的高級將領只有一位（左權），這頗難理解。而更難理解的是，根據大陸諸多中共黨史讀物所揭示的材料，毛甚至連百團大戰和平型關戰鬥這樣的作戰都不贊成進行，後來曾不止一次地加以批評，聲稱它們削弱了中共的力量，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尤其是毛 1963 年 7 月 10 日接見日本社會黨佐佐木更三等人時關於他「要感謝日本皇軍」的說法，更是成為台灣學者指責中共在抗戰中表現的重要根據。在從 8 月紐約舉行的抗戰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到 9 月台港兩會，幾乎每會必有台灣學者情緒激動地將這些問題提出來，或譴責中共，或向大陸學者質疑。

與台灣及海外諸多抗戰論著的說法不同，大陸學者通常習慣於強調八年抗戰中中共在政治上的指導作用，和敵後游擊戰爭對日軍的巨大牽制作用，斷言國民黨自相持階段開始以後，蓄意對付共產黨，保存實力，應付戰後，後期抗日態度消極，主要靠中共的堅持才將戰爭進行到底。當然，在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研究這些年取得眾多成果，一般讀者都已經熟知國民黨軍隊重大戰役和犧牲將領甚多的情況下，多數大陸研究者也並非不承認中共軍隊在抗戰中大規模作戰遠不如國民黨軍隊這一事實。只不過，在人數、裝備、後勤供給等各方面與國民黨軍隊相差甚遠的情況下，是否必須靠大規模戰役作戰來與日軍對抗，才算是真正抗日，這在大陸學者方面多半是有不同理解的。多數大陸學者更重視中共在敵後農村組織發動民眾抗日的的作用，相信以中國與日本的差距，唯一能夠使中國方面長期堅持，最後趕走日本的力量，只能是億萬農民；唯一能夠使中共堅持敵後與強大日軍周旋的，也只能是以農民為中心的游擊戰爭。是毛發現了這個道理，堅持了這條道路，因而使中共得以在敵後的農村中生長壯大。最後，並且依靠農民戰勝了國民黨。

各說各話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格外突出。其實，在這裡有不少情況是存在誤解的。像 9 月會議中有位台灣學者所提交的論文那樣，將中共戰史著作中所提到的那些比較典型的作戰統計起來，然後同他從台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得到的國民黨敵後部隊歷次作戰戰報統計數字加以對比，得出中共八年抗戰對日作戰一百五十四次，國民黨僅敵後部隊游擊作戰就達七千七百餘次，似乎不甚公平。很明顯，在大陸出版的中共戰史中提到的作戰，僅僅是大陸軍事研究人員認為值得一提，規模稍大些，或具有比較典型意義的游擊作戰，並非中共軍隊全部戰報統計。拿這樣的數字同國民黨敵後部隊所有作戰的戰報相比，自然不成比例。但有一點是肯定

的，即如同目前一些對國民黨敵後游擊隊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樣，在敵後堅持是很難不同日本軍隊進行戰鬥的。在美國國防部檔案中有一件 1944 年美國空軍中尉在河北上空被擊落後，經過在中共根據地的一些小游擊隊護送，輾轉一月到達某軍分區司令部的長篇情況報告，其中很詳細地談到了他親眼目睹這些游擊隊必須不斷地與日軍進行小規模戰鬥的情況。很明顯，敵後的中共游擊隊幾乎是無日不戰的。如果說，國民黨在敵後的部隊報告游擊作戰七千餘次的話，那麼，不難想像敵後根據地的規模和軍隊及游擊隊數量都遠遠超過國民黨的中共，對日軍實行游擊作戰和自衛戰的次數一定比國民黨多得多。

當然，有關中共抗戰的研究目前還不十分深入。這與抗戰期間的中共軍事歷史檔案多不開放有關。這種情況不僅注定了大陸多數有關抗戰史的著作，只好翻來覆去照抄軍事研究部門撰寫的戰史中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那些盡人皆知的史實資料，而且影響到諸多海外學者無法系統了解抗戰期間中共對日軍事戰略方針的種種變化與背景，反過來也影響到大陸學者在與台灣學者交流時，有時不能不感到被動。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由於兩岸多年很少強調抗戰期間兩黨如何在軍事上合作抗日，只是大談兩黨如何磨擦與衝突，包括筆者在內，此次在台北中央日報社開座談會時，聽到台灣一位老兵聲稱他當年在敵後打游擊多年，經常與八路軍並肩作戰，從未發生過互相磨擦衝突的情況，竟頗感吃驚。這種現象說明，有必要推動大陸檔案進一步開放，以便使大陸學者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加強關於中共對日作戰問題的系統研究。

（二）關於八年抗戰造成政權易手的原因

無論大陸的還是台灣的學者，大都把八年抗戰看成是中國命運的一大轉折期。所謂轉折，毫無疑問都同國共兩黨此消彼長，敵後政權迅速易手這一事實密切相關。但問題是，大陸政權因何易手？在這個問題上，相當一部分台灣學者與多數大陸學者的看法可謂大相逕庭。台灣學者強調政權易手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全力對付國民黨的策略陰謀，和國民黨在長期抗戰中受到嚴重損害；而大陸學者則強調問題的關鍵在於國民黨獨裁專制、政治腐敗和農村政策之失誤，是人心向背的轉移。

如同否認中共的勝利同毛的策略思想密切相關，不合事實一樣，籠統地把國民黨的失敗歸結為中共陰謀破壞的結果，同樣不那麼有力。從那些當年從台灣出去的眾多華裔美國教授的看法中，不難看出部分台灣學者的

看法確實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唐德剛教授有段很中肯的評論，應當是台灣學者所熟知的。他就一些台灣學者堅持西安事變使剿共中止，抗戰開始，中共藉抗戰毀滅了國民黨大陸政權的觀點，批評說：「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是表現得刻骨銘心，為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歷史家，都不會否認。……蔣公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復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了個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面，這又是誰之過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9月香港會議上吳天威教授關於國民黨失敗原因的發言，以及汪榮祖教授新近出版的帶有較多批評蔣介石內容的專著，都足以反映相當一部分留美華裔教授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目前台灣學者中究竟有多少人還像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幾位資深教授那樣，堅持認為國民黨後來的失敗，關鍵就在於當年未能把剿共戰爭進行到底，頗令人懷疑。尤其是台灣年輕一代的學者，他們至少相信，國民黨當年的失敗，有其自身的致命弱點。陳永發教授9月9日在中央日報社座談會上關於國共兩黨抗戰期間農村政策比較的發言，顯然正是這種新思維的一種反映。只是，儘管兩岸學界就近深入研討國共歷史問題的情況都不能令人滿意，但相對於大陸學術界不斷有對中共歷史問題進行研討的文章著作出版的情況，台灣學界對國民黨歷史問題的檢討似乎還遠未形成一種風氣。以至於大陸學者對國民黨當年政策提出的幾乎任何一種批評，差不多都要引起部分台灣學者的強烈反應。在學術討論中，很難說這種情況是正常的。

當然，從9月會議中爭論的某些問題中，也不難發現大陸學者前此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更多的還只是集中在某些概念化的簡單結論上，缺少具體深入的事實方面的探討。比如，關於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批評問題，是否應當考慮到中國前此政治環境的局限和戰時環境的特點呢？影響毛在抗戰初期肯定蔣和國民黨在政治上的進步，到後期強烈否定國民黨政權的因素，究竟有哪些？中共力量的消長究竟起什麼樣的作用？又比如，關

於國民黨政權腐敗的問題，至今既無深入的個案研究，也無紮實深入的綜合研究成果問世，僅憑個別的回憶或幾封電報又如何能夠令台灣學者口服心服？再比如，關於國共兩黨農村政策得失的研究，在大陸雖有較多的根據地建設研究，但對國民黨農村政策的個案研究與綜合研究尚無重要成果。特別是，有必要對國民黨在大陸的政策與去台後的政策加以全面細緻的比較研究，具體說明，為什麼國民黨在大陸的農村搞不好，去台灣反能搞成功？

（三）關於國共鬥爭對戰後中國前途的影響問題

國共鬥爭究竟對中國抗戰和中國前途有利與否，這在今天大概是兩岸學者最難達成共識的一個問題了。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事實上已經大大超出歷史研究的範疇，而帶有相當多的意識形態的和感情的色彩了。在9月台港會議，包括此前（8月中旬）在紐約召開的同一题目的華人學者討論會期間的不少爭論，就是因此而起。由於四十年來兩岸不同的經濟發展速度所造成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不可避免地促使本來就帶有強烈的老大心態的部分台灣學者，更具優越感和不平衡感。再加上1949年以來，大陸方面政治運動不斷，並且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浩劫」，更使得部分台灣學者的這種心態根深柢固。

但對多數大陸學者而言，他們對唐德剛先生所言，國民黨「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歷史也有深切的了解，因而不能想像國民黨在大陸繼續統治會出現怎樣一種局面。尤其是，大陸何其大，台灣何其小，若以台灣經驗簡單比擬於大陸，又何嘗不類似於盲人摸象？何況台灣之發達，政策適當固然重要，蔣氏父子帶去台灣的大陸存金似亦不可忽視。在政策對頭條件下，以大陸之積蓄去啟動小小台灣島之經濟改造，造福一千餘萬人民，有如舉手之勞；但縱使政策對頭，若將其投入大陸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土地，分諸當時之四萬萬五千萬之人民，是不是仍會落得個精衛填海，徒得喝采的結果呢？

無須說，圍繞著這個問題的爭論，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下，將永遠不可能取得積極的結果，反而只會徒然損傷兩岸學者之間的感情。依筆者之觀念，當代歷史學家是否一定需要像政治家那樣，把歷史與現實混為一談，評古論今，頗有可商榷之處。在政治歧異的情況下，如果人人都站在不同觀念、不同黨派的立場上，根據不同的現實政治需要去描畫歷史，批判歷史，那麼，兩岸學人之間，除非你吃了我，或我吞了你，否則，就只好永

遠各說各話。如果我們兩岸的歷史學家能夠以務實的心態，本著對國家民族負責的精神，擯棄不同的政治見解，發揮歷史學正本清源、汰偽存真的科學功用，不加偏見、不帶任何主觀情感地，運用各方史料，將這段歷史客觀準確地逐一考證明白，如實記錄清楚，那麼，不僅兩岸學者間容易求同存異，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平心靜氣地在學術範圍內就雙方關心的歷史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與交流，而且即使我等當代學人因距離太近，不易對剛剛過去的一切作出是非曲直的價值判斷，也總可以給後人留下許多較為真實的歷史紀錄，為後人了解過去的歷史和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提供種種基本的史實線索與方便。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討會論文集

(1)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精裝 500 元 平裝 450 元
(2)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精裝 700 元 平裝 600 元
(3)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精裝 1400 元 平裝 1200 元
(4)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精裝 1300 元 平裝 1100 元
(5)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精裝 1400 元 平裝 1200 元
(6)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精裝 1400 元 平裝 1200 元
(7)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精裝 1500 元 平裝 1300 元
(8)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二冊)	精裝 1500 元 平裝 1300 元
(9)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精裝 1100 元 平裝 1000 元
(10) 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精裝 1200 元 平裝 1100 元
(11) 近代中國科技史論文集	精裝 450 元 平裝 400 元
(12)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二冊)	精裝 1600 元 平裝 1400 元
(13)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	精裝 1400 元 平裝 1300 元
(14) 「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	精裝 1200 元 平裝 1100 元

函購九折，郵撥帳號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關於中東鐵路研究評述

譚桂戀*

追溯中國早期鐵路的修築與經營，莫不與西方列強有密切的關係。十九世紀末葉，甲午戰爭結束後，是列強爭取在華鐵路利權最為積極的時期。而其投資鐵路修築利權方式有二種，即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直接投資分外資築路，以及清廷或華商與外國公司、銀行合資築路；間接投資分借款代築和借款自辦。¹其實無論是直接或間接投資，中國政府均無主動權，完全聽憑列強的需索，其中損失權益最大者，莫過於外資築路。所謂外資築路，從字義上看，是由外資修築鐵路，實際上，鐵路的經營權亦在外國公司手中，而且在完工通車營運之後，鐵路沿線利權亦隨之喪失，在「鐵路附屬地」內構築成另一種形式的租界——「鐵路租界」。

十九世紀末，外資修築、經營的中國鐵路計有四條：中東鐵路、南滿鐵路、膠濟鐵路、滇越鐵路，四路中以俄國承修經營的中東鐵路路線最長，行經地區最廣，所涉及問題最為廣泛複雜。回顧中東鐵路早期發展史，可以代表沙皇時代的俄國在中國東北擴張的縮影，它為俄國在北滿建立了龐大的「鐵路租界」與殖民地。與此同時，列強在中國東北勢力的角逐由此展開，先有日俄之間的對立，日俄戰爭結束後，繼日俄兩國之後，復有美、英兩國的加入，演成所謂「滿洲問題」的出現。有謂「滿洲問題」是遠東各勢力衝突的本源，鐵路是此一衝突的核心，中東鐵路則是衝突核心之根本。換言之，環繞於中東鐵路而產生的國際問題，是遠東和平安全之所繫。²這一特質在本世紀的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期間，尤為明顯，如 1929 年中俄兩國的武力衝突，以及 1933 年日俄的

* 政治作戰學校講師

1 楊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38。

2 Tao-Shing Chang, *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36), p.v.

緊張關係，³都是導因於中東鐵路。

有關中東鐵路的研究，自本世紀二〇年代末期起開始出現，研究重點在政治外交方面，如 1928 年滿鐵哈爾濱事務所編著《東支鐵道お中心とする露支勢力の消長》（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介紹中東鐵路由 1896 年「借地修路」之源起，以迄 1928 年 3 月營業貨幣由盧布改爲大洋爲止之中俄交涉史。全書計有上下兩卷，以俄國十月革命爲分水嶺，分前、後編，前編有六章，一至四章概述中東鐵路路權取得經過，及義和團運動期間，俄軍進佔中國東北全境之後的中俄交涉。值得稱述者在五、六兩章，分別從護路軍的設置、松花江的航行權、鐵路用地的徵購、煤礦的開採、林木的採伐、電信和郵政業務的興辦、法院和警察機關的設立，以及鐵路附屬地行政權的發展等項，說明中東鐵路取得鐵路興修經營權以外的利權之原委。後編有二十章，重點有二，一爲敘述十月革命後，中國藉機收回中東鐵路各項利權之經過；二爲中俄共管中東鐵路之交涉，以及此後雙方因管理權責劃分所衍生的中俄糾紛。後者對於：（一）俄共政府利用中東鐵路赤化中國；（二）俄籍管理局長掌控路局人事和財政，罔顧中方權益；（三）鐵路當局支持郭松齡叛變之嫌疑等問題，所引發中（北京）俄、奉俄間的糾紛交涉，有極爲詳細的敘述，由此可以明瞭 1929 年 7 月中東路事件爆發的根本原因。書中並附有中俄雙方的文件，尤其是不易蒐集之俄方文書和路局之俄文文件，足供參考引用。

國人之重視中東鐵路問題，係在 1929 年 7 月中東路事件發生後，由數月至一年間，除報章雜誌的評論外，出版的專書爲數不少，如雷殷《中東路問題》（哈爾濱，出版者不詳，民國 18 年 8 月）、高良佐《中東鐵路與遠東問題》（上海：太平洋書店，民國 18 年 8 月）、中國國民黨宣傳部《中俄關於中東鐵路之交涉史略》（編者印行，民國 18 年 9

3 九一八事變後，中東鐵路被迫以半價的運費運送日軍，致使其貨運量銳減。1932 年中東鐵路營運情況益差，營業收入甚至無法支付薪水。1933 年 8 月，滿鐵的敦圖鐵路（即吉會鐵路）將完工通車，屆時必會對其營運造成更惡劣的影響。有鑒於此，蘇俄政府自 1934 年 4 月起，即陸續將該路各種車輛約計三千四百多輛撤至西伯利亞，此舉引起日方不滿，乃將滿洲里封鎖，結果外貝加爾、烏蘇里兩路的聯絡中斷。5 月 11 日，蘇俄對外宣佈願將中東鐵路售予日本。5 月 23 日，日本內閣會議決議令滿洲國出資購買中東鐵路。日俄雙方歷經一年半的交涉，於 1935 年 3 月在東京簽約，以一億四千萬日圓成交。

月)、董顯光《東路中俄決裂之真相》(上海:真善美書店,民國18年10月)、世界週報社《中東路事件》(上海:華通書局,民國18年11月)、傅角今《中東鐵路問題之研究》(上海:世界書局,民國18年11月)、董顯光(Hollington H. Tong)《中東路事件研究》(*Facts About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Situation*,哈爾濱:東北文化社,1929年9月。《東路中俄決裂之真相》一書係摘錄自此書)、曹氏(Lien-en Tsao)《中東鐵路研究》(*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 An Analytical Study*,上海:國民政府工商部工商調查局,1930年)。上述作品除《中東路問題》尚就中東鐵路的營運狀況作一介紹外,其餘各書均著重在俄國如何利用中東鐵路侵奪中國利權之經過,以及中東路事件之始末和影響。同年9月,另有上海《遠東評論》(*Far Eastern Review*)編輯索科爾斯基《中東鐵路史》(G. E. Sokolsky,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出版,胡適並為之作序。此書亦是在中東路事件爆發後,分十章陸續於《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發表,概述中東鐵路之交涉史。全書論點特別之處,在作者對1924年〈中俄北京協定〉和〈奉俄協定〉中有關中東鐵路懸案問題解決之批評,他認為中俄共管的體制根本無法付諸實施,中東鐵路的經營體制既是採行俄國制度,中方縱使擁有一理事長的權銜,握有實權的管理局長卻是俄籍人士,於路務的掌控上,華籍理事長可說是毫無置喙餘地,這是伏下日後雙方糾紛不斷的根本原因。⁴

進入三〇年代中俄適因中東路事件結束,正進行贖回該路交涉之際,卻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俄方將談判對象轉向日本。為表示國人對中東鐵路的持續關注,1933年商務出版社將1920年至1930年刊載於《東方雜誌》之周鯁生〈中俄關係及承認蘇聯問題〉,及蔣星德〈中東鐵路的時代背景與政治反映〉、〈中俄會議的前夜〉等三篇文章,集結成書出版,名為《中俄關係與中東鐵路》,全書內容為泛論性質,參考價值不高。三年後,該出版社復出版一英文著作,是當代國人對中東鐵路研究最具學術價值者,即張道行《中東鐵路與國際勢力衝突》

4 G. E. Sokolskii,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Ltd., 1929), pp.47-48.

(*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該書徵引中外檔案史料及相關論著，以列強在滿洲勢力的角逐為主軸，敘述中東鐵路由興築，以迄九一八事變後淪為日俄交涉籌碼，總計為期近四十年之變遷史。其中對：(一)美國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欲利用「滿洲鐵路國際化」計畫，擬將中東鐵路納入該計畫中，分享滿洲鐵路利權；(二)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染指中東鐵路之企圖；(三)中東路事件發生後，美國及各國對此一事件的態度等主題之敘述，均較上述各書詳細。至於九一八事變後，日俄兩國有關中東鐵路的談判，到 1935 年俄方以一億四千萬日圓將中東鐵路售予日方之始末，亦有完整的介紹，頗有參考價值。

上述有關中東鐵路之研究，多係時局影響之下的產物，近數十年學術界對中東鐵路之研究，始自唐盛鎬《沙皇與蘇維埃時代俄國的滿蒙政策（1911～1931）》（*Russia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9）一書，該書在俄國的滿洲政策部份以中東鐵路為主題（“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nstrumentality of Russia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敘述俄國利用中東鐵路擴張其在滿洲的勢力，直到 1931 年為止。其中對中東鐵路利權擴張方面，該書從鐵路合同「經理」（administration）一詞，分就中、英、法文的原義，說明其含意僅是鐵路的經營、管理，並無鐵路地帶行政管理權的意義。而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收回各項利權的努力，以及中俄共管時期中東鐵路理事會功能之不彰、路局人事、盈餘的分配存放、鐵路地帶的赤色活動等，書中的敘述分析又較張道行《中東鐵路與國際勢力衝突》完整深入。惟美中不足者，書中有關中東鐵路各項利權的敘述上，除政治、軍事利權較詳細外，對經濟及其他利權的介紹則失之簡略。其他如部份年代、人名、事件的發展，稍有誤謬。⁵

唐盛鎬著作問世歷經十年後，學術界有關中東鐵路的專著或文章始陸續出現，有研究中東鐵路興築交涉始末者，如李國雄《中東鐵路建造的前因後果及其在外交史上的地位》（民國 60 年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

5 唐盛鎬書中的誤謬之處，如將 1904 年周冕與中東鐵路管理局簽訂地畝合同，誤為 1902 年，復將當時的黑龍江將軍達桂，誤為程德全（*Russia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73）；又如 1917 年十月革命後，中東鐵路秩序大亂，霍爾瓦特於 1918 年 7 月在俄境四站成立「全俄臨時政府」，唐書則誤為 1917 年二月革命發生後的 3 月（op. cit., p.115）。

士論文)；有以沙俄侵華史觀點，研究沙皇時代中東鐵路利權擴張史者，如李濟棠《沙俄侵華的工具——中東鐵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哈爾濱鐵路分局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地組合編《中俄密約與中東鐵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葛鳳花〈沙俄與中東鐵路〉(《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4期)等均是。而就中東鐵路的興築源起，以迄1952年的歸還中國之交涉研究，有張道行《中東鐵路與中俄關係》(*Russia, China and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1973)，此書為打字油印稿，是作者於1971~1972年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訪問研究期間完成的文稿，為其繼1936年《中東鐵路與國際勢力衝突》一書之後的作品，全書計十五章，前十章敘述1896~1935年間中東鐵路之變動，除作小部份修正外，與舊作無太大不同，可觀之處在後五章，介紹雅爾達密約訂定後，蘇聯勢力重返中東鐵路，以及1949以後中蘇共談判無償交還中東鐵路之始末。有關1945~1952年中東鐵路的變動部份，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的鐵路專家凌鴻勛，在其編著的《七十年來東清、中東、中長鐵路變遷之經過》一書中亦有論及，惟其內容及徵引資料均未如前書詳細豐富。在中東鐵路出售問題研究方面，金梅〈「蘇滿關於中東路轉讓基本協定」所涉及的國際法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一文，從國際法的觀點，分析蘇滿協定之非，並批評蘇聯漠視中國權益，助長日本帝國主義氣焰。

在中東鐵路發展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期，為俄國十月革命，以迄中俄北京協定的訂定前止，故關於此一階段的研究最多，有研究北洋政府及列強對中東鐵路的政策，或中東鐵路利權之收回、中蘇之交涉、路界內的俄國革命活動及鐵路工人的罷工等。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中國適處於軍閥政治時期，北京政府對中東鐵路的政策，在格拉德克(F. R. Gladeck)《北京政府與中東鐵路問題(1917~1919)》(*The Peking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Question, 1917-1919, A Doctor Disser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2*)書中有詳細的介紹。作者將北京政府的決策歸納為三項，即1917年12月先派兵進入中東鐵路駐防，後任命虛懸已久的中東鐵路「督辦」(即「總辦」，依據1896年的中東鐵路合同規定，由中國政府派任)，以及1919年2月同意協約國監管中東鐵路。全書詳述並分析此三項決策形成的始末和原因。在北京政府同意協約國監管中東鐵路的決策過程中，作

者認為北京政府以段祺瑞為首的陸軍部、交通部官員，以及東北當局多表反對，惟並未設法探求協約國對此一作法的詳情。而外交部官員則從務實的觀點認為協約國監管中東鐵路對於中國較為有利（抵拒日本的趁機染指），然其卻無法左右內閣的決策。結果只見北京政府以「拖延」（delay）的策略因應，直到延宕半年之久後，得知日本積極派兵中東鐵路，以及該路的監管計畫草案已擬定等雙重壓力下，才不得不同意協約國的決議。⁶由此反映出在軍閥政治體制下，官僚系統運作的缺乏效率，延誤中國掌握中東鐵路的有利時機，反使各國在該路的勢力得以凌駕中國之上，此一情形於 1924 年以後再度重演，是年俄共政權穩定後，利用〈中俄北京協定〉、〈奉俄協定〉恢復其在中東鐵路的地位。⁷

十月革命後，以協約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為支持俄國臨時政府，利用在遠東的捷克軍出兵西伯利亞，在此次的軍事行動中，西伯利亞鐵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中東鐵路成為該路的一部份，受協約國監管。該監管委員會成員以美國鐵路專家為最重要，技術部部長史蒂芬斯（John F. Stevens）是其靈魂人物，德藍提（J. J. Delanty）《史蒂芬斯及其在中東鐵路控制權角逐中之地位(1917~1922)》*F. Stevens and His Role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1917-1922*, A Thesis Master of Arts in History, CA State College, Fullerton, 1970）一書，對史蒂芬斯在監管中東鐵路期間，利用鐵路技術和運輸管理制度的革新為手段，防制日本欲接收俄國在中東鐵路的勢力等問題，有完整的介紹。

中東鐵路各項利權的逐一收回，在中國利權收回運動史上極其重要，李毓澍〈中東路與外蒙古交涉〉（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編，編者印行，民國 72 年）一文對此有一詳細的敘述，並兼論中蘇在 1920 ~ 1924 年間有關中東鐵路問題的交涉，分析 1924 年〈中俄北京協定〉內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不利於中國的部份，在：（一）管理權完全由俄人操縱；（二）路局正副局長職權劃分，「協定中缺乏明細規定」；（三）協定中雖規定「鐵路各級人員，按照中俄兩國人民平均分配任用」，卻又定明「各項位置，應照謀事者之能力、技術及教育資

6 F. R. Gladeck, *The Peking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1917-1919* (A Doctor Disser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2), p. 467, pp. 470-480.

7 *Ibid.*, p.490.

格者補充之」。如此則「確實保障住維持東路現況俄人完全操縱的狀態」，1929年中俄在中東路管理的衝突，「其癥結即種因於此」。⁸李念萱〈哈亂與中東鐵路〉（《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民國69年）一文，主要根據《中俄關係史料》中東鐵路部份，詳細說明1917年十月革命後，俄國布爾什維克分子在哈爾濱所進行的革命運動，造成哈埠秩序的不安，以及中國派兵進駐哈埠，解除該黨分子所領導的俄軍第559及618號民兵大隊之武裝，並將之驅逐出境等經過。此文可彌補在此之前，有關中國收回路界內駐軍權和護路權始末的研究之不足。⁹薛銜天〈十月革命與中國收回中東鐵路路區主權的鬥爭〉（《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一文，概述1918～1921年間中國收回警察、司法等部份利權經過，並以1921年2月東省特別區市政管理局的成立，監督市自治會（即公議會）及市董事會一事，作為中國在路區主權收回之始。

在中俄交涉方面，李嘉谷〈十月革命後中蘇關於中東鐵路問題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敘述1920～1924年中俄有關中東路管理權的交涉。文末作者指出，整個交涉過程中，「蘇聯政府出爾反爾，力圖繼承沙俄的特權，無視中國的主權與利益，甚至將中東鐵路區域視為俄國領土的一部份」。¹⁰艾樸如（Bruce A. Elleman）〈蘇聯對中東鐵路的秘密外交（1924～1925）〉（“The Soviet Union's Secret Diplomacy Concerning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 2, 1994）一文，前半部份敘述1919～1924年間中俄有關中東鐵路的交涉，後半部份介紹〈中俄北京協定〉簽訂後，蘇聯針對中東鐵路問題所進行的秘密外交，此一部份是全文重點所在。所謂1924～1925年間中東鐵路秘密外交，即是指在〈中俄北京協定〉簽訂後，俄方刻意延宕日後雙方會議的召開時間，一方面私下和張作霖洽談，簽署〈奉俄協定〉，並於1924年底重新掌控中東鐵路的管理權；另

8 李毓澍，〈中東路與外蒙古交涉〉，見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編，編者印行，民國72年，頁1035。

9 或因史料的錯誤，及資料的不足，〈哈亂與中東鐵路〉文中將俄國第559號民兵大隊誤為519號（或55號）（頁358）；而中東鐵路公司會辦文哲里（爾）原名A. N. Wentzel，亦誤寫S.（應為E.）I. Kerbedz——克爾別茲（頁366）。克爾別茲是第一任會辦，但於1903年6月卸任。

10 李嘉谷，〈十月革命後中蘇關於中東鐵路問題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頁241。

一方面則於 1925 年 1 月與日本簽訂秘密協定，互相承認雙方在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勢力。這一段外交秘辛，是過去論及中東鐵路交涉者，未曾觸及的主題。文末作者認為蘇聯日後得以恢復在華優勢，以及中共力量的壯大，均與 1924 ~ 1925 年間中蘇交涉之秘而不宣有密切關係。而且，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二年後，其對華政策與帝國主義並無不同，從未以平等地位對待中國，縱使 1949 年中共政權建立後的中蘇關係亦復如此，由此可以瞭解何以中俄邊界問題遲至今日尚未完全解決。¹¹

中東鐵路地帶的革命運動及罷工風潮，是蘇聯時代的史學者在中東鐵路研究上的重點，如赫菲茨（A. N. Kheifets）〈中東鐵路中俄工人共同對抗武裝干涉者和白衛軍史略（1918 ~ 1922）〉（“Iz istorii sovместnoi bor'by russkikh i kitaiskikh rabochikh KVZhD protiv interventov i belogbapdeitsev, 1918-1922 gody”，Voprosy istorii, 1958, 4.），概述中東鐵路的中俄工人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利用數次大規模的罷工行動，對抗盤據該路的霍爾瓦特（D. L. Khorvat）、高爾察克（A. V. Golchak）、謝米諾夫（A. Semenov）等白俄勢力，並阻撓監管該路的協約國之出兵西伯利亞的軍事行動。作者肯定中俄工人的聯合罷工行動，為鐵路地帶創造了新的政治情勢，有利於蘇維埃外交當局爭取中東鐵路的解放運動。安德列耶夫（G. I. Andeev）《中東鐵路的革命運動（1917~1922）》（*Revoliutsionnoe dvizhenie na KVZhD v 1917-1922 gg.*, Novosirsk: Izdatel'stvo 《Nauka》, Sibirskoe otdelenie, 1983）一書，對中東鐵路自 1917 年俄國革命以後，至協約國結束監管為止，所進行的罷工和革命行動之研究，較前文詳細深入。全書前言、結論不計，分上下兩篇共六章，上篇敘述自 1905 年以來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在中東鐵路地帶的發展，以及 1917 年俄國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組織的建立、活動狀況。下篇敘述中俄工人聯合舉行罷工，以對抗白俄勢力及協約國之支持反革命活動。書中指出，中俄工人的罷工，以 1918 年 9 月和 1919 年 7 ~ 8 月兩次規模為最大，持續二週至一個月之久。此外，1918 ~ 1920 年間尚有零星的罷工活動，為期一日至三日不等。作者認為中東鐵路工人的罷工行動，以及各革命黨派的結合，是擊潰白俄勢力和協約國干涉

11 Bruce A. Elleman, "The Soviet Union's Secret Diplomacy Concerning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1924-1925",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3-2, May 1994), pp. 479-482.

的主要力量。同時，中俄工人的團結，也奠定了中蘇建交的良好基礎，在中蘇關係史上的意義極其重要。¹²

其實，俄國十月革命後，所謂布爾什維克主導的中俄工人罷工行動，僅有 1918 年 9 月的這一次，其餘各次大小規模的罷工行動，均是工人自行發起，不容否認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人中有其勢力，然其對整個路界內的革命運動的推展，並不如蘇聯學者所宣稱的足以擊潰反革命勢力。中國工人在 1918 ~ 1920 年的罷工行動中，不過是在爭取其福利，如在工資的發放，拒領毫無價值的盧布，希望以大洋替代，以及要求改善工作環境和待遇等，與所謂響應布爾什維克革命並無實質的關係。此可由 1921 ~ 1922 年間霍爾瓦特、高爾察克等白俄勢力退出中東鐵路，俄國工人罷工行動結束，而中國工人仍陸續有反對裁員減薪之罷工行動一事獲得印證。至於所謂中俄工人的罷工行動，奠定後來中蘇建交的基礎，則是布爾什維克式意識形態的說法罷了。

中東鐵路的中國工人多於俄國工人，而待遇無法與之相比，故自 1905 年起即有參與俄國工人罷工活動，此項罷工活動，多數集中在哈爾濱鐵路總工廠。哈爾濱車輛工廠廠史編寫組〈三十六棚工人的抗俄鬥爭〉（《歷史研究》，1978 年第 3 期）一文，即概述 1905 年以來，以迄 1919 年鐵路總工廠中國工人參與歷次罷工行動的情形。陳海江等〈三十六棚鐵路工廠〉（《哈爾濱文史資料》第 15 輯，1991 年）一文，概述該工廠由興建至 1950 年更名為哈爾濱機車修理工廠為止之發展史。

霍爾瓦特與俄國對中東鐵路的經營相終始，掌控該路長達十七年之久，是俄國擴張其在北滿勢力的執行者。吳文銜、張秀蘭《霍爾瓦特與中東鐵路》（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即詳述霍爾瓦特以中東鐵路為基地，執行俄國在北滿的擴張政策，以及十月革命後，霍氏成立「全俄臨時政府」，進行反革命活動情形。並兼述 1918 ~ 1919 年的中東鐵路工人罷工行動、中國政府收回路界內主權的努力、協約國監管中東鐵路執行概況。或因資料限制，書中對霍爾瓦特在中東鐵路商業營運中的角色，未見任何說明。中東鐵路護路軍代表著俄國在北滿軍事力量的擴張，影響及於中國東北邊疆政局的安定。薛銜天《中東鐵路護路

12 G. I. Andeev, *Revolutsionnoe dvizhenie na KVZhD v 1917-1922 gg.* (Novosibirsk: Isdatel'stvo (Nauka), Sibirskoe otgelenie, 1983), pp. 118-119.

軍與東北邊疆政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一書，對此一問題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全書分上下兩編共十一章，詳述護路軍發展史，至1924年〈中俄北京協定〉簽署為止。透過該書的介紹，可知護路軍由築路期間開始成立，歷經義和團事變、日俄戰爭而擴大為正規軍的編制，成為俄國在北滿的軍事力量象徵。護路軍影響中國東北邊疆政局最大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策動呼倫貝爾獨立，以及十月革命後，各自參與白俄、赤俄兩股勢力的對抗，危及中東鐵路地帶的安全。

1929年中東路事件所引起的中蘇邊境戰爭，是1924年中蘇建交以來最嚴重的軍事衝突。瓦爾塔諾夫（V. N. Vartanov）等《中東鐵路衝突中蘇維埃軍的軍事行動》（*Konflikt na KVZhD, iz istorii Sovetskikh Vooruzhennykh Sil, Khabarovsk: Knizhoe izdatel'stvo, 1989*）一書，介紹中東路事件發生的原因、中蘇邊境戰爭經過、中蘇停戰後的談判。作者認為東北當局欲壟斷中東鐵路的企圖，由來已久，中東路事件的爆發，是此一企圖的展現。1927年南京政府的清黨、中蘇關係的惡化，以及1928年底中國的統一，有助於東北當局在中東鐵路政策的強勢作為。再加上英、美、法等國的積極介入，激化中蘇對立的愈益嚴重，終於演成兩國之間的武裝衝突。¹³作者指出，就其本質此一中蘇戰爭乃是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發生後，資本主義世界行將瓦解，各帝國主義國家尖銳對立等現象下的產物。¹⁴至於蘇方局長的專斷作為、人事和財政分配的不均、路界內的赤化活動等所造成的糾紛，書中並未提及，一味將雙方衝突的發生，歸咎於中方，並以所謂的帝國主義國家之反蘇戰爭來詮釋此一中蘇戰爭，顯然有失客觀。

另外，在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其政策究竟為何？根據中共「中央通告」所知，其政策是聲援蘇聯的「反帝國主義之戰」、「反抗國民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¹⁵王章陵〈匪黨與「中東路事件」〉（《匪情月報》，第17卷第2期，民國62年）一

13 V. N. Vartanov etc., *Konflikt na KVZhD, iz istorii Sovetskikh Vooruzhennykh Sil* (Khabarovsk: Knizhoe izdatel'stvo, 1989), pp. 25-35.

14 Ibid., p.6.

15 中共中央通告〈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紅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頁383。

文，以中共第 41 號「中央通告」為依據，批判中共在中東路事件中之「擁護蘇聯」，乃是一「出賣民族國家」之行爲。¹⁶文中並對陳獨秀主張以「反對國民黨的誤國政策」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進而引發中共內部的爭論，有一概略的說明。文末以托洛斯基（L. D. Trotsky）對中東路事件的態度為例，認為托洛斯基尚且能基於民族利益而支持其政敵史達林之政策，而為中共黨人無法認清史、托二人其實都是民族主義者這一點，感到「可憐亦復可恥」。¹⁷本庄比佐子〈東支鐵道紛爭と中國共產黨〉（《東洋學報》，第 56 卷第 2-4 號，1975 年）一文，則特別著重在中東路事件結束後，中共武裝暴動路線的形成與發展原因之探討。作者認為李立三左傾冒進路線的出現，與共產國際在中東路事件期間及結束後給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指示，有相當大的關係。¹⁸此可由 1929 年 10 月 26 日給中共的信函—「國民黨改組派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及 1930 年 2 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等文件看出。共產國際強調國民黨的分裂，象徵中國革命時機的成熟，中共應積極展開武裝鬥爭；並謂中東路事件的結束，卻是意味著新的帝國主義對蘇戰爭的開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最重要的任務仍是在保衛蘇聯」。這是以李立三為首的中共中央，於 1929 年 12 月中東路事件結束以後，武裝暴動策略的確立與強化之原因。¹⁹關於上述說法，向青等《蘇聯與中國革命》一書，於「蘇聯共產國際處理中東路事件的策略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一節中，亦有如是的見解。²⁰

上述有關中東鐵路的研究，全集中政治外交方面，徐曰彪〈試論俄國在華投資與東省鐵路財政(1895～1917)〉（《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一文，則從經濟的層面，探討中東鐵路的財政收支概況、俄國政府對該路的赤字貼補，以及其在俄國對華投資中的地位。文中指出，在俄國對外投資中，中國高居第一位，如 1913 年時佔百分之八十三，與

16 王章陵，〈匪黨與「中東路事件」〉，《匪情月報》，第 17 卷第 2 期，民國 62 年，頁 73。

17 同上，頁 80。

18 本庄比佐子，〈東支鐵道紛爭と中國共產黨〉，《東洋學報》，第 56 卷第 2-4 號，1975 年，頁 167。

19 同上，頁 161-165。

20 向青、石志夫、劉德喜，《蘇聯與中國革命》（北京：中央編譯社，1994 年），頁 326-328。

日本相似；而中東鐵路的投資所佔比例最高，1914年的投資金額有三億六千九百萬盧布，佔是年俄國對華總投資金額（五億二千五百萬盧布）的百分之七十。²¹文末尙就中國政府是否擁有中東鐵路的股權提出說明。作者認為儘管鐵路合同是由華俄道勝銀行簽訂的，但中國政府以庫平銀五百萬兩投資華俄道勝銀行，並不代表就擁有鐵路公司的股權。事實上，中東鐵路公司是獨立於華俄道勝銀行之外，倒是鐵路合同規定，路成通車之後，該公司每年應「報效（中國政府）二十五萬，可先提五百萬」的規定，證明中國政府享有鐵路營運利潤。²²

至於中東鐵路的興建經營於中國東北經濟發展之影響，塚瀨進《中國近代東北經濟史研究——鐵道敷設と中國東北經濟の變化》（東京：東方書店，1993年）書中第二章「東支鐵道沿線地域の變化」即有介紹。此書原係探討鐵路興建對中國東北經濟發展的影響，其涵蓋時期為十九世紀末以迄二十世紀前半。中東鐵路既是中國東北最長的鐵路，自然在其研究之列。作者分就貿易、農業、金融等項，說明中東鐵路的興建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卓著。以鐵路興建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為主題，在鐵路史研究領域中極富意義，如張瑞德《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1905～1937）》（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6年）。²³塚瀨進之研究，由於涉及區域極廣，包括中國東北全境鐵路，如南滿、京奉、奉吉、吉敦、四洮、洮昂等鐵路，故對中東鐵路於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只能作概略介紹。不過，無論如何，在論及中東鐵路與北滿經濟發展的關係時，此書仍有其參考價值。

此外，有關中東鐵路研究，散見於中國學者的中俄關係史論著中，依出版先後，臚列如下：孫幾伊《中俄交涉論》（上海：大東書局，民國20年）、何漢文《中俄外交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4年）、陳復光《有清一代的中俄關係》（昆明：雲南大學，民國36年）、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2年）、佟冬《沙俄與東北》（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

21 徐曰彪，〈試論俄國在華投資與東省鐵路財政（1895～1917）〉，《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頁117。

22 同上，頁128-131。

23 何漢威，《京漢鐵路初期史略》（香港：中文大學，1979年）一書，雖敘述京漢鐵路（即平漢鐵路）清季時期的發展史，但亦兼及其對華北經濟發展影響之論述。

究所《沙俄侵華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在外國學者研究俄國在滿洲的發展專著中，亦有論及中東鐵路者，最早是蘇聯時代史家羅曼諾夫（B. A. Romanov）《俄國在滿洲（1892～1906）》（*Rossia v Man'chzhurii*, 1928年），後有阿瓦林（B. Avarin）《帝國主義在滿洲》（*Imperializm v Manchzhurii*, 1934年）。²⁴八〇年代復有英國學者奎斯提德（R. K. I. Quedsted）《俄國人在滿洲（1895～1917）》（*The Tsarist Russians in Manchuria, 1895-1917*,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2）。這些作品對中東鐵路的論述，亦是集中於政治外交層面，惟奎斯提德著作除政治外交外，尚從經濟、社會等層面，介紹自甲午戰爭結束以後，至沙皇政權崩潰為止，俄國政府在滿洲勢力擴張始末，以及俄國移民社會的發展狀況。可惜的是，在敘述中東鐵路營運概況時，在1907～1914年的客貨運輸統計表部份，係轉引自阿瓦林著作，而後者在引用《中東鐵路工作概論》（*Kratkii obzor raboty KVZhD*, Kharbin: Tipografiia KVZhD, 1929）製作統計表時，錯置客貨運輸量，造成奎斯提德對客貨運輸量成長情況的錯誤分析。²⁵蘇聯學者梅里霍夫（G. V. Melikhov）《既遠且近的滿洲》（*Man'chzhurii, dalekaia i blizkaia*, Moskva: 《Nauka》, 1991）一書，於敘述沙皇時代俄國移民在滿洲的生活史時，對中東鐵路興築始末，及其各種機關的設置和運作狀況，也有相當篇幅的介紹。

經由上述的介紹，可知自二〇年代末期以來，有關中東鐵路的研究論著為數不少，只是不論是五〇年代以前，或五〇年代以後，研究方向多側重在政治外交方面，不外是中東鐵路興築的背景、各項利權的取得經過、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國收回利權及中蘇共管交涉、中東路事件等課題。當然，無可否認地，這些課題在中東鐵路發展史上極其重要，亦是中俄關係史的焦點所在，有其研究價值。不過，若從史學的宏觀研究論，畢竟有其缺憾，中東鐵路固然象徵晚清以來俄國侵華的一個工具，

24 羅曼諾夫和阿瓦林著作，分別有中文譯著，羅曼諾夫之書最早有民耿譯為《帝俄侵略滿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6年），後有陶文釗等重譯，名為《俄國在滿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阿瓦林之書由北京對外貿易學院俄語教研室譯出，名為《帝國主義在滿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25 阿瓦林，前揭書，頁157；R. K. I. Quedsted, *The Tsarist Russians in Manchuri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2), pp. 225-226

可是作為最早聯絡中國東北的鐵路，其對當地經濟的發展影響不容忽視。同時，它又是俄國在華最大的投資，其經營成敗，代表著俄國以資本主義的手法，獲取在華經濟利益的多寡。是故從經濟層面探討中東鐵路的營運狀況，當是饒富意義之事，值得學者深入研究。

其次，以往由於俄國長期侵略中國之故，國人深切痛恨之餘，在中俄關係史的研究上，不免有「仇俄」心理的宣洩，影響所及，自是以侵華史的觀點，來詮釋中俄關係的發展，中東鐵路的研究亦不能例外。此一心理大陸的史學者尤其明顯，只是其所仇之「俄」是沙皇時代的俄國，而非共產革命以後的俄國。史學的研究摻入濃厚的感情因素，本是追求客觀論點的一大禁忌。近年來，大陸史學界對此已有部份的調整，嘗試擺脫民族主義的色彩，以客觀持平的角度，詮釋近百年來的中俄關係史，從中東鐵路的研究情形來看，薛銜天《中東鐵路護路軍與中國東北邊疆政局》、徐曰彪〈試論俄國在華投資與東省鐵路財政〉等堪稱其代表，惟要達到完全客觀持平，仍有待更多的努力。

最後，有關中東鐵路的研究，尚有二點須說明者，一為台灣史學界對中東鐵路的研究，遠不如大陸史學界。數十年來，僅有李國雄《中東鐵路建造的前因後果及其在外交史上的地位》、李毓澍〈中東路與外蒙古交涉〉、李念萱〈哈亂與中東鐵路〉、王章陵〈匪黨與「中東路事件」〉等作品問世。這些作品以一主題或事件為研究對象，若論縱橫的全面性研究成果，仍嫌不足。二為中東鐵路的研究方向，除經濟層面值得嘗試外，在政治外交層面上，由中蘇共管時期以迄歸還中國為止（包含中東路事件），約近三十年的中東鐵路交涉史，雖已有唐盛鎬、張道行二位學者之論著，惟其間中蘇雙方的糾葛牽連，亦有再行深入探究之處。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 Literature

Christian Henriot*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represents a new field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For a long time, urban history has been neglected to the benefit of a research that focused massively on the great political events. Over the last decade, however, it has gained increasing respectability.

Research on China was for a long time dominated by what used to be called the orientalist tradition. One of its main features was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f ancient texts. As a consequence,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s and, by predilection, on the formal content of these texts rather than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lity that underlined them.¹ Moreover, since these documents were produced by the literati who ruled the country, they conveyed a system of values and a discourse that gave emphasis to the ideal of a frugal and industrious rural society. There ensued from this a lack of interest in urban society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ncient China that reflected the anti-city bias and the attitude of distrust the literati harbored against urban settlements and their populations,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potentially more dangerous in political terms, the

* Fellow of the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Institut d'Asie Orientale

1 The other traditional fields of orientalist studies were th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classical China.

merchants. Cities, moreover, did not formally exist in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n the opposite,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was designed to limit the influence and power of urban entities.²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orientalist studies failed to pay any atten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did not take the opportunity the free access to China before 1949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s by foreign residents and traveler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provided to observe Chinese society *in viv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herself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orientations of research toward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breakup of the country provided the ground for an approach that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the forced opening of China by Western powers and on political history. Above all, the takeover of power by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49 led the specialists of China, especially historians, to center their work on the origin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victory of communism. In fact, historical research took as its target the communist movement under its various aspects, with a predominantly political history, and peasants, the social springboar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world of cities, which was regarded as unworthy of consid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practically forsaken by historians.

In reality, urban society was not completely excluded from research, even if initial works were irregular and partly determined by political concern. Therefore, a choice had to be made in the historical production of the last decades to determine what legitimately came under this heading and to highlight the possible filiation that existed between the various works produced at different times. Although such an approach may be somehow artificial, it is evident that the historiographical unfolding which led to the emergence and structuring of a

2 Large cities were often divided among two different counties (*xian*) and had no official administration at the municipal level.

specific field of research did not take place by accident. Such a development is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historians of Western Europe and to the specific evolution of China historians.

In this paper, I have privileged a chronological approach that should highlight more clearl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is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and its stages. Within this framework, I have selected only the works which truly dealt with urban phenomena — monographs of particular cities or studies of specifically urban social groups. At the end of this presentation, I shall sketch out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currently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the “black holes” which await the historians’ attention.

The pioneers’ works

The first works that relate to urban history were not produced by historians, but by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They were all concerned with China’s key city — Shanghai — on which, as we shall see later,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udies has concentrated. In 1940, Chen Yao-sheng produced in a little known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first academic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³ The author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ity of this territory that existed as an autonomous entity — a kind of *imperium in imperio* — within a Chinese city which was itself divided into three distinct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rench Concession, and Chinese municipality). Chen’s approach focused exclusively on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various authoritie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city’s actual urban management.

At the same period, another work focused on the fate of Shanghai under the

3 Chen Yao-sheng,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940).

Japanese occupation, especially with a view to assess its economic impact. The author, Robert W. Barnett,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state of war caused by Japanese aggression had led to a sort of kidnapping of the city, to an increasing stifling of its economy — following the blockage of all land and maritime routes — and to the decline of the city as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enter.⁴ Barnett's study, which ends in 1941 before the seiz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by 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relative "freezing" of the autonomy of the French Concession, emphasized the particular status of Shanghai in China and its inability to survive as a large cosmopolitan metropolis without the preservation of its link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initiated a decline that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nly accelerated and brought to an end.

In contrast to the two previous works, the classical book of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 Key to Modern China*, represent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 and role of Shanghai in the opening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⁵ The author combined a geography and history to determine the city's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fter the arrival of Western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s weight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above all,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etropolis to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its hinterland and more generally to the whole country. Shanghai was said to have been the privileged vector of modernization in a lethargic and tradition-bound China ; it opened the doors to an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spired from Western models. Rhoads Murphey has since then reneged on his own interpretation, although in my view it still holds a certain relevance.⁶

4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 1937-1941* (New York: 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 1941).

5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6 I shall not develop the arguments of this debate here. The reader shall refer to the later works of Rhoads Murphey,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What Went Wrong?*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It is clear that the three works presented above relate to urban history only imperfectly. They all took a city as their object of study, though without really penetrating into it. Nevertheless, these authors laid the ground for more history-oriented approaches of Chinese cities. And it is the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that gave birth to a few innovative works in the 1960s. Their main axis was not urban history *stricto sensu*, but they were to contribute [partake to] to this field in a fundamental way. This is the case, most notably, of Jean Chesneaux's stat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which explored the then unknown world of urban proletariat, especially in the industrial metropolis Shanghai of the 1920s.⁷ Although his work was flawed by an approach that suffers from a political bias, it was an esse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a still ill-defined and numerically insignificant group. The proletariat was, however, very present and active in the citie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aradoxically, Jean Chesneaux's work had no sequel. It was not until the 1980s that a series of original works offered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workers (see *infra*).

At the same period, Marie-Claire Bergère was undertaking the study of another group that took the lea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 — the bourgeoisie or its forebears.⁸ The forced opening of China had induced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specially in the treaty ports open to foreign trade, and generated a radical social restructuring. The fusion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class and the merchants gave birth to an elite which was more concerned about modernizing and adapting the country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West. Politically, the bourgeoisie rejected the imperial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Manchus and, according to Marie-

Studies N. 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1); *The Outsiders.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7 Jean Chesneaux, *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Paris-La Haye: Mouton, 1962);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from 1919 to 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 Marie-Claire Bergèr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et la révolution de 1911* (Paris: Mouton, 1968).

Claire Bergère, embraced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without being able to play a central role.

These pioneering works uncovered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y that heretofore had been neglected by orientalist studies. They brought a new light on original issues, either out of political concern (Chesneaux), or out of questions based on French historiography (Bergère). They also represented, with Lucien Bianco's work on peasants, an attempt by French historians to a systematic approach of the social groups which were the products and the engin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is research on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roletariat, although it was not based on a particular city, centered in fact very much on Shanghai, China's experimental social "melting pot". More generally, these works opened the way to more focused monographs of cities and urban social strata.

This review of innovative works would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mentioning the only work which marke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namely Mark Elvi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the first municipal institution set up in Shanghai between 1895 and 1914.⁹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and that of its elites, the author took pain to document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elite in Shanghai. One that was very much involved in the affairs of the ci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weakening of the imperial regime, managed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power base with the tacit assent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Mark Elvin's study dealt as much with the actual realizations of this municipal body in the urban field as with the nature of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rends that underlay this movement. Mark Elvin's conclusions largely agreed with those of Marie-Claire Bergère, although his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genuinely native elements of such an evolution.

9 Mark Elvin,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Shanghai, 1905-1914"(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67).

The return to the city

Because the mainstream of research was oriented toward the great 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however, this first group of works was followed by a long latency period. The urban phenomenon in China failed to take root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a renewed interest in 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began to develop through a series of three conferences that permitted to go backward in time. The starting point was the conference held on Chinese cities under communism which gave birth to a collective volume edited by John Lewis.¹⁰ It was followed by two similar meetings on the c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n the Republic. The two remarkable volumes that came out of these debates brought, in William G. Skinner's view, "a more eclectic and imaginative use of sources, improved methodologies, a more rigorous approach to argumentation, and, above all, an augmented sense of problem".¹¹

Each of the two volumes referred to above comprised contributions which studied various segments of Chinese urban society. In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from previous works, a wide array of specific groups 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became the central object of a more careful examination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structure, the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of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ociety. The final result was far from balanced. Local elites (literati, merchants) benefited — this was an effect of the availability of sources — from the privileged attention of historians. One should distinguish among these contributions the papers written by William G. Skinner in the volume devoted to Late imperial urban society. The author raised issues both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terms that are still at the core of current research.

10 John Lewis,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1 "Preface" in Mark Elvin & William G. Skinner, *Th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vii; William G.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Altogether,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tate that the topics and the problems examined in these volumes have paved the way later studies followed.¹²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has therefore constantly oscillated between two poles : monographs of cities and studies of social groups increasingly located in a particular urban center.¹³ The study of the city of Jinan by David Buck constitutes the first genuine attempt at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fate of a whole city over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1890-1949).¹⁴ His ambition was probably excessive, but i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novelty of his enterprise. David Buck tried to highlight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at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level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This process could not mature because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especially the difficulties created by the warlords, the stifling effect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finally the war with Japan and the civil war. Although he tried to give a dimens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o his work, David Buck produced a piece of research in which political issues and political history dominated.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roups, production was much more substantial. On the one hand, Marie-Claire Bergère carried on her study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in particular its Shanghai compon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Her research found its final outcome in a state doctoral dissertation whose topic — an uncommon one at a time when French historical research

12 "We have aimed to open up a new field of study —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hinese urbanism. I think we have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the main dimensions of the subject, in suggesting the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t affords, and in demonstrating its importance for social science as well as for sinology". William G.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vii.

13 Gilbert Rozman has attempted to reconstruc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Gilbert Rozman,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14 David Buck, *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rivileged the *longue durée* — allowed her to explore large section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o develop a reflection 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urban society.¹⁵ Moreover, through her use of a method — prosopography — unknown in the China field where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sources made such an attempt a hazardous enterprise, Marie-Claire Bergère brought into her narrative a very dense human dimension. She was able therefore to demonstrate the emergence of a group which was clearly aware of its existence and its responsibilities toward the nation. Through their commercial and social practice, they were bound to what can be called the tradition, but they were at the same time the carriers of a modernist project which the decay of the state, or its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under the Guomindang, eventually brought to failure.¹⁶ In the same vein, a mention should be made of the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of James Sanford on Shanghai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the merchant community in a single city.¹⁷

As in the previous period, the other pole of society — workers — was again the object of a study with a still politically inspired *problématique*, although it was also emblematic of a desire to define more precisely the nature of this group in Chinese society. Chan Ming-kou's work dealt with the labor movement at Canton, Hong Kong and in the main urban center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One of the originalities of his dissertation was to take as a starting point a period that precede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movements, especially the Communist party. Chan Ming-kou has skillfully delineated the contours of a milieu that tried

15 Marie-Claire Bergère, "Problèmes du développement et rôle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 la crise économique de 1920-1923", thèse d'Etat (Paris: Paris VII University, 1976).

16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21-825.

17 James Sanford,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to organize and defend its rights by itself. He has demonstrated the obviously decisive influence of modern trade unions, both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while emphasizing the limits of their power due to the communal divisions among regional groups and their inability to groom genuine grass-roots leaders. Although it highlights a central aspect of a region much neglected in current historiography, Chan's study did not however observe the workers in their cities and in their workplace.¹⁸

Another topic that deserves a more active exploration — foreign communities — did not generate much interest. David Krantzler has devoted his book to the fate of the Jew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¹⁹ His work appears more as a contribution to Jewish memory — a legitimate concern undoubtedly — than as an attempt at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ers in China. Because of its sensitive and poorly rewarding character in a political and historiographical context of denunciation of imperialism and its evils, this topic has suffered from disrepute and did not become the object of research except for a short and general essay on foreign communities in China²⁰. More recently, however, a few historians have looked into this promising field of research (see *infra*).

After years of eclipse, the world of cities has progressively come back to the front stage of historical inquiry on China. Although works were more numerous, better defined and, for some of them (Marie-Claire Bergère)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they were still unrelated monographs to which one can *a posteriori* attribute a certain consistency. It is not totally artificial, however,

18 Chan Ming-kou,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19 David H. Krantzler, *Japanese, Nazis and Jews: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of Shanghai, 1938-1945*, (New York: Yashiva University Press, 1974).

20 Albert Feuerwerker,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History, N. 29.

and it does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earch trend and the beginning of clear and coherent movement.

The maturation of the field

The maturation of urban history into a field of research is the natural outcome of the spate of works that have accumulated during the last decade and a half. One can now speak of an explicit and conscious movement around issues that have become the object of intense debates among historians and have considerably enriched and renewed 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urban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field cannot begin without mentioning the fascinating and exemplary study of Hankou by William T. Rowe.²¹ With a deliberate commitment to rehabilitate the role of c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author has painted a masterly portrait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one of the major emporia of China over near a century. He examines with great finesse the complex structures of commercial networks and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merchants and imperial power. The other side of his study is the analysis of the city's social organiz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 it was made of the juxtaposition of regional communities of sojourners with a strong identity — on the extraordinarily integrative role of the guilds for their own constituencies and between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Above all, William T. Rowe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reality of a fusion of the city's various groups of elites into a unique urban elite. This elite was able and willing to invest a local power neglect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mperial state and to take into their own hands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William T. Rowe also

21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mphasizes the native nature of this process which in the absence of the Westerners' economic invasion, could hav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genuine Chinese bourgeoisie and to a political evolution much different from what actually happened in China.

In a second volume, William T. Rowe has shifted his interest from the elites to the whole popul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o what may be labeled the patterns or modes of social control.²² The city of Hankou, as all the large urban concentrations, had a potential for serious crisis such as natural calamities or social conflicts. Quite strikingly, it appears that the setting up of structures for social welfare and public services by the guilds in the city represented the more blatant expression of the conquest of the public domain to the expense of a state which was neither capable nor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in these matters. This new field of action, which came under the public domain but was dominated by private organizations, formed an intermedi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arena — the so-called “public sphere” in Jürgen Habermass' terms — between public (the state and its servants) and private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enterprises) in which the elites found the road to the exercise of power. Hankou was also remarkable in that it had a low occurrence of social conflicts in spite of numerous potentially dangerous issues (food crisis, labor unrest, inter-community riots)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efficacy of this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her study of Shanghai native-place organizations, Bryna Goodman tends to support in part the analysis of William T. Rowe. She emphasizes the powerful integrating capacity of the guilds (*huiguan*) and the native-place associations (*tongxianghui*) in a society which was subject to an unprecedented demographic upheaval and a very rapi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²³ Despite such instability, the

22 William Rowe, *Hankou: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floating or even unruly segments of the Shanghai population remained marginal. Most individuals, whatever their social status, achieved their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networks formed by each community of sojourners. On the opposite, however, Bryna Goodman supports the idea that these communities, including their leading strata, were not necessarily on the way to a fusion into an undifferentiated and cosmopolitan urban elite. A vertical partition based on native place continued to override the horizontal social divisions, even if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e can perceive a splitting up of native-place 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diverging interests between the ruling elites and commoners. The more recent work by Kwan Man-bun did not exactly contribute to this debate. His study dealt more specifically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erchants and the state in Tianjian where the salt merchants involved the state monopoly on this commodity dominated the local stage. The role of the guilds seems to have been much less significant, although the author noted the involvement of merchants in public works or local welfare organizations.²⁴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followed a chronologically illogical path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above mentioned work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several monographs on the twentieth-century bourgeoisie, especially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Parks M. Coble has drawn a remarkable portrait of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demonstrating their lines of force (regionally based network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ir contradictions toward the nationalist regime on the other.²⁵ After its staunch support of the Guomindang in its enterprise of conquest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Shanghai bourgeoisie was dragged into providing continuous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 extent that its fate was bound to that of the regime. Although it was molested by the nationalist

24 Kwan Man-bun, "The Merchant World of Tianjin: Society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25 Parks Mc L.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egime's heavy handed methods, the bourgeoisie put up with this situation until the economic crisis shattered the fragile unity of this group, wiped out its economic influence and subjected it to the goodwill of the stat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bourgeoisie over a longer period (1890-1930), Joseph Fewsmith has also observed the strategy of domin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on urban society and its elites, although it failed to achieve it because of the personal relations the members of the elite entertained with the major 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²⁶

Xu Xiaoqun's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Shanghai in the 1920s-1930s has for the first time contributed to fill in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of the social spectrum.²⁷ It deals with the groups which were the vectors of the nascent middle classes : professionals and the organizations they hav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acquire an identity and to defend or promote their interests : lawyers, physicians, engineers, accountants, journalist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s.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author is that these groups whose numbers were on the rise enjoyed a lifestyle that placed them in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relation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lthough they did not equal tha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lites. They created their own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to assert their identity, to give more cohesiveness to the profession, and to be recognized by the state. These initiatives were an element of the form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se groups were not homogenous,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ir short history, but the sum of their actions was symptomatic of the maturation of Chinese urban society. Their associations were born ou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and capitalist economy at the same

26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The Univ. of Hawaii Press, 1985).

27 Xu Xiaoqun, "State and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Rise of Shanghai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1912-1937"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time as they met and even looked for a recognition by the state. Both needed each other : the associations longed for an official recognition to defend their interests ; the state was willing to co-opt these groups for its state-building and modernization policies.

In a sense, the link between the merchant commun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bourgeoisie of the next century remains to be established. Joseph Fewsmith was the first to use the notion of “public sphere” (*gong*) as an intermediary arena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He emphasized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merchant organizations. The debate, however, was by then limited to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the bourgeoisie. David Strand’s book, a late outcome of his original dissertation, broadens this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social groups (rickshaw pullers, merchants, etc.) to Beijing’s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²⁸ While the former were before all the recalcitrant victims of technical progress — they vented their anger and frustrations through violent demonstrations — the latter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a city subject to the recurrent intestine struggles between warlords, military officers and corrupted politicians. In the absence of the state, the elites not only guaranteed the preservation of social order, they also contributed to weave the framework of a social and political arena that carried the germs of a genuine civil society. Such a role, however, was basically denied to them by the Guomindang as Michael Tsing has shown in his study of Canton in the 1920s. What he perceived during this period was an emasculated merchant community and an immatured working class hardly dominated by a fledgling political power. Neither managed to articulate a convincing discourse and to find a real basis for cooperation. In the end, Chinese society failed to nurture the institutions most neede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28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of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²⁹

The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was also enriched by a new approach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morphology of cities. Chang Ying-hwa was the first to undert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major citi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tructure and use of urban space.³⁰ His work obviously brings to light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Beijing, the administrative capital, and Shanghai, Asia's first commercial,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metropolis. This line of research was carried over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vein by Lynda Cooke Johnson in her dissertation of the urban structure of Shanghai (1756-1896).³¹ She has documented how a relatively important commercial cent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nefited from the destruc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Taiping rebellion to the other regional urban centers an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fter the opening of China to foreign trade. Lynda C. Johnson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the modifications of the urban space,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progressive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city a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Studies of specific urban centers taken as a whole unit has also experienced a revival. Lai Jeh-hang has touched upon this topic in his dissertation on Sun Fo (Sun Ke) in which he examined the municipal policy of the Nationalists in Canton in the early 1920s.³² Lai Jeh-hang has pointed out phenomena whose more detailed and systematic study was carried out by Maryruth Coleman and Christian

29 Michael Ts'in, "The Cradle of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anton, 1900-1927"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30 Chang Ying-hwa,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ities, 1920's and 1930's: An Ecological Approac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2).

31 Lynda C. Johnson, "The Decline of Soochow and Rise of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Economic Morphology of Urban Change, 1756-1894"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1986). Lynda C. Johnson's dissertation has been revised and recently published as *Shanghai: From market town to treaty port, 1074-185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not read yet].

32 Lai Jeh-hang, "A Study of a Faltering Democrat: The Life of Sun Fo, 1891-1949"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76).

Henriot. These two authors have selected the same period — the Nanjing decade — and they have examined in two different cities, Nanjing and Shanghai respectively, the means and effects of the modernization effort of the Guomindang.³³ Beyond the study of the major accomplishments of these municipalities in the fields of urban management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tax system, urban planning) which demonstrate the reality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modernizing project of the Nationalist elites, Christian Henriot has explored the complex web of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 the state and the local elites. His conclusions challenge the interpretations put forward by the specialists of this period (especially Parks M. Coble and Joseph Fewsmith) and play up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state apparatus, the increasing ascendancy of the latter as well as the autonomy a fraction of the local elites was able to preserve.³⁴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as her target, Kerrie MacPherson has reconstructed the genesis of foreign power which she argues came out from an increasing concern for public health issues.³⁵ The necessity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the residents in an ecologically (the settlement was located in an area made of marshes, canals and paddy fields) and socially (the fear of riots b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ostile environment (the settlement was located in an area made of marshes, canals and paddy fields)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solidarity and common interests. On this basis Westerners organized themselves into a sort of local state power that took over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services. In the same vein, a mention

33 Maryruth Coleman, "Municipal Politics in Nationalist China : Nanjing, 1927-1937"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34 Christian Henriot, *Shanghai, 1927-1937. Elites, Locality, and Municipal Power in Nation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5 Kerrie L. MacPherson, *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hould be made of Noel Miners' work on the particular case of Hong Kong, a colonial city-state.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singles out a few outstanding policies the administration implemented in the social arena (prostitution, drug, bond-servants).³⁶ On Tianjin, Lewis Bernstein has produced an interesting, though unbalanced study which outlines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of the city at the end of the empire. It also examines the conquest of Tianjin by the Western armies after the Boxer rebellion as well as the brief experience of foreign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that followed.³⁷ There is no specific issue in this work that can relate it to current debates in Chinese urban history.

The fate of intellectuals as a social group has not attracted many historians. The peculiar nature of this group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study it in a given locality. Intellectuals are most often regarded as producers of ideas for whom a geographical definition is not relevant.³⁸ Nevertheless, a monograph can also be useful for studies that deal not just with the leading figures, but try to insert this community into its environment. For instance, Noël Castelino has reconstructed the intellectual,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ven the geographical itinerary, of a group of Shanghai-based non partisan intellectuals who established political journals during the civil war.³⁹ Prosopography has proved to be especially relevant and fruitful. For the perio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 mention should be made of Edward Gunn's work on Beijing and Shanghai writers, although the author does not deal with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per se*. Another

36 Norman Miners, *Hong Kong Under Imperial Rule* (Hong Kong,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7 Lewis Bernstein, "A History of Tientsin in Early Modern Times, 1800-1910"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8).

38 The fascinating work of Yeh Wen-hsin o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may also be cited in relation with this topic.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9 Noël Castelino, "Les intellectuels non engagés et l'opinion publique en Chine, 1945-1949"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aris, E.H.E.S.S., 1983).

contribution has been made by Fu Po-shek on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in which he tackles the neglected issues of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⁴⁰ Shanghai students have been studied by Jeffrey Wasserstrom. His focus, however, was more on their political action than on their place in an urban setting.⁴¹

The 1980s also saw the revival of research on workers. This renewed interest translated into a study of the role of communist activists in Hunan which, although it was not strictly centered on one city, did examine strike movements in Changsha and emphasized the deficiencies of previous works and called for a political and social redefinition of this class.⁴² Two other monographs have simultaneously opened new perspectives. The first one by Emily Honig examined woman textile workers in Shanghai while the other, by Gail Hershatter, dealt with Tianjin workers.⁴³ The two authors cover *grosso modo* the whole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y both offer exceptionally detailed pictures of a milieu that appeared by and large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its rural origins. It was divided in regional communities that at best ignored each other or at worst fought with each other, causing th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activists' attempts at creating a "working class". The quality of these studies is rooted in their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get very close to the tragic reality of this world. Their weakness, however, is a loss of the sense of history. The thesis of

40 Edward M. Gunn,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Fu Po-shek,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2 Lynda Shaffer, *Mao and the Workers :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New York: Sharpe, 1982).

43 Emily Honig, *Strangers and Sist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Notons aussi une étude de moindre intérêt par Ko, Yiu-chung, "The Labor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1900-1937"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81).

division and stratification among workers has also been illustrated by Lu Hanchao's dissertation on workers' neighborhoods in which he examines their residential patterns in Shanghai.⁴⁴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work of reference on this topic is the monumental dissertation of Alain Roux on Shanghai workers. It combines a real concern fo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f workers in order to reconstitute its variety and complexity. It also aims at restoring the history of this group and to give it a plac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at period.⁴⁵ A specialist of this domain since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y political inclination, Alain Roux has rehabilitated the reality of a restive or even combative working class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ad dismissed as irrelevant the anti-Communist repression of the Nationalists after 1927. He has also established the activist and effective role of the trade unions form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new regime. Eventually, Alain Roux demonstrates that, by an irony of history, the "working class" remained at the periphery of a revolution of which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e vanguard. This topic is certainly not exhausted. The more recent monograph of Shanghai workers on strike by Elizabeth Perry adds great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leavages within the Shanghai proletariat.⁴⁶ Altogether, there is now a solid basis for the study of work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current explor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was enriched by studies of strata

-
- 44 Lu Hanchao, "The workers and neighborhoods of Shanghai, 1911-1949",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91).
- 45 Alain Roux, "Ouvriers et ouvrières de Shanghai à l'époque du Guomindang, 1927-1949"; thèse d'Etat (Paris I-Panthéon Sorbonne University, 1991). It is being published in several volumes by distinct publishers. So far, two volumes have appeared: Alain Roux, *Le Shanghai ouvrier des années trente. Coolies, gangsters et syndicalistes* (Paris: L'Harmattan, 1993); Alain Roux, *Grèves et politique à Shanghai: les désillusions, 1927-1932*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 1995).
- 46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or groups situated at the social periphery.⁴⁷ A particular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poorest segments of the Shanghai population such as the Subei people (also called Jiangbei people). They came from the more impoverished parts of Jiangsu and once in Shanghai, they were confined to the less rewarding jobs and ostracized by the local population. Emily Honig has demonstrated how the prejudices accumulated over time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a low economic status reinforced each other to keep this community apart.⁴⁸ The world of prostitutes — a genuine barometer of social change — has been studied by Christian Henriot in his state doctoral dissertation.⁴⁹ Operating at the border between the “honorable society” and the world of criminals, prostitutes were patronized by men of all origins and watched over by various authorities. Therefore, they were especially sensitive to the changes in sexual behaviors, gender relations and modes of entertainment. Since prostitution was a matter of concern for many institutional and private actors, the discourse they generated provide as many entrie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s of social control in Shanghai.

The realm of social control and more specifically of a major institution designed for this purpose has been undertaken by Frederic Wakeman in his wide-encompassing study of police in Nationalist Shanghai.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police force was a major priority of the new authorities in their ambition to rule the city, to take over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to create a new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Frederic Wakeman’s book

47 Although it is not easy to place it in a particular category, the collective volume edited by Yeh Wen-hsin and Frederic Wakeman deserves a special mention. It offers a wide array of perspectives on Shanghai urban society and a good preliminary synthesis of the state of the field. Frederic Wakeman & Yeh Wen-hsin,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48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9 Christian Henriot, “La prostitution à Shanghai aux XIXe-XXe siècles, 1849-1958”, thèse d’Etat, Paris, E.H.E.S.S., 1992, 3 vols. (forthcoming as Christian Henriot, *Belles de Shanghai. Prostitution et sexualité en Chine aux XIXe-XXe siècles*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96)

examines the reforms that were introduced, the impact of foreign influences and the various tasks that were assigned to the police.⁵⁰ Although the new force gained in efficiency over the years, especially though a closer collaboration with the other services of police, it was also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political problems — anti-communist repression — and failed to play its role as a guardian of public order. Frederic Wakeman has capitalized on the rich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he has explored systematically to project himself into the much confused perio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⁵¹ Shifting away from a specific police force, he examines urban crime and terrorism as it developed in Shanghai, especially in the so-called Badlands — Shanghai's western extra-settlement road area — because of the police and administrative vacuum created by Japanese occupation. His very detailed monographs shows the incredible level of violence and social disruption that prevailed for a time in the city due to the merciless struggle nationalist, communist, Japanese and puppet agents engaged in.

This review would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the mention of an axis — the study of foreign communities — that was embryonic in previous works, such as those by Kerrie MacPherson or Kathryn Meyer, but that have become more concrete in two series of works. Paradoxically, although foreigners were often disparaged in the name of the imperialist aggression they embodied, the communities living in Chinese cities have not ye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 Nicholas R. Clifford has brought some light on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Shanghai in the 1920s. He has emphasize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national groups who lived among themselves although they harbored a unanimous and condescending distrust toward the Chinese. Nicholas R. Clifford's book, however, has more to do with political events, especially the reactions of foreigners to the

50 Frederic E.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51 Frederic E.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ris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than to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foreign communities per se.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this respect. Françoise Kreissler has undertaken a more global approach of the Jewish communities who settled in Shanghai in the 1920s and 1930s. Her stat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s now near completion.⁵² The American community in Shanghai was studied by James Huskey.⁵³

Conclusion : political history, elites and soci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questions raised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with an important interval due to the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uncatalogued or unidentified archival materials, recent and still restricted access to archives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on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by the shift of the objects of research and of the *problématiques* from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vent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social groups who played a role in these events, then to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society that took a whole city as its target. This was not the only notable change in urban history. There was also a growing autonomization from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an increasingly “auto-centere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issues that were brought out by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herself.

While the revolutions have inspired many historians — they first regarded

52 Kerrie MacPherson, *op. cit.*; Kathryn B. Meyer, “Splitting Apart: The Shanghai Treaty Port in Transition, 1914-1921”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1985); Nicholas R.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Françoise Kreissler, “Exil in Shanghai: Problematik und Schwerpunkte Themen”, in Kuo Heng-yü & Leutner Mechtild(éds.),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om 19.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Minerva Publications, 1991).

53 James L. Huskey, “Americans in Shanghai: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response to revolution, 1919-1928”,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85) [not read yet].

them as responses to Western intrus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the inherent mechanisms and transformations at work within Chinese society have determine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more recent works. For instance, the 1911 revolution has led historian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local elites and from there to reflect up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rena that was generated by the growing investment of these elites in public affairs. Although such concern can be found in older works,⁵⁴ they were formalized only recently in a few thoughtful monographs and papers.⁵⁵ The central concept around which much debate has developed is that of “public sphere” drawn from Jürgen Habermass’ work, and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at of “civil society”.⁵⁶ In other words, Chinese society would have given birth spontaneously to a movement in which the elites played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affairs of the city in a context of decay (19th century), or even complete collapse (20th century) of the state.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and the exte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not yet settled, but it has contributed to a renewal of Chines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thanks to its application to new fields and to the new perspectives it offers.

What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are now open to the historians of China ? The

-
- 54 Especially the excellent monograph of Joseph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as well as that by Edward Murphey,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55 Keith R. S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Mary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seph Esherick et Mary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the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56 William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6, N. 3, july. 1990, pp. 309-329; Mary Wright, “The Origins of Chinese Public Sphere”, *Etudes Chinoises*, IX, 2, 1990, pp. 13-60; David Strand,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A Perspective on Popular Movements in Beijing, 1919-1989”, Working Papers in *Asian/Pacific Studies*, Asian/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 Duke University, fév. 1990.

progress made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in terms of issues and materials have laid the basi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aspects that heretofore have been neglected. There is first a need for a geographical extension of research through studies of other cities than Shanghai — currently the target-cit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especially more minor cities (Wuxi, Ningbo, etc.), inland cities (Xi'an, Chengdu, etc.) and coastal cities (Canton, Fuzhou, Xiamen, Dalian, etc.).⁵⁷

Another possible axis in cities for which there are abundant archives is the study of spatial or social “micro-milieus”. In other words, it is time to undertake the exploration of specific corporations an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ly large social categories (bourgeoisie, workers) as has been done in European history (the study of particular corporations such as peddlars, bakers, etc.) or to select a more restricted space (for example, a district, which is possible on the basis of the police archive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daily life of the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which formed urban society. A field of research does not define itself solely in terms of objects, but in terms of problématiques and methodologies.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last decade show that Chinese urban history has now become a clearly unidentifiable domain bound to be enriched by the innovative works the opening of archives in China is calling for.

57 Several studies in Chinese urban history have appeared recently that confirm the trend toward a sustained interest in this field of study. Since I did not have them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essay, I shall limit myself to indicating their reference: Clausen Soren & Thogersen Stig,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Cit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Harbin*, (M.E. Sharpe Armonk, Inc., 1995)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various authors on pre- and post-communist Harbin); Wolff David, “To the Harbin Station: City Building in Russian Manchuria, 1898-1914”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1).

史料介紹

關於中日戰爭日方史料的收藏與介紹

加藤陽子*撰
川島眞、傅奕銘**譯

一、前言

舉凡研究近代日本史者所必備的工具書，我將毫無疑問地推薦下列二書。

(1) 中村隆英等編《近代日本研究入門》(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

(2) 百瀨孝《事典 昭和戰前の日本 制度と實態》(吉川弘文館，1990年)。

前者的特點是採取政治學的方法。例如，關於每個政治主體——政黨、議會、軍部、財界等等——皆以簡單扼要的方式說明到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和評價，以及研究課題等。不僅如此，在該書的後半部甚至詳盡介紹外交史料館、國立公文書館等史料館的情況，以及所在地、館藏史料的特徵。

在日本史的領域中，若要研究近世以前的歷史，我們很容易找到有關當代制度、政治機構方面的簡便手冊。但是，本來以為容易可查到之近現代史，特別是有關戰前昭和期的制度、機構，卻沒有像那樣的簡便手冊，得時時刻刻注意各個分野的專著，才查得到有關當代的制度、機構等資料，百瀨氏的著作則完全克服了上述研究近現代史學家的缺陷。例如，樞

*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助教授

** 川島眞，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傅奕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密院、大審院等機關的權限，自明治到昭和期間參謀本部和陸軍之間關係的變化，諸如此類的問題，以前難以掌握，但現在只要翻閱本書，即可找得到答案。

本文將針對日本史研究者提供方便的資訊，主要是敘述史料公開的情況。最近，我們可以察覺到日本的出版業者開始認為史料的復刻、翻印等賣得不錯，而近來社會上沒有什麼好消息，此事可說是較樂觀的話題。出版社將免費的史料，限定出版，賣得高價，雖然對於這樣的作法，個人不表贊成，但是這樣的出版品使研究者省去到東京找史料的麻煩，特別是對那些不住在東京地區的研究者而言這類的出版品相當受用，只要確認可靠的研究者參與編輯，這樣的一手史料刊本就有相當的利用價值。舉例來說，曾經翻印過的有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的《日清講和關係調書集》《日露講和關係調書集》《外務省執務報告（東亞局、歐亞局、通商局等）》（皆由クレス出版）、來自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圖書館藏的有《「大陸令・大陸指」總集成》（エムテイ出版）。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外務省執務報告》，這是按外務省事務規定，各司各課所職掌的內容，按年度彙整出版，而此報告所公刊的是 1936（昭和 11）年至 1939（昭和 14）年為止之部分。這種執務報告的好處是在於可彌補其他文書萬一失落的部分，例如 1942（昭和 17）年日本外務省遭祝融，燒毀通商局、調查部、官房文書課等所藏文書。

「大陸令・大陸指」是軍部最高指揮官以天皇之名所發出的作戰命令，自滿洲事件至日本戰敗為止，發出將近 1400 件的「大陸令」。這種基本史料的編纂對於以前難以斷定的中日戰爭中各個作戰目的的研究有所助益。

此外，從前只限定在該圖書館才可借閱的館藏史料，大部分已製成微卷出售，使之利用更加方便。例如，總計 114 卷的美濃部洋次文書（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以國策研究會和戰時經濟統制關係文書為中心），便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一例。

以前，日本近現代史的基本史料集中於東京，所以住在東京的研究者擁有相當有利的條件，但是，這樣的情況已逐漸改變。

現在，對各個史料館的現況作如下介紹。

二、國會圖書館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永田町 1-10-1

閉館時間：星期六（除了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星期日·第三·四之星期一

閱覽時間：9:30-17:00

利用資格：不論國籍，只要滿二十歲以上，誰都可利用

電話號碼：81-3-3581-2331（總機）

國會圖書館雖被國內外研究者評價為利用不便的圖書館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該館所藏的豐富資料。除了圖書、雜誌的閱覽之外，還具備了幾間專門的資料室——如報紙、科學技術資料、政府刊行物、地圖、古典·漢籍、音樂、影像等等。與本文有關的是其中三間資料室——法令議會資料室、特別資料室、憲政資料室。

（1）法令議會資料室

不愧是議會圖書館，帝國議會時代的本會議（亦即總會，譯者註）議事錄、委員會議錄，一應俱全。從史料價值觀點來考量，比本會議議事錄，審議各項法律案的委員會議錄，有更高的價值，因為它可以更詳細地了解政府的答辯內容及政黨的意向。

這些史料目前正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及臨川書店出版復刻版，可說是幾乎已含概所有的部分。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之中的資料有明治·大正·昭和（戰敗前）的《貴族院議事速記錄》（全 74 卷）、《眾議院議事速記錄》（全 86 卷）、以及明治·昭和（戰敗前）期的《帝國議會貴族委員會速記錄》、《帝國議會眾議院委員會議錄》。臨川書店則重印大正時期的《帝國議會貴族委員會速記錄》、《帝國議會眾議院委員會議錄》。

法令的確是令人覺得枯燥無味，但是可藉由法令的修改過程，較為容易地掌握議會與內閣之間的對抗關係。有這樣的特點，只要鎖定一項法律條文，研究其長期的修改過程，也能使之成為相當有意義的研究。例如，1943（昭和 18）年 11 月 1 日的兵役法修改。這個法律修改的目的在於使台人男子服兵役。在第八十三次帝國議會眾議院貴族院的委員會議事錄中，詳載來自各方對於該法修改提出質疑的內容。主要的議論是台灣總督府等機關對於導入台灣徵兵制所作的準備情況、台人日語程度的情況、台人士兵是否可升級下士官、將校等問題。若以其他史料如總督府、陸軍、

內務省等與之對照，則可描繪出戰爭末期的一個局面，對於日本的議會在戰時發揮何種功用，即使作實證的研究，也具有意義。

(2) 特別資料室

在特別資料室，名稱爲「昭和財政史資料」的微卷最具有利用價值。這是大藏省昭和財政史室爲了編著《昭和財政史》，收集了由大藏省所藏之原始史料和個人資料所製成的微卷。其目錄索引有二冊，參照該索引即可閱覽。不僅是財政、金融政策相關的資料，大藏省也收藏其他部門、機關的資料，也就是工商、外交、陸海軍、日銀等該看的資料一應俱全。此外，在大藏省內部用來對帝國議會答辯作爲參考資料的「議會參考書」亦可供參考。

(3) 憲政資料室

這裡收藏著近代日本史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軍人、知識分子等個人所遺留下來的資料。利用這間資料室的手續比國會圖書館麻煩得多。雖然國會圖書館不需要身份證，進入這間資料室，若是研究人員則需要服務機關所發的證件，若是學生則要導師的介紹信。但是也可用簡單的方法，請導師將學生的名字寫在自己的名片上，再寫上收件單位（憲政資料室）的名字即可。到這間資料室，首先得辦閱覽登記，再查看該室中各文書的目錄，之後申請所要的資料。目錄類按人名作成，將姓名依「ABC」的順序排在書架上，一次可申請十件。

根據《憲政資料室收藏資料一覽》（1995年3月版）的記載，所藏政治家、軍人等相關資料達二百人份、託管三十六人份，以其他所藏機關的資料爲中心作成的微卷有一百人份。但是，因爲欠缺將對話內容和草稿記錄保存下來的日人民族性，和戰敗時遭燒毀等原因，具有深度內容而被保存的文書，實際上並不多。

這種事情對於研究明治史的學者而言，可說是不可思議之事，因爲他們所接觸到的是整理完備的伊藤博文、井上毅和松方正義等關係之類的文書。本稿茲將中日戰爭時期參考文書的概要特徵作一番介紹（請參考本文最後的「憲政資料室收藏資料一覽」）。

首先介紹首相部分。五·一五事件後，通過舉國一致改組的齋藤實內閣的相關文書，以質與量來看，都是上乘的。約一萬件的資料中可見海軍時代、朝鮮總督時代、首相時代所有的文書類、手冊、書信等。〈齋藤實關係文書目錄〉在書店可買到（《齋藤實關係文書目錄書類の部I》紀伊

國屋書店，1993年）。

至於近衛文麿的資料，可利用的較少。但該資料室備有京都「陽明文庫」收藏資料的微卷版，其中近衛手稿、手札、書類等散見其中。

有關阿部信行資料，東京大學法學部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收藏阿部文書之原件，該資料室有該史料之微卷。亦可找到在其首相時期來自其他部、局的公文、報告書等。

若要研究「滿洲國」，該資料室之資料則有所助益。滿洲事件時擔任高級參謀的石原莞爾的相關資料、其部下提出各種政策、為之立案的片倉衷的資料、整理「滿洲國」皇帝溥儀和關東軍司令官會見記錄的林出賢次郎的資料、擔任最後滿鐵總裁山崎元幹的資料、日產壟斷企業的鮎川義介之資料等，舉凡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資料皆被保存下來。

憲政資料室所藏之資料目錄主要由紀伊國屋書店代為刊行，每次刊行的目錄是研究機關、圖書館必買的，又因為出版冊數有限，沒多久就絕版了。

三、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圖書館

地 址：東京都目黑區中目黑 2-2-1

閉館時間：星期六・星期日

閱覽時間：9:00-16:00

利用資格：不論國籍，誰都可利用。不需要介紹信。

電話號碼：81-3-3713-6111

（1）軍人日記

大部分將官以上的軍人，在還是新手時已養成寫日記的習慣。因此對於缺乏個人資料的日人而言，軍人的日記卻意外地、罕見地大部分被發掘，出版成書。歷任軍力縮減期的陸相、朝鮮總督、近衛內閣時期外相的宇垣，有《宇垣一成日記 1-3》（みすず書房，1968年）。任侍從武官、陸相、中國派遣軍指令官之畑，則有《畑俊六日記》（みすず書房，1983年）。擔任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時期海軍軍令部長加藤，則有《加藤寬治日記》（みすず書房，1994年）。

其他如在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時期的海相財部，在其海軍次官時代，有《財部彪日記》（山川出版社，1983年），舉國一致內閣時期的教育總

監真崎，則有自 1932（昭和 7）年至 1945 年的《真崎甚三郎日記》（山川出版社，1981 年）。自 1932（昭和 7）年至 1938 年，擔任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的《岡部直三郎大將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 年）是一部記載頗多情報的日記，對日本佔領華北的過程有詳細描述。

上述的資料中，日記的性質主要還是透過當事者的主觀意識看事情，因此檢視與之相異立場的日記，進行史料批判是不可或缺之事，甚至參照由軍方所作之第一手資料也是必要的。

（2）所藏史料概要

首先參照田中宏巳《米議會圖書館所藏 佔領接收舊陸海軍資料總目錄》（東洋書林，1995 年）（米＝美國，譯者註），該書主要是對日本之軍事關係資料的保存方式及特徵，作一番說明。起因是隨著戰局情勢惡化，開始疏散工作，在 1944（昭和 19）年陸軍省各課所使用的公文書類都搬至東京都北多摩郡柚木村柚木的地下倉庫。此時所搬送的資料主要是明治初期至 1942（昭和 17）年的「陸軍省大日記」。所謂「大日記」是由大臣官房按陸軍省往來公函等公文類所編纂而成。

此外，在海軍方面，除了海軍省的記錄庫房所藏之機密、秘密處理之外的普通文書「公文備考」，已由海軍省內的地下倉庫移至橫濱文壽堂書店的倉庫。

另外，在 1945（昭和 20）年初，海軍功績調查部的資料，也就是各船艦部隊的行動表、戰鬥詳報、戰時日誌等，均移送山梨縣韭崎之海軍韭崎分室保管。

如上述般，爲了躲避空襲所作暫時性的疏散工作，使這些資料免遭燒毀，得以被保存下來。也就是說有關軍方資料中，參謀本部、軍令部的部分幾乎喪失殆盡；現今所留下來，在陸軍方面以軍政關係的「陸軍省大日記」爲主，在海軍方面的軍政關係資料，除了機密、秘密以外，只有普通文書類的「公文備考」。

但是上述的資料後來還是遭遇劫數，由於日本戰敗，由 WDC（Washington Document Center）接收這批史料。這個來自美國的機構本來屬於美國陸軍省副官部，成立於 1944（昭和 19）年中旬，自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3 月 31 日爲止展開接收作業。這期間所接收的文書總數共有 444,522 件。但是，在 1958 年 4 月歸還時，卻拿走了三分之一的「陸軍省大日記」、七分之一的「公文備考」。也就是說，即使閱讀了日本現存所

有的「陸軍省大日記」和「公文備考」，也不過是看了舊軍部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即使在史料方面受到這樣的限制情況下，仍欲進行研究的話，對於「陸軍省大日記」有何種程度的利用價值。關於這點，本文按相澤淳「文書館：史料館めぐり 防衛廳研究所戰史部」(《日本歷史》533號，1992年10月)作說明。現存的「陸軍省大日記」記載著由1868(明治元)年至1942(昭和17)年為止的部分。大日記中分成好幾種類，自大正時期以降的分類方式如下述幾種。

i)甲 輯：諸規則關係的普通文書冊。徵兵令等法令修改等書類在此部分編纂成冊。

ii)乙 輯：甲輯以外的普通文書冊。

iii)密大日記：戰時動員

iv)機密大日記：戰時動員關係等，有「機密」之區分的文書冊。

也就是說即使是1927(昭和2)年的大日記，也有上述4種種類，因此，必需查閱圖書館架上所陳列之大日記目錄，才能找到所需部分的申請號碼。政治關係部分可找i部分，作戰等關係部分可找iii或iv部分。

至於其他處所收藏之史料，如下情形。

i)服部史料、堀場史料(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國防政策相關文書)

ii)宮崎史料(國防政策相關文書。參謀本部歷史草案及草案史料)

iii)榎本史料(海軍軍裁會議文書)

iv)千代田史料(第一次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前後之上奏書類、記錄等)

v)霞ヶ關史料(海軍軍令部關係史料)

戰史部刊行《戰史叢書》102卷，自此，從滿洲事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正式戰史公開問世！這些出版成果所憑據的史料，主要是有關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作戰指導的根本史料(大本營機密戰爭日誌)，該日誌並未全面公開，僅有一部分的《大本營機密日誌》(芙蓉書房，1979年)被出版。

但是，由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和外交史料館的研究者所組成的近代外交史研究會出版了《變動期の日本外交と軍事 史料と検討》(原書房，1987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森松俊夫(大本營陸軍參謀部第三課 機

密作戰日誌〉所作的史料介紹，由此可明確地掌握中日戰爭初期陸軍之戰爭指導觀。

四、國立公文書館

地 址：東京都千代田區北の丸公園 3-2

閉館時間：星期六・星期日

閱覽時間：9:00-17:00

利用資格：不論國籍，誰都可利用。不需介紹信。

電話號碼：81-3-3214-0621

在美國的話，除了一部分海軍關係文書之外，政府機關之公文書皆收藏在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Office，非常方便查詢。

但是在日本，若要查閱外交史料，得到麻布的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若要找舊軍方史料的話，則要到東京目黑區中目黑的防衛廳防衛研究所。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該館可說是具有總合性質的公文書館。所保管的書類包括曾經通過內閣閣議的文書類及各省的公文案件等，也就是與內閣相關的文書類，主要的文書類有如下列幾種。

「太政類典」是 1867（慶應 3）年至 1881（明治 14）年為止，由太政官所發出的布告、達、規則及報告，經繕謄，按年代、部門類別編纂而成，但是這部分和本文所設定的時代相異。

「公文錄」是 1868（明治年）年至 1885（明治 18）年期間的太政官文書，其中原議書是按年代別、省廳別分類編修而成，當然，這部分和本文所設定的時代也無直接關係。

「公文類聚」在 1882（明治 15）年改稱為「太政類典」。對分類門目作大幅更改，自 1886（明治 19）年開始，不再用繕寫方式，而是以原議書和說明資料方式收錄。有關中日戰爭關係方面，則可查閱外交門和兵制門部分。

「公文雜纂」是除了「公文類聚」之外的內閣起草案、或是往來公文書，按各省廳別、年代別，自 1886（明治 19）年至 1945（昭和 20）年編纂而成。除了條規、典例以外的公文或準公文書也按年代別、省廳別編纂成冊，例如有按內閣、宮內省、外務省、朝鮮總督府、台灣總督府、中日戰爭時期的第一、第二、第三委員會、資源審議會等機關別所編纂而成

的史料，特別是在各種委員會的史料中，可發掘出許多至今尚未被提出探討的有趣題材。

除了上述四種文書以外，還有「公文別錄」。其年代在 1868（明治元）年至 1947（昭和 22）年之間。照理是應該編入「太政類典」、「公文雜纂」中的，但曾因某種緣由，未經整理，擱置一旁。在本文所設定時期之範圍內，包含了 20 冊的總動員計劃關係書類。上述的「公文別錄」，已全部製成 106 卷的微卷，由「ゆまに書房」發售，利用相當方便。

「內閣官房總務課資料」，此文書一如其名，收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內閣官房相關文書。其中包括有關「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政策、為發動戰爭的次官會議（亦即次長會議，譯者註）、戰爭終結的相關文書等各種不同性質的文書都在內，對研究者而言具有相當的利用價值。

五、結語

近現代史可供利用的史料多如汗牛充棟，研究者必需有驚人的記憶力和過人的精力。此二條件，筆者皆缺，因此時常望著堆積如山的筆記資料感到茫然，不免興嘆：「這筆資料是否看過了」？「有關那筆史料的筆記到底放在何處」？不過，當這些性質不明、評價未定的史料，開始被賦予意義時，這批史料就令人產生難以割捨的魅力。

要靈活地運用史料並沒有捷徑，正如本文所述，需將各史料館的收藏概況作成筆記，並把每次閱覽的結果作成調查記錄，由平日所作的小事累積成爲一件相當可觀的大事，這是筆者切身的感受。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越飛與孫中山

——蘇俄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的一頁

林 軍*

早期蘇維埃俄國駐華代表及共產國際代表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的往來已爲世人熟知。然而，當時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蘇俄政府上層，尤其是蘇俄政府外交界內部對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是如何考慮、評價和決策的呢？其內部有何意見分歧呢？筆者謹利用俄國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九〇年代初解密的、未經公布的檔案資料，通過俄共中央政治局以及外交人民委員會與其駐華全權代表越飛之間的內部的往來信件，揭示早期俄國共產黨（布）和蘇俄政府對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的政策及內部意見分歧。

如果說引起共產國際重視孫中山的是馬林，那麼，使俄國共產黨（布）和蘇維埃俄國政府重視孫中山和國民黨的人，則應是越飛。越飛是蘇維埃俄國政府初期的首批駐華全權代表，他初抵中國時，面臨中國局勢之亂象，然而不到半年時間內，他明確提出了支持孫中山及國民黨的政策，並且首次以蘇俄政府特命全權代表的正式身份直接與孫中山接觸、會談，公開發表聯合宣言，促進了蘇俄政府及俄共（布）對於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政策，啓開了日後蘇維埃俄國對中國國民黨政策的先河。

越飛是一位資歷頗深、經歷不凡的革命家和外交家。或許因爲他具有像馬克思的猶太血統和資產階級的家庭出身，或許因爲他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讀書、在列寧的故鄉進行革命活動，這些背景使他有過於強烈的鬥爭意識和堅定的革命信念。他一直是列寧世界革命思想的信奉者和執行者。

* 哈爾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甚至，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俄共（布）領導所期望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顯然無望之後，越飛仍然念念不忘世界革命。所以，越飛不理解俄共（布）戰略政策的調整，跟不上蘇俄政府對內對外政策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而始終堅持列寧最初的世界革命思想，甚至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將新經濟政策的原則精神應用於對外政策的作法。他明確表示：「我是一個完全的新經濟政策的擁護者。但我認為我們的對外政策也轉向『商業核算』，這將是我們完全的破產」。¹

在中國問題上，越飛同樣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站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角度分析判斷中國問題。他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俄政府領導匯報指出：「我們在中國的處境非常有利，威信難以置信之高，我們可以在最為廣泛的範圍內推行我們全部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綱領」。他歸納自己的對華外交的策略是堅決拒絕具體問題的談判，而進行政治、外交和經濟關係的綜合在一起的談判。並利用這個談判「加深被壓迫民族對我們的好感，展示我們的政策與其他強國政策的區別」。²

越飛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國內局勢。1922年9月，即他到北京後一個月，就把中國的國內鬥爭納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範圍。他指出中國歷史上幾乎總是北方反對南方的革命，進而認為當時中國的鬥爭不僅是「革命的南方反對反革命的北方」的鬥爭，而且是「革命力量反對反動勢力，即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³

可以看出，越飛從支援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角度，初抵中國，便對南方的孫中山懷有好感。儘管如此，他對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的認識仍然有一個過程，雖然這一過程很短暫。

越飛對於孫中山雖有一定認識和好感，但認為孫中山存在很多弱點，因而，沒有明顯地傾向於孫中山。

首先，越飛最初並未把孫中山視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他給列

1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1995年第2期，頁50。

2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1號，頁3、7。

3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4號，1922年11月25日，頁2。

寧寫信時指出：「對於我們具有決定性的、最主要的意義的不是那些為人熟悉的中國代表人物。不僅吳佩孚或張作霖，就是以其革命精神最為貼近我們的孫中山，也不應該成為我們的中國政策所應適應的對象。我們所應適應的對象只能是民眾，是還沒有自己領袖，卻已經被喚醒起來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民眾。這一民眾是由一定程度激進的、部分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以及同類的學生和自由知識分子組成」。⁴他認為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真正力量存在於具有共產主義情緒的工人、農民和自由知識分子組成的革命群眾和領導者。然而，越飛卻認為「還沒有一個這樣的領導者」。⁵

其次，越飛雖然主張依靠廣大民眾運動，而不是寄望於某些個人，但他基本上仍按照俄共（布）中央的希望，協調孫中山與吳佩孚、張作霖之間關係。他提出實行高度革命、全面反帝政策前提下的對華政策：依靠廣大民眾的民族解放、民族統一運動，促使孫中山與吳佩孚聯合以建立孫、吳的中央政府；促使孫中山更加積極地實行他的政策，更加關注北京政府的事務，盡快地把國民黨建成真正廣大民眾的政黨。⁶儘管，在張作霖、吳佩孚和孫中山三人之中，越飛對於孫中山的評價最好，認為張作霖「不過是一個抓住東北三省不放的發了財的紅鬍子」，「靈魂深處充溢著朝廷惡習並夢想王位或自己兒子當總統」；而吳佩孚比張有教養、更聰明，但他在爭鬥中也僅僅為了個人的利益、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但是，直到1923年初之前，越飛一直認為應該繼續促使孫中山與吳佩孚接近，並認為這將加強中國的革命運動。⁷

越飛認為，在中國是革命的南方與反動的北方進行鬥爭，同時，北方張作霖和吳佩孚的實力雄厚，以至於他們「企望統治整個中國」，他們之間不可避免發生經常的爭鬥。孫中山由於接近日本及安福系，自然傾向張作霖而反對吳佩孚。蘇俄在中國東北的許多利益與奉系張作霖有關。所

4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5。

5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7。

6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加米涅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4號，1922年12月15日，頁88。

7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6號，1922年12月15日，頁9。

以，蘇俄政府希望吳佩孚與孫中山攜手建立聯合政府。孫中山給越飛寫信提到孫吳調和的最主要的障礙是吳佩孚以爲蘇俄政府會協助他與張作霖鬥爭。爲了消除孫中山的這一疑慮，越飛一方面回信向孫中山聲明蘇俄不會協助吳佩孚，同時要求列寧、托洛茨基和齊切林給孫中山寫信說明不僅不助吳反張，而且也不會反對張作霖。對於撮合孫中山和吳佩孚，越飛認爲不很容易，並斷定孫吳勢力一強一弱時，弱者是不會同意調和的（原文如此——筆者）。因而，越飛向國內匯報說：「儘管我竭盡全力，調和吳佩孚與孫中山始終沒有比此前更有希望、更現實」。⁸

再次，越飛雖然給孫中山比別人較高的評價，認爲孫中山是「優秀的中國革命者」，但他認爲孫中山身上還存在許多問題。他指出孫中山不太重視普遍的國際形勢，忽略了世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同時，他認爲孫中山過去曾與日本及親日的安福系有過很密切的關係。在孫中山眼裡日本是比歐美可怕程度差一些的敵人。⁹

越飛一方面認爲孫中山「毫無私利，工作不是爲了金錢或虛榮心」，同時指出孫中山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問題：「他在自己的鬥爭中仍然是一個純粹的主觀主義者。因爲，他被中國歷史上的現實誤導了。在中國對於不深刻的、不夠科學思維的觀察者來說，所有事件都是由個人所創造的，而不是民眾。難怪孫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他靈魂深處相信他是孔夫子直接、理想的繼承人，並認爲孔夫子之後，只有他一人能夠完成中國統一和解放的大業」。¹⁰

進而，越飛批評孫中山行事作風等問題：「他輕視民眾，一心想成爲國民黨的獨裁者（他要求每一個黨員宣誓效忠於他，並有權處決任何一個黨員）。由此也就引出他的軍事冒險主義。他深信在中國要取得革命勝利只有使用軍事力量。所以，他總是處於如何組織自己的軍隊和地盤的角逐之中。當他從廣東被驅逐出來時，他同所有人，包括吳和張秘密來往，而

8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4號，1922年11月25日，頁11-17。

9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4號，1922年11月25日，頁11。

10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8。

不插手日常政治活動，並不與任何一方最後談定。現在，當他在福建省取得勝利並奪取部分地區，他想打回廣東。這樣，廣東將更加廣泛地成爲他手中的省份。他完全忽視了這樣一種情形，即這些勝利使他與吳佩孚分離，而與安福（親日的）分子和張作霖接近。這樣，志在統一中國的孫實際上成爲分解的酵母、成爲已經形成的脆弱平衡失衡的原因。很清楚，對於孫以中國解放統一名義的革命的勝利將意味著孫對於全中國的勝利。」

11

除此之外，越飛還認爲，孫中山的重要缺點是不重視政治和群眾的運動，只注重於武裝鬥爭，並在這種缺點被指出後仍沒有明顯改進。越飛指出：「我現在通過孫的代表接近孫並試圖向他證明其政策的全部冒險所在。他口頭上同意我的意見，而實際上始終只要求一點：幫助他建立強大的軍隊。孫明白，沒有後方，他永遠不能建立這樣的軍隊。因此，他想在我們能成爲他的後方的、並能幫助他的地方建立這種軍隊，即在東土耳其斯坦（指中國西部省份——筆者）或最好（指與中國本土交通方便的地方——原注）在蒙古。這種要求他總是反覆提出」。¹²

總而言之，在 1923 年年初之前，越飛對於孫中山較之別人有好感，但沒有明顯的傾向性。只是到了 1923 年 1 月，曹錕控制了北京政府；吳佩孚勢力明顯衰弱，按越飛所說「以往的吳佩孚政府已不復存在」，而且，吳佩孚同蘇俄的關係有所惡化。¹³與此同時，孫中山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有了明顯的進步，越飛對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開始有新的認識。雖然他仍然不放棄吳佩孚和張作霖，但他對於孫中山已經有了明顯的傾向性和選擇。他向中央匯報中明確指出：「如果我們必須在吳佩孚和孫中山之間選擇的話，那麼毫無疑問應該選擇後者」。

越飛分析道：隨著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孫中山的成就特殊地加強了。如我以前所報告的，他不僅在他很早以前奪取的福建省得以鞏固，而且，他的將軍們不久前開始了討伐廣東。關於這一點，我也早就預言過。討伐迅即成功。因爲，第一，孫中山的主要敵人陳炯明因與英國的關係而

11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 8-9。

12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 8-9。

13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 7 號，1923 年 1 月 13 日，頁 5。

威信掃地。第二，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地方上的工作進一步消除了陳的影響。孫中山對陳炯明的攻伐一開始，就看出來後者無所依靠。一種可能是他逃跑了，另種可能是他還能堅持一下。但是，任何人也不懷疑，他的好戲已經唱完了。因此，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孫中山將在南方恢復自己的勢力。與此同時，他利用近幾個月時間進一步擴大勢力，實際控制整個南方，包括東土耳其斯坦也將掌握在孫中山手中。考慮到張作霖目前同孫中山的暫時合作，所以，後者近期差不多成爲整個中國的主宰，除了吳佩孚可能控制的一個省份和北京周圍不大的一片所謂中央的、正式的中國政府的基地之外。」¹⁴

1923年，越飛不願世界革命不可能爆發，因此蘇維埃俄國必須同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現實，堅持世界革命的思想 and 不斷革命的理論，在中國問題上提出了繼續革命的觀點，並從這一觀點出發提出了與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進行正式往來的建議。

1923年1月中旬，他給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俄政府領導寫信提出了在孫中山勝利發展的情況下「誰是真正的中國政府，我們應該同誰往來」的問題。他指出：「當我還在土耳其斯坦時，我第一次接觸中國事務，我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僅同中國中央政府發生關係，而當時華南政府從精神上更接近我們，並且可能有更多成功的機會，我們這樣做是否正確？」「但是，在那個時期（指越飛在土耳其斯坦工作時期——筆者），我們沒有可能同南方政府即孫中山直接進行接觸。如果現在事態發展將如同我們所預見的進行，那麼，我們同孫中山的聯繫可以通過蒙古和中國土耳其斯坦，那樣，確實能夠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像從前那樣去哄著爲帝國主義分子所控制的毫無用處的中國中央政府。而我們按照孫中山在他給我最近的一封信中所提的要求（我把該要求一併送上，請予以高度重視）去做，即轉入真正的革命政策，承認孫中山的革命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且只同它打交道，這是否更好呢？」¹⁵

14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7號，頁5-8。

15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7號，1923年1月13日，頁5-6。

越飛進一步指出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進步：「孫中山的政黨——國民黨及孫中山本人在我們思想的影響下，近幾個月，黨的性質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化；國民黨真正地變為中國廣大民眾的政治黨派；並且，該黨近幾天在自己歷史上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綱領」。「孫中山本人認識到並十分明確地承認，我幾經努力才使他相信的，即更加積極實行全國性政治的必要性以及僅僅使用武力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統一來實現中國轉變是不可能的。起碼，目前孫中山已經向現中國政府（北京政府——筆者）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到那裡，並從昨天起開始談判。這就證明了他想要用政治的、外交的，而不僅是純軍事的手段影響中國政治」。¹⁶

因此，越飛報告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陳述他南下與孫中山晤談的必要性：「我的南方之行是完全必要的，會是特別有利的。因為，首先，在那裡我能夠進一步弄清情況；其次，在那裡我不僅能夠極力影響孫中山本人，並且可以影響整個廣大的運動。在南方我還盡可能從事在與中國社會輿論的溝通關係，也就是我至今為止在北方所進行的那種工作。假如我沒有病，我反正得尋找某種藉口為上述目的現在去南方。」¹⁷

二

1923年1月，越飛通過與孫中山的代表往來以及他親自來到上海與孫中山直接接觸後，對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由於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吳佩孚的衰弱及其與蘇俄和孫中山的關係緊張，越飛最終放棄了原來撮合孫、吳的政策，或在孫、吳、張三者之間平衡選擇的策略，明確提出了選擇孫中山、聯合孫中山的方針。

1923年1月26日，他從上海給俄共（布）和政府領導的報告中指出：由於吳佩孚與孫中山關係緊張，由於孫中山在南方的勢力大大加強，即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軍事上控制了整個南方，我早就提出過的問題全部擺

16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7號，1923年1月13日，頁6。

17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7號，1923年1月13日，頁7-8。

在我們面前。「如果還記得，我早就完全絕對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假如我們不得已進行選擇的話，那麼，我們任何時候也不能支持吳反對孫」。他進一步指出：「當我在這裡與孫中山面識，親眼看到他所領導的運動的規模和作用，我就更加堅信不能支持吳反孫。因此，我不想完全掩飾同孫的聯繫和接近，而是相反，我極力要達成按照本信附件式樣形成的協議，作為俄羅斯與孫之間的協議而讓世人知曉」。

越飛來到上海親自與孫中山會晤商討，耳聞目睹，對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有了新的認識，肯定了孫中山及國民黨的進步。

越飛重申「孫是絕對純潔的革命者、真誠的熱心人」。「當指出他的錯誤時，他能及時承認並進行必要的改正」；並且指出孫中山糾正了以往的缺點，取得了新的進步：「我所經常強調的他不太重視民眾以及宣傳和鼓動工作的主要缺點，現在他已經糾正得相當不錯了。他不僅不久前發表了他的政黨的綱領，而且近日他還要向全中國人民公布宣言。他本人立即同意公布我與他會談的正式消息。他還將許多報紙抓在自己手中。週末，他前往廣州同海關工人和革命軍隊進行直接的思想交流並施加影響」。

越飛與孫中山討論了孫中山的行動計劃，並認為，「說實在的，在中國事務上，除了孫的計劃——盡快行動和行動失敗這兩點以外，目前再也想不出什麼別的了」。

關於孫中山的行動計劃，越飛向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領導報告道：根據孫中山的計劃，首先是徹底消滅陳炯明。戰勝陳以後，孫中山認為「同吳佩孚的衝突是絕對避免不了的了，因而，打算調動自己的軍隊反對後者，即從轉到孫手中的湖南省和四川省即孫認為有十萬自己軍隊的兩地反對河南省及洛陽和漢口吳所牢固控制的地方」。作為策應，張作霖進軍北京並佔領北京。孫中山戰勝吳佩孚之後，按照孫中山的設想，張作霖應當將北京移交給孫中山。這樣，孫中山便可以全中國的統一者進入北京。

在討論孫中山計劃時，越飛曾就進入北京的方式提出過問題：「為什麼不採用和平方式進入北京呢？我認為目前在北京政府混亂的狀況下，在北方完全崩潰的形勢下，由於孫知名度和威望的提高，他完全可以提出自己是共和國總統候選人，同樣可以（選舉的）全中國代表的身份進入北京」。對於這一問題，孫中山認為：「這或許是可行的，不過，按照中國習慣則毫無疑問會出現如下情況，如果他不用武力消滅自己的敵手而進入

北京，那麼，即便把他被選為總統也絲毫免不了一死。因為在這種條件下，他在北京也可能在胡同裡被人打死」。

越飛還與孫中山討論了由於缺少外援或其他不可預測的原因而使孫中山計劃失敗時的行動方案，即所謂完全依靠蘇俄的第二個長期方案。

關於這一長期方案，越飛向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領導報告道：孫中山認為「至今他所有失敗都是由於他自己的原因所致，即他始終以南方為基地，因而過多地依賴了帝國主義強國」。所以，孫中山想把「自己的新綱領建立在完全不依賴帝國主義強國、而純粹指望我們的基礎上。儘管，他斷定最明顯反對他的只有英國，而美國支持他。日本對他同情勝於敵視（在任何情況下安福系都擁護他）。法國對他淡然」。因為「在南方設立根據地，孫必須始終顧及到『強國』可能在任何時候隔離沿海地區，而使孫伏首就範。所以，孫認為，如果將自己的基地轉移到國家內地，比較靠近我們，那麼，與我們簽訂協議後，太平洋沿岸上強國的任何舉動都毫不足懼。當前，所稱的整個穆斯林中國，即東土耳其斯坦及其鄰省都在孫的強烈影響之下。這種影響還應該加強，以便在任何情況下與我們保持緊密的直接的聯繫」。關於孫中山計劃的具體運作，越飛繼續匯報道：「從四川出發，路經與吳勢力所控制地區不接觸的區域，即路經甘肅、陝西等地，運動孫在那裡擁有的十萬軍隊到蒙古邊境，經過東土耳其斯坦或通過庫倫布置在能夠與我們直接聯繫的地區的產糧和富庶的省份」。「這支軍隊由我們來武裝（武器以外的軍需、服裝等孫不希望由我們來弄，而必須有我們一定數量的軍事教官）。當這支軍隊訓練成具有相當戰鬥能力後（孫認為這需要一到二年），將展開孫最後的『北伐』。這次必然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強國的任何干涉都不足懼了，因為，即使隔離了沿海地區，他們也不能影響這一計劃的實現，而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敢冒險從沿海進入內地。只有一個日本可能從滿洲出兵，這沒什麼可怕的，因為真正的十萬軍隊足以抵住日本，守住邊境」。

關於孫中山計劃可能遇到的兩點困難及需要蘇俄援助的問題，越飛指出：首先，孫中山由於資金不足，可能無力組織軍隊反對吳佩孚，也不能取勝。因而，孫中山「需要數額為二百萬墨西哥美元（幾乎相當於等量金盧布——原注）的資金上的援助。孫懇切希望我們能給予他這筆錢」。其次，「張作霖奪取北京之後，由於吳牽制了孫的軍隊，他將變卦而不願意將北京轉交給孫。在這種情況下，同樣懇切寄望於我們的幫助，即我們出

兵滿洲，把張作霖的兵力從他所佔領的北京引出來」。對於孫中山所提出的困難，越飛答覆道：「我將盡快將在這兩種情況下我方提供幫助的問題請示我國政府。不過，我個人在我們能夠在資金上提供援助的問題上持極其樂觀地態度」，並認為這比蘇俄政府軍事上的幫助，即根據與孫的協議進攻滿洲現實、可能得多。越飛還曾提醒孫中山注意，當蘇俄進攻滿洲時，日本可能進攻蘇俄遠東地區。

越飛認為孫中山的行動計劃和長期方案是以他「所推薦的有計劃的政治——外交——軍事的手段行動」的方案。並且，這一計劃和方案完全依靠蘇俄的幫助和支持，孫只好同帝國主義者妥協，當然，也就同帝國主義者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妥協，而中國民族革命的勝利將拖延很長時間」。

越飛明確向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領導提出援助孫中山的問題：

1. 是否準備盡快給孫二百萬金盧布或別的什麼數量？如果同意，錢應該由信使帶來。
2. 我們是否準備在必要的時候攻擊張作霖，把他從北京引出來？
3. 我們是否準備在一至二年裡給孫十萬軍隊提供武器（並派出一些教官）。當然就裝備來講，這不應該是現代歐洲兵團。如果不成，那麼，多大數量，什麼時候我們能夠供給孫武器？

越飛在給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領導的信中強調指出：「如果中國的民族革命在中國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有了我們的幫助，這將說明就是我們把帝國主義摔倒在地，我們在全世界成為民族解放鬥爭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核心。如果中國當前民族革命的勝利沒有出現，僅僅因為我們沒有給予幫助，這將意味著帝國主義比我們強得多，是它戰勝了我們，而不是我們戰勝了它，因此，殖民地民族革命無所依靠了」。

最後，越飛進一步評價孫中山，強調對於孫中山的援助：「孫遠不是基馬爾（又譯凱末爾）。他更加是我們的人，更堅決的革命者。如果我們現在同他站在一起，他將永遠不會背叛我們。而且，中國在世界上的份量任何時候也不會比土耳其低」。「難道所有這些還不值什麼二百萬金盧布」？¹⁸

18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8號，1923年1月26日，頁14-39。

三

對於越飛關於孫中山和國民黨的分析、評價，以及他希望蘇俄能明確支援孫中山和國民黨的建議，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以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如何回應？其決策過程又如何？

1923年1月11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書面答覆越飛：

您（與馬林）關於中國的提綱在政治局會議上進行了審議。

總的看來，誰也沒提出任何意見，但提綱也未獲全部贊同和批准。

根據我們的建議，政治局僅作出了如下決議：

接受外交人民委員會關於贊成越飛旨在全面支持國民黨、建議外交人民委員會及我們共產國際的代表加強這方面工作的政策的建議。

這種支持，如您所知，很遺憾，只能具有道義上和政治上的性質。孫中山在資金和軍事援助上的期望值過高的願望，對於我們來說是不能勝任的。不過，實際地幫助出版報紙總算是被通過了。政治局打算撥款出版報紙，目前所缺少的是預算。

我想這種報紙如同大的中文日報（將來可以有每日英文附頁）。報紙由公司出版，而公司的大部分權力在我們手裡。編輯部是國民黨加北京的民族主義分子，其中可能有某些有名的知識分子。報紙本身固然是中國的，但是，很顯然，我們把它變為我們的武器。

在當地，最好您自己決定如何合理地組織它。

你還將通過電報知道這件事的有關數字和細節。

我覺得在這件事上應當鼓勵馬林參加。

我已同他談了此事。他很欣賞這件事。不過，他對國民黨的好感會使他想把整個的事都轉交給國民黨，而我們只不過是給予報紙一定的資金補助。

我認為這不是我方謹慎。我們應該保留我們對於報紙實際上的影響能力。¹⁹

1923年3月，加拉罕通知越飛中央政治局根據越飛的建議作出的關

19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加拉罕給越飛的信，1923年1月11日，頁1-2。

於支援孫中山的指示。加拉罕表明：「指示確定了當前我們準備提供幫助的性質和規模，遵循這個指示，必須同孫中山進行談判並根據我們的可能和意向制定新的共同計劃。在此我想指出，關於我們必須支持國民黨和孫中山的基本思想，如你所知，早就通過了。我們的意見分歧，或者更確切些說，是顧慮在於同孫中山合作可能使我們在北京的處境複雜化，給我們在中國官方中心駐紮和工作帶來困難。因此，我請您特別注意指示的第五條。其中規定在官方聲明中，我們不應該比積極同情國民黨民族解放和統一願望說得再甚了」。加拉罕繼續指出：「中央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曾提出過某些疑義：在多大程度上所有種類武器的軍校的組織工作可以應有的秘密形式進行，即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參加這一軍校的組織工作可不為人知。也曾經提出過這樣一種意見，軍校與其他別的方式相比或許是不太方便的幫助形式。我認爲您在同孫中山談判時對這個意見能予以注意爲盼。所附指示由3月20日政治局會議批准」。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如下：

1.我們認爲必須全面地支持國民黨和孫中山，但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贊同那種計劃，即含有我們武裝進攻義務或者多少能夠引起必須進行這種進攻內容的計劃。

如果現在我們被引入同張作霖的戰爭，這無疑會促進日本軍人集團地位的加強，導致日本入侵滿洲，還可能入侵我們遠東。其結果無論對於我們還是中國以及日本革命的發展都是巨大的損失。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即當日本革命的發展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而使它不能入侵的情況下，以驅逐那裡日本特務和白俄爲目的的武裝打擊滿洲才能被認爲是合適的。那時，我們作爲滿洲居民的保衛者、中國民主的同盟者、同時又是日本革命的幫助者進入滿洲。

在當今條件下把我們引入同滿洲的戰爭不是孫中山政治的考慮，而是他抽象的戰略考慮。這分明是一件有害的事。這就是孫中山計劃的這一部分爲我們堅決拒絕的原因所在。

2.我們認爲您從政治上對孫中山的那種評價，您給予他的建議，尤其是必須廣泛地進行思想政治上的組織和準備工作，只有也只能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革命軍事行動的建議是完全正確的。在這方面還必須進行一個工作習慣上的徹底轉變，即根據可能建立政治宣

傳的中心機構，以便孫中山在執行過程中能夠得到我們經常的建議。

3. 我們同意為孫中山的組織工作提供數目不超過二百萬金盧布的貸款用於中國統一和民族獨立的準備和組織工作。不過，必須用委婉、但要堅決的方式；通過必須有俄羅斯顧問參加的特別委員會來確保這些資金合理而又節約地使用。這一援助應該使用至少一年，分四批每批按五十萬金盧布提供。

4. 我們準備協助孫中山在北方某省或西部諸省組織一個大型集團。然而，我們物資上的援助規模很小（最多八千日本步槍，十五挺機槍，四門「奧利薩卡」炮，兩部裝甲車）。或許我們的軍事物資和教官不是用於建立野戰部隊，而用於建立所有類型武器的很像樣的軍校這種更長遠的計劃更為合適。這樣就有機會在北部和西部為革命軍隊培養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的幹部。當然，在為此目的地點選擇上應該經過最為精細的斟酌。

5. 在以這種方式實行與孫中山合作綱領的過程中，將來必須保持謹慎、掌握分寸。整個計劃必須嚴格保密。在官方聲明中，我們不應該比積極同情國民黨民族解放和統一願望說得更甚了。我們繼續同中央官方（指北京政府——筆者）進行談判，以確保同中國的和平關係不受近期將發生這樣或那樣事變的影響。

6. 美國方面在哪些問題上向孫中山表示給予幫助？孫中山從美國政府那裡是否得到資金援助？多大數量？他在多大程度上依賴美國？如果他計劃中止接受美國的援助，而僅僅依靠我們，那麼，這個計劃在物資方面對於我們來說可能是根本不能勝任的。從我們方面看，我們所關心的是孫中山將來不得已從美國那裡得到資金援助，因而不過分暴露我們與他的聯繫這一點。因此，完全可以把下述兩點聯繫起來，第一，孫中山力量中心逐漸的從東南沿海，即離開美國向內地轉移；第二，加強我們對於軍事政治方面工作的參與。

7. 國民黨在軍閥控制的省份有否地下組織？在吳佩孚和張作霖部隊裡建立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地下支部是否可能？或許這種準備工作能使孫中山的軍事計劃更為現實些。在這一工作中，我方的政治顧問可以參加。

8.看來，同中國政府開始談判從時間上是推遲了，然而我們認為，當您將這一談判進行到可以暫停的時刻，您回莫斯科討論由於中國和日本當前形勢給我們提出的極為複雜的問題和任務才是最為理想的。²⁰

俄共（布）中央及外交人民委員會對於孫中山及國民黨並非像越飛那樣有信任和把握，而存在某些疑慮，對於集中全力支持孫中山仍有疑慮。1923年4月19日，加拉罕給代替赴日本談判的越飛主持駐華代表處工作的副全權代表達夫謙的信中表示：「我們等待您及越飛同志對於3月21日發出的指示的答覆意見。儘管這一指示把賭注押在了孫中山身上，我在此還是要告訴您我們這裡、特別是在共產國際同志們那裡所產生的某些疑義。這些疑義是由中國普遍的軍事政治局勢引起的，是由每日從北京得到的電報中明顯表現出來的各種鬥爭勢力相互關係不確定性所引起的」。作為中國事務的主管和外交人民委員會支援孫中山建議的起草人，加拉罕希望駐華代表處能夠提出根據消除這些疑義。「與您談這些疑義，我是希望能夠得到你們的反對意見，或者不僅從軍事——政治角度、而且也從經濟角度提出見解。我們這裡所提出的問題如下：我們把孫中山當作在中國最為積極、最為接近我們的力量。這一力量由參加中國國內戰爭的一些具體領袖組成。它突出的表現出自己的民族特點並以其計劃和任務得到我們最大的同情。在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中孫中山及其政黨是最為徹底和最為可靠的。然而，無論如何，這還不足以使我們將所有努力和支持僅集中於孫中山。如果把孫中山軍隊可能取得的勝利成果不僅僅當作中國的統一，則孫中山能否起到中國俾斯麥的作用。他是否、能否以其綱領和策略聯合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人士，以奠定統一中國的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以往諸報告中越飛同志所注意到的孫的缺點在於：他只相信用軍事手段解決同其他督軍之間的糾紛，而認為組織和政治任務對於他來說只起次要作用。越飛同志使孫注意這一問題，孫似乎明白了必須開展廣泛的政治工作。孫是否採取了什麼實際步驟開展這一組織的和政治的工作，表現有哪裡，了解這些對於我們很重要。你們和俄羅斯通訊社近來的消息都是一樣的，僅是些『吳佩孚的不大的成就，孫中山不大的成就』。昨天收到的您

20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加拉罕給越飛信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決議，1923年3月22日，頁17-19。

發來的馬林的密電和我們所得到的其他消息提到孫與吳佩孚之間準備總的戰爭，而且認為張將參與這一準備之中的決定性的戰爭。我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所面臨戰爭的結局是決定性的，而雙方正在準備戰爭，這是毫無疑義的。您寫道，您委托馬林要求孫給張作霖施加壓力，讓張作霖接受我們關於多數（大概指在中東鐵路管理機構中席位——筆者）的要求。我認為，我們應該全面利用這一戰事的準備時期並努力實現我們在中東鐵路問題上的要求。看得出來，您已經考慮到了這種形勢並採取了最必要的措施。我請您在這方面繼續努力，並讓我們了解您採取的措施及結果。至於擔心吳佩孚在戰勝張之後有可能進攻蒙古，當然不能排除這種可能。然而，吳佩孚對孫中山和張開戰這還是遙遠的難以相信的前景。如果孫和張想得到我們必要的援助而對我們施加壓力，這一理由正好給他們本身施加了更大的壓力。我認為您應不惜口舌向孫和張證明不僅我們的援助，而且就是我們保持中立或確信我們是他們的後方，這對於他們都是很必須的」。²¹

在越飛的積極建議和努力下，蘇俄政府開始更加關注和重視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要求及時匯報情況。外交人民委員會儘管沒有像越飛所考慮的那樣是否應該承認孫中山政權為合法政府並只與它往來，然而卻提出在孫中山駐地設立領事的想法。加拉罕指示道：「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與南方保持經常的聯繫，以便了解那裡情勢的變化。因為，我們越日益重視孫中山並且給予遠遠超前的援助，同他保持經常的接觸對於我們就越發重要；通過他自己的話、通過他的委員得到的信息以及通過我們的委員和代表直接了解的關於孫中山的軍事力量和他所領導的地區情況對於我們也就越發重要。我認為，從這一點出發，在那裡設立我們的正式領事和全權代表、如同我們在煙台和廣東那樣，是異常重要的。請予以考慮並電告我們用什麼方式做這件事，而我們在這裡為您準備候選人」。²²

四

越飛在對外政策，主要是對華政策方面與中央政治局及外交人民委員

21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加拉罕給達夫謙的信，1923年4月19日。

22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加拉罕給達夫謙的信，1923年4月22日，頁1。

會之間有方針策略之爭，因而，在對待孫中山和國民黨問題上也存在著分歧。這在上述外交人民委員會的信和政治局的決議中已經很明顯了。此外，從越飛同他們的其他信件中也表現出來。

分歧的焦點在於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不可能出現的世界革命還是面對蘇俄所面臨的國內外現實。策略之爭在於不計經濟利益而以政治宣傳鼓動為主，還是更加務實、注意切實利益。在對待孫中山和國民黨的問題上的潛在分歧的根源也在於此。在對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問題上，俄共（布）與蘇俄政府的支持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問題上與越飛沒有根本分歧。分歧在於如何支援孫中山及其所領導運動的策略上：是公開地、明朗地支持孫中山或者承認孫中山政權並作為合法政府只與它往來，還是秘密地暗地支持孫中山同時與北京政府進行交往，以保持兩國關係平和。這些，顯然是與對於時局和政策這些深層次的不同認識有關係。

越飛主張在中國實行無私的對華政策，認為「我們一般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的政策的主要之點應該是顯示這一政策的完全無私性」，²³並認為在中國不僅不應該追求實際的經濟利益，反而，為了在中國的反帝事業，「甚至應當犧牲我們（蘇俄）的某些利益」，²⁴他明確指出，「我們對中國提出哪怕一點點帝國主義或半帝國主義性質的要求，就足以破壞我們整個的對華政策。而我所堅信的我們對華政策的失敗將意味著整個世界範圍內反帝政策的失敗」。²⁵他雖然作為官方代表公開否認蘇俄政府曾作過的無償歸還中東鐵路的許諾，但私下裡卻一直主張無償歸還該鐵路，反對在這個問題上的背信，認為「放棄中東鐵路表明自己否定沙皇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在中國人確信我們已經承諾歸還中東鐵路之後，我們為自己保留中東鐵路，或者要求中國人支付贖路金就意味著承繼沙皇政府的政策，徹底毀壞了對我們的信任」。對於蘇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的中東鐵路政策，他尖銳地批評齊切林是想得到錢，而對加拉罕，他言詞更為激烈：「如果不是在您面前，而是面對歷史的話，我將一百次地聲明：所採取的

23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2號，頁2。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1995年第2期，頁50。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1995年第2期，頁50。

關於中東鐵路的決定對於我們整個世界政策是極端自私的、非常有害的」。²⁶

越飛批評在列寧生病期間，俄共(布)中央在對外政策上所犯的錯誤，指出蘇俄政府的對外政策沒有確定的方針路線。²⁷在中國問題上，他批評俄共中央也犯有「印象派的毛病，並對中國具有新經濟政策的心理，即從中國那裡只想得到純粹物質上的好處」，²⁸並認為俄共(布)中央只注重中東鐵路和外蒙古等具體問題的談判而沒有重視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對華策略是「最為錯誤、最為有害的策略」。²⁹他指出，「兩者擇一：要麼我們的世界政治像過去一樣是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為爭取世界革命而鬥爭；要麼不是這樣，那麼，這也就意味著我不知道、也不了解我們目前的世界政治，自然，我也不能夠付諸實施。如果我們的政治是這樣，那麼在中國的工作應該帶有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的演示、宣傳鼓動的特點，因為在中國具有進行這種演示的最強烈的共鳴，具有進行這種演示的最為輕鬆、最為現實的可能性」。³⁰

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對華政策正如加拉罕所說，「現在，我們的對外原則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時期，即每一寸蘇維埃土地、每一個蘇維埃盧布都應該是我們特別關注的對象。不經過一番艱苦的鬥爭，我們決不向其他強國讓一分利」。³¹在對待孫中山問題上，加拉罕更多地是從策略上考慮。當他在無償歸還中東鐵路問題上遇到不能自圓其說的難題時，即他曾於1920年正式簽發給中國政府的外交文件包括無償歸還中東鐵路的許諾，後來，蘇俄國內外形勢好轉之後，他又指使越飛正式否認這一許諾而處境尷尬之時，他指示越飛：「哪怕孫中山曾經來信告誡我們全然不可同北京政府進行談判，我們手中也就握有論證我們中東鐵路問題觀點的很好的論據了」。加拉罕認為，既然孫中山曾經告誡蘇俄政府不要與當時的北京政府

26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1995年第2期，頁50。

27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2。

28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3。

29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2號，1922年9月12日，頁1。

30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列寧的信，頁6。

31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世界歷史》，1995年第2期，頁51。

進行談判，並指出與北京政府進行談判是危險的，所以，加拉罕估計孫中山不會同意蘇俄將中東鐵路歸還給北京政府。關於這一點，加拉罕給越飛寫道：「如果，孫認為同北京進行談判是危險的，並規勸我們不要這樣做，那麼，他未必能夠贊同我們將中東鐵路移交給與之談判危險的這個政府（指北京政府——筆者）」。³²

越飛 1923 年 1 月 27 日離開中國赴日本同日方進行談判時，仍然堅持他對於孫中山和國民黨的觀點。1923 年 4 月 12 日，他從日本給蘇俄黨政領導寫第九封信。在這封信裡，他除了堅持自己觀點外，還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整理。他在談到在吳佩孚和孫中山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時說：「在我的綱領中從來沒有以吳佩孚為目標，而是相反，從一開始，當我開始研究中國局勢時，我當時就指出，誰在中國將自己的命運與個人集團聯繫在一起，則必然要失敗。因為所有這些集團都不穩定、變化無常。最初，我就指出在中國存在的不是集團問題，而是民族解放和統一運動。與這一運動我們必須步調一致。對於這一運動我走得如此超前，我曾經建議你們在俄中談判時只能向中國提出忠於這一運動的領袖所能接受的那些要求。如果我在集團問題上對於孫作了某些例外，這正是因為不僅把他視為較好的集團，而且，還把他當作如他自己所說的『個人化的革命』。同時，我認為必須同所有別的有影響的集團保持過得去的關係。同北京政府保持關係，因為與它終究擺脫不了官方的關係。同吳佩孚保持關係，因為他當時曾是獨裁者，因此我同他保持不間斷的書信和其他方面的聯繫。最後是同張作霖。我同他的代表們在去長春的途中及在長春市內進行過談判，而在從長春返程至瀋陽時本應該同張會見，但因我抱病而未能實現。然而，我強調一下，我始終寄希望於民族解放和統一的中國，我甚至預言說，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即我們必須在『個人化革命』的孫與其他人之間進行選擇的時刻，並預先指出，那時我們只有選擇孫中山。這就是我過去和現在的綱領。在談判的準備期間，我甚至得到了民族主義者關於成立自己的委員會的許諾，我們同該委員會甚至就俄中會議上提出的棘手問題都能達成協議。有目共睹，我的綱領與赤塔（Chita，曾是遠東共和國的首府）政治嫩手們的大學生似的爭論——中國的哪集團對我們更合適、應該指望哪個，毫無共同之處。這也正如你們所看到的，並非全然像通知我的那樣，

32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加拉罕給越飛的信，1923 年 1 月 11 日，頁 4-6。

如托洛茨基所寫的，政治局同意了我的中國政策」。³³

越飛進一步闡述自己對孫中山的政策：在中國反帝情緒高漲時，「在民族旗幟下的孫的運動也廣泛發展起來。到處以接待共和國總統的儀式迎接孫。但對於他所需要的二百萬（上封信我所提到的），他始終想或者以他的廣東鐵路作抵押而得到；或者從近來突然變得慷慨起來、大概是想為自己保住澳門的葡萄牙人那裡得到。北京最後的一封電報通知說全中國的軍閥都反對孫，孫幾乎被包圍了。我了解孫的戰略計劃，我不太相信這種危險性。此外，孫還有一支力量，在我們的促使下他開始特別注意這支力量，這就是廣大的民眾。這些中國南方的民眾幾乎把他當作半個上帝。因此，我不相信軍閥反孫的成功和勝利。何況，他最強的敵人英國人目前顯然與他和解了，英國香港總督好像是第一次在孫途經時為孫安排了隆重的早宴」。³⁴

1923年3月17日，越飛給加拉罕寫信強調支持孫中山的重要性：「您以及中央委員會不明白，我們拒絕對孫的幫助全然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因為，這客觀地把孫推入英國和美國的懷抱。而且，如果我們真的不能夠幫助他，那我們總不應直接拒絕，而應該作出點許諾，那怕是便宜的小包裹作作幫助的樣子」。³⁵

越飛甚至表示他離開日本回到中國時，將不是去北京，而是直接去廣州。「這樣，首先，因為孫建立了聯盟而進一步使我們可能同孫和北京政府的談判達成具體協議；其次，同北京的談判拖得越晚越好」。³⁶

越飛對於俄共（布）中央和外交人民委員會在中東鐵路等問題上向中國提出「繼承沙皇政府的政策」的要求，而在支援孫中山和國民黨問題上謹小慎微，不以為然。他在談到孫越宣言時不無微詞地寫道：「在上海我

33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9號，頁1-3。

34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9號，頁6-7。

35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加拉罕的信，1923年3月17日，頁58。

36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9號，頁9-10。

們促成與孫中山的接近，使我們能夠在連民族主義者都不能接受我們的要求時躲在他寬大的背後；多少掩飾了我們對華政策中的帝國主義毛刺」。

蘇俄國內在支持孫中山工作的具體運作上，與越飛的強烈迫切要求有一定距離。因而，1923年6月28日，加拉罕給越飛寫信解釋道：「從您的電報中可以看出，您主張盡快落實我們援助孫的計劃。我們也認為，原則的問題決定之後，我們就決定最大限度地支持您的建議，要是拖延執行則是絕對不能饒恕的。需要說明的是如此拖延是由於這種情況造成的，即我們不希望您不在的時候做這件事，並且以為您能很快回中國。現在，當完全清楚了，由於健康情況影響了您以及您同日本的談判，使您還將在日本停留相當一段時間，那麼，援助應該開始，不等您返回。從這個意義上，我在前封信中給您在蓋克爾啓程赴北京之前給我他所作的指示。具體計劃應該在北京一起研究制訂，並得到您的同意後通知我們，然後再也沒有任何耽擱地最快地付諸實施。達夫謙（Ia. Davtian，駐華副全權代表一筆者）已前往日本到您那兒去。我想，他將與您討論該問題的所有細節，以便回北京後能開始落實。在您的一封密碼電報中提到必須答應給孫一定數量的資金。我認為，資金方面的援助不應該脫離總計劃，因而，在總的計劃被批准和開始執行之前給他撥款，似不合適。但是，如果實行援助的總計劃的最初某些步驟之一是給他撥款，我們當然不反對這樣做。我們辦理貸款的機關，在我們未使中央知道撥用資金的計劃、程序和日期之前，不會給我們相應的撥款」。³⁷

越飛認為中國還沒有共產主義思想的民眾運動領袖。他向中央和政府匯報中極少提及中國共產黨，顯然中共沒有引起他的關注，與之也少有接觸，因而主張全面支持孫中山和國民黨。他的副手達夫謙與他的觀點基本一致，他們領導的駐華代表處在孫中山問題上不僅與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意見有所不同，並且與共產國際的觀點也有分歧。副全權代表達夫謙在越飛訪日時代之向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的報告中重申越飛的關於對華政策的觀點。達夫謙明確表示對於越飛的觀點，他「完完全全同意」，儘管越飛曾與他發生過某些爭論。達夫謙認為在中國

37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第9號，頁48-49。

的政策應該「寄希望於民族解放運動。在現時民族解放運動的代表和最為徹底的是國民黨。就是因為這一運動促使中國擺脫了目前完全的無政府狀態和外國的干涉。也只有民族解放的強有力的中國才能夠與世界帝國主義對抗，並在與帝國主義鬥爭中與我們一起成為我們的盟友。毫無疑問，現時，孫和國民黨是這一民族解放運動的唯一代表。在這方面，國民黨既依靠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也依靠在階級關係上還未明顯分化出來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分子」。達夫謙對於俄國國內對於孫中山政策的疑慮提出不同意見。他指出：「我完全不清楚共產國際的立場以及某些同志所產生的對於中國普遍形勢估價的疑義。不過，我從其他渠道有所耳聞。共產國際的某些同志認為必須努力優先加強共產主義的運動，尤其是在北方。這些同志甚至認為能夠建立不依賴國民黨而獨立行動的群眾性共產主義組織。我個人認為這是過分的希望。共產主義運動還非常薄弱。無產階級在階級問題上還不夠覺悟。另一方面，這裡的、甚而無論哪裡的工人運動與一般的民族運動過於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因為，階級鬥爭在相當的程度上應該是反對外來帝國主義者的鬥爭。我認為，共產黨趁還繼續留在國民黨中的時候，應當努力進行無產階級的階級教育，努力準備將來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並加強工會組織。然而，目前共產黨與國民黨分離，從分散力量角度講似是很大的錯誤。同時，我們應該利用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機會對國民黨施加經常的壓力，以加強純政治的工作來影響國民黨的總的政治路線」。達夫謙總結自己的觀點：「總之，我認為我們在中國的政策應該是長期支持孫和國民黨。不過，我們的支援應該始終以國民黨廣泛開展政治工作，加強在北部中國和滿洲的組織工作為條件。在中國唯一具有生命力的力量，就是現時以孫為領袖的國民黨所代表的民族解放運動。支持這一運動，緊密聯繫國民黨，我們就能夠影響政治發展並擁有孫為首的牢固而永久的盟友。孫是中國的中心人物，是所有人眼中的民族解放思想的代表。正因如此，他的威信很高。因而，與各種軍閥集團不同，他不實行個人的政治」。³⁸

為了答覆越飛提出的問題，確立蘇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與其駐華代

38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達夫謙給外交人民委員會齊切林、中央政治局斯大林、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耶夫、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1923年4月12日，頁5-6。

表之間的關係，也許身為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加拉罕想讓激進、激烈而又恃才傲物、桀驁不馴的越飛溫順一些，他引據政治局決定給越飛如下指示：

由於您提出的全權代表應該服從誰，是外交人民委員會還是中央的問題，該問題在中央進行了討論，23年1月4日作出決定如下：

- 1.全權代表直接服從於外交人民委員會，一切問題同後者聯繫。委員會的命令對於全權代表來說是必須無條件遵行的。
- 2.全權代表有權向中央申訴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命令，但在中央解決這一問題之前不得中止執行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命令。
- 3.對於蘇維埃政府中央機關的一切命令，全權代表直接、並也只能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獲得。³⁹

對於加拉罕的上述指示，激烈而又激動的越飛直言反擊，不僅衝著加拉罕，而且直接抨擊俄共（布）中央。他明確講「我並不認為，委員會（指外交人民委員會——筆者）的命令對我來說是必須執行的。這不過是與中央書記處某個人咬耳朵而弄到了寫這麼一張紙的權力。而且，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想像，中央在政治問題上能強迫無條件的服從」。「您以為中央不可能改變觀點的結論是誤解和不了解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我整個的外交生涯主要歸結為，用我的話說，我不得不『與莫斯科和平談判』，而不是同我們的敵人談判。如果您稍微動動自己的腦筋，您大概會記得，在一百回之中，中央最終有九十九次採納了我的觀點」。⁴⁰

這是越飛的老毛病。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當越飛在柏林任大使的時候，他看不慣齊切林的不規律的工作習慣，不願意與齊切林共事。對此，列寧曾經寫道，「我非常尊重越飛的工作，並無條件地贊成他的工作。但我堅決要求越飛控制自己像一個外交人民委員會領導下的大使，遵守禮節，不罵人，不蔑視他人，一切重要事情都要徵求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意見。只有這個時候，我才能夠並將支持越飛大使」。⁴¹

作為步入仕途的外交家，越飛過於鋒芒畢露，桀驁不馴。這就決定了他坎坷、短暫的政治生涯和命運。他公開對抗中央，蔑視並不服從外交人民委員會，固執己見。看來，他被召回不僅僅是考慮他的身體狀況。1923

39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加拉罕給越飛的信，1923年1月11日，頁1-3。

40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越飛給加拉罕的信，1923年3月17日，頁1-2。

41 《近現代史》（俄文），1990年第3期，頁98。

年 7 月 19 日，他的上司加拉罕受中央的委託婉轉慎重的通知越飛，中央認為與日本的談判中，俄方被日本人利用了。加拉罕順便提起越飛曾經挖苦他的話題：「當您在北京被建議去日本時，我私下就擔心過。當時向您和中央表示有很大的危險性，即越飛到日本將被利用來安撫社會運動。因此，中央決定建議您從日本人那裡獲得日方要求的確切表示並盡快離開日本」。莫斯科將委派新的代表與日本談判。最後，加拉罕通知越飛他將奉命前往中國：「同樣應該通知您，爲了重新進行將來的談判，中央已經任命我進行這一談判。不管何時重新談判，我過七至十天啓程前往遠東」。

42

越飛曾追隨列寧，又傾向托洛茨基。儘管他認為托洛茨基等不應該以全體反對派名義發表的 1927 年 8 月 6 日聲明，並且認為聲明中存在許多錯誤，⁴³但他終歸是反對派的一員，他的政治命運卻客觀地與托洛茨基爲首的反對派有著不解之緣。

越飛和孫中山都學過醫，但他們的健康狀況卻都不好。在孫中山病逝二年後，這位疾病纏身、政治失意的富賈之嗣，拒絕了萬貫家產，而爲自己的醫療費用受窘，最後在失意中悻悻然飲彈自斃。正如 1927 年 11 月 16 日，他在清醒的遺言中所說的那樣：「我畢生堅持這樣一個觀點：社會政治活動家應該善於適時地離開人生，像演員離開舞台那樣，而且過早要比過遲好。……三十多年前我就信奉並遵循這種哲學，人生只有它爲了無限的事業，對於我們來說就是爲了人類時才具有意義。……」

（筆者謹利用此機會向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給予我閱檔方便和幫助的有關領導和工作人員表示由衷的感謝，並感謝爲我在莫斯科大学訪問期間提供科研和生活方便的亞非學院院長麥立克謝托夫博士。）

42 俄羅斯外交部歷史檔案管理局檔案，加拉罕給越飛的信，1923 年 7 月 19 日，頁 1-2。

43 《托洛茨基檔案——蘇聯共產黨反對派》（莫斯科，泰爾拉出版社，1990 年），第 4 卷，頁 80-81。

新書評介

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黃自進。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年1月，248頁。

本書是以作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所發表的諸篇論文為骨幹，重新改寫而成。是台灣學術界第一本有關吉野作造的專書，也是日本或者可謂是全世界第一本專門探討「吉野作造中國觀」的專著。吉野作造（1878-1933）是位活躍於大正時期以及昭和初期日本輿論界的知識分子，曾被稱譽為大正民主運動的旗手，對當時的輿論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誠如入江昭（Iriye, Akira）所評述的，吉野的外交思想反映著其企圖創造講求道義的「和平國際關係」，這種理念在當時而言，已是「異端」代表，¹何況其對輿論界的影響力在二〇年代末期後開始逐漸衰微。他的中國論，由於初期階段對日本侵華政策的肯定，因而頗能獲得共鳴。爾後，鑑於他開始提倡對中國的「同情與尊敬」，這些改變使他與當時的輿論走向背道而馳，為此他也飽受批判。²

這樣一個異端代表，被作者選為研究對象，自然有其特殊考慮。也就是說，作者的日本研究，意涵著作者企圖跳越「日中敵對論」的既定框框，而試圖以一個全方位的角度來探討近代日中關係。然後以這個角度為基軸，追索大正民主運動為何失敗，日本的民心為什麼會轉向侵略戰爭。當然，作者在做此嘗試時，也深深理解以「從民主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為基軸的日本研究，會引起日本學界的眾多爭議。再加以，只以吉野為焦點而想掌握日本的政治思潮也是很困難的挑戰。不過，很顯然的，在面對這些眾多的挑戰下，作者仍堅持自己的想法，以吉野為焦點，而綜合投射於吉野的各種社會因素為研究線索，試圖對近代日中關係作一全盤性的解析。以一個台灣學者在大量活用日本史料的情況下，而勇於做如此嘗試，此一創舉本身就對東亞世界的相互理解以及分享東亞世界的歷史經驗有

1 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社，1966年）。

2 狹間直樹，《吉野作造と中國——吉野の中國革命史と日中關係史について》，《收入吉野作造選集》7（1995年8月），頁399-418。

相當的貢獻。以下，僅對本書的內容做一簡單的介紹，並兼評其內涵。

本書的主旨是在討論吉野中國觀的形成與變遷。以此為主軸，進而探討吉野民主理念的成形與反日本政府帝國主義侵華政策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吉野在日本政論界的崛起與沒落並其與日本近代政治思潮演變的因果關係。根據作者研究，吉野判斷中國情勢有三大考慮：第一、哪一股政治勢力應被視為是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心。第二、日本對中國實施以掠奪利權為主旨的帝國主義政策是否理性。第三、中國國民是否有政治獨立自主的能力。本書以呼應這三大要素為原則，因而選定吉野對中國革命、二十一條要求、及五四運動的看法為其探討的主題。作者的探討方式，首先是對各探討主題的背景做一概述性的說明，之後介紹日本輿論界的看法，最後則對吉野在日本輿論界所扮演的角色做一定位。本書以其說是吉野個人研究，不如說是藉由吉野為線索，對日本的輿論界以及輿論的動向作一全面性的探討。因此，本書分析的重點不是以吉野的心理狀態或是生命歷程等內心世界為主，而是將其焦點集中於當時的社會狀況等外在環境對吉野造成的衝擊。

本書的序言，主要是對既存的研究作一整理，進而介紹本書的主旨，其中也述及作者對大正民主運動的觀感以及吉野個人的簡歷。

第一章「吉野作造對中國認識的背景」。在第一節「大正民主運動的時代意義」中，作者將介於明治與昭和之間的大正時期，定位為政治社會全面爭取民主平等的萌芽時期，強調它的主要精神是向舊秩序挑戰，並謀求社會多元化。此一時代的訴求與以強調國家利益為首的明治時代或與以軍國主義為號召的昭和初期皆有所不同。作者並根據三谷太一郎的論點對日本的近代政治史作一整理。第二節「吉野的政治思想與其中國觀」，作者將吉野在生涯中鼓吹民主運動的種種歷程作了詳盡介紹，尤其是吉野在人生中的各個轉折都一一作了解析。例如明治時期的吉野雖然也高唱民主主義，但一切仍以國家利益為最高考慮原則。大正7年（1918），「搶米暴動」的衝擊是促成吉野將基層的民眾利益也開始納入國家利益一部份考慮的重要關鍵，也是吉野從提倡「民本主義」，轉而倡導「民本社會主義」的轉捩點。在第三節「威爾遜主義與吉野在日本政論界的興衰」中，作者認為吉野定義下的民本主義提供日本在天皇體制下仍有拓展民主政治的空間，此一理論上的新建樹也進而對謀求社會多元化的大正民主運動有實質上的貢獻。此外，威爾遜主義在全世界盛行的時候，吉野可謂是威

爾遜主義在日本的代言人。吉野既然以威爾遜主義的日本代言人的角色活躍於日本輿論界，威爾遜主義在世界論壇上的評價，自然也影響到吉野在日本輿論界的地位。這也是大正 5 年（1916）到 8 年（1919）期間是吉野在日本輿論界的最盛時期，爾後隨著威爾遜主義在世界政壇的挫敗，吉野的影響力也緊接開始衰落的原因所在。

第二章「吉野作造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在第一節「早期的看法」中，作者強調始自明治 39 年（1906）吉野在中國生活的三年體驗，並沒有養成他對中國事務的關心，也沒有結交到中國人的知己朋友。在吉野眼中革命黨不過是僅僅一群激憤於現行政治的不滿勢力，還談不上有推翻清廷政府的實力。而使他新燃對研究中國問題發生興趣的是在明治 43 年（1910）他奉派出國留學歐洲之時。留歐三年中，他常在基督教青年會裡聽到王正廷的事蹟。這使得曾經斷言「中國沒有人物」的吉野，深感對中國應有再研究的必要。大正 3 年（1914），吉野開始與流亡日本的中國革命志士來往。但是這些來往，並未促成他改變既有的中國觀以及對革命黨的既定認識。而這些既定的認識反而成爲他容忍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條要求的理論基礎。第二節「從否定到認同」。這一節分兩部份。在第一部份「對中國革命改觀的肇因」中，作者強調大正 4 年（1915）護國軍的起義是促成吉野對革命勢力改觀的重要關鍵。護國軍剛開始起義之時，吉野是主張中立，爾後則轉而支持軍務院。吉野對南方的支持一直持續到袁世凱暴逝南北重歸統一。吉野支持南方，是基於這批革命志士皆有國外留學經驗，理解民主主義，極富愛國心。吉野稱譽這批革命志士爲「青年中國（Young China）」的表率，期待他們是一群和孫中山迥然不同的新革命黨。對於孫中山，吉野在其於大正 7 年（1918）辭去大元帥職位後，開始賦予好評。在第二部份「全面支持北伐政策的思想背景」中，作者對吉野支持國民政府以及蔣介石的思想背景一一作了介紹。也就是說，吉野認爲國民政府是中國眾多勢力中，唯一可信賴，可與日本共謀東亞大局，化解日中雙方日趨緊張局勢的政治力量。第三節「吉野論孫中山」。這一節也是分兩部份。在第一部份「早期的認識」中，作者首先追索吉野爲何直到大正 8 年（1919 年）間止，對孫中山還仍持否定態度的緣由。根據作者的研究，意識形態以及性格上兩者的差異，是造成吉野不能認同孫中山的主要障礙。吉野是一位民族主義者，而孫中山則是以世界主義爲理想。其次，孫中山重理想，輕實務，這種性格上的缺失，也構成了吉野對

孫中山持負面評價的緣由。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吉野研究中國革命的資訊以及人脈關係皆傾向於黃興，這些都是吉野難認同孫中山的重要因素。此外，作者也指陳吉野以民族主義的觀點肯定中國革命的同時，卻仍以民族主義的立場支持日本的對華侵略政策。換句話說，此時吉野還未曾體會到，在對民族主義的詮釋上，他有自我矛盾之處。在第二部份「從改觀到全面肯定」中，作者強調吉野對大正 8 年（1919）五四運動的肯定，進而對五四運動青年學子的期待等等事實演變，促成吉野表達了有異於二十一條要求時期的中國觀。而這些改變無疑的與吉野對民本主義的認同，從知識性的認知提升到實質性的推動以及開始關心社會主義、國民福祉等自我本身價值理念的轉變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吉野的這些改變也反映在他對孫中山的評價上。大正 9 年（1920）起，吉野開始稱讚孫中山在中國民主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思想啓蒙者的角色。很顯然的，他對三民主義的肯定與他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有互動關係。而他對孫中山的再評價，無疑的也加深了他支持中國革命的信念。探討吉野對勞工運動的參與，對搶米暴動的觀察以及對社會運動的傾心等等事實的演變與他孫文觀改觀的關連性，可謂是本部份的主題。

第三章「從『二十一條要求』看吉野作造的日本在華權益觀」。在第一節「二十一條產生的背景」中，作者將焦點置於日本在華權益取得的過程以及制定對華侵略政策的理論基礎上，並對此作了詳盡解析。第二節「吉野全面肯定二十一條的理論基礎」，作者對吉野為何全面肯定二十一條要求的來龍去脈一一作了分析。根據作者的研究，吉野之所以肯定二十一條要求，可從主客觀方面來闡釋。主觀方面，他以日本人口增加的比率及經濟發展的需要為理由，強調擁有中國市場對日本的重要性。客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歐洲列強都無力顧及東亞，此一時機的提出，有利於日中兩國單獨交涉。總而言之，吉野認為中國已成爲全世界列強分割競賽的最後一個對象。如果日本在中國分割競賽中不能首搶先機，則對日本未來的發展有重大不利影響。作者並根據吉野的專著《日支交涉論》，將吉野對二十一條每一條要求的評價一一加以介紹，對此一時期身爲帝國主義信徒以及相信權力才是一切國際關係基礎的吉野有深刻的描繪。在第三節「吉野對山東權益讓步的原由」中，作者將吉野支持日本政府在青島問題的讓步，歸因於吉野對時代的風潮與二十一條要求時期有迥然不同的認知。作者認為導致吉野改變最重要的因素是來自於威爾遜所倡導的超越

權力的新國際關係論。吉野在威爾遜主義的影響下，開始倡導「講求道德」，認為此一原則應成為新時代的外交準則。對於山東問題的善後，吉野的立場是支持威爾遜所倡導的由國際聯盟代為管理，反對中國代表團所主張的直接歸還論。至於日本在中國本土以及在滿蒙地區的既有權益，吉野仍維持強勢主張，認為日本應在中國維持一特殊地位。作者以大正 5 年（1916）鄭家屯事件以及大正 6 年（1917）張勳的復辟事件中吉野的言行為例，對此時刻的吉野中國觀，有一生動的介紹。第四節「吉野全面否定二十一條的思想背景」，作者指陳吉野對二十一條要求改持全面否定立場，是昭和 3 年（1928）北伐軍進入北京，國民政府完成關內統一大業後才徹底顯現出來。吉野的此一否定立場，反映到現實外交事務上，就是聲援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政策。對吉野的在華權益觀的徹底改變，作者從吉野對國家利益的再認知，和對中國革命的再肯定兩方面加以探討。簡而言之，大正 7 年（1918）的搶米暴動，使吉野體認到政府的政策並不能保證一定能代表國民全體的利益，而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往往也不過是假國家利益之名，以飽政客或資本案個人私慾的帝國主義政策。此外，北伐軍統一關內，國民政府成為名符其實有實質管轄能力的中央政府之時，也促使吉野認為日本已沒有理由再堅持他在華的特殊權益，兩國應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重新檢討兩國所有的既定條約。

第四章「吉野作造對五四運動的觀察與評價」。在第一節「日本朝野論五四運動」中，作者將日本政府以及輿論對五四運動起因的評論，細分成煽動說、中國人的排外意識說、對日誤解說、抵抗日本侵略說、經濟利益衝突說、社會進化過程中的失調現象說等六大說法。其中尤以前三類的說法最為普遍。而這三種說法雖各有立論基礎，但也有共通之處。就是將五四運動中的反日情緒，歸咎於中國人對日本的誤解和中國人的自大心理或是第三國（美國）的煽動。第二節「吉野對五四運動的全面審視」。這一節分兩部份，第一部份「對五四運動的觀測」。作者指陳吉野自始就不將五四運動視為一反日運動，也對當時朝野之間最盛行的（美國人）煽動說持否定態度，對他而言五四運動是中國國民自發性的群眾運動。吉野認為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利，只是觸發五四運動的導火線，而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才是促成五四運動發生的主要原因。吉野以北京學界興起的新思潮為焦點，來審析知識分子的覺醒與五四運動爆發的互動關係。吉野所謂的新思潮是指以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等受過現代化教育為核心的新知識

分子團體，在北京所推動的社會倫理以及文學的改革運動。此一改革運動，在北京行之多年後，再加以深受威爾遜主義在全世界盛行的鼓舞，因而能一躍成為中國改革的先鋒，在中國知識界掀起一股勇於向傳統挑戰，全面求新求進的變局。根據吉野的研判，五四運動具有外交上的意義，也有內政上的含意。五四運動有兩個目標，一是排斥中國的專制政治；另一是對抗外在的侵略主義。在第二部份「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中，作者首先對日本應如何因應被定位為反日的五四運動，當時日本言論界最盛行的出兵說、強硬說、現有基礎上的中日親善說等三種言論一一加以介紹。這三種時事建言當然與不將五四運動視為反日運動的吉野所提出的對策是迥然不同的。針對官方及民間兩個不同層面，吉野提出了不同的因應對策。吉野認為五四運動所凸顯出的反日訴求，只是因日本的對華政策支持了中國專制政府，阻礙了中國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發展，鑑於此一原委，他反對日本官方有任何積極性的動作。至於民間，他認為兩國民眾既然皆受困於專制政府，就應攜手合作，一起為牽制日本專制政府的侵華行為而戰，一起為促進兩國的民主化而戰。第三節「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此節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肇因」。在這一部份，作者指陳早在五四運動以前，以吉野為首的黎明會及以李大釗為主幹的《每週評論》，已有相當密切的來往。而雙方交流的基礎是建立在對威爾遜理想的共鳴，對民主政治的信仰。在第二部份「挫敗及影響」中，作者檢驗了吉野所策劃的文化交流。在五四運時期，將日本政府視為「侵略日本」，而將日本民眾視為「和平日本」的吉野在歷經曲折後，終於在推展中日民間交流上取得成就。此一成就的事實莫過於大正9年（1920）北京大學教授高一涵率領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訪問日本。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之所以順利成行，象徵著日中民間志士對民主政治的嚮往以及對威爾遜主義的信服。但此一交流計劃只實施了第一階段，爾後則因日本政府有計劃的打壓，胎死腹中。不過，在此作者特別強調兩國青年學子之間在首次交會中並沒有達到思想的交集，應是雙方交流無法持續的主因，而日本政府所代表的外在壓力，不應斷言為問題的癥結。所謂沒有達到思想的交集，按作者的解釋，就是指代表日本青年學運的「新人會」雖然以社會主義同好的態度，來接待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但卻忽視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中國當今學運的具體目標，而「新人會」卻對此毫無自覺，雙方之間已喪失合作的基礎。爾後，雖然吉野還一再致力於日中親善，但他與日本青年學

運、社運之間的意識鴻溝卻愈來愈深，以致他一手所栽培的青年領袖皆未曾繼承他的理念，在進入昭和時代之後，皆被捲入日本舉國一致的侵華浪潮中。

在結論部份，作者特別指陳促成吉野對二十一條要求評價前後不一以及對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由肯定轉為否定有三大要因。一是國際民主主義的興起，二是日本搶米暴動的爆發，三是國民政府的北伐成功。作者強調九一八事變是吉野與社會民眾黨分道揚鑣的關鍵。吉野與社民黨的分歧，並不是在於雙方對理論的認同不一，而是在於日本民眾是否可因垂涎中國東北的物質資源而認同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吉野評九一八事變是由軍方發動受到民間支持的帝國主義行爲。此一評判同樣也適用於自九一八事變開始長達十四年的日本侵華戰爭。作者認為吉野在九一八事變時期與社民黨、日本民眾的分歧所在，無疑地也是解釋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侵華戰爭本質的最佳寫照。

從以上的簡介可知，本書是在大量參照吉野本人的論著以及廣徵博引日本外務省文書等相關史料後撰寫而成。如果與既存的有關吉野中國觀研究做一比較，可發覺作者無論在取材、論述上都較以往的研究更細膩、更精緻。例如在談到二十一條要求時，作者注意到北伐是影響吉野評價二十一條要求不一的重要因素；談到革命運動時，作者注意到護國軍的起義是促成吉野對中國革命觀改變的肇因；談到孫中山，作者注意到大正 7 年（1918）孫中山的下野反而是吉野對孫中山賦予好評的開始。此外，作者也注意到搶米暴動的刺激是促使吉野重審日本對華政策合理性的關鍵，作者此一指陳，可謂是研究「吉野學」的一大突破。例如，日本史學界泰斗坂野正高（Banno, Masataka）在論述吉野中國觀改變的契因時也僅提到大正 5 年（1916）是一個重要關鍵時期，而完全忽視大正 7 年（1918）日本全國各地所爆發的暴力搶米運動對吉野所造成的衝擊。³本書的撰寫方式是採用「主題式」的處理方式，雖然對每一主題中所反映出吉野中國觀的變化，無論巨細，作者皆有詳盡解析。但如果作者對吉野中國觀在每一段時期的轉折也能依時間順序稍加輔助說明，深信必能更有助於讀者閱讀。

本書的另一特色是，無論作者在提到日本或是在談到中國，皆能「讓

3 坂野正高，〈吉野作造の中國觀〉，《中央公論》（1978年），頁 211-215。

史料自己說話」，對當時雙方的立場，都能在第一手史料的導引下，以原始客觀的面貌呈現出來。至於對日本內部的探討，無論是涉及日本政府或者是吉野個人以及眾多陸續登場的相關人物，作者也皆能根據史料，將每一個人給予客觀的定位。鑑於作者能成功的超越國界，對錯綜複雜而又一向紊絲難治的日中情結，作出如此冷靜而深入淺出的探討，本書的出版，足可稱譽為日本政治思想史或者日中關係研究史上一個重要指標，對今後研究以上範疇的學者而言，本書必會成為不可遺漏的參考讀物。

今日的日本政治史學界，新近的研究傾向，是超越「從民主主義演變到法西斯主義」、「從經歷戰爭到戰後民主主義」此類往常的研究模式，而轉向於以大量史料為依據的「政治過程論」為中心的研究。此外，往常的研究模式中，如二〇年代的研究主題是民主運動，三〇年代則是以戰爭期為重點，兩個時代各有研究重心，但能以橫跨兩個時代為主題的研究卻屬罕見，因此如何開闢此一新的研究領域，也就成為今後日本政治史研究的一個最大課題。⁴在這方面，本人期望作者參照今日日本學術界的新近趨勢，今後也能致力於跨越二〇年代以及三〇年代的學術鴻溝。

其次，如果從日中關係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山田辰雄（Yamada, Tatsuo）將近代日中關係一百五十年歸類為「相互依存・競存・敵對」三種關係模式，此一見解已引起日本學術界相當回響。⁵濱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也認為此三種關係模式所構成的互動關係，足可反映整個近代日中關係史。也就是說，整個近代日中關係史就是由這三種模式所支配，只是這三種模式在每一時期所佔的比率不一，而此一比率的分配，也決定了該時期日中關係的走向。如果吉野的中國觀也能以此三種關係模式做為基軸加以研討，似乎也可成為另外一個值得鼓勵的嘗試。

以下僅就本文內容，提出個人淺見。第一點，吉野的中國觀還是建立在他的日本觀上。當然，對第三者的認識往往是藉由對自我認識的開始。但是自我的格局有時也會成為相互理解的妨礙。例如，吉野認為北京政府是個代表「軍閥、官僚」的政府，而他對所謂的「軍閥、官僚」的概念事實上是來自他對日本政府的體認，也就是他對日本政府中的「藩閥」的認知。因此，在他一再批評北京政府的官僚色彩時，卻忽視在巴黎和會時期

4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體制の崩壊》（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

5 山田辰雄編，《日中關係の150年——相互依存・競存・敵對》（東方書店，1994年）。

被他稱讚的顧維鈞卻是北京政府所派任的此一事實。此等事例皆在反映吉野的中國觀似乎還是停留在他的日本本位上。第二點，對於吉野所從事「日中文化交流」，如果能對日本政府的「對華文化事業政策」能有更進一步的掌握，則必能對日本政府為何阻礙吉野推展文化交流有更深入的分析。第三點，作者根據吉野的回憶，認為王正廷是促成吉野中國觀改變的關鍵人物（頁 64），而狹間直樹（Hazama, Naoki）則認為吉野之提到王正廷，不過是因為適逢王正廷活躍於巴黎和會，提王正廷較易讓當時的日本人理解。兩者對王正廷的評價，如此迥然不同，值得再深入研究。第四點，本人綜觀全文，似乎還有一個觀念可以補充。如果翻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珍藏的外交部檔案，可以發現民國 10 年前後「公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外交概念。尤其是當時大家都認為威爾遜的和平媾和十四點原則以及國聯的成立都是代表「公道」此一理念反映到國際事務上的具體成效。吉野在昭和 2 年（1927）所發表的「我國近代史上政治意識的萌生」的論文中，也對「公道」此一理念作了詳細的介紹。有鑑於此，本書如能添加「公道」此一理念的探討，則必能有助於對吉野中國觀的闡揚。最後，謹提出本書的筆誤。大正時期中華民國還沒有在日本設大使館，只有公使館。書中提到駐日大使館之處應為駐日公使館之誤（頁 194 以及頁 195）。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川島真□

6 Iriye, Akira,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9-88.

梁啓超。耿雲志、崔志海著。廣東人民出版社，嶺南文庫，1994 年 12 月，附梁啓超生平大事年表、參考書目舉要，539 頁。

撰寫一本好的梁啓超傳並不容易，這涉及下面幾個因素：第一梁氏的著述數量龐大，據估計約有一千四百多萬字，即使通讀一遍都很費時，遑論擇其精要、剪裁成書。第二梁氏才情橫溢，學問更是廣博精深，要描繪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必須深入地體會其思想與人格，再具有一枝細緻而巧妙的筆，方能使任公的生活意態躍然紙上。第三梁氏交往複雜、思想多變，

必須對清末民初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與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將梁氏放在適當的歷史位子之上。第四梁啓超生平與思想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而對於相同的歷史現象不同學者又常有截然相反的評估，要綜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再作出較公允的歷史評判也是一個具有相當高難度的史學工作。

由於有上述的困難，學界雖有不少的傳記與大量專題式的研究，但還沒有「一本」公認十分令人滿意的梁啓超傳，¹而最接近的兩個嘗試，很多人可能會同意仍是 1930 年代丁文江編的《梁任公年譜長篇初稿》與張朋園先生的兩本專書。²最近耿雲志、崔志海著《梁啓超》一書的問世是一件可喜的事，他們以三十多萬字的篇幅對任公一生有一個清楚的交代，是一本既通俗又言之有據的傳記。筆者忝為梁啓超研究之後學，捧讀之後頗有所獲，也有一些淺見，就教於各位師友。

全書除結語外，分為七章，前五章依時間先後敘述任公少年時代、戊戌變法時期、海外流亡時期、民初從政經驗、五四時期的講學與論戰，最後兩章則分述學術上的建樹以及家庭生活、業餘愛好、病況與死後哀榮等。

本書的特點可以分為描寫與評估兩方面來說明。在描寫方面，雖然作者沒有挖掘出前所未見的新史料，³他們所用的主要是大家所熟知的《飲冰室文集》、《合集》、上述的《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以及其它相關的著作，但是整體的結構十分勻稱，基本上把握到任公生活中各個主要面

-
- 1 近年來所出版的梁傳據我所知有毛以亨，《一代新銳梁任公》（台北：河洛圖書公司，1979）；孟祥才，《梁啓超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此書亦有台灣風雲時代出版公司版；陳占標、陳錫忠，《一代奇才》（廣州：花城出版社，1989），這是一本較通俗性，類似歷史小說的傳記；李喜所、元青，《梁啓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丁譜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台北世界書局 1958 年版，一個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張朋園先生的《梁啓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與《梁啓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1981）兩書早已名譽士林。有關梁啓超研究的評論可見江勇振，〈期待另一個研究梁啓超的新方向：綜評四本有關梁啓超的著作〉，《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3 期（1974），頁 437-454，該文強調應重視任公學術方面的表現；較近的研究成果則可參見拙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 1 章。
 - 3 在這方面台灣中央圖書館最近出版的任公知交的書信集，收了一些新史料，尤其是收有節錄進丁譜之信件的全文，值得注意，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梁啓超知交手札》（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5）。此外還有大陸出版的《梁啓超未刊書信手跡》（北京：中華書局，1993）。

向，不但討論到大家所熟知的政治、宣傳與思想變遷等方面，也談到他的學術貢獻與家庭生活。尤其讓人覺得成功的是作者文字清新流暢，在史料剪裁上往往適時引用梁氏的詩句、話語以及相關人物的論述，所以讀者不但可以經由梁氏自己的文字來了解其親身感受，更可以多角度地聽到梁氏身邊友人對當時情境的描述與反應。因此之故，本書不但是談梁啓超一個人，也成功地將梁氏放在師友與其他人物的關係網之中而顯示其生活的複雜面貌。

本書的描寫工作也儘量做到不偏不倚，例如談到任公在《新民叢報》時期與革命黨的論戰，作者指出「這場論爭絕不是一場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因而能較中立地敘述雙方立場，也看到雙方在許多觀點上「也不是完全對立的」。（頁 177）

耿、崔兩人的《梁啓超》一書由於在描寫上的成功使他們對梁氏有一個較公允的評估，在這方面我們必須對大陸史學界對梁啓超「評價問題」的演變有所了解，才能認識到本書的意義。大致來說從五〇、六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大陸史學界對梁氏的評價經歷了一個從「黑」到「紅」的過程。早期的看法可以以胡繩的〈梁啓超及其保皇黨思想〉、馮友蘭的〈梁啓超底思想〉與胡繩武、金沖及的〈關於梁啓超的評價問題〉三文爲代表。⁴這些文章都環繞著以「馬列主義的觀點」來評價梁氏的「進取性」與「反動性」。大致來說，他們所肯定的是戊戌時期以「資產階級改良派」來打擊「封建主義」，所以認爲這時任公的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後來清末立憲、保皇的想法則是表現出「地主階級」思想，「企圖抵抗革命運動，是反動的」。⁵

他們對於梁氏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後的思想與活動也持否定的態度，胡繩武與金沖及說：

在五四運動前後，梁啓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動，從表面看來，似乎是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其實剖析起來，萬變不離其宗，在這中間始終有一條黑線貫串著的，那就是，在革命面前以改良主義面目

4 胡繩的文章發表於《讀書與出版》，第 3、4 集（1948）；馮友蘭的文章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頁 128-141；胡金二氏之文則見《學術月刊》，1960 年第 2 期，頁 40-52。

5 引文見馮友蘭文頁 141。

來保存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爲了這個政治目的，他在實際活動上也越來越緊地投靠大地主大買辦的代表——北洋軍閥，在辛亥革命前後竭力抵制當時人民群眾中民主精神的高漲，而在五四運動前後則又竭力地抵制當時人民群眾中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⁶

這樣的歷史評估基本上是拙著所謂的「革命典範」的研究取向，⁷梁氏在清末反對辛亥革命、民初與軍閥合作，後來又不支持激烈的社會主義革命（或所謂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此狀況之下，很難逃脫被說成是具有「反革命的猙獰面目」之命運。

這樣「黑線」式的評估逐漸受到一些修正，較重要的可能是李澤厚在七〇年代所寫的〈梁啓超王國維簡論〉一文，他反對胡、金二人的觀點，認爲將梁氏的主要功勞定在戊戌時期是不恰當的，他強調「1898年至1903年是梁啓超作爲資產階級啓蒙宣傳家的黃金時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眾影響，起了最好客觀作用的時期」。至於起的是何種好的影響，李澤厚也說得很清楚，在於梁氏激烈地揭發清廷剝削人民的深重罪惡，號召人民去破壞、暗殺，簡言之，對破除封建主義的「革命」作出貢獻：

梁氏許多論著客觀上的確起了促使人們去仇恨清朝政府、傾向革命的進步影響。

更重要的則是李澤厚指出梁啓超的思想影響了後來「無產階級偉大的啓蒙思想家和史學代表」的魯迅與郭沫若。李澤厚雖然進一步地從資產階級改良派之「啓蒙工作」的角度肯定1898至1903年的梁啓超，但是還是從「革命中心史觀」對1903年之後反對革命的「反動」看法持批判的態度，並認爲他的貢獻在於間接促成共產革命。整體來說李澤厚並不欣賞梁啓超，他認爲梁氏淺、雜而多變，沒有構成自己的「思想體系」，「不是什麼重要的思想家，沒有多少獨創性的深刻思想成果」，「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傳家」。⁸

1980年代初期開始又有了新的變化，這涉及到大陸學界對「革命」與「改良」兩者的重新評估。1983年北大與北京歷史學會舉行的紀念戊

6 見該文頁48。

7 見拙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頁8。

8 該文收入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421-438，引文見頁388、423、425、435。

戊變法八十五周年學術討論會，許多學者站出來批駁了「凡是改良主義必然是反動的」看法，承認改良有其歷史的合理性，此後康有為、梁啟超乃至整個維新運動開始受到較多正面的評價。⁹這一個放棄革命中心史觀的過程，在拙著中稱之為「典範性的改變」，其中在大陸學界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李澤厚，他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1995）一書總結八〇年代以來他對近代史上革命與改良的思索，清楚地提出反對暴力革命與支持溫和漸進的改良主張，正反映了這一時代思潮的變化。¹⁰

在這改變的過程中，梁啟超受到了新的肯定，從前的黑線變成了紅線，1986年廣東的鍾珍維與萬發云兩人所著的《梁啟超思想研究》一書從愛國主義的角度大力肯定梁啟超，他們說：

梁啟超政治活動和政治思想是多方面的，他的學術思想和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似乎令人眼花撩亂。但深入研究下去，就可以發現，愛國思想就像一條紅線一樣，貫串在他的思想和活動之中。他不愧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愛國者。

從愛國主義出發，他們不但肯定胡金兩人所肯定的戊戌變法、李澤厚所肯定的「猛烈抨擊清朝政府的腐敗統治，成為資產階級的宣傳家」與「啟蒙大師」；他們也肯定梁氏在民國初年所從事的反袁、反復辟鬥爭，以及梁氏在文化與教育上的貢獻。¹¹

在了解上述背景之後我們可以再回到耿、崔二氏的《梁啟超》，此書可以說是在八〇年代以來「反省革命」的時代氣氛之中，企圖對梁氏作一更細膩的評估工作，因而能「充分承認他的歷史地位」。（頁492）整體來看，他們對貫穿梁氏一生的漸進觀點深表讚賞，並以之批評近代以來激進的烏托邦思想，下面的一段話含意是十分深遠的：

梁啟超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觀念：即任何先進的學說，先進的制度，必須與本國實際相結合，才能發生效力。不僅如此，任何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須在國家、人民的實際生活中有一個生長發展的過程。這一觀念，不但當時許多急進的革命黨人不能了解，以致

9 這方面的討論見羅福惠、田彤，〈引進、借鑒、變化：八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近現代史學鳥瞰〉，《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0期（1995），頁38-39。

10 最近我將李澤厚這一段心路歷程作一描寫與分析，見拙著〈論李澤厚思想的新動向：兼談近年來對李澤厚思想的討論〉（未刊稿）。

11 鍾珍維、萬發云，《梁啟超思想研究》（廣東：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1-2。

很長時期，人們只知尚理想，慕虛名，總想把最美好的制度一下子都搬到中國來，結果是欲速不達，付出巨大代價，理想仍只是理想，現實還是現實。（頁 164-165）

其中似乎暗示近代以來的激進取向，包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像土改、大躍進、文革等，使國家民族付出巨大代價，當時國人沒有接受任公的忠告，以致釀成大錯，是應該深自反省的。

具體來說作者對任公所從事的工作也大多數是肯定的。他們在結語部分提到任公一生在政治方面所經歷的五件大事，第一是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第二是清末立憲運動的領袖；第三是民初組織政黨，致力政黨政治；第四是反對君主復辟，維護民主共和；第五是促成中國政府與同盟國對德宣戰。對於第一件事他跟著大陸史學界的論定，肯定「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有「進步意義」；第二件事他反駁某些大陸學者的看法（將梁說成保皇黨），以為「在清末，不論是暴力的革命運動，還是和平的立憲運動，都是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進步的歷史運動，從本質上講，都是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的革命性的運動」；第三件事，他們認為雖然「不現實」，但是「反映了相當一部分資產階級和士紳階級，希望藉袁世凱的實力安定政局，漸漸走上和平建設正軌的心理」，所以無論如何是一個「進步的嘗試」；第四件事反袁氏的帝制與張勳、康有為的復辟，以及第五件事對德宣戰，作者也加以肯定。對於任公學術、文化上的成就，作者以為這是更為重要的，他們不但像李澤厚一樣肯定任公是「那個時代最主要的啓蒙大師」，也強調任公晚年的講學與著述；甚至說「他的中西結合的文化主張……他所提出的建設中國新文化的完整構想，至今仍可為我們所借鑑」。（頁 506）

無論如何，這一本傳記對任公的高度讚美，在海外或許並不覺得稀奇，但在大陸史學傳統中卻是前所未有的，我認為作者們以史實為基礎大膽地建立新說，這種敢於突破教條的魄力與勇氣是很值得我們欽佩的。

作為一個評論者我也不揣淺陋，提出一些批評。首先本書雖然擺脫了大陸學界過去所流行的樣板性的敘述方式，但它所反映出近代史的大的架構仍然是馬克斯主義歷史學的，作者還是從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線性發展史觀來描寫與評估任公一生；也顯然肯定唯物主義，認為任公「把精神看作歷史的動力，由此得出人類歷史不受因果律的支配，這完

全是錯誤的」，（頁 423）「主觀唯心思想，是很荒謬的」，（頁 412）這樣的評估我覺得應該避免。¹²當然我並不完全反對馬克斯主義的唯物史觀，不過建議作者至少要了解這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說法，而任公也不一定要在此框架中才能認識其歷史地位。作者堅守馬克斯主義的立場或許是出於內在、外在等複雜的因素，其本身無可厚非，但如因此而造成對任公思想的不當認知則應避免。在此作者對任公「反共」態度的描寫與評價或許是一個值得提到的例子，他們認為梁氏晚年反對社會主義、農工運動與十月革命是由於「階級偏見」，以及「出於他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和對中國共產黨缺乏真切的了解」（頁 373-374）。這一部分的描寫明顯地忽略許多任公對共產主義這一條「死路」的意見，在這方面張朋園先生《梁啓超與民國政治》一書要詳實多了。¹³就評估方面來說梁啓超在中國現代化的課題上採取發展實業而不是馬克斯式暴力革命的路子，我個人覺得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半個多世紀之後，隨著蘇聯、東歐的垮台，以及台灣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或許足以證驗梁氏當年所建議、而被多數人放棄的一個選擇是深具先見之明的。

其次，今日梁傳的撰寫必然是一個綜合的工作，但是從書後所列的參考書目，我發現有許多重要的研究並沒有參考，這當然涉及語言與獲取上的限制（也可能因為這只是一個書目舉要），但如能更為周延地運用二手材料，將可以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更好的表現。¹⁴在這方面我想舉作者

12 問題在於把任公定位為「唯心論」是不恰當的，他在〈非「唯」〉一文中說得很清楚，「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現的，凡講『唯什麼』的都不是真理」，見《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書局，1984），文集之四十一，頁 82。

13 任公稱共產主義為「死路」，說走這一條路「國家便沒有希望了」，見〈清華研究院茶話會演說辭〉，《飲冰室文集》，文集之四十三，頁 8。張朋園對任公反共思想的描寫見《梁啓超與民國政治》，頁 200-224。

14 在這方面我約略提到我所知道的一些重要研究，如張佛泉，〈梁啓超國家觀念之形成〉，載中國政治學會編，《政治學報》第 1 期（1971），頁 1-66。此外日本京都大學狹間直樹先生所領導的「梁啓超研究會」對於任公在日本期間透過日文認識西方思想的過程等課題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不宜忽略。張朋園先生〈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嚴復、梁啓超的進化觀〉，《陶希聖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食貨出版社，1979），以及近年他所討論的任公的家庭生活與兩性觀等論文是很值得參考的（見本所《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集》、新會市梁啓超研究會編《梁啓超研究》第 11 期）。大陸方面有劉邦富，《梁啓超哲學思想新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在相關的問題方面如蘇雲峰先生對萬木草堂與廣雅書院的研究（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13 期），Benjamin Elman 對學海堂的研究（載 *Ch'ing-Shih*

對任公在 1903 年前後思想變遷的分析來作說明，作者認為 1903 年之前梁氏思想就有一些「內在矛盾」，這些因素促成他從激進變為保守，其中包括強調「群體之自由」的「保守主義傾向」。（頁 151）這裡的分析是有問題的，因為梁氏無論是支持革命或反對革命他都主張個體與群體之間應以「界」的觀念為中心建立平衡的關係，而在危機時群體安危要比個體自由來得重要。¹⁵換言之，梁氏的群己觀與方法上是否支持「破壞主義」或革命是沒有關係的。作者在此的問題是將思想中的「目標」與「方法」混為一談，而錯誤地建立兩者因果關係。對於梁氏 1903 年前後的思想變遷，拙著曾從「內在邏輯」的角度加以詳細分析，可供參考。

二手著作的引用也涉及到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作者並沒有清楚區別何種觀點或引文是來自他人，何部分則為創見，這雖是大陸學界常見之事，¹⁶但就合理的學術規範來說，拙見以為應加以改進。另外一個疑惑是作者跟著李澤厚的說法認為「梁啟超終其一生都是一位只開風氣不為師的人物。在他身上，宣傳家的氣質遠勝於學問家」；（頁 47）但是在第六章談任公的學術成就則又大加讚揚他的貢獻，以清代學術史來說，作者洋洋灑灑指出五大優點，更說梁著出現後「再沒有人寫出可與媲美的著作」，甚至認為蔣維喬的《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和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整體而言，並沒有超出梁啟超所已達到的水準。若論思想深度，宏觀的把握和文字的表達則遠不如梁啟超」，（頁 399）這樣的說法顯然表示任公絕非「學問不尙精深」，也不是「只開風氣不為師」（頁 47）。

總之耿雲志、崔志海二位先生的《梁啟超》是一本相當成功的傳記，

wen-t'i, 4:2) 朱泐源的《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1995）都可參考。在此我不是批評作者沒有引用上述的資料，只是希望將來有志撰寫梁傳的人能更廣泛地利用中英日文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

- 15 學界的主流多強調梁氏思想中民族主義的面向，認為任公重視群體安危忽略個體自由，但我認為任公群己觀的基礎是儒家「己立立人」與佛家「無我」的觀念，所以他強調群己之間的平衡關係。而「個人」與「個性」在此架構中有終極性的價值。這樣的觀念不僅表現在《新民說》之中也表現在晚年所寫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內，在後書中任公明白表示他的理想社會是「個性中心之『仁的社會』」，其中群與己有平衡的關係，所以「墨法兩家之主張以機械的整齊個人使同治一爐，同鑄一型，結果至個性盡被社會性吞滅，此吾儕所斷不能贊同者也」，《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1986 重印本），頁 184。
- 16 例如李喜所與元青著《梁啟超傳》在後記之中即表示「本書在寫作過程中，還吸收了國內外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注明」，即是此一態度的表現。

雖然有些美中不足之處，但瑕不掩瑜，對任公之生平與思想以及對大陸當代思想走向有興趣的朋友都不宜錯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536頁。

近年，大陸學術界對民國時期的中外關係史研究，可以說相當蓬勃，不論單篇論文或專著，數量均相當驚人，而其中少數幾部涵蓋1949年以前中華民國外交史通論性論著的問世，更顯示學者們雄厚的企圖心。¹對於抗戰時期中外關係的研究，亦正方興未艾，除《抗日戰爭研究》學術季刊於1991年創刊外，同時對正面戰場（國民黨戰場）的史料刊布，亦帶動中外關係研究的新動向。儘管如此，一部涵蓋整個戰時外交的著作，仍告闕如，直到陶文釗、楊奎松、王建朗，在去年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合力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一書，才算對抗戰時期外交關係有了總結性成果。

本書三位作者均服務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陶文釗現擔任美國研究所副所長，楊奎松和王建朗則服務於近代史研究所。陶文釗專攻中美關係史，主要著作有《中美關係史，1911~1950》，在大陸學界有一定的評價。²楊奎松專攻中國共產黨史，著有《西安事變新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作者由於使用一般學者很難利用到的中共中央文件，其研究成果頗有推陳出新之處。王建朗最近即將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這本由三人合力撰寫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亦依各人專長分章撰寫。

本書在資料引用上，除大陸出版品及南京第二檔案館所藏資料外，大

1 例如吳東之主編《中國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張振鷗、沈予等，《日本侵華七十年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2 時殷弘，〈陶著《美國與現代中國——中美關係史，1911~50》評析〉，《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頁32-68。

量引用了台灣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在英文著作方面，除了已出版的西方學者研究成果外，還包括美國國務院所藏檔案微捲、美國參謀聯席會議、陸軍部、軍事情報部、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馬格魯德使團（Magruder Mission）的微捲。英國方面有英國外交部、內閣會議、作戰部等檔案微捲。日文資料稍少，主要仍為日本外務省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編印的資料。另外本書也引用相當多的德國外交文件及蘇聯外交文件，但未註明出版地。本書在史料蒐集上相當用心，但是所引資料大多為各國政府正式出版品，未出版的微捲檔案之引用仍嫌不足；有關西方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參照亦有不足之處。然而，對於戰時外交此一牽涉多邊國際關係的複雜變數，如能扣緊重大議題在史料上做客觀的排比與論證，已是相當龐大的工程。

本書上起於盧溝橋事件，下迄於日本受降問題之交涉，全書以國民政府戰時外交為討論主軸，共計十二章。嚴格言之，本書的整體架構仍承襲一般外交史通論以時間先後為經、事件為緯的佈局，但在章節安排上卻稍嫌蕪雜。例如第三、四章標題與內容應可做部分調整。第四章〈日本誘降與中日秘密接觸〉，第一、二節〈陶德曼調停〉、〈列強的調停企圖與日蔣接觸〉應與第三章〈反對英美妥協與爭取外援〉併為一章或另闢章節。再者，國共政治立場的後見之明，顯然亦使得本書章節有商榷之處。本書既以國民政府為論述主軸，但第九章〈中共抗日外交戰略的形成〉，所論基本上為中共中央外交路線的看法，與全書連貫性不符；或可於第十章〈美國與國共關係〉之前言，稍微提示重點即可；當然環繞國共關係的論述，向為中外學者所關注，欲突破前人所言，亦是相當大的挑戰。

本書在研究視野上，比起過去大陸學界的外交史論著有相當大的突破。首先，對於過去中共史家偏重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戰的問題，本書並沒有特別觸及，而直接從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之應變切入。對於國民政府戰時外交策略的運用，本書更予以正面評價。例如第一章探討從華北事件到淞滬抗戰之交涉，日本欲「現地交涉」，而中國政府則欲將衝突事件「國際化」，讓國際社會的參與（從國際聯盟到九國公約），來解決中日衝突。本書指出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初，英國對於中日衝突的反應比美國積極，英國首相張伯倫曾向美國三次提議聯合行動阻止華北危機，但美國政府態度消極。此事適與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相反；當年史汀生豎起不承認主

義的旗幟，英國不願配合，如今歷史重演角色互易（頁39-41）。此一論述係沿用蘿西·博格（Dorothy Borg）的發現，³但與博格不同的是，本書認為美國內部受孤立主義情緒的阻擋，使得立場不堅定。本書亦引用《蘇聯外交文件》所錄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的談話，說明當時國民政府認為美國態度不如英國強硬；然而英國對中國事務的參與亦為有限。中國在國聯會議和布魯塞爾會議中雖然沒有解決實際問題，不論是對日制裁或中國內部期望的實質性援助，均告落空。但本書仍肯定國民政府將華北事件國際化的作法，「會議使中日的解決國際化，挫敗了日本企圖直接交涉的圖謀，使這一問題成為國際社會所共同關注的一個中心問題。而且，道義上的援助必將為以後的物質援助打下基礎」（頁64-65）。

二〇年代遠東華盛頓體系中有兩個國家被排拒於外——德國與蘇聯，前者因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遭排斥，後者做為當時世界惟一的共產革命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亦受到英美兩國為主導的國際社會的排斥。抗戰最初階段國民政府爭取國際援助的活動不僅限於華盛頓體系國家，而且還延伸至華盛頓體系外的國家，而蘇、德兩國亦希望擴張對遠東的影響力，於是有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以及德國的中立，乃至後來陶德曼的調停。本書指出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外交策略的靈活與謹慎。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政府即希望與蘇聯達成協議，由蘇聯供應軍事裝備並締結一個中蘇互助條約，但蘇聯方面以中日已開戰，如簽訂互助條約，則意味蘇聯必須參戰，乃提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本書說明當時中國政府祇希望簽訂互助條約，而無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此係因中國政府不欲僅僅得到蘇聯的極小支持而予外界以親蘇印象，從而影響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頁72）。本書引用蘇聯外交文件，澄清過去普遍以為「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為中國政府要求簽訂，實則恰恰相反，而是蘇聯政府強烈要求簽訂的。

再者，本書對於蔣介石在戰時外交的定位亦有較公允的批評。例如史迪威事件，過去國共兩黨由於對史、蔣個人的情感主觀因素，使得對此一事件的看法相差甚大。史迪威被共黨視為「中國人心目中最優秀的戰士」，

3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3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94-300. 博格認為1937年盧溝橋事件對世界和平造成挑戰，美國受孤立主義影響，雖然沒有採取堅定立場反對日本的侵略，但美國政府以強有力的道義譴謫日本的侵略行動，強調避免採用武力的必要性。

⁴大陸學者對史迪威多有同情，下筆亦多情緒性字眼。即如在學術圈相當獲好評的牛軍著《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一書中，亦言「撤換史迪威表明，美國對華政策已經走上了惡性循環的軌道」，表示美國為維護其國家利益支持蔣，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⁵本書則已跳脫了此一思考窠臼，將史迪威事件視為中美戰時結盟與矛盾的匯集點，說明中美雙方在戰時合作各有立場與利益，而史迪威是中美軍事合作與衝突下的犧牲品。對蔣與史個人，本書認為史蔣兩人爭執不僅在領導權及緬北反攻之事，兩人的政治文化背景的衝突亦是主因。作者認為史迪威是美國職業軍人，不懂中國政治，祇知如何以最大限度動員中國抗戰的潛力，乃至調動陝北共軍，爭取戰爭勝利；「在蔣介石看來，史迪威必先了解中國，然後才有可能進行軍事合作，但史迪威卻沒有顧及政治因素，既然這樣，他在中國常常碰壁就在所難免了」（頁313，324-325）。

一般學者以為美國政府開始對遠東問題態度由消極轉向積極，關鍵點在於1939年日本南進政策導致英美安全體系的危機，而不是日本的侵略中國。美國為維繫本身的安全體系，惟有採取強硬行動遏制日本的侵略。⁶本書則認為1941年初美國已得悉日本的南進政策時，試圖安撫日本的願望更為強烈，同年5月美國甚至準備在「共同防共」、「承認滿洲國」、以及日本在中國北方駐軍的問題做出諒解與讓步（頁241-242）。但是就在美日政府試圖達成諒解時，發生了珍珠港事變，迫使美國最後和中國走向同一戰場。

本書對珍珠港事變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昇多有正面的肯定，例如認

4 周恩來悼念史迪威將軍，1946年10月17日，《周恩來書信集》（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5），頁352。

5 牛軍，《從赫爾利到馬歇爾——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本文所引為台灣版，書名改為《內戰前夕——美國調處國共矛盾始末》（台北：巴比倫出版社，1993：5），頁62。

6 此一觀點最具代表性的是，入江昭在《越過太平洋》一書提出，詳見：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7), pp. 200-211. 第8章「走向珍珠港」。其後入江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和太平洋的源起》一書重申此一觀點。見： *The Origi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Congeman Inc., 1987), pp. 64-73. 孔華潤亦持相同看法，認為珍珠港事變前後，美國開始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並不是突然關心中國，而是由於日本南進政策對安全體系的威脅，最終是由於它依附於羅馬——柏林軸心。見：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3.

爲開羅會議是大戰時期中國外交的巔峰（頁381）、並論述中國參與聯合國創建之貢獻，尤其是對托管制度與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獻力尤多（頁390）。作者運用英國外交檔案對蔣介石調停英、印關係的努力，中英新約的簽訂波折、英國對九龍租界問題的堅持，以及日本方面在中美、中英新約交涉過程中的角色，有相當完整的論述。對中英關於香港受降權之爭，亦提供後續研究一條取徑。

本書在架構上如能將抗日時期的中外關係，擺在遠東政治及全球戰略位置，則應有更開闊的視野及新發現。1930年代日本侵略華北，導致以維繫遠東政治秩序和中國門戶開放的華盛頓體系的崩潰，華北危機便成各國在華利益的新衝突點，而各國對日本的侵華行動究竟採取怎樣的立場？中日衝突如何引爆成一個國際性問題？各國當時是否放棄新的國際秩序的建立，還是企盼通過一場戰爭，重新建構新政治秩序？歐美的姑息抑或是遏制政策，對日本的南進政策有何影響？若能將遠東主要勢力的日、美、英、蘇與中國的多邊關係，做一綜合考察，對重建抗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或可能提供另一個思考方向，而非僅是平面式敘述中國戰時國際地位的提昇。如何跳脫中國民族主義本位的立場，以遠東政治的角度關照全局，當更能釐清抗戰時期中國由孤立走向盟國四「強」之一的真實位置。

綜觀全書，作者對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外交路線的嘗試多持肯定，例如對中蘇、中德關係上的努力；對珍珠港事變後國民政府對美外交路線的孤注一擲，本書則多有批評。設若本書能另闢結論一章，對整個戰時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做一總體式的檢討，應更能凸顯本書的特色。無論如何，我們欣見本書已走出國共兩黨政治圖像的包袱，以更開放的思維肯定國民政府戰時外交的多項成就，而且本書對中外交涉過程的微觀處理、掌握各國檔案材料的排比，以及對重大事件發展面向的分析，均相當著力，其成績仍值得肯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吳翎君□

學位論文

台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 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5.3~1996.1）

公小穎* 輯

一、博士論文

作者	論 文 題 目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
呂紹理	水燄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	政治大學	1995年3月
吳翎君	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為中心的探討	政治大學	1995年4月
李俊熙	日本對山東殖民地經營（1914~1922）	政治大學	1995年6月

二、碩士論文

作者	論 文 題 目	畢業學校	畢業年月
張旭宜	台灣原住民出草慣習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	台灣大學	1995年6月
王憲群	合步樓公司與中德關係	台灣大學	1995年6月
寇 強	明清山西、陝西兩省之經濟結構	台灣大學	1995年6月
鄭天凱	政權交替下的地方社會——雲林事件（1896）的探討	台灣大學	1995年6月
周敘琪	一九二〇年代的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	台灣大學	1995年6月
王嘉慧	晚清台灣鴉片進口貿易研究（1858~1894）	政治大學	1995年3月
柯惠鈴	陳嘉庚研究——華僑中國意識的探討	政治大學	1995年5月
陳宗仁	國民政府時期的土地改革運動——以地政學會	政治大學	1995年6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為中心的探討（1932~1949）		
鍾淑惠	林風眠與民初美術教育運動（1925~1938）	政治大學	1995年6月
吳秀玲	二十世紀初期京劇旦行轉變的歷史意義	政治大學	1995年6月
張菁華	1931~1935年中國東北問題研究	政治大學	1995年6月
蔣竹山	從打擊異端到塑造正統——清代國家與江南祠神信仰	清華大學	1995年5月
譚志東	中共延安時期的戲劇運動（1935~1947）——「工農兵文藝」政策的歷史審察	清華大學	1995年6月
歐秀娟	《清史稿》最後一位疇人——華蘅芳	清華大學	1995年6月
黃碧雲	清末民初知識份子的「社會」觀念	清華大學	1996年1月
宋惠中	票商與晚清的官僚體系（1862~1911）	中正大學	1995年6月
吳正心	清代廳制研究	中正大學	1995年6月
梁志輝	嘉義地區漢人社會發展之研究（1683~1895）	中正大學	1995年6月
蔡幸芳	曹公與曹公圳	成功大學	1995年6月
林春蘭	楊雲萍的文化活動及其精神歷程	成功大學	1995年6月
金智	清代嘉慶、道光朝台灣社會動亂的研究（1796~1850）	成功大學	1995年6月
陳如君	乙未之前恆春地區開發之研究	成功大學	1995年6月
李淑芬	日本南進政策下的高雄建設	成功大學	1995年6月
張麗芬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樟腦業（1895~1919）	成功大學	1995年6月
沈文瑤	清乾隆以前平埔族的自我防衛行動	成功大學	1995年6月
吳素惠	《盛京時報》之研究	中興大學	1995年7月
張睿娟	清代的漢化問題——以滿文滿語的使用為例	東海大學	1995年6月
林慧姪	吳新榮研究	東海大學	1995年6月
連慧珠	「萬生反」——十九世紀後期台灣民間文化之歷史觀察	東海大學	1995年6月
黃昭仁	清代台灣知府之研究	東海大學	1995年6月
郭紀舟	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啓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	東海大學	1995年6月
范瑞珍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客家人墾拓研究——以族群關係與產業發展兩層面為探討中心	東海大學	1995年6月
蔡其昌	戰後台灣文學發展與國家角色（1945~1959）	東海大學	1996年1月
李君星	經安會與台灣工業的發展	文化大學	1995年6月
賴珍寧	日治時期台灣思想控制法令之研究	文化大學	1995年12月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4.12~1996.3)

公小穎*輯

(1994) 12.29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兩年一次的「第三屆學術年會」，會期二天，共收到論文二十篇，內容涉及近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中外關係諸領域。

(1995) 5.4 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中國海關史第三次國際學術研討會」，於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舉行。本屆會議的研究主題為中國海關與近代中國社會及中外關係，來自兩岸三地以及美、日、澳等學者六十餘人參加，會期三天，發表論文四十篇。

5.6 「北京大學 1995 年度史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該會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日本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交流協會聯合舉辦，會期二天(至 7 日)，有來自兩岸及美、日、韓、俄、羅馬尼亞、丹麥等九個國家和地區的百餘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5.25 大陸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於北京舉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一百五十餘名。

5.27 由蒙藏委員會與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合辦，李符桐先生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贊助的「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於台灣師範大學舉行。會中發表論文十一篇，其中與中國近代史相關之論文如下：(1)陳捷先：〈從民族問題的處理看清朝政權的建立〉(專題演講)；(2)吳瑞秀：〈論雍正朝改土歸流的決策過程〉；(3)莊吉發：〈清初諸帝的北巡及其政治活動〉；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4)葉高樹：〈從「貢貂制度」看清廷與東北民族的關係〉；(5)馮明珠：〈論近代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從廓爾喀之役到華盛頓會議〉；(6)陳又新：〈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進京始末〉。

5.30 由大陸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等九個單位聯合舉辦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問題學術討論會」，於黃山召開，與會學者七十九人，會期三天，共收到論文四十八篇。

6.7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之「中國近代歷史的社會學闡釋研討會」，於中國文化研究所會議室舉行，會期三天，主要議題為中國近代的市民社會問題、中國近代史理論的反省、韋伯與中國歷史研究、歷史觀與中國近代思想史等四方面，發表論文十六篇。

6.17 在日本的台灣研究者及留學生舉辦「日本と台灣その100年を考える：日台關係100周年紀念留學生交流フォーラム」，該會假日本東京拓殖大學舉行，與會學者二百餘人，會期二天。

6.20 由大陸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的「十八世紀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於北京舉行，會期五天，討論會分經濟；邊疆、民族；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藝術；中外關係五個主題進行討論。

7.4 由大陸河北省委宣傳部等四個單位聯合舉辦的「河北省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於石家庄召開，會期四天，入選論文七十四篇。

7.11 由大陸中國現代史人物研究會組織的「全國第三次中國現代人物學術討論會」，於蘇州大學舉行，會期四天，與會學者四十二人，會議著重討論抗日戰爭時期的人物活動，發表論文四十四篇。

7.25 由大陸民盟青島市委、青島市歷史學會、山東師大青島夜大學等單位聯合舉行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期二天，與會學者七十餘人，宣讀論文近四十篇。

7.26 由大陸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和河北省辛亥灤州起義研究會聯合舉辦的「辛亥灤州起義學術研討會」於河北省灤縣召開，會期三天，與會學者四十餘人。

7.28 由國史館主辦的「台灣光復後修纂地方志研討會」，於國立政治大學藝文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共一百二十餘名專家學者與會。該會主旨在邀請實際參與各縣市地方志之修纂者，做一實務經驗的報告，以探討

修志時所遭遇之困難與衍生之問題，共發表論文八篇。

8.3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和日本沖繩縣教育委員會聯合主辦的「第三屆中琉關係史學術研討會」於日本沖繩縣召開，與會的學者約八十餘人，發表學術論文六篇。

8.8 由北京大學和日本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合辦，以「和平、合作、發展，迎接二十一世紀」為宗旨的「紀念二戰結束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於北京友誼賓館舉行，共有來自兩岸及美、菲、韓、加、俄等國學者近百人參加，會期四天。

8.11 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市社科院、市社聯、市委黨校、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中共寶山區委六個單位聯合舉辦「上海市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該會於寶山召開，會期二天，發表論文一百九十篇，近百名學者參加會議。

8.14 北京市委宣傳部、黨史研究室、北京市社科院、北京市社科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於豐台聯合舉辦「北京市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與會學者六十餘人。

8.15 由中國人民大學發起，中國現代史學會、中國石油大學聯合舉辦的「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於北京舉行，會期三天，有來自英、日、俄、美、馬來西亞及紐西蘭等國七十餘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8.15 由大陸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等單位聯合主辦的「紀念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於齊齊哈爾市舉行，會期三天，與會中外學者共七十三人，發表論文五十一篇。

8月中旬 由大陸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研究會、人民教育出版社聯合召開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於承德召開。會議除中方學者外，另有日本及越南歷史教育學者代表團出席。

8.16 由河北省中共黨史學會、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石家庄市社科聯、石家庄市中共黨史研究會聯合舉辦的「日軍侵華暴行國際學術研討會」，於石家庄市召開，會期四天，入選論文六十一篇，與會的中日學者共一百名，另有歷史見證人二十名參加會議。

8.30 由遼寧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等二十個單位發起的「第七屆中國暨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於瀋陽召開，會期四天。共有

來自六個國家和地區的百名專家學者與會，會議就清軍入關三百五十周年帶給中國社會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進行交流和探討。

8.30 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舉辦的「全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於北京舉行，會期四天。此次會議的主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華民族的振興」，共收到論文一百一十四篇。

9.2 由雲南大學歷史系、中共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委宣傳部、州政協文史委、州史志辦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於雲南省德宏州首府芒市召開，當年參與滇西抗戰戰士及抗日將士的後裔親屬暨各地學者，約七十餘人出席會議。共收到論文三十多篇。

9.11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舉辦「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期二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劉鳳翰、陳存恭、呂芳上等三位研究員應邀出席，並於會中分別宣讀論文：〈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之分析〉、〈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海外黨務〉及〈抗戰時期的遷徙運動——人口、文教事業及工廠內遷為例的探討〉。

9.14 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宣傳部等八個單位聯合舉辦「廣西抗戰文化研討會」，會期二天，與會學者七十餘人，發表論文七十六篇，著作四本。

10.7 「中法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於杭州大學召開，會期二天，共宣讀論文二十二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三井先生及助研究員許文堂先生應邀出席，並於會中分別宣讀論文：〈從北圻到中國——十九世紀一個里昂商人的殖民觀〉及〈中法實業銀行歇業風潮——政治層面的考察〉。（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0.19 以紀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五十周年為主題的「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於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該會由國史館主辦，會期三天，與會學者二百六十餘人，會中宣讀論文四十三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0.24 大陸中國兵工學會、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中國化學會、徐壽研究會等單位與歷史研究雜誌社在北京舉辦「徐壽父子對近代科學技術的貢獻研討會」，共有學者和徐氏後裔三十餘人與會，會期三天。會議針對徐壽父子與近代中國的兵工業、船舶製造業、化學工業、科學技術教育和科技翻譯等問題進行討論。

11.3 由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辦的「第五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假台北市陽明山中國大飯店舉行，與會的史政單位有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北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等八個單位以及國內外參與口述歷史工作的學者專家，共一百人。

11.10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舉辦「孫中山先生一百三十歲誕辰紀念座談會」，假台北市福華大飯店舉行。會議主題為「中山先生思想與台灣經驗」與「中山先生思想與中國前途」，應邀學者四十人。（詳見《近代中國》雙月刊第110期）

11.16 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舉辦的「台灣近代史研討會」，於南投市舉行，會期二天，發表論文十二篇，主講者及講題分列如下：(1)陳三井：〈政治情勢的演變〉；(2)李國祁：〈政治近代化的肇始〉；(3)藤井志津枝：〈日據時期「理藩」政策〉；(4)劉翠溶：〈基本建設之發展〉；(5)吳聰敏：〈總體經濟的表現〉；(6)彭百顯：〈台灣財政金融史〉；(7)朱法源：〈近代台灣的社會治安〉；(8)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職業變遷與婦女地位〉；(9)周惠民：〈清季台灣社會風氣之流變〉；(10)張勝彥：〈台灣的教育〉；(11)宋光宇：〈宗教與禮俗〉；(12)蔡淵黎：〈近代台灣學術發展〉。

11.24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舉辦「中國國民黨建黨一〇一週年黨史研究座談會」，假台北市福華大飯店舉行，與會者三十人。此次會議以「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及其趨勢」、「運用黨史會史料進行研究的心得與意見」為主題，進行討論。（詳見《近代中國》雙月刊第110期）

12.15 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台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專題研討會」，假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期二天，發表論文十九篇，篇名如下：(1)王泰升：〈撥雲見日的台灣法律史研究〉；(2)張隆志：〈台灣平埔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3)謝國興：〈當代台灣企業發展史研究的回顧〉；(4)黃蘭翔：〈回顧台灣都市史的幾個重要議題〉；(5)張珣：〈百年來台灣漢人宗教研究之回顧〉；(6)江燦騰：〈台灣佛教史研究之百年回顧〉；(7)查時傑：〈台灣基督教史的研究(1895~1994)〉；(8)黃俊傑：〈戰後台灣文化思想史的回顧與展望〉；(9)林瑞明：〈台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0)葉淑貞：〈日據時代租佃契約的選擇行為〉；(11)施添福：〈日據時期台灣東部的開發與熱

帶栽培業)；(12)陳其南：〈台灣漢人家族與村落社會〉；(13)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台灣學術探險調查之展開〉；(14)許雪姬：〈戰後初期的「台灣華僑」〉；(15)湯熙勇：〈光復初期台灣省政府成立的經過及其相關問題〉；(16)後藤乾一：〈台灣與東南亞關係之研究〉；(17)周婉窈：〈南洋經驗：台灣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18)Kristofer M. Schipper：〈台灣民主國歌的詮釋〉；(19)若林正丈：〈日本台灣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建立〉。

12.17 國立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主辦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研討會，會期二天，主講人及演講題目分述如下：(1)杜維運：〈傅孟真與中國的新史學〉；(2)岳玉璽：〈傅斯年學術思想淵源初探〉；(3)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4)王晴佳：〈中國二十世紀史學與西方：論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5)王汎森：〈從檔案看傅斯年思想與生活的幾個側面〉；(6)遼耀東：〈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8)李東華：〈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台大〉；(9)吳展良：〈傅斯年思想中的反形式理則傾向〉。

12.17 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爭之再檢討：新資料與新解釋」國際研討會，於加拿大溫哥華舉行，會期二天，共有來自亞洲與歐美七個國家與地區四十多位學者與會，宣讀論文三十三篇。（詳見本期「學術會議」）。

(1996)3.10 由台灣歷史學會主辦的「史學與國民意識研討會」，於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舉行，與中國近代史有關的講題分述如下：(1)石田浩：〈戰後日本有關台灣研究之介紹〉；(2)溫振華：〈清代台灣土地開發研究的回顧〉；(3)許達然：〈清朝台灣民變探討〉；(4)薛化元：〈《自由中國》雜誌歷史定位的再思考〉；(5)詹素娟：〈族群、土地與國家認同——平埔族的歷史省思〉；(6)陳錦忠：〈台灣中國史的意識結構〉。

3.16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研教中心主辦，廖英鳴文教基金會、教育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協辦的「邱逢甲與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於逢甲大學人言大樓第六國際會議廳舉行，會期二天。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1~20 期總目

* 篇名之後括弧內為作者，阿拉伯數字代表期數 *

◎學術會議

- 「胡適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達嘉) 11
- 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究會
(王綱領) 11
- 「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
(林滿紅·張朋園·呂實強) 11
- 「紀念中國近代史開端 150 周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紀要(王聿均) 11
- Conference on Oppositional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Marilyn Levine) 11
- 近代臺灣歷史與文化學術研習會
(游鑑明) 12
- 「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
(張壽安) 12
- 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
(謝國興) 12
- 新加坡「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國際會議(李恩涵·張瑞德) 12
- 中國鹽業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紀實(陳然) 12
- Paris Symposium on Society vs. State in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and
Vietnamese Traditions (Paul Ropp) 12
- 紀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學術會議(蔣永敬) 13
- 「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
會」紀實(劉鳳翰) 13
- 「中華民國歷史問題」學術研討會
(葉文基 Peter Ivanov) 13
- 「九一八」事變 6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蔣永敬) 13
-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陳秋坤) 13
- 紀念上海建城 700 週年——「城市研究
與上海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側記
(徐鼎新) 13
- 大陸首次胡適學術研討會綜述(歐陽哲生) 13
- 「變化中的族群認同和關係：東南亞華人
少數民族」國際會議報導(張存武) 13
- 「臺灣歷史上的土地問題國際研討會」
籌辦報告(陳秋坤) 13
- 第二屆德中關係國際討論會(吳素榮) 13
- 全美中國研究協會第三十三屆年會
(黃自進) 13
-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楊維真) 14
- 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許佩賢) 14
- 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
(黃繁光) 14
-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簡笙簧) 14
- 柏克萊「文化、宗教與中國經濟發展」
會議(葉文心) 14
- 莫斯科「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十九
世紀末~二十世紀末)」學術座談會
(葉文基 Peter Ivanov) 14
- 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研討會(張啓雄) 15
- 「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環境：人口與社
會史 1620-1920」研討會(賴惠敏) 15
- 「胡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紀要
(歐陽哲生整理) 15
- 記柏克萊、康乃爾兩大學在魯斯基金
贊助下的兩次「上海近代城市史」研
討會(葉文心) 15
- 落地生根——全球華人問題國際研討會
(朱法源) 15
- The IXth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Ursula Richter) 15
- 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謝國興) 16
- 「澳洲中國研究協會」第三屆雙年會
(張壽安) 16

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議 (蔡錦堂)	16	(John Carroll 撰, 張力節譯)	19
「從開埠到開放: 150 年來的上海」國際 學術討論會(王樹槐)	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yons and the Far East (Christian Henriot)	19
「從開埠到開放: 150 年來的上海」國際 學術討論會綜述(張濟順·孫紀平)	16	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 (楊維真)	20
「認同與國家: 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 學術研討會(許雪姬·謝國興)	17	海峽兩岸「傳統社會與當代中國社會史」 學術研討會評述(定宜莊·許禮)	20
曾國藩先生逝世雙甲子紀念演講會 (呂實強)	17	「求變求新的中國——二十世紀前半期 的歷史經驗」學術討論會(葉文心)	20
亞洲商業網絡(1850-1930)會議 (林滿紅)	17	◎學術交流	
「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紀要(魏外揚)	1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加州大學 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簽署合作協定	11
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第 43 次全國學術大會 (塚本元)	17	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系與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推動中國近世家 族與政治關係之研究	11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吳翎君)	18	◎學術演講	
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討會(楊翠華)	18	Two Different Kinds of " Food Riots " : Kiangsu, 1910 and 1932 (Lucien Bianco)	11
「東南亞華人教育」國際研討會 (朱滄源·鄭秀萍)	18	Mode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989 (Frederic Wakeman)	11
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吳志鏗)	18	The Evolution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njamin A. Elman)	11
商人與地方文化研討會(蔣竹山)	18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研討會一覽	11
「國際亞洲歷史學家學會」第十三屆會議 (陳國棟)	18	以五四超越五四(周策縱)	12
第三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 (黃自遠)	19	李約瑟研究所與中國科技史研究(何丙郁)	12
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 日據時期 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柳書琴)	19	Russian Historical Tradi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附劉廣京 中文節譯)(Robert O. Crummey)	14
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呂實強)	19	Chinese and Russian Traditions Juxtaposed :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附作者中譯) (Kwang-ching Liu)	14
近代中國與亞洲學術交流會(陳存恭)	19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wer Yangzi Education and the Lower Yangzi Educated Elite, 1895-1911 (Barry Keenan)	14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第二次國際學術 研討會綜述(秦兵)	19	關於修訂近代中國史的芻議(黃仁宇)	15
「紀念魏源誕辰 200 周年國際學術研 討會」紀要(王家儉)	19	明末清初的善書與社會意識形態變遷 的關係(包筠雅)	16
振興中華 100 年——第三次中華民國史 國際學術討論會(陳謙平·陳紅民)	19		
「本世紀中過渡時期的中國」研討會			

遠航（魏裝德）	16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罪證陳列館	
台海兩岸史學發展的異同（張玉法）	18	簡介（韓曉）	11
◎學人簡介		十年來中國大陸華僑史研究的回顧	
李守孔（林能士）	11	與前景（1979-1989）（林金枝）	11
溝口雄三（伊東貴之撰・張啓雄譯）	11	廿年來臺灣地區出版之期刊與論文集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有關中國近代婦女史的研究（游鑑明）	11
（黎志剛・林榮佳・何永盛）	11	東南亞六國海外華人研究概況調查報告	
In Memoriam Hellmut Wilhelm, 1905-1990		（陳三井・張存武・朱浚源）	12
（Ursula Richter）	11	行政院二二八工作小組的分工與資料蒐集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賴澤涵）	12	（許雪姬）	12
紀業馬（Jacques Guillermaz）（許文堂）	12	香港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要（林啓彥）	12
懷楊聯陞先生（劉廣京）	12	記「上海研究中心」（朱弘）	12
嚴中平（宓汝成）	13	清代糧食產量研究（陳秋坤）	12
張仲禮（程麟蓀・謝文孫）	13	大陸學者對吳三桂「降清」問題的討論	
畢仰高（Lucien Bianco）（許文堂）	13	（葉高樹）	12
Immanuel C. Y. Hsu（徐中約）（Philip		二十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現代新疆之	
Yuen-sang Leung 梁元生）	13	研究（上）（王大剛）	12
湯志鈞（楊志遠）	14	評介日本的「中國女性史研究會」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陳國棟）	14	（藤井志津枝）	12
何炳棣（馬泰來）	15	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入江昭（Akira Iriye）（楊大慶）	15	（李宇平整理）	12
王廣武（黃昆章）	16	公民社會與體制的發展（孔復禮	
林增平（邊雲飛）	16	Philip A. Kuhn）	13
韋慶遠（柏樺）	17	西方學者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	
楊雲萍（許雪姬・賴惠敏）	18	（史明正）	13
島田虔次（森紀子）	18	我參與二二八相關研究之經過（賴澤涵）	13
陳詩啓與中國近代海關史的研究（戴一峰）	19	二十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現代新疆之	
野澤豐（金丸裕一・舟納才一）	20	研究（下）（王大剛）	13
◎研究概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	
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		召開第一次會議	14
之評介（黃克武）	11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呂芳上）	14
《義和團研究會通訊》簡介（陳慈玉）	11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公開徵稿	14
日本「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討會」簡介		菲律賓華人史料基礎調查與蒐集計畫	
（久保亨）	11	（朱浚源）	14
「林本源」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許雪姬）	11	辛亥濼州起義史料的搜集與整理計畫	
「臺灣傳統農村生產工具研究」規畫研究		（唐向榮）	14
報告（陳秋坤）	11	大陸學界關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的研究	
「臺灣社會變遷之研究，1895-1990」		（孫宅巖）	14
計畫（陳慈玉・許雪姬）	11	哈佛大學 <i>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i> 學報	

簡介(張力)	14	中國大陸民國史研究述評(張憲文)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中之研究 計劃(民國81年3月-82年2月)		近現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討論 (潘光哲)	19
(江淑玲輯)	15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概況 (黃定天)	19
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與東亞的新型文化 (James L. Watson 報導·林滿紅譯述)	15	State Maki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ichard S. Horowitz)	19
香港的明清史學者及其研究動向(李金強)	15	引進·借鑒·變化——80年代以來中國大 陸近現代史學鳥瞰(羅福惠·田彤)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十年來的 研究工作(張海鵬)	15	大陸的中國近代教育史研究述評(劉海峰)	20
大陸學術界研究南京保衛戰問題述評 (孫宅巍)	15	◎史料介紹	
近十年來韓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吳金成)	15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及其典藏的 民國史料(呂芳上)	11
Recent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 the Chinese Experience (Zhang Kai-yuan & Peter Tze-ming Ng)	15	嚴復英文作品〈中國古代政治結社小史〉 (孫中興)	11
臺海兩岸學者對台兒莊戰役的研究 (張玉法)	16	國史館「財政部檔案」概述(何思謙)	11
評述近五年來大陸學界對於抗日戰爭正面 (國民黨)戰場之研究(馬振犢)	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 整編概況(八)(莊樹華)	11
《抗日戰爭研究》介紹	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地圖 簡介(謝國典)	11
山東大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16	清代內務府檔案資料簡介(賴惠敏)	12
近幾年來大陸學者關於中國商會史研究 綜述(趙洪寶)	16	記國難時期的一份報紙——民聲週報 (陳正茂)	12
近年大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概述(顧衛民)	16	夏威夷大學亞洲圖書館館藏臺灣光復初期 資料(湯熙勇)	12
Research Note: The Lu Xun Library in Prague (Ursula Richter)	16	《辛亥以來人物傳記資料索引》編纂紀實 (傅德華)	12
Chinese Immigration in Russia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s Far East) (A. G. Larin)	16	《袁世凱全集》的編輯整理概述	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中之專案 研究計畫(民國82年4月-82年12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 整編概況(九)(莊樹華)	12
(江淑玲輯)	17	Soviet Archival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on Modern China (S. C. M. Paine)	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二二八 檔案資料」簡介(許雪姬)	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之中之專案 研究計畫(江淑玲輯)	18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簡介 (許雪姬)	13
		《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編纂經過與 篇目(戴執禮)	13
		《黨政情報》目錄(林美莉)	13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
整編概況(十)(莊樹華) 13
- The Montgomery Collec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Chinese Language Private Accounting
Records (Robert P. Gardella) 13
- China in Maryknoll: The Sinologically
-Related Holdings of the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Murray A. Rubinstein) 13
- 孫常煒編：《蔡元培先生全集續編》——
兼述高平叔對蔡元培著述的編印
(陶英惠) 14
- 胡適佚信六封箋注(張挺·江小蕙) 14
-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五部檔」簡介
(高純淑) 1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
整編概況(十一)(莊樹華) 14
- 國史館館藏臺灣工業發展檔案介紹
(薛月順) 15
- 德西檔案館所藏中德關係史料
(1927-1938)(馬文英) 15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
整編概況(十二)(莊樹華) 1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宗人府檔案介紹
(賴惠敏) 16
- 中國教會大學歷史文獻在美國收藏情況
簡介(吳梓明·馬敏) 16
- 關於李鴻章文稿的發掘與整理(劉申寧) 16
- 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臺灣籍民」關係
檔案介紹(鍾淑敏) 16
- Documents on Sun Yat-s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the French Archives
(Marilyn Levine) 16
- 「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蘇雲峰) 17
-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度藏中國檔案之介紹
(一)(林瓊柔) 17
- 俄羅斯檔案館中保存的有關中國的材料
(A. M. Grigoriev) 17
- 蘇聯境內出版的中文期刊 1918-1937
(丘古耶夫斯基著, 余敏玲譯) 17
- 上海版《民國日報》與基督教大學史料
(邢福增) 18
- 關於《許壽裳日記》(北岡正子·黃英哲) 18
- 菲律賓華僑義山碑文的史料價值(吳文煥) 18
- 中研院近史所一年來的口述歷史訪問與
出版簡介(沈懷玉) 19
-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近期檔案整編概況
(莊樹華) 19
- 編撰「《基督教在中國》全世界所藏文獻
指南」的範本(Archie R. Crouch 著,
吳小新·吳梓明譯) 19
- 中研院近史所院史資料室簡介(李慧玲) 20
- 四川及廣東省市檔案館簡介(楊翠華) 20
-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檔案資料述略
(卓嘎) 20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現藏國軍檔案概況
(陳天民) 20
- 〈林獻堂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許雪姬) 20
- ◎問題與討論
「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北美
中國社會史的辯論(陳永明) 20
- 對民初中美科技交流的兩種詮釋(郭文華) 20
- 典範的危機與危機的典範：黃宗智中國
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綜合評述評論座談會
紀錄(陳南之紀錄整理) 20
- ◎新書評介
戰爭與和平：王宏斌著《晚清貨幣比價
研究》之評介(林滿紅) 11
-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王克文) 11
-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by Philip A. Kuhn (宋光宇) 11
-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by Emily Honig
(李盈慧) 11
-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by Linda K. Benson (王大剛) 11

- 許著：《龍井林家的歷史》試評（黃富三） 11
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 (Ursula Richter) 11
 Kamel Shee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Xingjiang Region* (陳永發) 12
 熊十力等：《玄圃論學集》(程志成) 12
 田中一成：《中國の宗族と演劇》(巫仁恕) 12
 蘇雲峰：《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王國璋) 12
 韋慕庭編：《北京俄使館事件所獲文件集》(葉振輝) 12
 Yu Chien-ming, *Jih-chü shih-ch'i T'ai-wan ti nü tzu chiao-yü. & Fujü Shizue, Jih-chü shih-ch'i T'ai-wan Tsung-tu-fu ti li-fan cheng-ts'e.* (Hui-yu Caroline Ts'ai) 12
 熊希齡研究的展開——三種相關出版品評介(張明園) 13
 陳支平著《近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之評介(杜榮佳) 13
 Wong Sin 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達玲玲) 13
 王中江著：《嚴復與福澤諭吉》(王煜) 14
 潘英著：《革命與立憲》(黃克武) 14
 謝國興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翁飛) 14
 久保亨著：《中國經濟 100 年のあゆみ》(陳慈玉) 14
 Charles Hayford,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江勇振) 14
 Edited by Ramon H. Myers,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陳巨擘) 14
 Dorothea A. L. Martin, *The Making of a Sino-Marxist World View: Perce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劉德美) 14
 Betty Peh-t'i,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 Harriet Sergeant, Shanghai: Collision Point of Cultures, 1918-1939* (David Fraser) 14
 李孝悌著：《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楊肅獻) 15
 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合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蘇雲峰) 15
 吳景平著：《宋子文評傳》(陳鋒) 15
 魏秀梅著：《清代之迴避制度》(章慶遠) 16
 Harriet 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 to 1800* (劉祥光) 16
 「五四話語」之反省的再反省：當代大陸思潮與顧昕的《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黃克武) 17
 山本有造著：《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趙祐志) 17
 Horst Gründer, *Welteroberung und Christentum. Ein 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Ursula Ballin) 17
 杉山伸也、イアン・ブラウン編：《戰間期東南アジアの經濟磨擦——日本南進とアジア・歐米》(王文裕) 17
 Chieh-Kuo Pang,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e Taiwan Case*(陳秀珠) 17
 李恩涵著：《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一九二五——一九三一)》(王綱頌) 17
 麥禮謙著：《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張存武) 17
 Key Ray Chong, *Cannibalism in China* (許文堂) 17
 黃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潘光哲) 18
 評《明實錄類纂》(邱仲麟)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關係

檔案選編)及俞玉儲《清代中國和琉球貿易初論》(張存武)	18
Barend ter Harr, <i>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i> (康豹)	18
James W. Tong, <i>Under Heaven-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i> (巫仁恕)	18
李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徐思冷)	19
李雲漢著:《中國國民黨史述》(蔣永敬)	19
柳永琦編:《海軍抗日戰史》(張力)	19
謝國興著:《企業發展與台灣經驗:台南幫的個案研究》(張維安·陳介玄)	19
解除歷史魔咒的迷思——從《開放中的變遷》看金觀濤、劉青峰的中國近代史觀與政治思想(黃克武)	19
楊珍著:《康熙皇帝一家》(賴惠敏)	20
Chae-Jin Lee: <i>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i> (傅葆石)	20
呂芳上著:《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周昌龍)	20
Poshek Fu: <i>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i> (王克文)	20
熊秉真著:《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劉仲冬)	20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0-1991)	11
韓國各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53-1990)(孫準植輯)	12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1-1992)(李達嘉輯)	13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1-1992)(李達嘉輯)	15
◎學位論文	
台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2-1995)	

(李達嘉輯)	19
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士論文(1948-1995)(張隆志輯)	19
◎研究機構介紹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陳謙平)	17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簡介(曾碧霞)	17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89年11月~1991年3月)(李宇平輯)	11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89年3月~1991年8月)(李宇平輯)	12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88年8月~1992年2月)(李宇平輯)	13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0年8月~1992年8月)(游鑑明輯)	14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1年7月~1993年2月)(游鑑明輯)	15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1年7月~1993年9月)(游鑑明輯)	16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2年10月~1994年3月)(江淑玲輯)	17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3年10月~1994年9月)(江淑玲輯)	18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3年11月~1995年3月)(陳南之輯)	19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4年5月~1995年9月)(陳南之輯)	20
◎讀者來函	
墨子刻、馬若孟、魏萼、賴澤涵來函	14
來函	16
◎研究討論	
Some Interpretations of <i>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i> -A Response to Mr. Ch'en Chü-po's Criticism (Thomas A. Metzger)	15
◎出版消息	
國內外新書之出版資訊,見於各期。	
◎通訊目錄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1~10 期總目	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9)

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

李思涵著

精裝 400 元 平裝 350 元

本書榮獲中國歷史學會頒發之第七屆金簡獎

本書係根據中、西、日文中目前所能見及的原始與第二手資料，以對 1925~1931 年歷屆廣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所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廢不平等條約方面的成功與失敗之處，予以評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1)

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到民國十八年)

呂芳上著

精裝 400 元 平裝 350 元

本書榮獲 1995 年中山學術獎

本書以五四運動後十年間，風起雲湧、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為主題，探討本時期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重大變化及政治與學運的密切關係。從該時期的學生運動史，一方面可以看出從事學運的學生，雖具理想色彩，而「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自不能不遭遇重大挫折；另一方面，斯時具高度動員力量的新興政黨，逐步與學生接近，終於導致學運的變質，由學生運動一轉而為運動學生。這一段二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歷史或可對當代學運提供若干啓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2)

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

張壽安著

196 頁 平裝 250 元 精裝 300 元

本書榮獲中央研究院 1996 年輕研究人員著作獎

評審簡評：代表作係從繁雜之原始資料疏理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解釋途徑。充分運用考證及經學方法，彰顯禮學研究的思想性。把問題擺在歷史脈絡中，取得承先啓後的效果。其主要的貢獻：恢復了清中葉儒學思想轉變的一條線索。



橫山英先生對中國近代政治史、社會經濟史有特殊洞見，成果斐然。



周策縱先生以研究五四運動、紅樓夢等專題享譽國際。



王家儉先生是從「海權」與「思想」來考察中國近代史的名學者。

本期要目

抗戰建國暨台灣光復：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

「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戰爭之再檢討：

新資料與新解釋」國際研討會

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

滬杭史學之旅

學人簡介——王家儉、周策縱、橫山英

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國研究

對兩岸研究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史現狀的省思

關於中東鐵路研究評述

新書評介三本——

黃自進著：《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
(1906~1932)》

陶文釗等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

耿雲志、崔志海著：《梁啟超》

台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

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1995.3~1996.1)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94.12~1996.3)

